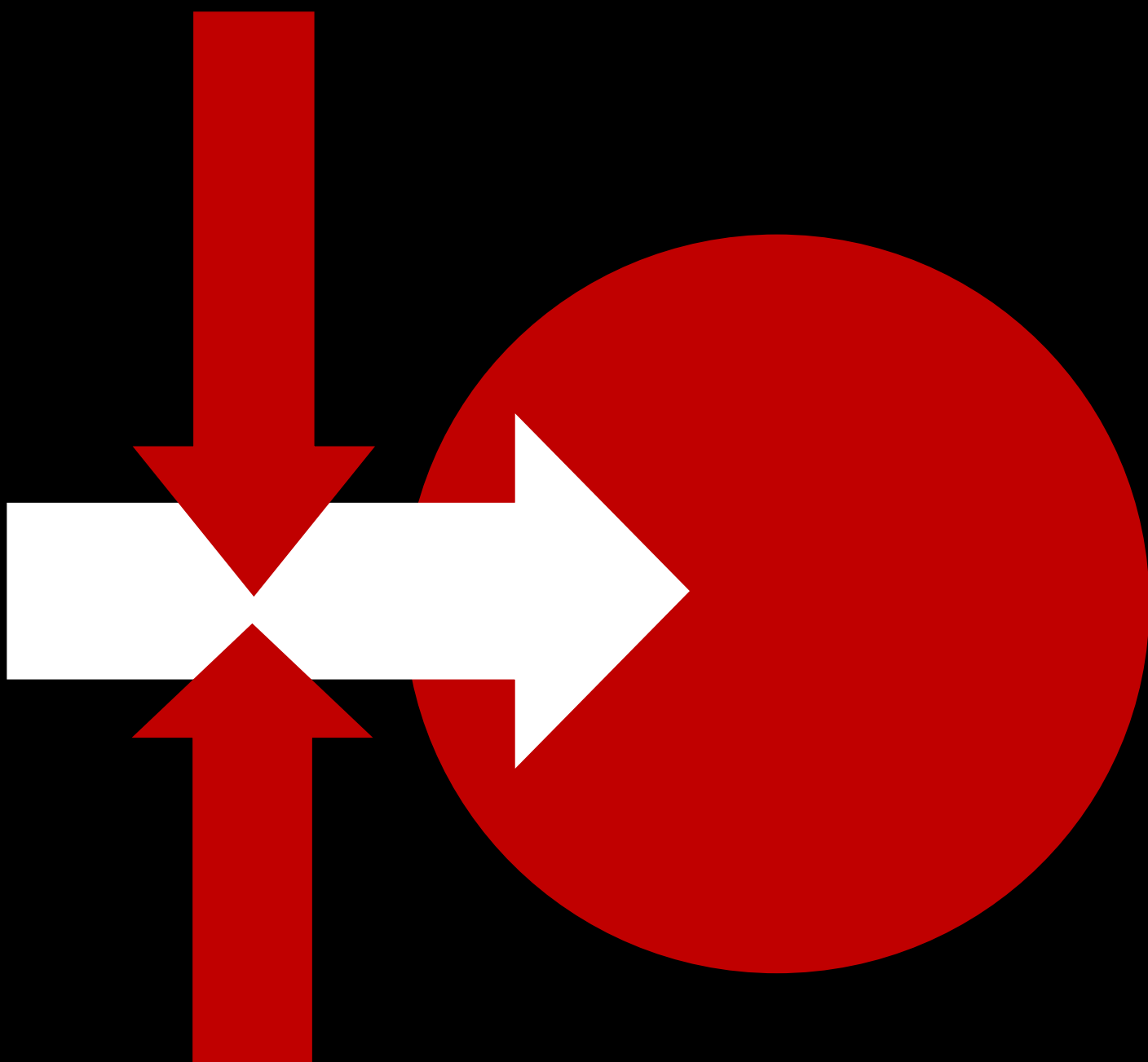


ТЕРРОРИЗМ И КОММУНИЗМ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

[俄]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著
Uni 佐仓绫奈 译校



Л. Троцкий
ТЕРРОРИЗМ И КОММУНИЗ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етербург 1920

列夫·托洛茨基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

根据苏俄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1920年版译出

俄文原文链接: <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033.html>

Л. ТРОЦКИЙ

**ТЕРРОРИЗМ
И
КОММУНИЗ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ЕТЕРБУРГ**

1-9-2-0

L·TROTZKI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ANTI-KAUTSKY



Preis Mk. 6.—

Herausgegeben
vom

Westeuropäischen Sekretariat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IN KOMMISSION

VERLAGSBUCHHANDLUNG CARL HOYM, NACHF. LOUIS CAHNBLEY, HAMBURG 11

目 录

| | |
|--------------------------|-----|
|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方法论的动态民主 | 2 |
| 前言 | 9 |
| 第一章 力量对比 | 30 |
| 第二章 无产阶级专政 | 46 |
| 第三章 民主 | 56 |
| “要么民主，要么内战” | 56 |
| 民主的帝国主义堕落 | 59 |
| 民主的形而上学 | 64 |
| 立宪会议 | 69 |
| 第四章 恐怖主义 | 85 |
| “出版自由” | 95 |
| 战争的影响 | 101 |
| 第五章 巴黎公社与苏维埃俄国 | 115 |
| 公社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不备 | 115 |
| 巴黎公社与恐怖主义 | 119 |
| 专制的中央委员会与“民主”的公社 | 122 |
| 民主公社与革命专政 | 125 |
| 1871年的巴黎工人—1917年的彼得堡无产阶级 | 131 |
| 第六章 马克思和……考茨基 | 152 |
| 第七章 工人阶级及其苏维埃政治 | 161 |
| 俄国无产阶级 | 161 |
| 苏维埃、工会和党 | 167 |
| 农民政策 | 173 |
| 苏维埃政权与专家 | 177 |
| 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政策 | 181 |
| 第八章 劳动组织的问题 | 194 |
| 苏维埃政权与工业 | 194 |
| 关于劳动组织的报告 | 198 |
| 劳动义务 | 199 |
| 劳动的军事化 | 202 |
| 劳动军 | 214 |
| 统一经济计划 | 219 |
| 集体领导制与一人专责制 | 223 |
| 报告的结语 | 227 |
| 第九章 卡尔·考茨基，他的学派与著作 | 247 |
| 代后记 | 259 |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方法论的动态民主

中文版导言

此文献给全书的译者，为他们能够将这本托洛茨基最为被忽视的典籍的中文化做出的努力。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反对考茨基》一书是托洛茨基在1920年为了回击考茨基在1919年著下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道路》中对苏维埃政权和俄国革命的攻击。托洛茨基这本为了俄国革命而辩护的著作长期被日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视为托洛茨基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本书里的托洛茨基过于可怕，近乎“毫无原则”地为革命中的所有专制和不民主要素作出了全面的赞扬和鼓励。这让哪怕是自诩为托洛茨基最忠实的传记作者艾萨克·多伊彻也惊呼这是一本糟糕的托洛茨基文本，也让第四国际的灰衣主教厄内斯特·曼德尔对此缄口不言。所以这样一本一直被沉默的文本直到今天能够以完全中文化的模样出现在公众面前是有着相当的意义的：一部完全本地化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可以让我们走出机翻，摆脱断章取义的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阴谋论的盗版马基雅维利恶魔学，同时这样的一本充满尖锐的呼声以及锋利的革命中的托洛茨基文本，也能让我们走出第四国际官僚和自由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托洛茨基圣徒神话的迷宫，再一次真实的面对俄国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的新世界与新问题的辩论发展。

在这里，应译者的邀请，我将作下一些对于这本书的导读，希望能够帮助本书的读者更好理解这本书的历史意义

首先要提一下这本书的历史背景。这本书写于1920年，在此时俄国内战布尔什维克的困局随着中央白军（邓尼金部）的败退和

中亚白军失去协约国支援慢慢打开。俄国内战最为血腥的 1919 年已经过去，但是粮食困境，交通瘫痪，五千俄里的漫长前线和为了填补这一前线而彻底分散的俄国工人阶级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烙下了许多印记。同时整个俄国社会都被内战所彻底改写，**俄国革命从最开始数百人的宫廷政变，到数千人的议会乱斗，再到数万人的城市暴动。到这本书为止，俄国革命已经演变为了数百万人在战场和前往战场的路上奔波，数千万人的生活和革命变得紧紧相依，俄国革命的迅速社会化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形成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数千万人裹挟着数以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进入一场有关生产者和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革命之中。**

工人们离开工厂，农民们离开农村，贵族们在战壕和泥地里打滚，革命的中央委员们离开议会纷纷前往前线，资产阶级的议员们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和神父一起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革命，**俄国社会里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阶层的人几乎都参与到了这场革命之中**，无论主动与否都必须承担其对自己负责的最高义务和最高权力。这就是托洛茨基在编纂此书时深刻认识到的现实，内战砸坏了俄国社会的每一个部分并让社会化的力量传导到了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而让所有人都必须参与到新社会的组织和重建中。**这种革命和暴力形成的最高强制力主导了俄国从 1918 年开始的几乎每一场政治**，打破了资产阶级政治和最高君主制度的权威，让所有人都从革命和生存的最高强制力中获得自己对自己的授权，组织各种不同的强制力组织——这就是专政专制主义的起源，也是考茨基最为恐惧的革命恐怖的终极来源。

在革命时代，那些被赶下了台的政党，不可能使其自身与那些坚定的统治阶级相妥协，它们将通过与执政政党的疯狂斗争来证明这一点；它不相信执政党的持久性，所以也不被坐牢吓倒。正是

这个简单又明确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普遍地在内战诉诸枪决来解决问题。——本书第 94 页

这篇文章的副标题取为“作为方法论的动态民主”，这也是我认为此书作为最为经典的布尔什维克思想作品的一点。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诚挚向大家推荐列宁在 1918 年同样的批判考茨基的作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和列宁的对考茨基批判的著作共同组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两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点——**从列宁出发的作为世界观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从托洛茨基出发的作为方法论的动态民主**，这两点和考茨基代表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所冲突从而形成了列宁和考茨基以及托洛茨基和考茨基的最为经典的两场论战。

列宁和考茨基的论战是在 1917—1918 年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此时的考茨基在分崩离析的第二国际中发出最后的悲号，用《无产阶级专政》来攻击俄国革命，认为布尔什维克通过紧密的政变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错误使用了苏维埃这种完全不如资产阶级议会的方法实施了独裁统治。而列宁的回应中批判了考茨基的历史观并且转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将无产阶级专政从一种单独的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君主制度或者独裁的统治方法的庸俗对比中拉出——**并将其形容为了一种社会崩塌发展的必然形式：**

即在社会崩塌中的权力分散中，无产阶级一旦自觉或不自觉控制了属于自己的权力，将会不受控地为了保护自身而开展一切可能的方法来稳固自身的存在，而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意义：无产阶级，获得权力，然后为了保护自身继续在分崩离析的世界存在不惜使用一切专制权力，这和政党无关，和某个核心人群无关，而且由于无产阶级高度的社会化存在和革命的迅速蔓延，这将最终和一切阶级的一切人有关。正如同列宁所为自己所例证的，无

论什么样的派别，什么样的革命者和反革命运动，如同彩虹一样的各色政党和派别都将会在革命的社会化中彻底分裂成使用专制方法支持苏维埃和使用同样方法反对苏维埃的两派。一个所有人获得对自己全部权力的世界里必然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全部权力而分裂和奋战，即使是末日般的俄国内战也没有摧毁俄国社会的最后也是最大的社会化因素——革命和最高权力的全面社会化。而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全部含义。

而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托洛茨基则从方法论上补完了这一观点，**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多元的专制洪流的组织方法最后必然都是动态的，无论是形式上还是人群上的绝对的没有准则的动态的民主模式。**动态民主方法和静态民主方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民主主义的一切方法所绝对对立，不再是 1 或者 0 的大数据显示，也不是考茨基所梦想的 52%和 48%，而是所有人必须通过掌握自身全部权力的努力来进行的政治方法，无关合法性也无关某种绝对真理的最高意志授权。俄国革命的多样性的专制苏维埃政治洪流对于托洛茨基毫无疑问就是这种动态的政治的显现，围绕在苏维埃政治上实行地方的和群体的专制主义的数百万计的工人农民群体以及依附于他们之上的革命或者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了全新的俄国革命政治的所有选民，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在相信用选票来维护怎么样的政府，而是使用手中的枪炮和社会化生产力量来怎么样建立新的世界。托洛茨基公开承认了这种全面的权力分散和自我赋权的无产阶级的群体多元专制，由此他愿意在这个基础上为一切布尔什维克的强制力革命辩护——劳动组织的军事化、劳动军的组织以及苏维埃政治的多层次结构，因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切强制方法都来自于最底层的最为现实的苏维埃专制权力的直接赋权，无论是工会紧急生产委员会还是地方的三人、五

人专制小组。

如果布尔什维克的强制政治被动态的无产阶级所敌视，那就让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彻底停摆，如果布尔什维克的政权被社会化地控制了专制权力的无产阶级重新联合起来反对，那就让布尔什维克的政权灭亡，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的强制权力运作下去，他的政权也持续运转，那么布尔什维克必然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他背后数十万的核心工人、数百万的参战农民以及更多的在布尔什维克后方重建社会的生产群体付出一切需要的代价求得生存。托洛茨基公然宣布了这一让后世托洛茨基主义者胆寒的革命宣言，并且公开攻击了合法性政治本身，布尔什维克依靠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上升和俄国资产阶级社会衰亡的极端对立的社会崩塌和权力社会化中生存，一切神赐权力的合法性都在这本书中被贬低和嘲讽。而恐怖主义自然也是这种强制力的一部分，在一切权力彻底分割的无产阶级全面的但又分散的专制年代，谁更能够通过任何方法集合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权力，谁就能够在动态的多元政治中拔得头筹。

为此托洛茨基不吝嗇于谈论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衰败和孟什维克的灭亡。正如他在书中阐述的，如果可以让德国军国主义踩着俄国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的人头获得胜利，布尔什维克完全愿意踩着左翼机会主义的人头取得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一种大胆而诚实的陈述，而且只能够在布尔什维克的新世界观中取得答案，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世界观的多元专制政权以及动态民主作为方法论的多层次的强制力政策组成的各色的但是目的泾渭分明的反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形成了托洛茨基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的最为经典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对于俄国内战最为贴切的分析角度。

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创造的新世界倒在了新世界的新问题之中，但是这并不证明考茨基带有西方社会民主党陈腐的偏见的谩骂是正确的，我们同样的可以回到这本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得到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他们所竭力得出的现实主义的解决方法。正如托洛茨基对劳动军的辩护中提及的劳动军成立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铁路系统的瘫痪，让前往乌拉尔山作战的红军部队无法迅速回转到南方或者中亚的战场上服役，而同样的中亚的红军也没法迅速前往乌克兰阻止波兰白军进军，所有他们在铁路运力恢复之前尽量自发分散为当地的生产苏维埃服务来喂饱自己以及服务于战时生产。

俄国在内战中不仅脱离了电气时代，甚至连恢复蒸汽时代都充满困难，如果不让俄国彻底堕落成一个农村国家，布尔什维克作为工业无产阶级力量的代表，也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为了自己的生存和阶级性属性的存续比起其他反革命或者革命力量他需要最低程度的维护工业生产的流通、生产和交换体系，只有这样俄国还能保留工业的底子从而避免无产阶级的灭绝。在这个废墟上维护生产和维护阶级生产的基础上布尔什维克开始处理新世界的新问题，付出必要的代价让苏维埃工人阶级继续存在，哪怕为此付出官僚主义或者其他的代价（新经济政策）。

布尔什维克是否为他自己的生存支付了过多的代价？这个问题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布尔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不害怕任何历史的决断时刻并愿意果断的背叛自己而行动，正如同此书中回击考茨基的比喻——即使没有（也不可能会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操作指南和管理国家的学校，无产阶级也必将登上历史的列车并且操纵作为方向盘的国家。

而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一正常资本主义社会所恐慌的

一切政治行为的总和——的必然联盟，也是出于一个这样的前提之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把个人的生命视为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存在的社会中，但这个社会同时对个人消耗生命而产出的劳动力被剥削、被出售、被消费而视而不见；我们被教导人人平等，但是却对财富满盈的罗斯柴尔德和贫困的矿工的“平等”的状况泰然处之；我们被剥削，也被消费，被称为社会的主人，也被贬为生产的奴隶

所以，托洛茨基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对恐怖主义和革命专制主义的出色辩护，必将以多元的方式流传下去。

Communard

2022年1月

前言

写这本书的契机，是由于考茨基发表了一本同名的学术诽谤作品¹。这项工作是在与邓尼金²和尤登尼奇³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刻进行的，写作也不止一次地被前线发生的事件打断。在那些困难的时日里，也就是在写第一章时，苏维埃俄国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纯粹的军事任务上。我们不得不把捍卫社会主义经济创造可能性的任务摆在首位。除了满足前线的需要以外，我们在工业方面能做的事情不多。我们不得不主要通过和考茨基的政治诽谤进行类比来揭露他的经济诽谤。在这项工作开始时，也就是差不多一年以前，我们主要通过指出俄国工人在内战前线的高度纪律性和战斗英雄主义，来驳斥考茨基说俄国工人不适于劳动纪律且没有经济自我约束能力的奇谈怪论。这一经验足以驳斥小资产阶级的诽谤。但过了几个月后的现今，我们可以直接运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生活中得出的事实和论点了。

当军事压力一缓解，也就是我们在击溃高尔察克⁴和尤登尼奇并成功地对邓尼金进行决定性打击之后，在与爱沙尼亚签署和约⁵并与立陶宛和波兰⁶开始谈判以后，整个国家就转向了经济方面。仅仅是迅速而集中地将注意力和精力从一项任务转移到另一项任务上的事实——另一项任务具有深刻的不同，但需要做出的牺牲相比之下却不是最小的——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苏维埃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尽管已经经历了各种政治上的考验、物质上的灾难与惨祸，但劳动群众离政治上的腐朽、道德上的堕落或冷漠还无限远。这是因为，这个制度虽然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却使他们的生活有了意义，并赋予了他们崇高的目标，使他们保持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张力，能够将注意力和意志集中在集体任务上——这

前言

是史无前例的。目前，所有工业部门都在为建立严格的劳动纪律并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党组织、工会、工厂和车间的管理委员会都在这个领域竞赛，得到了整个工人阶级舆论的一致支持。一个又一个工厂通过了自己的会议决定，自愿延长了每日工作时间。彼得格勒⁷和莫斯科树立了榜样，而各省则向彼得格勒看齐。义务星期六和义务星期日——在指定的休息时间内自愿且无偿工作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不断地吸引了数十万男女工人参与其中。根据专家的意见和数据证明显示，义务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劳动强度和生产率特别高。

在党内和青年联盟中自愿动员进行劳动任务表现出来的热情，同过去为执行军事任务进行的动员表现出来的热情是一样的。劳动志愿补充了劳动义务并使其变得高尚。新成立的劳动义务委员会将自己的网络覆盖了整个国家。居民越来越广泛地被吸收进大规模的工作当中（为路扫雪、维修铁路、伐木，劈柴和运柴、简单的建筑工作、采伐页岩和泥炭），并且这一吸收越来越按计划进行。如果没有高涨的劳动热情，不断广泛地吸收军事单位参与劳动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不错，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凋敝、精疲力竭和饥贫交加的环境中。但这并不是反对苏维埃制度的论据：所有的过渡时代都会有类似的悲剧性特征。每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耗尽自己的力量之后，并不会简单地退出舞台，而是被激烈的内部斗争暴力扫荡，这种斗争直接给参与者带来的困难和痛苦往往比被反抗的人更多。

从封建经济过渡到资产阶级经济，乃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上升，是一张骇人听闻的殉道者列表（Мартиролог）。无论农奴群众在封建主义下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无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下

的生活多么艰难，劳动者的苦难也从未达到像旧的封建体制被强行打破并被新体制取代时的程度。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苦难大众的冲击下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很长一段时期内加深了他们的苦难，把他们的苦难带到了一个极端。还能怎么样呢？

以高层的人事改组结束的宫廷政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几乎影响不了国家的经济生活。而将数百万工人拖入其漩涡的革命则是另一回事。社会的形式无论是怎样的形态，都以劳动为基础。革命会中断人民群众的劳动，吸引他们长期参与斗争，破坏他们的生产联系，从而打击了经济，不可避免地降低在它突然出现时的经济水平。社会变革越深刻，吸引的群众越多，持续时间越长，对生产机器的破坏越越大，对社会储备的破坏力就越强。因此，从中可以得出的、不需要证明的唯一结论，就是内战对经济有害。但是，如果要是把它计在苏俄经济体系的账上，就相当于把新人类的诞生时母亲分娩阵痛归咎于这位生下他的母亲。任务是减少内战。而这一点只能通过行动的果断性来实现。但是，考茨基的整本书正是针对革命的果断性而写的。

* * *

自本书出版以来，不只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或推进了一些意义重大的进程，摧毁了考茨基之流的最后基础。

在德国，内战越来越具残酷的性质。旧党和工人阶级职业民主派的外部组织力量不仅没有为考茨基的现行理论得出的更和平、更“人道”的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相反，它成为了痛苦不断加剧的斗争的持久性质的主要缘由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越是背负保守且沉重的包袱，忠诚于它的德国无产阶级就得在一系列对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连续攻击中耗费越多的精力、生命和鲜血，以便

前言

在斗争过程中为自己创造一个能够领导它取得最后胜利的新的、真正革命的组织。德国将军的阴谋、他们瞬息即逝的夺权以及随后发生的血腥事件再度表明，在帝国主义和内战的条件下，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是可悲的、无足轻重的装模作样。已经过气的民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缓解不了任何矛盾，治愈不了任何创伤，防止不了右翼也防止不了左翼的叛乱——它是无力的、微不足道的、虚假的，它只为迷惑人民的落后部分——特别是小资产阶级而存在。

考茨基在他书中最后部分表达的希望，即西方国家，“具有古老民主制度”的法国和民主国家取得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一幅健康的、正常的、和平的、真正的考茨基式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图画，是最荒谬的幻想之一。胜利法国的所谓共和民主体制目前在世界上是有史以来最反动、最血腥、最腐败的政府。它的内政和它的外交政策一样，都建立在恐惧、贪婪与暴力之上。另一方面，法国无产阶级比任何阶级都更容易受欺骗，他们越来越转向了直接行动的道路上。共和国政府对总工会⁸的镇压表明，即使是工团主义中的考茨基之流——即假情假意的妥协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也没有任何合法的位置。群众的革命化、私有者的残酷无情和中间集团的崩溃——这三个平行的过程，既是激烈内战将临的条件，也预示了激烈内战的爆发——最近几个月正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在法国全速进行。

在英国，事件虽然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却遵循着同样的基本路径。在其统治阶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压迫和掠夺整个世界的这个国家，民主的公式甚至失去了它作为议会骗子招摇撞骗工具的意义。在这一领域里最高级的专家劳合·乔治⁹如今不是在呼吁民主，而是呼吁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私有者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在他的论点里没有一丝“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有的

那种民主浆糊。劳合·乔治站在阶级现实的根基上，因此讲的也是内战的语言。英国工人阶级带着其特有的沉重的经验主义，正在接近其斗争中的又一篇章——在这一篇章面前，宪章派¹⁰留下的最英勇的一页也将变得苍白无力，就像巴黎公社¹¹在法国无产阶级近乎胜利的起义面前也将变得苍白无力一样。

正是因为历史事件在这几个月里以其严酷的能量发展了自己的革命逻辑，本书的作者不禁扪心自问：还有必要出版这本书吗？还有必要在理论上反驳考茨基吗？还需要在理论上为革命恐怖主义辩护吗？

很遗憾，答案是“是的”。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即使对经验主义的英国来说，工人阶级也曾有过一个时期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概括其经验和任务的理论。同时，心理，甚至是无产阶级的心理却囊括了保守主义的可怕惰性——更何况，在这一情况下，这里指的就是唤醒了无产阶级、直到最近还如此强大的第二国际各党派的传统意识形态。在官方社会爱国主义¹²（谢德曼¹³、维·阿德勒¹⁴、雷诺德尔¹⁵、王德威尔德¹⁶、亨德森¹⁷、普列汉诺夫¹⁸等人）崩溃后，国际考茨基主义的徒子徒孙¹⁹（德国独立派²⁰、弗里德里希·阿德勒²¹、龙格²²、相当一部分意大利人、英国“独立派”²³、马尔托夫集团²⁴等）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稳定的平衡依赖的主要政治因素。可以说，整个文明世界劳动群众的群众意志，直接受到事件进程的刺激，目前同上述的人士的意识相比，无可比拟地更加革命，但议会主义和妥协主义的偏见仍然笼罩在他们身上。

现在（1920年5月）乌云又笼罩在了苏维埃俄国上空。资产阶级波兰通过进攻乌克兰²⁵开启了世界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全新攻势。又一次摆在革命面前的巨大危险和战争，再次把俄国考

前言

茨基派推向了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上——也就是说，实际上走上了帮助世界上扼杀社会主义俄国的人的道路。在无产阶级革命干得漂亮的时候，就试图帮助它；在它特别需要帮助的时候，则千方百计地阻挠它——这就是考茨基之流的命运。考茨基不止一次地预言了我们的覆灭，而这一覆灭则是考茨基理论正确性的最好证据。这位“马克思的衣钵传人”已经墮落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唯一严肃的政治纲领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崩溃的投机。

他们又一次打错了算盘。共产主义工人领导的红军将打败资产阶级波兰——这将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力量的崭新展示，将会粉碎性地打击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怀疑主义（考茨基之流）。尽管外部形式、口号和色彩纷繁杂乱，但我们的现代历史将其进程的主要内容简化到了极致——将其简化为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皮乌苏茨基²⁶不仅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波兰大地主而战，不仅为资本主义的财产和天主教会而战，而且也为议会民主、渐进的社会主义，为第二国际、为考茨基有权利继续担任资产阶级的批判闲饭客而战。我们是为共产国际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战。双方下的赌注都很高。这场斗争将艰苦卓绝。我们希望获得胜利，因为我们有获得胜利的一切历史权利。

1920年5月29日，莫斯科

注释：

[1]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卡尔·考茨基对革命的自然历史的贡献 (!)》，柏林，1919年版。——作者注

[2] 邓尼金是以自己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斗争而闻名的反革命将军之一。1919年，他成功占领了顿河，清除了乌克兰的苏维埃军队，占领了库尔斯克和奥廖尔，并逼近共和国的兵工厂图拉，威胁到了莫斯科。然而，

随着苏维埃俄国动员全部力量，邓尼金被赶离红色首都，被压制到南方，最后被打败。邓尼金军队那可怜的残余力量转移到了克里米亚。邓尼金本人移民英国，让白卫军总司令弗兰格尔伯爵来取代自己的位置。英国国王给他授予了勋爵头衔。——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 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 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 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 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 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 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 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 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 大举进犯莫斯科, 并几乎攻占莫斯科, 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 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 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 比利时, 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 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中译者补注 2]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 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 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 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 参加过日俄战争, 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 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 被排挤出白军, 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 当年年底, 白军被彻底击溃后, 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3] 尤登尼奇是沙皇军队的一名将军, 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曾担任高加索前线的总司令。十月革命后, 他变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敌人。他主要以

其夺取彼得格勒的尝试而闻名。1919年，在英国的支持下，尤登尼奇成为了在爱沙尼亚领土上建立的“西北政府”军队的首领，并两次试图进占彼得格勒。尤登尼奇在5月16日初次尝试，结果占领了芬兰湾南岸的克拉斯纳亚戈尔卡，不过这第一次尝试在1919年8月5日红军的报复性打击下陷入了瘫痪——红军占领了爱沙尼亚边境城镇扬堡。1919年10月12日至25日，尤登尼奇第二次试图攻占彼得格勒时，恰逢邓尼金向莫斯科方向的进攻进展顺利。尤登尼奇打到了普尔科沃，却在那里被红军打到永不翻身。——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 Николаевич Юденич, 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俄国步兵上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生于莫斯科。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和总参学院。1902年起任团长、旅长，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历任军务总监、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1915年1月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同年晋上将。1916年参与指挥埃尔祖鲁姆战役和特拉布宗战役。1917年3月升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5月退役。1918年侨居芬兰，后迁居爱沙尼亚。1919年7月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

[4] 高尔察克是沙皇舰队的海军上将，前黑海舰队司令官。苏维埃政权在西伯利亚失败后，在协约国的坚持下，他被那里建立的执政府任命为战争部长。然而，1919年11月18日，高尔察克策划了一场政变，摇身一变成了“西伯利亚最高执政”。他在组织了一支数量庞大的白军后，夺取了整个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从1919年5月开始，他接连挫败。红军接连不断地攻占城市。整个西伯利亚都布满了游击队，后方有许多农民起义。结果就是高尔察克的军队被击溃并被压制进腹地深处。最后，在1920年1月，他的军队在伊尔库茨克被打败，他本人在下乌金斯克被俘并在2月7日被伊尔库茨克革命委员会下令枪毙。——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5] 1919年底尤登尼奇彻底失败，迫使爱沙尼亚于1920年2月2日和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爱沙尼亚得到了民族边界、森林租让权和1500万金卢布。作为回报，爱沙尼亚同意允许苏维埃俄国不受阻碍地使用其贸易港口，并允许俄国货物自由过境。与爱沙尼亚签订的和平条约历史意义在于，它是除了《布列斯特条约》之外苏维埃共和国与资产阶级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这份条约是《塔尔图和约》（俄语：Тартуский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СФСР и Эстонией；爱沙尼亚语：Nõukogude Venemaa ja Eesti vahelise sõja lõpetanud rahuleping / Tartu rahu）。

[6] 这些谈判在邓尼金和尤登尼奇被打败后就立刻开始了。1920年5月，莫斯科举行俄国—立陶宛和会。而波兰方面情况更加复杂。苏维埃政府曾三次试图与波兰进行和平谈判（1919年12月22日、1920年1月28日和同年2月2日）。然而，波兰以各种方式拖延和谈，然后在1920年5月突然进攻了乌克兰发动，占领了基辅。之后的和谈进程是在战后进行的。1920年8月17日，俄国和波兰代表团在明斯克第一次谈判。1920年9月21日，谈判地点转移到里加，10月12日双方在那里签署了初步和约。——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这份条约是《里加和约》（波兰语：Traktat Ryski，俄语：Рижский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乌克兰语：Ризький мир）。

[7] 原文误作“彼得堡”。——中译者注

[8] 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于 1895 年在利摩日成立，是法国工人组织从互助协会发展到现代类型工会的结果。但一开始，总工会影响力有限，因为有劳工交易所协会与它并存——它依靠的是地方性的工会间协会，即“劳工交易所”（*Bourse de Travail*），这些交易所与工人群众有着良好的联系，在他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1902 年，蒙彼利埃的大会才实现了工会运动的实际统一——当时两个组织在总工会的共同名称下合并了。

直到战前，法国的工会运动在各方面都算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典例。在组织上，总工会基于自治主义和联邦主义的原则。体现这些原则的一个例子就如——总工会的全国委员会由每个行业组织派出的一名代表组成，无论其规模、性质和作用。然而，全国委员会并不是工人群众斗争的权威领导者，而只是充当地方工团、联合会的顾问、帮手等角色。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是“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e*）的结果，其表现为夺取生产工具的总罢工。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承诺了如果战争爆发会参战。总工会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斗争，也拒绝与政党产生任何联系。

1914 年的战争暴露了工团主义的内部弱点。革命的措辞和过往的军国主义威胁并没有阻止总工会领导人成为最热心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积极帮助自己的政府。由于受到了战时经验的教训，法国工会运动开始逐渐摆脱工团主义思想。1921 年底，总工会分裂为革命派和改良派两部分。革命部分改名为团结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unitaire*），联合了 60 万工会成员中的 35 万会员。在 1922 年的圣埃蒂安大会上，统一工会通过了加入了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1922 年 11 月在赤色劳工国际的第二次大会上签署了加入的协议。从那时起，统一工会把它的革命路线理得越来越顺了，同时也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残余势力做了斗争。同时，团结总工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也在上升。到 1923 年 9 月 1 日，它已经有 44.8 万成员，而改良派的总工会人数则几乎没有变化（25—29 万人）。——俄文版编者注

[9] 劳合·乔治直到 1922 年 11 月，长年担任英国政府的领导人。他从一个自由主义改革派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战时和战后成为了帝国主

义资产阶级的领袖。在整个战后期，劳合·乔治通过试图用妥协的方法来恢复资本主义的平衡。他虽然支持用军事手段干预苏俄，但深信这种方式用处不大，于是试图通过和平的经济压力来把苏俄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他最近的一次冒险，即热那亚会议，以失败告终。1922年10月，由于自由党败选，劳合·乔治被迫辞职，让位于保守党。现在他是自由党右翼的领袖。

——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戴维·劳合·乔治 (David Lloyd George, 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财政大臣、军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职。

[10] 宪章运动是1836—1848年在英国兴起的一场工人运动，起因是经济危机和失业。

为了通过立法改善工人阶级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宪章派努力争取政治权利，主要是争取英国下议院的民主化。1838年，第一份由一百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宪章）被提交给众议院，在请愿书中，宪章派提出了以下主要要求：一切男性的选举权、废除对代表的财产资格审查、平等的选区、代表的报酬和每年的选举。议会拒绝了宪章派的要求，导致工人阶级以示威、集会和罢工的形式强烈抗议。在1842年和1848年，类似的命运也降临到了另外两个宪章派的请愿活动上。尽管如此，作为工人阶级在自己旗帜下的第一次独立行动，宪章派运动影响了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从那一刻起，英国的封建领主和大资本家被迫对工人阶级做出越来越多的让步，而工人阶级并没有忘记先驱者——宪章派的行动。宪章派的主要领导人是奥康纳和奥布莱恩。——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费格斯·爱德华·奥康纳 (Feargus Edward O'Connor, 1796年7月18日—1855年8月30日)，英国宪章运动领导人。1820年起开始担任律师。1831—1832年期间积极参与第一次议会改革运动。1832—1835年、1847—1852年任下议院议员。1833年起参加宪章运动。1837年创办《北极星报》(Northern Star)，多次被捕，1840年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846年创办宪章合作土地公司，试图推行土地改革。1852年因梅毒引起精

神失常，在下议院殴打三名议员，事后被解除职务并被送入精神病院。1854年出院。1855年去世。

[中译者补注 2] 詹姆斯·布伦特·奥布莱恩 (James Bronterre O'Brien, 1805年?月?日—1864年12月23日)，英国宪章运动领导人。1830年参加激进改革协会，逐渐开始参与宪章运动。1836年加入伦敦工人协会，开始为《穷人卫报》(The Poor Man's Guardian)工作。1838年起为《北极星报》工作。1840年被捕并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847年《穷人卫报》停刊后逐渐脱离宪章运动。晚年穷困潦倒。1855年病逝。

[11] 巴黎公社存在于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这段时间。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空前失败、梯也尔反动政府的背叛与无能、巴黎劳动群众艰难的粮食状况——他们徒劳地期望政府资金、食品征用及其他各种社会措施，这些因素导致巴黎公社出现。公社以其激进的立法而引人注目，废除常备军、政教分离等法案可以体现这一点。

关于普查被工厂主遗弃的工厂和其剥削计划的法令、公职人员与工人工资相同的法令等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但在公社时期，资本主义还没有灭绝，仍然蕴藏着强大的发展力量。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也还没有足够觉醒并组织起来。经过8天的英勇抵抗，巴黎公社失败了。胜利的资产阶级残酷地屠杀了起义的工人。

巴黎公社发挥了世界历史性的作用。它在不具备完善的形式下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让人们不再幻想无产阶级和平掌权。公社社员低估了统治阶级将进行的疯狂抵抗——统治阶级不会自愿放弃其统治利益。同时，公社强调了政党集中领导的必要性，如果没有政党的集中领导，最强大的自发运动也很容易被打败。这些都是公社的主要教训。请参阅马克思在其小册子《法兰西内战》中的详细描述，也请参阅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俄文版编者注

[12] 社会爱国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影响着第二国际所有社会民主党的思潮。它的观点的实质可以归结为：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战争时期都有义务保卫祖国，因此在战争期间要与统治阶级达成国内和平。国际社

会主义中的这种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在战争期间表现得如此明显，是由 1871—1914 年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时代（从巴黎公社到帝国主义战争）准备起来的。在这个“有机”发展的时期，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中形成了一整批的特权工人、党和工会的官僚，打破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成为机会主义潮流的来源。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危机最终暴露了在第二国际存在期间一直在破坏自身的内部矛盾，并使其大多数人倒退到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完全决裂的地步并与资产阶级紧密结合。

列宁同志把社会爱国主义的社会经济背景定义为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体现，他说：“机会主义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各种特点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的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直接继续和顶点，因为这是为维护大国民族的特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加强对其它民族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保住和巩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希望与此相适应的策略在战争时期的自然的继续，这就是当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中译者注：引文来自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增订版第 26 卷第 259—260 页。]——俄文版编者注

[13] 菲利普·海因里希·谢德曼（Philip Heinrich Scheidemann，1865 年 7 月 26 日—1939 年 11 月 29 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 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1919 年 2 月 13 日——1919 年 6 月 20 日任魏玛共和国首届总理。1919 年 11 月 19 日——1925 年 10 月 1 日任卡塞尔（Kassel）市长。1920—1933 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辗转流亡奥地利和丹麦，1939 年死于哥本哈根。——中译者注

[14] 维克多·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也是其机关报《工人报》（Arbeiter Zeitung）的编辑。早在战前他就已经开始向修正主义发展，而在战争期间，他成为了社会调和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一大支柱。——俄

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维克多·阿德勒 (Victor Adler, 1852 年 6 月 24 日—1918 年 11 月 11 日),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一战中公开支持奥匈帝国参战。1918 年任临时政府中的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15] 皮埃尔·雷诺德尔是战争期间法国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饶勒斯去世后, 雷诺德尔在战争初期就被提拔到这一职位上。作为政客、“党的厨房”的投机商, 他很适合背叛与政治交易的年代。雷诺德尔领导着社会爱国主义的大多数人, 持续到 1920 年的图尔大会——当时社会爱国主义者变成了少数人, 被迫与共产主义多数派分裂。如今, 即使在分裂的社会党队伍中, 雷诺德尔也领导着右翼, 公开呼吁该党与资产阶级政客组成联合政府。——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皮埃尔·雷诺德尔 (Pierre Renaudel, 1871 年 12 月 19 日—1935 年 4 月 1 日), 法国社会党右派改良主义领袖之一。1933 年因主张社会党参加激进党政府, 带领一部分人脱离了社会党, 组织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 (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Union Jean Jaurès), 1935 年该党与共和社会党 (Parti républicain-socialiste) 和法兰西社会党 (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 合并为社会主义共和同盟 (Union socialiste républicaine), 社会主义共和同盟后来参加了人民阵线。——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 2] 俄文原书正文和注释中提到的“法国社会党”, 其实是指法国社会党 (1969 年正式成立) 的前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为了尊重原文, 我们不作改动。

[16] 王德威尔德是比利时社会主义者、第二国际的最高领导人。王德威尔德甚至在战前就已经与饶勒斯一起领导了第二国际的改良派。战争最终使他背叛了社会主义。成为王室大臣后, 王德威尔德毫不吝啬地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中鼓动 (在沙皇大使的祝福下), 支持罗曼诺夫的战争。2 月后, 王德威尔德前往彼得格勒, 向社会主义者施压, 要求他们支持战争。1919 年, 此前一直高喊民主、民族自由等口号的王德威尔德签署了《凡尔赛条约》——这条约意味着协约国公开掠夺德国。王德威尔德始终敌视苏维埃俄国。他

在 1922 年著名的审判中为社会革命党人辩护，尤为体现了他对苏俄的敌视。
——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艾米尔·王德威尔德 (Émile Vandervelde, 1866 年 1 月 25 日—1938 年 12 月 27 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 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 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 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 3 次全国总罢工 (1893、1902 和 1913 年)。1894 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 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 1900 年 9 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 月 4 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 年至 1937 年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 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17] 亨德森是英国工党的领导人之一。亨德森向来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对宗教问题情有独钟。在工党内，亨德森一直主张阶级调和，在战争期间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宣传“把战争坚持到胜利”的思想。在战后的第二国际中，亨德森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汉堡举行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统一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亨德森和执行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成员一样，在之后被批准“休假”，加入麦克唐纳的内阁。——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阿瑟·亨德森 (Arthur Henderson, 1863 年 9 月 13 日—1935 年 10 月 20 日)，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一个纺织工人家庭，十岁丧父。十二岁开始当工人。1906 年参与成立工党。1908—1910 年、1914—1917 年、1931—1932 年三次出任工党领袖，并曾担任不管大臣、外交大臣等职务。

[18] 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 1857—1918)。1883 年创建了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他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普列汉诺夫的主要贡献，除了对俄罗斯工人运动作用的精彩论证

外，还涉及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主要问题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最著名的是他的以下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我们的意见分歧》《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文集《20年》《对于我们批评者的批判》。普列汉诺夫长期以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领袖。战争期间，他像第二国际的其他主要领导人那样，成为狂热的护国主义者。——俄文版编者注

[19] 国际考茨基主义。在战时与战后，主要国家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支部有两个边缘派别：公开的机会主义者、一贯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前者形成了一个中派的、摇摆不定的中心集团，而他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领袖是考茨基。实质上，其他国家的所有中派政党基本上都以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考茨基的立场为指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他们称作国际考茨基主义派。——俄文版编者注

[20] 作者指的是德国独立党[中译者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考茨基、哈泽、希法亭和雷德布尔。德国独立党成立于战争期间，因对战争的态度和战争拨款的问题脱离了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十一月革命后，德国独立党再次与谢德曼派联合，加入德意志共和国[中译者注：指魏玛共和国]临时政府。1920年，在哈雷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德国独立党分裂：少数派成立了一个特殊团体，后来与旧的社会民主党合并；多数派加入了第三共产国际，成为统一的德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战后任独立社民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

[中译者补注 2] 胡戈·哈泽 (Hugo Haase, 1863 年 9 月 29 日—1919 年 11 月 7 日), 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犹太家庭, 曾在柯尼斯堡当律师, 被称为“穷人的律师”。1897 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 1911 年当选为社民党主席, 1912 年当选为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1914 年不愿支持战争拨款法案, 但迫于党的纪律, 最后还是投了赞成票。从 1916 年起成为中派的发言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担任其领袖, 1918 年 11 月—12 月担任人民全权代表。他是独立党右翼领袖, 后来在国会台阶上被民族主义者暗杀。——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 3] 格奥尔格·雷德布尔 (Georg Ledebour, 1850 年 3 月 7 日—1947 年 3 月 31 日), 曾当过教师、演员和新闻工作者。他当过潘科夫 (Pankow) 的议员, 一战前是激进派, 一战中属中派, 对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斯派不友好。1917 年参加独立党, 1918 年领导柏林的独立党组织, 并领导着革命工长组织。1919 年 1 月担任革命委员会联合主席。1920 年, 由于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发生分歧, 与独立党左派决裂。1922 年没有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33 年流亡到瑞士, 1947 年于瑞士逝世。——中译者注

[21]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的儿子, 退出了所谓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战争爆发前, 阿德勒主要从事科学工作, 直到战前才积极投身奥地利工人运动。社民党战前的投降行为给阿德勒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并没有让他成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此表示反对的方法不是在群众中开展工作, 而是通过个人的恐怖行为——刺杀斯图尔克首相。奥地利的战败和十一月革命的失败几乎完全消除了奥地利社民党内部的分歧, 从那时起, 阿德勒一直利用他的道德权威来为奥地利社民党的背信弃义政策辩护。1920 年底, 阿德勒领导了不伦不类的第二半国际的建立工作。在第二半国际与第二国际合并后, 他当选为新合并后的国际的书记。[中译者注: 此处的第二国际指 1919 年在瑞士组建的伯尔尼国际, 又称黄色国际, 并非 1889 年在法国建立的第二国际。]——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冈·阿德勒 (Friedrich Wolfgang Adler, 1879 年 7 月 9 日—1960 年 1 月 2 日), 他是维克托·阿德勒的儿子, 1897 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1907 年起任《斗争》(Der Kampf) 杂志编辑, 1911 年任奥地利社民党维也纳组织的书记, 1916 年 10 月 21 日刺杀了奥地利首相卡尔·冯·施图尔克, 被判死刑, 后改判 18 年徒刑。1918 年革命后获释, 在革命期间曾任工人苏维埃领导人, 后当选为奥地利国会议员。第二半国际和第二国际合并后, 他曾任总书记, 时间长达 15 年。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 1946 年退出政界, 1960 年死于苏黎世。

[中译者补注 2] 卡尔·冯·斯图尔克 (Karl von Stürgkh, 1859 年 10 月 30 日—1916 年 10 月 21 日), 奥匈帝国政治家。1909—1911 年担任教育大臣, 1911 年 11 月 3 日出任奥匈帝国首相。1916 年 10 月 21 日被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暗杀身亡。

[22] 让·龙格是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法国著名社会主义者沙尔·龙格的儿子和马克思的外孙。

在战争期间, 让·龙格奉行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和妥协主义的政策, 这种政策也许比他的精神父亲考茨基的方针显得叛徒得多。龙格不仅发声支持战争拨款, 而且一直试图将法国的战争描述为防御性的, 宣称战争的目的是捍卫民主。龙格虽然反对资产阶级政党, 但也只不过是反对抗议篡改战争目标。当以法国为首的协约国干预和封锁苏维埃共和国时, 龙格为了不至于彻底在具有革命意识的法国工人眼里名誉扫地, 被迫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他甚至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原则, 当然他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步骤来实现这些原则。他在组织问题上同样采取了前后不一和妥协主义的路线: 虽然用最激进的方式与开明改革派和社会爱国者打嘴炮, 但实际上却认为有必要与叛徒托马和类似的政治团体保持团结。自 1920 年法国社会党因对第三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而发生分裂以来, 龙格一直领导该党的右翼少数派, 与从该党分离出的多数派 (即法国共产党) 作着系统性的斗争。——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让·龙格 (Jean Longuet, 1876 年 5 月 10 日—1938 年

9月11日), 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 1844—1883)与夏尔·龙格(Charles Longuet, 1839—1903)之子, 出生于伦敦, 1881年随父母返回法国。在家庭影响下, 少年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 1897年参加了盖德和保尔·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 一战期间, 他虽然持和平主义立场, 但总是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后继续留在社会党内, 支持第二半国际。

[中译者补注 2] 阿尔贝·托马(Albert Thomas, 1878年6月16日—1932年5月8日), 出身于面包师家庭。1902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04年起在《人道报》工作。1910—1921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12—1914年任尚皮尼市长。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5—1916年任炮兵和军事装备部国务副秘书长。1916—1917年任军备部长。1917年访问俄国, 支持临时政府。1919—1932年任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1932年因糖尿病逝世。

[23] 英国独立工党通常与德国独立党一样是中间派。在一战期间他们进行了绥靖主义宣传, 并受到了劳合乔治政府的打压。1920年退出第二国际; 1921年参加了维也纳的第二半国际; 1922年它再次成为黄色国际的一部分。英国独立工党的左翼后来与英国共产党合并。党的中间派由沃尔黑德领导。右翼领导则是麦克唐纳和斯诺登。——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理查德·科林厄姆·沃尔黑德(Richard Collingham Wallhead, 1869年12月28日—1934年4月27日), 早年担任装饰师。早年参加了独立工党。1911—1920年任独立工党全国行政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 1917年曾短暂被英国政府监禁。1919—1934年任下议院议员。1920—1922年任独立工党主席。1932年退出工党, 但1933年又宣布退出独立工党, 返回工党。1934年去世。

[24] 马尔托夫集团。战争期间, 俄国孟什维克分裂为一群没有影响力、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国际主义者和多数派。前者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 而后者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爆发时, 大多数孟什维克拥护资产阶级民主, 并把他们的代表送进了资产阶级政府。马尔托夫集团对其党内同志的背信弃义政策感到愤慨, 但又没有决定离党。十月革命后,

马尔托夫的集团开始滑向孟什维克右翼的位置。马尔托夫称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为新沙皇制度。他与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不断的思想斗争。此时他和比他更加右倾的同道中人结盟，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1920年，全世界燃烧着革命的烈火，此时马尔托夫的思想变得左倾，并接受了坚持苏维埃政权民主化的口号。在随后的几年里，马尔托夫集团不再是一个特殊的集团，完完全全接受了孟什维克多数派的观点。他们在国外从事着系统的反苏维埃运动。——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

（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 2] 军事工业委员会（俄语：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комитет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组织是根据1915年5月第九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其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军事工业委员会企图操纵全国的经济，然而沙皇政府几乎在军事工业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就采取对策，成立了自己的机构，即国防、运输、燃料和粮食等“特别会议”。这就使军事工业委员会实际上只充当了国家和私营工业之间的中介人。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开始在委员会内建立工人团。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对工人团的选举进行了

抵制。在 244 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 76 个委员会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工人团的委员会则只有 58 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内组织了以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为首的工人团。1917 年二月革命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试图利用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专家来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1918 年 7 月 24 日军事工业委员会被撤销。

[25] 波兰进攻乌克兰。作者指的是在波兰和苏维埃政府就缔结和平问题展开长期且失败的谈判后，1920 年 5 月波兰人突然袭击并占领了基辅。——俄文版编者注

[26] 皮乌苏茨基，原小资产阶级的波兰社会党领导人，随着波兰的重建成为了其领导人。皮乌苏茨基是受法国启发的资产阶级政策的推动者。他也策动了 1920 年俄波战争。目前，他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担任波兰军队总司令（元帅）。——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约瑟夫·克莱门斯·皮乌苏茨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 1867 年 12 月 5 日—1935 年 5 月 12 日，旧译“毕苏斯基”或“皮尔苏茨基”)，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 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 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 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 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 年暂时下野，1926 年 5 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

第一章 力量对比

在批评俄国苏维埃制度的那些老生常谈中，尤其是在批评其他国家向苏维埃制度过渡的革命尝试时，总是会出现力量对比的论据。俄国的苏维埃制度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它“不符合力量对比”。落后的俄国不能为自己设下只有先进的德国才能完成的任务。而对德国无产阶级而言，掌握政治权力也将是疯狂的行动，因为“现在”这么做将会打破力量对比。国际联盟¹虽然并不完美，但它符合力量对比。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进行的斗争也不过是乌托邦而已，因为力量对比是符合修改《凡尔赛条约》²的要求的。龙格如果跟在威尔逊³之后磕磕撞撞，那并不是因为在政治上变得软弱了，而是为了力量对比规律的荣耀才这么做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认为，奥地利总统塞茨⁴和总理伦纳⁵必须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中枢岗位上展现自己的小市民庸俗性，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就会打破力量对比。世界大战开始的两年前，当时还不是总理，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倡导者卡尔·伦纳向我解释说，六三体制⁶——即加冕了君主制的地主与资本家的联盟必然会在俄罗斯持续一整个历史时代，因为如此便符合力量对比。

这种力量对比到底是什么，是一条应该用于定义、引导或解释整个历史进程的、可以批发或零售的神圣公式吗？为什么现在考茨基学派总是拿这样的力量对比公式去为摇摆、懒惰、懦弱、背叛和出卖找借口？

按他们的理解，力量对比包罗万象：目前达到的生产水平、阶级分化的程度、组织起来的工人的数量、工会手上的现金，有时还指最近一次议会选举的结果，经常也指内阁的让步程度或金融寡头的无耻程度；不过，这个词最常见的意义，还是由半瞎的学究或

所谓的“真正的政治家”制造的简略政治印象——他们虽然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措辞，但实际上却是被庸俗的花招、小人的偏见和议会的“预兆”引导……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客在与警察局长在他不久前的美好时光里小声嘀咕以后，总是能准确地知道维也纳的“力量对比”是否允许五一节期间举行的和平的街头示威。而对艾伯特⁷们、谢德曼们、大卫⁸们来说，力量对比在不久以前还完全可以以贝特曼—霍尔维格⁹或鲁登道夫¹⁰本人在帝国议会向他们伸出的手指数量为基准。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认为，在奥地利建立苏维埃专政将会破坏力量对比：协约国将会使奥地利陷入饥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7月的苏维埃大会上提到了匈牙利，当时匈牙利的伦纳们还没有在匈牙利阿德勒们的帮助下成功推翻苏维埃。乍一看，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对匈牙利的看法看上去可能确实是正确的：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就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反动分子弗里德里希的内阁¹¹。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问，这符合了力量对比的最后要求了吗？无论如何，如果不是拜罗马尼亚军队所赐，弗里德里希和他的骠骑兵¹²甚至都不可能暂时掌权。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解释苏维埃政权在匈牙利的命运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力量对比”，至少也应该考虑两个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匈牙利自身和邻国罗马尼亚。但是不难理解，我们不能止步于此：倘若在匈牙利的危机逼近以前奥地利就已经建立了苏维埃专政的话，那么推翻布达佩斯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将会变得无比艰巨。因此，我们必须把奥地利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背信弃义的政策一起纳入力量对比中，而这种力量对比决定了苏维埃政权在匈牙利的一时失败。

而是在西方，在克里蒙梭¹³和劳合·乔治所在的国家那里寻求关键：他们手中有面包和煤炭，而这两样东西，特别是在我们这个

时代的力量对比机制中的重要地位，就相当于大炮在拉萨尔¹⁴宪政中的重要地位。从高处看，阿德勒认为，只要克里蒙梭（或米勒兰¹⁵，这个低配版的克里蒙梭）还没同意，奥地利无产阶级就不应该夺取政权。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反问一句：克里蒙梭自己的政策是否符合了真正的力量对比？乍一看，足够符合了——如果没法证明足够符合，那就让克里蒙梭的宪兵来保证这点吧：他们会驱散工人的集会，逮捕并枪毙共产主义者。但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回想起一点，那就是苏维埃的恐怖措施——同样的搜查，同样的逮捕，同样的枪毙，只不过是针对反革命分子，就被某些人说成是苏维埃政权不符合力量对比的证据了。然而，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在全世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一个不会为了维系自己采取严厉的大规模镇压手段的政权。这意味着，互相敌对的阶级的力量在打破了包括“民主”权利在内的一切外壳之后，将会力图走无情斗争的道路来确定自己新的对比。

当俄国建立了苏维埃制度时，不仅资本主义政客，各国的社会机会主义者也都宣布它放肆地挑战了力量对比。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哈布斯堡的伯爵切尔宁¹⁶还有保加利亚首相拉多斯拉沃夫¹⁷都达成了共识。从那时开始，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君主制覆灭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国主义也崩溃了。苏维埃政权坚持了下来。得胜的协约国进行了动员，投入了一切可以投入的力量来对付它。苏维埃政权坚持了下来。倘若考茨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或奥托·鲍威尔¹⁸在两年前预言无产阶级专政会在俄国坚持下来，先是会抵御德国的帝国主义进攻，然后与帝国主义的协约国持续作战的话，那么第二国际的“智者”就会认为这种预言反映了他们对“力量对比”令人可笑的无知。

在任何时候，政治力量的对比都是在不同程度的基本要素和衍生要素的影响下促成的，仅深刻地被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人民的社会结构极其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小资产阶级，尤其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方法被社会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抛弃并判决有罪后，也仍然长期保持着自己的存在。群众的意识又极度落后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旧社会主义政党的意识落后于群众的情绪整整一个时代；而旧议会和工联主义领袖的意识比他们的政党的意识还要更加反动——这是一个僵化的肿块，至今未能被历史祛除或挤破。在一个和平的议会时代，社会关系稳定的情况下，（没有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心理因素对当时的所有计算都是忠诚的：议会选举被认为充分完整地反映了力量对比。帝国主义战争打破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平衡，暴露了旧有标准的不适用，这些标准完全不受深刻的历史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在前一个时代逐渐积累起来，而现在猛然迸发，决定了历史的运动。

政治上的腐儒理解不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无法理解其内在的失配性和矛盾性。他们想象历史会全方位同时地、系统地准备好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也认为生产的集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共产主义道德会与电犁和议会的大多数人同时成熟。所以，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客以纯粹机械的态度对待代议制，认为它像压力计显示蒸汽压力的强度那样，准确无误地显示了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在这里，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对社会关系发展的机械主义观点更无意义的了。

如果我们从社会的生产基础开始，通过阶级、国家、法律、政党等上层建筑逐级向上看，我们就可以发现，每提升一层，僵化不是在简单叠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前面每层僵化的乘积。结果就是这一长期来自诩“最先进”的群体的政治意识在关键时刻终于

暴露出来，变成了历史发展的巨大阻力。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最关键时刻，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第二国际各个政党，不敢、不能也不想掌握政权，而是把无产阶级引向了帝国主义互相残杀的道路上，证明了自己是反革命的决定性力量。

强大的生产力——历史运动的打击因素，在那些落后的上层建筑机关（私有制和民族国家）中窒息，而这些上层建筑机关则被过去的发展限制着。在资本主义的培养下，生产力正在撞击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每一堵墙，要求以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来解放自己。社会集团、政治力量的惰性被证明无法打破旧的阶级集团；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党由于守旧、愚蠢和背叛，充当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实际保护人——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以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式出现的生产力的自发骚动。人类技术是最具革命性的历史因素，它以其数十年积累的力量揭竿而起，强烈反对谢德曼、考茨基、雷诺德尔、王德威尔德和龙格那令人厌恶的保守主义和卑鄙的愚蠢，并以其榴弹炮、迫击炮、无畏舰和飞机对人类文明进行了一场无情的大屠杀。

因此，人类现在经历的苦难，究其本源恰恰在于人类利用自然界的技术力量早已发展成熟，成熟到足以使经济社会化——无产阶级在生产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完全保证了它的专政；而历史上最自觉的力量——政党及其领导人却还未摆脱陈旧偏见的桎梏，只能培养群众对自己的不信任。近年来考茨基明白了这点。他在自己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¹⁹中写道：“无产阶级现在太强大了，因而可以非常平静地等待即将到来的战争。当无产阶级已经从这样的国家基础中汲取了尽可能多的力量，当它的重建已经成为它进一步崛起的条件时，过早的革命就不再是空话了。”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框架，并使人类陷入了一个

危机与动荡的时代起，群众的意识在严酷的震荡下，已经被打出前一个时代的相对平衡了。生活方式的常规与惰性、和平的合法性的催眠术已经耗尽了对无产阶级支配。但它还没有自觉地、奋不顾身地走上公开革命斗争的道路。它正摇摆不定，经历着不稳定平衡的最后一刻。在这一心理转变的时刻，上层分子的角色（一方面是指国家政权，另一方面是指革命政党）获得了巨大的意义。一次来自左或右的决定性推力，就足以使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向左或向右走。我们在 1914 年已经见识过这一点了——当时帝国主义政府和社会爱国主义政党的联合压力立即使工人阶级失去了平衡，把他们推向了帝国主义道路。在这之后，我们见证了战争的试炼、它的结果与一开始的口号的反差是如何革命地震撼群众的，这使得他们越来越能够公开起义对抗资本。在这些条件下，如果存在一个能清楚地意识到当前时代的驱动力并了解革命阶级在其中的特殊地位的革命政党，一个能知道这个阶级不竭的潜力，相信这个阶级，相信自己，知道革命方法在一切社会关系不稳定的时代下的力量，并准备运用这种方法并将其进行到底的革命政党，那么这种政党的存在就是一个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的事实。

相反，一个传统上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不了解革命形势因而也找不到开启革命大门的钥匙，既不相信无产阶级，也不相信自己的话，那么这样的政党就是我们时代最有害的历史刹车，是混乱的根源。

这就是考茨基和他的同伙今天扮演的角色。他们教导无产阶级不要相信自己，而是应该相信他们在民主这面哈哈镜上的投影——而这面镜子却已经被军国主义的皮靴踩得粉碎。在他们眼中，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不该是国际形势，不该是资本主义事实上的崩溃，不该是它引起的社会解体，不该是那从资

本主义文明的残垣断壁中发出的对工人阶级统治的客观需要的怒吼——这一切都不应该决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政策，而是资本主义代议制的记录员正在统计的票数。再重复一遍，就在几年前，考茨基似乎还能理解革命问题的真正实质。他在自己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中写道：“既然无产阶级成为了国民当中唯一革命的阶级，那么，现代秩序的每一次崩溃——不管它是精神上的、财政上的还是军事上的崩溃，都意味着对这一切负有责任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破产。打破由此产生的僵局的唯一出路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而现在那消沉、懦弱的党，考茨基的党，则对工人阶级说道：“问题不在于你们现在是不是唯一的具有创造性的历史力量，不在于你们能不能彻底扫除有产阶级堕落成的那群当权强盗；问题不在于这是一个没有人能替你们完成的任务；问题不在于历史没有给你们缓期，因为目前的血腥混乱状态有可能将你们埋葬在资本主义的最后碎片之下。实际上问题在于，当权帝国主义强盗在昨天或者今天成功欺骗、强奸并拐走了民意，获得了 51% 的选票，而你们却只有 49%。愿世界灭亡，议会多数万岁！”

注释：

[1] 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威尔逊的影响下，1919 年凡尔赛会议上战胜国的代表建立了国际联盟。国联章程的导言部分规定了国联的主要目标：“促进各国人民的合作，实现全世界和平。”此外，其职责包括保护劳工（第 23 条）、优待殖民地人民（第 22 条）、促进国际贸易往来等。

国联的建立是凡尔赛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组织打着和平的幌子，行英法帝国主义之实。签署凡尔赛条约的美国前国务卿蓝辛在其回忆录《和平和谈判》中写道：“必须坦率承认，国联是最强者手中用来反对战败国民族意愿和希望的工具。”国际联盟自成立以来的活动已经充分证实了这种令人讨厌的特征。在和德国的关系上，国联充当了国际密探的角

色，监督着凡尔赛条约落实的每一步。此外，对于被占领的萨尔煤区，国际联盟过去和现在都是最高管理机构。国联决定了和决定着所有问题，包括：被比利时吞并的奥伊彭—马尔默迪地区、但泽问题和奥德关系。

国际联盟的组成及其组织最能说明其强权性质。形式上，它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大约 50 个（除了德国、俄罗斯和从国际联盟脱离出来的美国）；事实上，它只是协约国的一个机构。根据国际联盟章程，实际的管理和负责机构不是每年召开一次的全体大会，而是负责所有当前事务的理事会。理事会享有很大的职权：如果认为国联成员没有履行其义务，则有权驱逐成员国。但是，如果认为在理事会这个帝国主义的巢穴里能达成国联事务的共识，那就大错特错了。由于四分五裂的经济矛盾，协约国在理事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如英国对德国和俄国的经济复兴感兴趣，奉行与这些国家和解并接纳它们加入国际联盟的政策，而法国恰恰相反，一直试图利用国联奴役德国和孤立苏俄。

国际联盟过去一段时间的活动表明该组织是完全徒劳的。战争可能性的问题不仅没有变得不那么尖锐，反而成为当今欧洲政治最迫切的问题。以和平方式复兴欧洲的经济问题也处于同样的境地。

第二国际的妥协分子为威尔逊十四条祈祷。他们认为威尔逊十四条是国联最重要的制度。但他们发现自己很难找到论据为这团浸透了侵略精神的浆糊辩护和解释。这团浆糊就是威尔逊的腹中死胎。——俄文版编者注

[2] 凡尔赛指的是 1919 年 6 月 28 日协约国和德国之间在凡尔赛签署的和平条约。该条约在外交上巩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血腥结果。该条约的奴役性和掠夺性远超《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德国失去了其在欧洲的大量领土，失去了它在摩洛哥、暹罗、利比里亚等地的殖民地和特权。德国割让给协约国煤矿、超过四分之三的铁矿和大片耕地。这一切使德国工业陷入萧条，人民食不果腹。最后，战胜国控制了德国主要的生产部门、水陆交通以及对外贸易，把德国实际上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我们甚至没有谈论对德国海、空军的毁灭以及为了补偿协约国的战争损失而欠下的巨额赔款。

除此以外，前奥匈帝国遭到了大片的领土分裂，转变成了一组在国联脚下的独立国家。[中译者注：虽然同为巴黎和会的一部分，但协约国同奥地利及匈牙利的和平条约并非凡尔赛条约，与两者的和约分别是《圣日耳曼条约》及《特里亚农条约》。]

甚至包括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凡尔赛条约签署之时都证明了这份条约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切实际、极为致命。1923年1月，法国不得不通过武力解决其赔偿问题，占领鲁尔区。这件事比任何抽象理论都能证明在帝国主义战争后形成的、在罪恶的《凡尔赛条约》影响下的政治和经济矛盾有多么强烈。——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逻辑学家。

[3] 威尔逊，1912—1920年任美国总统。和平主义的传教士。他在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阐述了他主要的和平主义思想，这一度成为被愚弄的小资产阶级和部分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仰象征。国际联盟的发起者和创建者。在战争期间，他是交战国之间的调解人。不用说，他的想法只是美好的愿望，而一切资产阶级政府会拿这种想法去欺骗劳动群众。——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16岁进入戴维森学院，29岁获博士学位，30岁开始在大学任教。190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09年当选为新泽西州州长。1912—1920年任美国总统。191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4] 奥地利总统塞茨是一位老社会民主党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成员。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他出任奥地利共和国总统。——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卡尔·约瑟夫·塞茨（Karl Josef Seitz，1869年9月4日—1950年2月3日），1901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2年当选为下奥地利州议会议员。1915年公开鼓吹反对战争。1918年当选为奥地利制

宪国民议会议员。1918—1934年任社民党主席兼国民议会议员。1919—1920年任总统。1923—1934年任维也纳市长。1934年被捕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44年“七·二〇事变”后被捕并被送进集中营。1945年获释。1945—1950年再次担任国民议会议员。1946—1950年任社民党终身名誉主席。1950年病逝。

[5] 伦纳总理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所谓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支柱，理论作家，主要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其著作有《国家与民族》(Staat und Nation)《民族问题》《奥地利民族为国家而斗争》(Der Kampf der oesterreichischen Nationen um den Staat)等。战争期间是一名社会爱国主义者。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出任革命后第一届奥地利政府总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卡尔·伦纳(Karl Renner, 1870年12月14日—1950年12月31日)，早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11年当选为奥地利消费合作社中央理事会主席。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18—1920年任奥地利总理。1920—1934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31—1933年任国民议会主席。1938年支持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1945—1950年任奥地利总统。1950年逝世。

[6] 俄国六三体制。笔者在这里指的是1905年革命后俄国反动派的最终胜利。1907年6月3日有关国家杜马选举的法律剥夺了大多数居民群众的选举权，使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分子在杜马中占了优势。这项法律公布后不久，时任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构思出了一整套惩罚性措施。在该法公布的同时，第二届国家杜马被解散，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也开始了，革命自由的最后残余被摧毁殆尽。从此，这一日期变成了政变与黑暗反动的同义词。——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注：请参阅列夫·托洛茨基《1905》。]

[7]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 1871年2月4日—1925年2月28日)，生于裁缝家庭，1889年参加社民党，1905年当选社民党总书记，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在一战中积极配合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11月8日担任总理，1919年2月11日担任总统，镇压了十一月革命。——

中译者注

[8] 大卫是著名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家，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派系。在 20 世纪初，大卫批评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引起了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极大同情（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第四卷有一篇文章《智者所见略同》）[中译者注：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增订版第 7 卷第 187—191 页，原始标题为《LES BEAUX ESPRITS SE RENCONTRENT》]。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卫是修正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的支柱之一，热心鼓吹与资产阶级结成政治派别，批评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认为社民党应当是全民性的。战争时期，大卫毫无疑问地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者，直到战争胜利前都极度狂热地鼓吹战争。1915 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Die Sozialdemokratie im Weltkrieg）的巨著（关于它，参见《真理报》1924 年第 169 期的列宁的文章）[中译者注：指列宁《德国机会主义论战争的一本主要著作》，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增订版第 26 卷第 289—293 页，原文原载于 1924 年 7 月 27 日《真理报》]，在这本书中他从理论角度论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护国主义立场。革命后，大卫担任了一些重要的行政职务。——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爱德华·海因里希·鲁道夫·大卫（Eduard Heinrich Rudolph David，1863 年 6 月 11 日—1930 年 12 月 24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经济学家；德国机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创办人之一。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农业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一月革命后，在 1919 年 6 月 21 日至 1919 年 10 月 3 日之间担任过魏玛共和国的内务部长。

[9] 贝特曼—霍尔维格是威廉王朝的重要人物。战争期间任德意志第二帝国总理，容克贵族和金融资本的傀儡。1914—1918 年间屠杀的鼓动者和组织者之一。[中译者注：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 1856年11月29日—1921年1月1日), 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国首相。

[10] 鲁登道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使自己扬名于世的德国将军之一, 多次打败了同盟国。他是当今德国法西斯主义者最突出的领导人之一, 经常参加民族主义游行, 自我标榜为君主主义者, 支持霍亨索伦王朝复辟。——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埃里希·鲁登道夫 (Erich Ludendorff, 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 出身于地主家庭, 1882年参军, 1894年起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 1905年进入总参谋部第二处工作, 参与了施里芬 (Schlieffen) 计划的制定。一战爆发后任德军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参加了对比利时的侵略, 1914年8月底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 1916年8月任军需总监。十月革命爆发后, 他参加了与苏维埃俄国政府的谈判。1923年参加了纳粹党的“啤酒馆暴动”, 1925年被纳粹党和德国人民自由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 在总统选举中败给了兴登堡。此后逐渐与纳粹党疏远。1937年在慕尼黑逝世。

[11] 弗里德里希政府。1919年8月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垮台后, 反动的弗里德里希政府成立。——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伊什特万·弗里德里希 (István Friedrich, 1883年7月1日—1951年11月25日), 匈牙利政客。早年担任足球运动员, 退役后短暂担任过裁判。1912年加入共济会和独立与48党 (Függetlenségi és Negyvennyolcas Párt)。一战期间短暂服役。1918—1919年任国防部政治事务国务秘书。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短暂被捕, 获释后领导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匈牙利革命失败后, 于1919年8月7日至11月24日任匈牙利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1919—1920年任国防部长。1922—1924年任匈牙利足协主席。1920—1922年、1926—1939年任国会议员, 在任期间领导基督教民族党 (Keresztény Nemzeti Párt)。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于1951年7月被捕, 同年8月被判处15年徒刑, 11月25日死于狱中。

[12] 这里指的是弗里德里希内阁中的一个反动匈牙利大臣。——俄文

版编者注

[13] 克里蒙梭，年轻时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法国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在凡尔赛会议和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他是法国总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乔治·克里蒙梭 (Georges Clemenceau, 1841 年 9 月 28 日—1929 年 11 月 24 日)，学生时代起便在报上撰写政治评论和文艺评论，并积极参加反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活动。1870 年任蒙马特尔区区长。1871 年 2 月当选为激进派议员。同情巴黎公社。1875 年任巴黎市议会议长。1876—1893 年任众议员，不久便成为激进派领袖。他一贯拥护共和，反对复辟帝制。1897 年开始为《震旦报》撰写社论。1900 至 1902 年创办《集团》周刊。1903 年 6 月主持《震旦报》报社工作。积极参与德雷福斯案件。1902 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成为参议院中左翼联盟的领袖。1906 年 10 月出任总理兼内政部长。1911 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担任外交和陆军委员会委员。一战时持沙文主义立场。1917—1919 年任总理兼陆军部长。1920 年总统选举失利后退出政坛。

[14] 拉萨尔 (1825—1864)，德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拉萨尔的历史功绩及其政治活动的主要成果在于，他能够将德国工人群众从 1848 年革命后陷入的冬眠中唤醒。拉萨尔与试图影响工人的自由派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斗争，积极推动工人组织了一个独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 年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拉萨尔的领导下创建起来，拉萨尔是终身主席。在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活动纲领方面，拉萨尔虽然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但与他们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偏差。他误解了调节工人工资的规律，认为工人最低工资一成不变，因此提出了由国家补贴的生产性工人协会，以此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另一方面，拉萨尔夸大了普选权，为了实施普选权，陷入了和俾斯麦之间稀里糊涂的政治关系之中。拉萨尔身后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和发表的演讲。比如说他的《赫拉克利特》——希腊哲学领域的研究、《既得权利体系》——哲学和法律研究、《巴斯蒂亚—舒尔茨》——经济研究，最

后还有他的演讲——《宪法的本质》和《工人纲领》，至今仍未失去科学和文学优点。拉萨尔死后，他的追随者拉萨尔派于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一次大会上与爱森纳赫马克思主义者合并，组成了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

[15] 米勒兰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是反动民族集团的策动者之一。米勒兰像法国资产阶级的其他现任领导人一样，最初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开启了政治生涯，与饶勒斯共过事。但早在1899年，他就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露出了真面目。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曾围绕米勒兰入阁事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米勒兰主义”成为社会主义中机会主义和部长主义的常用名词。[中译者注：部长主义指社会主义领导人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形式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米勒兰逐渐右转，终于顺利成为了法国反动派领袖。然而最近所谓“左翼集团”的胜利动摇了他的地位。1924年6月，他被迫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1859年2月10日——1943年4月7日），生于巴黎一个小商人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当选为众议员。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向社会主义，1893年与饶勒斯等人组成独立社会主义派，1896年提出了改良主义的《圣芒德纲领》。1899年6月入阁，任商业部长，他是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1920年1月至9月任总理，1920年9月至1924年6月任总统。

[16] 切尔宁伯爵，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的奥匈帝国外交大臣。——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奥托卡尔·切尔宁伯爵（Ottokar Graf Czernin，1872年9月26日——1932年4月4日），奥匈帝国贵族，曾长期在外交界工作，

1916年12月至1918年4月间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其间曾作为奥匈帝国代表参加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

[17] 巴西尔·赫里斯多夫·拉多斯拉沃夫（Васил Христов Радославов，1854年7月27日—1929年10月21日），保加利亚政治家。1882年加入保加利亚自由党。1884—1886年、1894年任司法部长。1886—1887年任财政部长。1886—1887年、1913—1918年任总理。1887年、任内政部长。1894年任公共教育部长。1913—1918年任外交部长。一战战败后流亡德国。1929年死于柏林。——中译者注

[18] 奥托·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杰出理论家。在战前的几年里，鲍威尔是奥地利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团的秘书。作为理论家，鲍威尔当时因其文化民族自治理论而闻名，该理论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反映了社会民主党依赖执政的奥地利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战争年代，鲍威尔采取了考茨基主义的立场，这在奥地利的条件下意味着最纯粹的防御主义。俄国革命时他刚好是俄国战俘。由于无法公开发言，鲍威尔以各种化名捍卫李伯尔—唐恩执行委员会的路线。鲍威尔以行动从意识形态方面支持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1918年他成为了革命后的社会民主党伦纳政府的外交部长。1920年，已经退休的部长鲍威尔与阿德勒一起领导了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1921年，新经济政策出台后，鲍威尔开始预言性地宣称俄共（布）正在带领俄国走向最纯粹的资本主义。1922年汉堡的合并会议后，鲍威尔成为联合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中译者注：原文有误，汉堡会议在1923年5月。]——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

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 2] 米哈伊尔·伊萨科维奇·李伯尔（Михаил Исаакович Либер，1880年5月24日—1937年10月4日），原姓戈尔德曼（Гольдман）。生于维尔纳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6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cjaldemokracja Królestwa Polskiego i Litwy, SDKPiL*）。1897年参与创立犹太工人总同盟（即“崩得”）。1898年代表崩得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支持孟什维克，此后成为崩得和孟什维克主要领袖。在1905年革命期间当选为彼得堡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成为“取消派”。一战爆发后，起先支持战争，后来又转到“国际主义”立场。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到萨马拉省。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17年6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支持临时政府，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在七月事变中，他支持临时政府镇压革命工人。十月革命爆发后，积极反对十月革命。内战期间居住在乌克兰，1920年迁往莫斯科。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

[19] 这里是中译者自行翻译的，引用部分下同。——中译者注

第二章 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铸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而恩格斯在1891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不久，顽强地捍卫了这一概念——无产阶级政治专权的概念，是其行使国家权力的唯一形式。”

十年前的考茨基是这么写的。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政权的唯一形式不是民主议会中社会主义占多数，而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独揽大权，也就是其专政。显然，如果我们认为这项任务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完成这一任务的唯一途径，就是把国家权力集中在无产阶级手中，建立一个过渡时期的特殊政体。而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统治阶级并不会遵循以长期适用为目的存在的一般规则，而是革命权宜的考虑。

专政是必要的，因为这不是局部改变的问题，而事关资产阶级的存续的问题。在这一基础上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在这里，力量决定一切。当然，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排除达成个别协议或重大让步，特别是当它们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有关的时候。¹但是，无产阶级缔结这些协议，前提只能是自己掌握了政权的物质机器，并确保自己能够决定为了社会主义任务的利益会如何（作出哪些并拒绝哪些）让步。

现在考茨基彻底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说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力”，也就是说，他开始用诚实的社会主义者对付剥削者专政——哪怕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剥削者专政——的话术来描述无产阶级的革命政体。²

通过放弃革命专政，考茨基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混淆成了社会民主党在未来竞选中赢得多数席位的问题。根据代议制的法律虚构，普选权表达了国家各阶级公民的意志，从而有可能吸

引大多数人支持社会主义。在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之前，社会主义的少数必须服从资产阶级的多数。盲目崇拜议会多数，不仅拙劣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整个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如果人们从根本上将社会主义政治归结为议会席位数量，那么形式民主制国家就根本没有革命斗争的位置了。如果在瑞士，普遍投票选举出的多数人对罢工者通过了残暴的决定，或者在北美，由形式上的多数人意志组成的行政部门向工人开枪的话，瑞士和美国的工人是否有“权利”以总罢工的形式进行抗议呢？显然没有。政治罢工是一种对“国民意志”的议会外压力的形式——这“国民意志”是通过普遍投票表达出来的。不错，考茨基自己似乎也不好意思走到他的新立场的逻辑要求的那么远。他没摆脱过去残余的束缚，不得不承认通过行动来修正普选权是可以接受的。议会选举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至少在原则上——从来没有替代过真正的阶级斗争，替代它的冲突、反击、打击或起义。议会选举只是这种斗争的一种次要因素，在某个时代里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而在另一个时代发挥了较小的作用——以便在专政时代完全失去其作用。

在 1891 年，也就是在恩格斯去世前不久，正如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恩格斯顽强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唯一形式。考茨基自己都不止一次重复这一定义了。顺带一提，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来，考茨基目前把无产阶级专政篡改成特殊的俄国发明，并强加给我们，这种做法实在太可耻了。

要实现目标，就不能摒弃手段。必须高度紧张斗争，才能真正确保无产阶级专权。既然社会主义政变的任务需要专政——“无产阶级行使国家权力的唯一形式”，那么，就必须不择手段确保专政。

要写关于专政的小册子，除了备好墨水瓶和纸张以外，也许还需要开动脑筋。但是，为了建立并巩固专政，必须阻止资产阶级破

坏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考茨基显然认为，写一本催人泪下的小册子就能实现这一点。但他自己的经验不得不提醒他：影响不了无产阶级，就难以影响资产阶级。

只有让惯于统治的资产阶级明白：当他们认为反叛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怠工、阴谋、叛乱和外国军队的帮助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太过危险时，工人阶级专权才能得到保证。必须迫使丢掉政权的资产阶级服从。怎么做？教皇们一直在用来世的报应来吓唬世人。我们可没有这样的资源以供支配。教皇的地狱也从来不是独栋别墅，而是结合了神圣宗教裁判所的物质之火和民主国家的蝎子。考茨基不是倾向于认为可以用断然的命令式来驯服资产阶级的想法，而这命令式在其最近的著作中扮演了圣灵的角色吗？我们只能向他承诺，如果他决定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王国装配康德式人道主义的使命，我们会提供实践上的协助。无论如何，他会在那里有机会亲眼见证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没有本性——他们经历了六年战火，所以他们的性格已经成功稳固下来了。每一个白卫军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把一个共产主义者挂在树枝上，比用考茨基的书来跟他讲道理容易得多。这些先生既不迷信民主原则，也不迷信地狱之火，更何况，教会牧师和官方科学都与他们共同行动，把自己的混合雷电不留余地地劈向布尔什维克的头上去。俄国白卫军与德国等国的白卫军一样，不能被说服或羞辱，而只能被恐吓或打垮。

谁在原则上拒斥了恐怖主义，或者说，在原则上拒斥了对残酷无情的、武装的反革命采取镇压和威慑措施，谁就必须拒绝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即它的革命专政。谁拒绝了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在放弃社会革命，并把社会主义钉在十字架上。

* * *

现在的考茨基没有任何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他每当试图总结自己对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时，都得奉上提前热好的饶勒斯主义³和伯恩施坦主义⁴的偏见。

考茨基写道：“1789年的革命本身消除了某些使革命具有如此残暴性质的最重要的特征，为将来几次革命的比较温和的形式铺平了道路。”⁵让我们假设的确如此——尽管为了这么假设我们必须忘记1848年的6月⁶和公社被镇压时的恐怖⁷。让我们假设，十八世纪的大革命通过了无情的恐怖手段摧毁了绝对主义、封建主义与教权主义的统治，却是为更和平、更温和地解决社会问题准备了条件。但是，即使我们承认这种纯粹自由主义的假设，即便如此，那些诋毁我们的人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结果的俄国革命，正是从十八世纪末法国完成的工作开始的。我们的祖先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并没有通过革命恐怖的道路费心去准备民主条件来缓和我们的革命的风气。伦理大吏考茨基应该考虑到这一情况，去指责我们的祖先，而非我们。

不过，考茨基在这个方向上算是让了一小步。他说：“不错，凡是深刻了解问题的人都不会认为可以单靠武力来推翻像德国、奥国和俄罗斯这样一些以军国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但是，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谁？）也不大想道用真刀真枪实行屠杀，而是越来越想到唯一最宜于无产阶级达到其目的的手段，即拒绝工作，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罢工……但是，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它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居然像十八世纪末发生的情形那样又借助于杀戮、报复和残酷性，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这种行动使得整个的发展颠倒过来了。”⁸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我们需要通过战争和一系列革命才能正确了解一些渊博理论家的思想，才能发现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

事实证明，考茨基并不认为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来把罗曼诺夫⁹或霍亨索伦¹⁰踢出王座，但与此同时，他又在认真设想可以通过总罢工，也就是双手交叉的消极示威来推翻军事君主制。尽管已经存在了1905年俄国经验及其相关的世界性辩论，考茨基看来还是坚持了他对总罢工的无政府—改良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向他指出，12年前在他自己的报纸《新时代》（*Neue Zeit*）上，明确写着，总罢工只是为了反对敌对国家政权而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动员，但罢工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将使无产阶级而不是它的敌人精疲力竭，而这一点迟早会迫使工人们回到车床前。总罢工只有成为无产阶级与敌对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即工人公开的革命起义时，才会具有决定意义。革命阶级只有摧毁敌对军队的意志，才能解决政权的问题，解决这项所有革命的基本任务。总罢工导致双方进行动员，并第一次认真检验用于抵抗反革命的力量。但只有在斗争的持续发展中，也就是在过渡到武装起义后，革命阶级为获得权力而必须付出的血腥代价才能被确定下来。但血的代价是必然要付出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权力和确保权力的斗争中不仅要死人，也会杀人——严肃的革命者不会对此抱有疑问。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最残酷的斗争不为生而为死，说它“推翻了所有的发展”，这只能意味着某些可敬的思想家的头脑就是一个 *camera obscura*，也就是暗箱，所有物体在里面的投影都是颠倒的。

但是，即使是对那些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更先进、更文明的国家来说，考茨基历史论调也完全没有被确证。然而，这论点本身并不新鲜。修正主义者曾经赋予它更多的原则性质。他们认为，在民主条件下，无产阶级组织只要不断增长，就可以确保过渡到社会主义体制时，不需要总罢工和起义，也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只需要渐进点滴的改良和进化。

考茨基在其活动的巅峰期认为，尽管存在民主的形式，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正在加深，而这个过程必然会导致革命，导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当然，没有人会试图事先计算出无产阶级的革命起义及其专政体制会造成多少受害者。但大家都很清楚，受害者的数量将由无产阶级的抵抗力量决定。如果考茨基想用自己的小册子说民主教育并没有缓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己主义，那么这点本就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如果他想补充说，不顾民主而爆发并肆虐了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破坏道德风尚，使资产阶级习惯于暴力的行动方式，并使其肆无忌惮杀戮人类群众时，那他就对了。这些都直接在我们面前发生了。但我们恰恰必须在既定条件下进行斗争。进行斗争的不是从瓦格纳—考茨基的曲颈瓶中冒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造人¹¹，而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对真正的资产阶级，从最近一次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屠宰场中走出来的两个阶级。

考茨基在世界各地爆发无情的内战这一事实中，看到了结果……第二国际“久经考验的必胜策略”已被抛弃。

他写道：“事实上，从那时起，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占领导地位，后者于是直到世界大战之前，在其所有自觉的大型运动中都受到了保护，免于巨大的失败。而且，通过恐怖主义统治来确保胜利的想法已经完全从其行列中消失了。”

“在这一方面，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占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学说，但民主已经在西欧扎根，并开始成为那里斗争目标的补充——政治生活的可靠基础。”

在这个“进步公式”中没有一丝一毫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真实过程和它们的物质冲突被消解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中，

这后者归功于民主条件而向人们保证会有往新的、“更合理”的社会形式的、似乎是无痛的过渡。这是最庸俗的启蒙运动，是十八世纪精神中来迟了的理性主义，不同的是，孔多塞¹²的思想被替换成了庸俗化后的《共产党宣言》。整个历史被归结为一长条连续的印刷纸带，而这个“人性”过程的当之无愧的中心点看来是考茨基的办公桌。

第二国际时代的工人运动被树立成我们的榜样，它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前进，在自觉行动中没有遭受过重大的挫折。但是工人运动、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全人类文明在1914年8月遭受了不可估量的失败，当时的历史正在总结社会主义政党的所有力量和才能，而在这些政党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在“民主的坚实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政党已经破产了，他们在早期工作中的那些考茨基想永久化的特点——见风使舵，拒斥“非法”行动，避免公开斗争，对民主作为无痛政变的途径的希望——所有这些都化为灰烬了。由于害怕失败，由于在所有条件下都不让群众进行公开斗争，由于用辩论消解了总罢工，第二国际的各党派已经为它们的可怕失败做足了准备，因为它们没有挪动一步来避免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四年的帝国主义大屠杀，这屠杀已经预先决定了内战的激烈性质。确实有必要有一些不仅仅在眼前晃悠，而且还会在耳边回响、用鼻子就可以闻到的缺心眼的温和人士，以便在当下——在第二国际不光彩地崩溃之后，在其领导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可耻地破产后，在血腥的白痴行为即世界屠杀及内战的广泛蔓延之后，能够把我们与第二国际的深思熟虑、忠诚、对和平的爱好和清醒进行对比，后者的遗产正是我们如今正在清算之物！

注释：

[1] 原文直译为：“特别是在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上。”——中译者注

[2] 原文直译为：“他开始操起了各国诚实的社会主义者一贯用于定义哪怕是以民主形式加以伪装的剥削者专政的方式来描述无产阶级的革命政体。”——中译者注

[3] 饶勒斯主义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一股机会主义潮流，这股潮流和让·饶勒斯的联系在了一起。——俄文版编者注

[4] 伯恩斯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股机会主义潮流，得名于爱德华·伯恩斯坦。这一潮流获得了国际上的重视。它以修正主义著称。——俄文版编者注

[5]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6页。——中译者注

[6] 笔者在这里指的是1848年6月卡芬雅克将军对巴黎无产阶级的血腥镇压。法国工人革命起义的挫败导致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崛起和拿破仑三世事实上确立了独裁统治。——俄文版编者注

[7] 1871年5月底，巴黎公社的垮台招致了猖獗的资产阶级的疯狂报复。根据伊·斯捷潘诺夫（《巴黎公社》）的大致数据，3万名公社社员被凡尔赛军队杀害，4万至4.5万人遭到长期逮捕，1.3万人分别被法院判处不同的刑罚，最后有数万名移民被迫出逃法国。为了作对比，我们必须记住，圣巴托罗缪之夜约有5000名受害者；1793—1794年的恐怖也不及巴黎公社遇到的恐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1870年2月4日—1928年10月8日），苏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1909年期间参与了将《资本论》翻译为俄文的工作。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4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

员。1920年参加了苏波战争。1921—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逝世。

[8]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1—112页。译者修改了引用的译文。——中译者注

[9] 此处的“罗曼诺夫”指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是最后一位俄罗斯沙皇。二月革命把他从王座上拉了下来（1917年3月）。十月革命彻底惩治了罗曼诺夫家族。根据1918年7月乌拉尔地区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尼古拉二世在叶卡捷琳堡市被枪杀。尼古拉二世的统治标志着极端的反动，是对革命组织的最严厉的迫害、大规模的处决和谋杀。1896年加冕期间霍登卡练兵场的踩踏事故，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血腥星期日（1月9日），对1906—1907年革命运动的血腥镇压，同一时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1912年对勒拿河工人的大屠杀，完全证实了人民群众给他取的绰号：“血腥尼古拉”、“刽子手尼古拉”。

[中译者补注1] 1896年5月18日（30日），在莫斯科附近的霍登卡，官方为庆祝尼古拉二世加冕礼而举办一次民众游乐会。由于当局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结果当天挤死了1389人，挤伤致残1300人。这件事引起了社会上的普遍愤慨。尼古拉二世被称为“血腥的尼古拉”和“霍登卡的沙皇”，就是由此而来的。

[中译者补注2] 关于流血星期日，详见列夫·托洛茨基《1905》第二版第一部分第七章《一月九日》。

[中译者补注3] 1912年4月4日（17日），沙皇军队枪杀西伯利亚勒拿金矿工人的事件。勒拿金矿工人因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于1912年2月底开始举行罢工。3月中旬，罢工席卷了各矿，参加者达6000余人。罢工者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取消罚款、提供医疗救护、改善供应和居住条件等要求。布尔什维克帕·尼·巴塔绍夫是领导罢工的总委员会主席。沙皇当局调动军队镇压罢工，于4月3日（16日）夜逮捕了几乎全部罢工委员会成员。4月4日（17日），2500名工人前往纳杰日金斯基矿向检察机关的官员递交申诉书。士兵们奉命向工人开枪，当

场死 270 人，伤 250 人。勒拿惨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俄国革命运动从此迅速向前发展。

[10] 此处“霍亨索伦”指的是被 1918 年十一月革命推翻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霍亨索伦王朝在普鲁士统治了几个世纪，并在 1871 年成为整个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

[11] 瓦格纳曲颈瓶里的人造人。瓦格纳是歌德《浮士德》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是一个迂腐的医生，制造了一个人造人，这个人造人住在玻璃曲颈瓶中。作者想通过这个比喻强调考茨基建构的人造性和迂腐性——它忽视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条件。——俄文版编者注

[12] 孔多塞（1743—1794）是一位法国数学家、社会学家。他是卢梭的学生，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积极活动者。他被罗伯斯庇尔的支持者逮捕并杀害，因为他是吉伦特派的一员。他著有著名的《人类思想史画卷简图》（*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 l'esprit humain*）一书，该书首次提出并发展了人类进步的概念。——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马里·让·安托万·尼古拉·德·卡里塔，孔多塞侯爵（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 年 9 月 17 日—1794 年 3 月 28 日），法国传记作家、数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陪审团定理”和“孔多塞悖论”而出名。1776—1793 年任法兰西科学院常务秘书。1790 年起参加吉伦特派。1791—1793 年任国民公会议员。1793 年被雅各宾派下令逮捕，随即逃走。1794 年被捕，死于狱中。

第三章 民主

“要么民主，要么内战”

考茨基有一条清晰而唯一的救赎之路：民主。为此仅需要每个人都承认它并承诺服从它。右翼社会主义者必须放弃他们为履行资产阶级意志而制造的血腥暴力。资产阶级自己必须放弃在其诺斯克¹和中尉沃格尔²的帮助下将自己的特权地位捍卫到底的想法。最后，无产阶级必须永远放弃用宪法未曾允许的任何其它手段赶走资产阶级。如果上述条件可以得到满足，社会革命将能无痛溶解进民主之中。就像我们看的那样，为了成功，给我们动荡的历史戴上一顶帽子，再从考茨基的鼻烟壶中借用一点智慧就足够了。

我们的智者暗示说：“只存在着两种可能，不是民主便是内战。”³但是在德国，“民主”的形式要素已经正式到位，内战却没有片刻停息。考茨基承认：“完全可以肯定，德国在目前的国民议会领导下是绝不可能恢复元气的。如果反对现有的国民议会的斗争变成反对民主、反对普选、反对国民议会本身的组织的斗争，那就非但不会促进、反而只会阻碍德国的恢复过程。”⁴仿佛在德国问题在于选举权的形式，而不是实际权力的归属！

考茨基承认，目前的国民议会无法使国家“恢复元气”。所以呢？游戏从头开始。但伙伴们会同意吗？未必如此。该党如果不利于我们，那么就显然有利于他们了。国民议会“没有能力恢复国家的元气”，却能够通过诺斯克暧昧的专政，为鲁登道夫的“严肃”专政做准备。为高尔察克作了准备的立宪会议便是如此。考茨基的历史使命正是等到政变以后写下第 N+1 本小册子，以便从过去的整个历史进程——从猴子到诺斯克，再从诺斯克到

鲁登道夫——解释革命的崩溃。而革命政党的任务则不同：它得及时预见危险，并付诸行动来防止危险。为此，当前除了从真正的掌权者——暂时躲在艾伯特先生和诺斯克先生背后的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手中夺取政权以外，别无他法。因此，历史道路从现有的国民议会开始出现分岔：要么是帝国主义匪帮专政，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两条路都不通向“民主”。考茨基看不到这一点。他废话连篇，不断解释民主对于群众的政治发展与组织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民主来实现全面解放。人们会以为，自《爱尔福特纲领》⁵写就以来，世界上没有发生过任何值得关注的事情！

正是在这段时间，这几十年以来，法国、德国和其他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了斗争和发展，充分利用了民主制度，并在其基础上建立了强大的政治组织。然而，这条通过民主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教育之路被一个重要事件打断了，那就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阶级国家在其负有责任的战争爆发之时，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组织的帮助下，成功欺骗了无产阶级，并把他们拉入了自己的轨道。因此，民主方法本身在某一时代提供了所有无可争辩的益处，却显示出了自身行动力的极限。所以，两代无产阶级在民主条件下的教育根本没有为评价世界帝国主义大战这样的事件做好必要的政治准备。这一经验并未提供任何基础来断言：如果战争延迟十或十五年，无产阶级就会在政治上有更多准备。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不仅为劳动者的政治发展创造了比专制更有利的条件，而且还把这种发展限制在资产阶级合法性的范围内，巧妙地积累并巩固了无产阶级上层的机会主义习惯和法统偏见。在战争的灾难迫在眉睫之时，为了推动德国无产阶级走向革命，民主学校显然是完全不够的。它需要野蛮的战争学校、社会帝国主义的

期望、最大的军事胜利和史无前例的失败。在这些改变了全世界，甚至也改变了《爱尔福特纲领》的事件发生之后，再笼统地谈什么民主代议制在无产阶级教育的地位，就意味着陷入了政治上的幼稚。考茨基的不幸之处正在于此。

他写道：“无产阶级对于争取政治自由和参与政治事件的越来越严重的怀疑，使蒲鲁东主义⁶者活跃起来。今天，同样（！！）的思想已经产生，并且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产物、作为马克思所没有知道的而且也无法知道的经验的产物被提供出来。这些思想不过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旧的思想的变种，但它们并没有因此变得比较正确。”⁷

布尔什维主义原来是……热好了的蒲鲁东主义！从纯粹的理论关系上来讲，这是这本小册子中最无耻的断言之一。

蒲鲁东主义者拒绝民主的理由与他们完全拒绝政治斗争的理由是相同的。他们支持在没有国家权力干预、没有革命政变的情况下存在的工人经济组织，主张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工人互助。而由于他们被推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他们就宁愿选择民主，也不选财阀政治或革命专政。这与我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以无产阶级集中权力的名义拒绝民主，而蒲鲁东主义者正相反，准备忍受被联邦原则稀释了的民主，来避免工人阶级革命的专权统治。考茨基明明有更多理由把我们比作蒲鲁东主义的对手，即布朗基主义⁸，因为他们了解革命政权的意义，在掌握权力的方面不迷信形式民主的表征。但是，为了明晰共产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之间的对比，有必要补充下列事实：我们有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这一布朗基主义者曾经无法设想且现在依然无法设想的政变组织；我们有我们的党，这一我们曾经拥有并且现在仍然拥有的具有完整社会革命纲领的、不可

替代的政治领导组织；最后，我们有我们的工会，这一经济改造的强大机器，完全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支持着苏维埃政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在失去了最后的理论自觉和历史意义时，才会说蒲鲁东主义的偏见在布尔什维克身上复活了。

民主的帝国主义堕落

“民主”在政治词汇中具有双重意义，这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它指的是基于普选权和其他“人民专制”形式的属性之上的国家体制。另一方面，民主这个词可以理解为人民群众本身，因为他们过政治生活，并且，在这两种意义上，民主的概念都遮掩了阶级差别。

这一术语学上的特殊性有其深刻的政治基础。中间的、在阶级方面上分化不大的居民群体——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越是在国家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看上去就越稳定、越完整、越不可动摇。民主在十九世纪的北美合众国和瑞士达到了顶峰。在大洋彼岸，国家的联邦共和民主制度仰仗农场主的农业民主。在稍小的赫尔维蒂共和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坚实的农民构成了联合各州的保守民主的基础。

民主国家诞生于第三等级反对封建主义势力的斗争中，很快也成了用于对付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出来的阶级矛盾的工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包含的人越多，后者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越大，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越低，这一制度在对付阶级矛盾一点上也就越成功。然而，时间过得越久，中间阶级就会越是无望地落后于历史发展，就越是被剥夺了代表国民发言的机会。不错，小资产阶级空论家（伯恩施坦⁹和考茨基）满意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消失并没有像马克思学派提出的

那样迅速发生。确实，从数量上看，城市，特别还有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仍然占据着极其庞大的地位。但这一发展的主要内容反映在小资产阶级遗失其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上：这个阶级对国民总收入贡献的价值量比小资产阶级数量下降得快多了。其社会、政治和文化重要性也相应下降了。历史发展越来越不以这些保守等级的继承者为基础，而是以社会两极的阶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为基础。

小资产阶级越是失去自己的社会意义，就越难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历史角力之中扮演权威仲裁者的角色。与此同时，具有相当数量的市民，特别还有农民，继续在代议制选举统计中寻求自身的直接表达。所有公民作为选民形式上的平等只是更公开地表达了“民主代议制”无力解决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无产者、农民和托拉斯领导人“平等”投票使农民在形式上成为两个对立者间的调解人。事实上，在社会和文化上落后、在政治上无助的农民，在所有国家中都支持了最反动、最冒险、最混乱和最腐败的政党，而归根结底，这些政党也总是支持资本而反对劳工。

与伯恩施坦、桑巴特¹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¹¹等人的所有预言相反，中间阶级的生命力并未减弱，而是极大地加剧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危机。如果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是以化学反应般的纯净形式发生的，那么无产阶级通过民主议会机构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就会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大得多。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坚持的事实，也就是它的生命力，在资本主义破坏了政治民主的本质之后，甚至对政治民主的外在形式都是致命的。小资产阶级通过在议会政治中占据了它在生产中失去的地位，最终损害了代议制，使其成为了混乱的、充满闲话并阻碍立法的机构。仅仅因此，无产阶级身上就多了个任务：在独

立于甚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夺取国家权力机器。这不是为了反对它的利益，而是为了反对它的愚蠢，反对它在无力的冲动中采取的那难以捉摸的政策。

马克思在讲拿破仑三世的帝国时写道：“帝国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¹²这里的定义比法兰西帝国体制要更加广泛，它包括了由于大国的民族资本的全球野心而诞生的最新型的帝国主义。在经济领域，帝国主义以小资产阶级角色的最终衰落为前提；在政治领域，它意味着通过内部分子重组来彻底摧毁民主，并使其所有工具和机构完全服从于自己的目的。帝国主义通过忽略这些国家过去的政治命运来拥抱所有国家，表明了自己与任何政治偏见格格不入，表明了它一视同仁地准备并能够利用在社会方面重生和被自己征服的尼古拉·罗曼诺夫或威廉·霍亨索伦的君主制、北美合众国的总统专制以及法国议会中上百无助的、人造奶油式的立法者。最近的一次大屠杀，即资产阶级世界通过其进行自我更新的那场血腥洗礼盆，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画面——所有政府形式、治理系统、政治方向、宗教和哲学流派都在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画面。甚至许多在过去几十年的帝国主义发展准备期睡大觉，继续以传统思想面对民主、普选等概念的腐儒，在战争期间也感到这些熟悉的概念充满了一些新的内容。专制、议会君主制、民主制。在帝国主义面前——而因此也在即将取代帝国主义的革命面前，所有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统治权，从俄国沙皇专制到北美的准民主联邦制，在权力上都是平等的，并以不可分割地互相补充的组合形式结合到一起。帝国主义通过它掌握的一切手段，包括不考虑选举票的算术学的议会，成功地在关键时刻完全制服了

城镇和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甚至也征服了上层无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掌握政权的标志，民族思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以国防口号获得了复苏。民族意识形态以令人出乎意料的鲜明程度在最近以牺牲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代价迸发出来。帝国主义幻梦的破灭——不仅包括战败者的幻梦，也包括胜利者的——最终破坏了曾经的民族民主，以及它的主要工具，即民主议会。在任何地方都能非常明显地看到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萎靡、恶劣与无助。在所有国家，国家权力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力量匹配的问题，这个问题横贯在台面上或幕后主导的资本家集团及起义的革命无产阶级之间，前者有数十万训练有素、坚忍不拔、不可阻挡的军官，而后者处于中间阶级吓破了胆、张皇失措和意志消沉的条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无产阶级通过民主代议制和平夺取政权的言论是可悲的闲话。

在全球范围内，政治局势的图景相当明晰。资产阶级——首先是胜利者一遍的资产阶级，通过把面色惨白且憔悴的人民带到了毁灭的边缘，暴露了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带领人民摆脱可怕处境，也暴露了它与人类的进一步发展之不相容。所有的中间政治集团，包括为首的社会爱国主义党派都在活活地腐烂。受到他们欺骗的无产阶级日渐反对他们，并巩固自己作为唯一能够将人民从野蛮和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力量的革命使命。但历史还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政党争取到形式上的议会多数。换句话说，历史并没有把国民变成一个辩论俱乐部，悄悄地通过多数票表决赞成向社会革命过渡。正相反，暴力革命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历史的迫切需求无力通过议会民主制的机器为自己打开道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算计着：“只要我还拥有土地、车间、厂房和银行，只要我还拥有报纸、大学和学校——最重要的，只要我还控制着军

队，无论你们如何改组民主的机器，它将仍然服从我的意志。我在精神上征服了愚蠢的、保守的、懦弱的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都在物质上臣服于我。我通过我的建筑物、我给的好处、我的计划和我的罪行压制并将一直压制住他们的想象力。在他们不满和小声嘟囔的时候，我就会制造数十个安全阀和避雷针。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召集反对党派，他们明天就会消失，但今天却会完成自己的使命，使小资产阶级能够在不损害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表达愤慨。我将用普遍义务教育制度束缚广大人民群众，让他们在完全无知的边缘徘徊，不让他们有机会把知识提升到我们的精神奴役专家认定的安全水平之上。我将腐蚀、欺骗并恐吓无产阶级内部的特权分子和落后成员。我同时利用这些措施，只要还掌握着必要的征服和恐吓工具，就能阻止工人阶级先锋队掌握大多数人民的意识。”

对此，革命的无产阶级回答道：“因此，救赎的首要条件就是从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统治工具。所有统治工具仍在资产阶级手中时，和平上台的想法是无望的。以资产阶级自己提出并设下了街垒的道路，即议会民主的道路获得权力的想法则是三倍无望的。只有一条路：通过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物质的统治机器来夺取权力。无论议会中表面上的力量对比为何，我都将把主要力量和生产资料交给社会支配。我将从资本主义的催眠中唤醒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我将在实践中向他们展示社会主义生产的意义。到那时，即便是人民中最为愚昧落后或备受恐吓的那层人也会支持我，自愿并自觉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

当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¹³时，西欧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认为这一事实即使不是末日的开始，也意味着与社会主义过往的整个发展阶段进行了拙劣的、武断的决裂。但与此同时，这

只是帝国主义与战争准备的新形势下必然得出的结论。俄国共产主义第一次走上了理论和实践总结出来的道路的历史原因，与俄国无产阶级首次被迫走上为政权而斗争的道路的历史原因是相同的。

此后欧洲发生的一切都表明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认为民主的纯洁性有可能恢复，就是在做可悲的反动乌托邦的南柯梦。

民主的形而上学

在民主问题上，考茨基感到了脚下历史根基的动摇性，于是便一头扎进了经院哲学的泥土里。他不去研究当下，而是在推论应该如何。

民主原则——人民主权、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自由——的身上出现了道德义务的光环。它们被从自己的历史内容中抽象出来，并被描绘成神圣且不可动摇的事物。这种形而上的堕落并非偶然。极具启发性的是，即便是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在他活动的最佳时期是康德主义的反对者，而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被爱国主义的浪潮吞没时，也试图抓住绝对律令的稻草……

对于德国人民现在尤为熟悉的那种真正的民主，考茨基将其与一种作为庸俗的现象和事物的理想的民主进行对比。考茨基并没有肯定地指出哪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真正能够确保无痛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他深知，这样的民主是必须的。考茨基把目前的德国国民议会——那个无助的、反动恶意的、追求屈辱的机关与另一个“真正的”、“正确的”国民议会作了对比。后者什么都好，唯一的缺点在于它并不存在……

形式民主的教义并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而属于所谓“自然法”的理论。后者的本质是承认永恒不变的法律规范，而这些规范，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而这些表达方式一定程度上具有局限性，并且受了扭曲。现代史中的自然法，即从中世纪产生的自然法，首先是抗议等级特权、专制对于立法的乱用和其他封建实在法等“人为”产物。仍然过于弱小的第三等级思想家在某些理想规范中表达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这些规范后来则发展为民主学说，同时获得了个人主义的性质。个人就是目的本身，所有的人都有权利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同样的选举权。民主的要求作为反封建主义的战斗旗帜具有进步特点。然而，越往后，自然法的形而上学（形式民主理论）就越是显露出了其反动的一面：建立一套能控制工人群众和革命政党现实要求的理想规范。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世界观的历史交替，就会发现自然法理论仿佛复述了不带有原始神秘主义的基督教唯灵论。福音书向奴隶宣布，说他与奴隶主具有同样的灵魂，声称天庭面前人人平等。而事实上，奴隶仍然是奴隶，服从对他来说是一种宗教义务。奴隶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找到了神秘主义的发泄口，借此来抗议令人饱受屈辱的黑暗状况。他一边抗议，一边得到安慰。基督教对他说：“你虽然像一头驮驴，但有一个不朽的灵魂。”这里听上去像愤怒。但同一个基督教说道：“你先活得像一头驮驴一样，但你不朽的灵魂已经准备好得到永远的回报了。”这里听上去是安慰。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阶级中，基督教历来以不同的方式结合了这两种论调。但总的来说，基督教和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变成了哄骗受压迫群众良心的工具。¹⁴

发展成为民主理论的自然法告诉工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其背景、财产状况和地位；在决定人民的命运时，人人享有平等的发言权。这一理想规范曾让群众意识革命化，因为谴责了专制主义、贵族特权和财产资格审查。但越往后，它就越麻醉群众，使贫困、奴役和屈辱合法化；因为，既然每个人都有权发言决定人民的命运，那又怎么可以反抗奴役呢？

罗斯柴尔德¹⁵将全世界的血泪铸成自己钱箱里的带拿破仑头像的金币，在议会选举中只有一票。一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掘土工人，一生不能穿着衣服睡觉，像地下的鼯鼠一样在社会上游荡，然而，他享有人民主权，在法庭和议会选举中与罗斯柴尔德平等。在现实生活条件中，在经济进程中，在社会关系中，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平等：一边堆积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奢侈品，而另一边却堆满了贫穷和无望。但在国家法律的上层建筑范围里，这些巨大的矛盾都消失了；只有无形的法律阴影可以穿透那里。地主、农夫、资本家、无产者、部长和擦鞋匠——他们作为“公民”，作为“立法者”，都是平等的。基督教中神秘主义的平等从天堂降临人世，就形成了民主的自然法，可是，它还是不接地气，并没有落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土地上来。对于一生都在给资产阶级当驮牛的愚昧短工来说，通过议会选举的媒介影响人民的理想权利仍然比天国应许给他的幸福要真实得多。

在某个时代，为了工人阶级发展的实际利益，社会主义政党走上了代议制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接受了民主的形而上学理论，后者建立在超历史、超阶级的法律之上。无产阶级学说认为民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辅助工具，完全适应统治阶级的任务和需要。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社会依靠无产阶级的劳动生

存，没法拒绝将其阶级斗争的某些部分合法化而不损害自己，这就为社会主义政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利用民主机制提供了可能性，与此同时绝不把它当作亘古不变的原则来向它宣誓。

在所有时代的斗争中，党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人们——团结的人类公共生活的成员——创造真实的、经济的、生活的平等条件。也正是因此，无产阶级理论家不得不揭穿民主的形而上学，即政治骗局的哲学外衣。

如果说民主政党在其革命高潮的时代揭露了教会教条的压迫性的、令人窒息的谎言，向群众宣传道：“你们在生的另一端被哄骗到了永恒的幸福之中，而在当下你们却被剥夺了权利，被专横跋扈的枷锁束缚着”，那么几十年后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同样有权对同样的群众说：“你们被哄骗到公民平等和政治权利的虚构当中，但却已经被剥夺了行使这些权利的可能性；有条件的、幻影般的法律平等已经变成了一个思想上的苦刑犯锁链，你们每个人都被它拴在了资本的战车上。”

社会主义政党以其基础任务的名义，也在代议制的基础上动员群众，但这些党也从未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承诺通过除了民主的途径以外的方式将群众带向社会主义。在适应议会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在前一个时代仅限于在理论上揭露民主，因为我们还太弱，没法在实践中克服它。但是，在所有的偏差、蜕化与背叛的缝隙中若隐若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轨道，已经预设了这样的结果：无产阶级的工作机制一旦被证明足以能完成这种任务的时候，就抛弃民主，并取而代之。

我们将举出一个证词，这份证词相当生动。保尔·拉法格¹⁶在1888年的俄语文集《社会民主党人文集》中这样写道：“议会制是这样一种政府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会有一种幻想，

似乎是人民亲自管理国家事务，而实际上真正的权力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甚至不是整个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阶级的某些阶层手中。资产阶级在其统治的初期不懂得，或者说得确切些，感觉不到需要给人民制造自治的幻想。因此，欧洲的所有议会制国家开始时都实行有限制的选举制。在所有的地方，通过议员选举来左右国家政策的权力起初只属于较大的有产者，而后才逐步扩大到不太富裕的公民，直到在某些国家把这种权力从特权变成全体居民的普选权。”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财富的数量越大，占有者的人数就越少；权力也是这样：随着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人数的增长和选举产生的执政者人数的增加，实际的权力日益集中，并为越来越少数的一帮人所垄断。”¹⁷这就是多数票的秘密。

在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看来，只要资产阶级维持统治地位，代议制就会存在。他写道：“一旦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它必须组织革命政权，并且用专政的手段管理社会，直到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为止……”¹⁸

当初的考茨基知道这种对代议制的马克思主义评价，而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重复过这种评价——虽然没有那种高卢式的清晰和辛辣。考茨基的理论变节恰恰在于，他通过承认了民主原则绝对且不可改变，再度从唯物辩证法回退到自然法去了。曾被马克思主义揭露过是资产阶级的传动机制的、只需在政治上临时使用，以便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准备的那东西，又被考茨基奉为最高原则，站在各阶级之上，无条件地使无产阶级斗争方法臣服于其之下。代议制的反革命堕落在第二国际的腐儒对民主的美化中得到了最彻底的体现。

立宪会议

总的来说，无产阶级政党并非完全不可能在民主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但即便有这样的事情，也不会给事件的发展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新变化。受无产阶级在议会中的胜利的影响，知识界的中间分子可能较少反对新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抵抗将由军队的情绪、工人的武装程度、邻国的局势等因素决定；内战将在这些实际环境的压力下发展，而不是在代议制不稳定的算术下发展。

我们的党不曾放弃过通过民主的大门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因为我们清楚意识到了通过这种“合法化”过渡到新体制的某种鼓动性、政治性优势。因此，我们也试图召集一个立宪会议。这一尝试失败了。刚被革命唤醒参加政治生活的俄国农民，发现自己面对着数个党派，而每一个党派似乎都想赶走他们。立宪会议挡住了革命运动的路——然后被扫地出门。

立宪会议中占多数的妥协分子只是城市和农村的中间阶层以及无产阶级中较落后部分内部存在的考虑不足和犹豫不决在政治上的映射。我们如果从抽象的历史可能性角度出发，那么就可以说，倘若立宪会议运行了一两年，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与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联系，最终使他们名誉扫地，从而导致布尔什维克形式上占了上风，那就不会那么痛苦了；这向群众表明了实际上只有两种力量：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革命无产阶级和以陆海军将领为首的反革命民主势力。但整个问题在于，革命的国内关系发展速度并没有跟上国际关系的发展速度。如果我们的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脱给“事物发展过程”的客观教义，那么战争事件的发展可能就会超越我们。曾几何时，德国帝国主义差点就夺取彼得堡，而克伦斯基¹⁹政府也已经认真地开始撤离彼得堡

了。届时，彼得堡要是陷落了，无产阶级就要遭灭顶之灾，因为革命最好的力量都集中在那里，在波罗的海舰队上和红色首都中。

因此，不可以指责我们的党违背了历史发展，而可以指责我们的党在几个政治阶段上实现了飞跃。它踩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脑袋前进，以便防止德国军国主义踩着俄国无产阶级的脑袋，在革命的背后与协约国媾和，然后再向全世界张开自己的翅膀。

从上面说过的话不难推断出考茨基一直纠缠我们的两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如果我们想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为什么还要召开立宪会议？其次，如果我们认为应该召开的第一次立宪会议被证明是落后的，不符合革命的利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召开新的立宪会议呢？考茨基的后见之明（？）是，我们没有因为原则问题而拒绝民主，而只是因为它对我们不利。为了抓住这一诽谤的长尾巴²⁰，让我们来重现一下事实。

我们的党从革命一开始就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就是说，早在解散立宪会议和颁布召集立宪会议的法令之前，这个口号就已经提出来了。不错，我们没有把苏维埃与未来的立宪会议对立起来，后者的召开被克伦斯基政府不断拖延，问题也因此不断增多，但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一味跟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路，把立宪会议视为俄罗斯大地的未来主人，没指望它包治百病。我们已经向群众解释过，真正主人可以而且必须是劳动群众自己的革命组织——苏维埃。如果我们没有事先正式拒否立宪会议，那也只是因为它不是反对苏维埃的权力，而是反对克伦斯基自己的权力，而克伦斯基又只是资产阶级的一块招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事先决定好了，如果立宪会议中的

多数票结果对我们有利，立宪会议就应该自我解散，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就像后来根据最民主的选举法选出的圣彼得堡市杜马做的那样。在我的小册子《十月革命》中，我曾试图澄清过为什么立宪会议迟缓反映了一个已经被革命超越了的时代。这是因为我们只在苏维埃中看到了革命政权的组织，而且在召集立宪会议时，苏维埃已经是事实上的政权。所以，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可避免地朝着武力解散立宪会议的解决方向，而立宪会议本身也并不希望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而解散自己。

考茨基问道：“但是，你们为何不再召集一个新的立宪会议呢？”

因为我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如果说第一次立宪会议还能在瞬息间发挥进步作用，以便在小资产阶级分子面前将令人信服的合法性赋予给襁褓之中的苏维埃体制，那么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两年以后，在西伯利亚、白海沿岸、乌克兰、高加索地区的所有民主尝试彻底崩溃以后，苏维埃政权确实不需要立宪会议那声誉扫地的权威来施以祝圣仪式。考茨基与劳合·乔治异口同声地问道：既然这样我们是否有权得出结论，说苏维埃政权是按照少数人的意志来统治的，因为它避开了用于检验其至高无上之地位的总选举？他们的疑问脱靶了！²¹

如果说代议制度即使在“和平”且稳定发展的时代，作为国内情绪的计量表也相当粗糙，而在革命动荡的时代完全失去了跟上斗争进程和政治意识发展进程的能力的话，那么苏维埃体制则无可比拟地更加接近、更加有机、更加诚实地联系人民的劳动大众，认为自己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静态地表达多数，而是在于动态地形成多数。俄国工人阶级通过走上革命专政的道路表示，它在过渡时期的政策并不基于为了获得农民选票而与见风使舵的政

党进行的竞争，而是基于对农民群众进行现实中的吸收，使他们联合无产阶级，为劳动群众的真正利益来管理国家。这种民主比代议制更加深刻！

现在，当革命的主要任务——生与死的问题——是在军事上击退白匪的疯狂进攻时，考茨基是不是觉得，任何议会中的“多数”都能够确保一个更有活力、更有自我牺牲精神并更加接近胜利的革命防御组织？在一个革命国家里，斗争的条件是如此分明，被卑鄙的环形封锁带扼着咽喉，致使所有的中间阶级和团体都只剩下邓尼金和苏维埃政权两个选择。甚至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样在原则问题上有分歧的政党也在沿着同样的路径分裂。这还需要其他证明吗？！

在提议我们为立宪会议进行选举时，考茨基是不是打算在选举期间暂停内战？谁的决定可以暂停内战？如果他打算为此动用第二国际的权威，那我们就得赶紧提醒他：这个机构在邓尼金那边享有的权威只比在我们这边多一些而已。由于工农军队还在抗击帝国主义匪帮，而选举必然也只能在苏维埃的领土上进行，考茨基是不是想要我们允许那些支持邓尼金攻打我们的政党公开发言呢？这不过是空洞而卑鄙的闲话——任何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允许正在与它交战的一方在自己的军队后方调动敌方的力量。

其中相当重要的还有一点，即劳动居民中的精华目前正在现役部队里。先进的无产者和最有觉悟的农民，在各种选举中，如同在每一次群众性政治行动中那样，都站在前头引导劳动者的舆论，而他们现在都正在身为红军指挥官、政委或列兵在战斗和牺牲着。如果资产阶级国家中最“民主”的、体制建立在代议制的基础之上的政府都认为不可能在战时举行议会选举的话，那么要

求体制丝毫不建立在代议制基础之上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战时进行这种选举就更有没意义了。它自己的选举机构——地方和中央苏维埃——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被俄国的革命政权阻止其通过定期改选来自我更新脚步，这完全足够了。

最后，作为最后但并非不重要（the last not least²²）的论据，我们不得不告知考茨基：即使是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即像马尔托夫和唐恩²³这样的孟什维克，也不认为目前可以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而是把它推迟到了更美好的未来去。到时候还需要召开吗？值得怀疑。一旦内战结束，工人阶级的专政就可以释放出它所有的创造力，并在实践中向最落后的群众展现出自己能给予他们的东西。通过劳动义务的有计划实行和集中化的分配组织，全国居民都将参与到全苏维埃的经济和自治体系当中。苏维埃本身——现在的政权机关——将逐渐解体成为纯粹的经济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内容头上竖起一顶立宪会议般的陈旧王冠，毕竟，一切必要的东西已经在立宪会议之前就已经“立”好了，而且还是在没有立宪会议的情况下“立”好的。²⁴

注释：

[1]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生于哈菲尔河畔勃兰登堡（Brandenburg an der Havel），1884年参加社民党，1892年当选为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主席。1902—1918年担任开姆尼茨的《人民之声》主编。1906—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基尔起义后，骗取了基尔水兵的信任，当上了基尔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30日出任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和国防军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并指使自由军团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1919年2月13日—1920年3月22日任国防部长。1920—1933年任汉诺威省总督，纳粹

党上台后被撤职。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变”而被捕，被监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来被盟军解救。1946年死于汉诺威。——中译者注

[2] 沃格尔中尉是杀死罗莎·卢森堡的凶手。社会民主党政府装模作样地审判了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凶手，演出了一场无耻的喜剧。凶手只不过是轻微的惩罚。——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库尔特·沃格尔 (Kurt Vogel, 1889年10月11日—1967年?月?日), 德国军官。一战期间入伍, 积功晋中尉军衔。1918年加入自由军团。1919年1月15日参与谋杀罗莎·卢森堡, 同年5月14日被判处两年四个月徒刑, 5月17日在同伙的协助下越狱, 逃往荷兰。

[中译者补注 2] 根据英文维基百科, 向罗莎·卢森堡开枪的可能是赫尔曼·苏雄 (Hermann Souchon)。

[3]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 三联书店1963年版, 第165页。——中译者注

[4] 同上, 第172页。——中译者注

[5] 《爱尔福特纲领》是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 卡尔·考茨基密切参与了起草过程。这份纲领本着正统马克思主义精神, 最终清除了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上合流的拉萨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爱森纳赫派) 通过的纲领中残余的拉萨尔主义。尽管如此, 《爱尔福特纲领》仍存在内部缺陷, 因为当时是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时代; 世界资本主义正进入其最繁荣期, 德国正迅速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之一。这些客观条件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合法化和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的胜利。在此基础上, 改良主义不断壮大, 拒绝革命斗争, 宣扬渐进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激进分子虽然反抗修正主义, 保留了社会民主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 但这种激进主义更多表现在理论领域而不是实践领域。

德国社会民主党目前的活动越来越淡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革命目标, 完全专注于合法的议会、政党和工会活动。《爱尔福特纲领》鲜明体现了这一矛盾: 它的理论方面以革命为目标, 实践方面却几乎仅限于议会活动, 没有超出纯粹议会方法的框架。《爱尔福特纲领》的民主改革清

单，完全没有具体展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条件和形式，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有机”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完全落后于因革命时期而闻名的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的四分之三。

帝国主义战争暴露了上个时代所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幻影的昙花一现的性质。世界大战空前激化了社会矛盾，全世界经济因此崩溃。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通过战争，使世界无产阶级接近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直面客观形势，当前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战后革命事态明显已经超越了《爱尔福特纲领》实践部分的主要问题——在资产阶级制度内征服民主。

《爱尔福特纲领》长期以来一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方纲领。1921 年，格尔利茨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纲领。《格尔利茨纲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甚至比《爱尔福特纲领》倒退了，其显著特点是完全拒绝阶级斗争的思想，社民党不仅承认工人阶级，还承认一切劳动人民。因此，这份新纲领标志着社民党最终放弃了独立的阶级立场。——俄文版编者注

[6] 蒲鲁东主义是法国工人运动的一种流派，得名于创始人蒲鲁东（1809—1865）。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要改造资产阶级社会，实际上只是想清除其中的一切矛盾，把它变成一个理想的资产阶级社会。蒲鲁东在《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De la Capacité politique des classes ouvrières*）中谈到了无产阶级独立阶级组织的必要性，但继续对罢工和直接参与政治斗争表示不满。蒲鲁东反对共产主义，提出了合作互助方式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蒲鲁东主义思潮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第一国际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蒲鲁东的观点遭到了马克思的彻底批判。参见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这本书回应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俄文版编者注

[7]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61—62 页。——中译者注

[8] 布朗基主义者是伟大的法国革命家布朗基的追随者。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生于 1805 年）在 1830 年的法国革命中做出了杰出的贡

献，并将他的全部人生都献给了革命斗争，坚定参与和组织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武装起义。在他的报纸《人民之友社》（*Société des amis du peuple*）中，布朗基与政府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因此获刑1年。1836年，他再次参与制造火药，获刑2年。获赦后积极参加四季社（*Société des saisons*），为起义做准备；起义被镇压，他被判处死刑（1840年），但被减为无期徒刑。1848年革命解放了布朗基，他再次组织了中央共和社（*Société républicaine centrale*）。他因企图组织夺取政权而再次被判处10年监禁，曾试图逃跑，但失败了。他被流放到科西嘉岛，在那里被囚禁在堡垒中。1859年的大赦释放了布朗基。他立即因组织秘密社团而被捕，获刑4年。1870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组织使布朗基从事积极的革命工作。他被缺席选举为公社成员，但很快被捕入狱。公社成员试图以显赫的凡尔赛贵族换取他，但均无济于事。1872年，布朗基被军事法庭判处流放。1879年，他当选众议院议员，但政府不同意他当选。1881年去世。

从布朗基的革命活动中可以看出布朗基主义的本质。布朗基主义可以概括为“通过精心组织的秘密阴谋和详细准备的武装起义，有可能夺取国家政权并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布朗基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马克思主义超越。前者的主要缺点在于不了解阴谋成功与革命运动的客观前提之间的关系，不了解工人群众运动的意义及其在某个方向上的准备。然而，布朗基主义明白夺取国家政权的意义，强调了革命者的积极作用的重要性。在这些方面，布朗基主义接近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表现形式——布尔什维主义。——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 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

评。

[9] 爱德华·伯恩斯坦（出生于 1850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一辈人物之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工作。《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代党中央机关的编辑。

90 年代末，他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修正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的学说在许多方面是不科学的。伯恩斯坦认为这些马克思学说中关于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贫困化、资本普遍集中（特别是农业集中）、群众革命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不科学。伯恩斯坦这本书的积极部分归结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阶级矛盾不会加剧，而是缓和，工人阶级的状况通过国家改革越来越好，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正在发生。伯恩斯坦宣布议会是资产阶级社会转型的工具，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实现在议会中的多数。伯恩斯坦的书出现在资本主义和平繁荣的时代，成为国际社会民主“修正主义”或“伯恩斯坦主义”整个思潮的起点。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倍倍尔、卢森堡等人——都发声反对修正主义，并在一系列著作中证明了修正主义在整个科学上的矛盾及其对工人运动的政治危险。

自他的第一本修正主义著作问世以来，伯恩斯坦在过去三十年中的演变一直在稳步向右。在他的新书中，他证明了工人阶级在习俗和殖民政策、陆海军的军备方面与资产阶级存在共同的利益。早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前，他就“证实”了工人阶级有祖国。不言而喻，他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爱国主义立场，鼓吹阶级合作。——俄文版编者注

[10] 维尔纳·桑巴特（生于 1863 年）是德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著有名著《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 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等等。他稍微“感染”了马克思主义。桑巴特在他的著作中驳斥了马克思构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即小生产逐渐消亡。他认为，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会民主化，社会矛盾趋于缓和。他起初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后来演变为君主主义者。在战争期间，他采取了极端爱国主义的立场。——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维尔纳·桑巴特 (Werner Sombart, 1863 年 1 月 19 日—1941 年 5 月 18 日), 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11]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是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 著有许多科学名著。举几个主要的: 《俄罗斯工厂》(Русская фабрика) 《现代英国工业危机、原因及其影响》(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кризисы в Англии) 《政治经济原理》(Осно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纸币与金属》(Бумажные деньги и металл) 等。90 年代,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是有名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反对者之一。民粹主义在理论上被粉碎后,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变成了一个公开的、热心的修正主义者, 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марксизма) 尤其可以体现这一点。他转向康德和庞巴维克, 最终成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 1918 年去世, 曾任南方某个反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 1865 年 1 月 8 日—1919 年 1 月 21 日), 俄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1883 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94 年转向合法马克思主义运动。1900 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1 年与马克思主义决裂。1905 年革命失败后在彼得堡任教。1909 年加入立宪民主党。二月革命后在乌克兰参加民族主义运动, 曾担任乌克兰财政部长。1919 年在参加巴黎和会途中去世。

[12]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58 页。——中译者注

[13] 1918 年 1 月 1—7 日解散立宪会议。根据社会革命党右派斯维亚季茨基的计算, 601 人当选为立宪会议代表: 338 名社会革命党人 (58%), 其中 239 名属于右派, 69 名乌克兰派和 39 名左派; 156 名布尔什维克 (25%), 14 名立宪民主党人 (5%), 两名人民社会党员和 1 名孟什维克 (不包括外高加索); 其余的小部分代表在合作派、民族团体等之间分配。由于社会革命党的乌克兰派投弃权票, 立宪民主党根本没有出席, 那么 1 月 5 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会议的力量对比如下: 反革命资产

阶级集团 323 票，苏维埃政党（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195 票。这决定了立宪会议的行为路线。立宪会议拒绝讨论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斯维尔德洛夫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从而宣布不承认十月革命和其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左派相继退出立宪会议。此后，立宪会议通过了关于将土地转让给人民的法律和关于开启俄德和平谈判的决议，希望用这些迟来的措施能使自己和苏维埃的斗争容易一些。然而，立宪会议的立场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社会上没人支持它：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组织的捍卫立宪会议的示威给人留下了悲惨的印象，因为他们完全得不到工人和士兵的支持。1 月 6 日至 7 日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解散立宪会议。

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上的策略绝非偶然，而是源于布尔什维主义关于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观点。甚至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列宁在 1917 年 12 月中旬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中就写道：

“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 1917 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

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 [中译者注：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增订版第 33 卷第 167 页。]

同时，列宁预见到了那些本应导致立宪会议不符合国内实际力量对比的特殊因素。这些因素包括：（1）社会革命党在立宪会议选举后分裂。

（2）十月革命胜利前举行选举，当时劳动群众无法理解十月革命的全部意义。（3）11 月和 12 月发生的革命改变了军队和农民的政治倾向，但立宪会议反映不了这种倾向。关于立宪会议的内容，详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14] 译者在这里补充几条来自《圣经》的译文，供读者参阅、批判使

用。

(1) “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武加大译本拉丁文：“qui enim in Domino vocatus est servus libertus est Domini similiter qui liber vocatus est servus est Christi.”）——《新约·哥林多前书》7：22

(2)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武加大译本拉丁文：“state et nolite iterum iugo servitutis contineri.”）——《新约·加拉太书》5：1

(3)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武加大译本拉丁文：“Dominus autem Spiritus est ubi autem Spiritus Domini ibi libertas.”）——《新约·哥多林后书》3：17

(4) “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武加大译本拉丁文：“quasi liberi et non quasi velamen habentes malitiae libertatem sed sicut servi Dei.”）——《新约·彼得前书》2：16

[15] 罗斯柴尔德是欧洲最富有的银行。其创始人迈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1743—1812）出身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犹太商人家庭。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法兰克福、伦敦、维也纳和那不勒斯拥有银行办事处。他们拥有巨额财富，对欧洲货币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迈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1744年2月23日—1812年9月19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创始人，国际金融之父，欧洲银行巨擘。

[16]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婿，法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他年轻时是蒲鲁东主义者。1865年与马克思相识后，他开始拥护科学社会主义。他积极参与巴黎公社的活动。拉法格试图在各省（波尔多）发起支持公社的运动，但失败，随后被迫逃往西班牙。拉法格先后在西班牙、葡萄牙积极参与了工人运动，组织了第一国际的分部，并与巴枯宁的影响作了斗争。1872年积极参加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工

作。1880年返回巴黎后，他加入了法国工人党机关报《平等》编辑部。从那时起，他成为法国社会党的领袖和公认的理论家。拉法格试图向法国工人运动灌输持续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米勒兰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他身上碰到了钉子。拉法格的手笔中有许多杰出的科学著作和小册子。他的著作《财产及其起源》和《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已被翻译成欧洲所有的语言。他年事已高，意识到自己不适合积极参加党的工作，他与妻子劳拉一起自杀了。——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年1月15日—1911年11月26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1851年随全家迁回法国波尔多。1864年进入巴黎大学。在蒲鲁东影响下，参加了第一国际。后来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1868年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9年与盖得等人成立法国工人党。1889年主持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1911年与妻子一起自杀。

[中译者补注 2] 珍妮·劳拉·马克思（Jenny Laura Marx，1845年9月26日—1911年11月25日），马克思的次女，曾任马克思的秘书。1868年嫁给保尔·拉法格，积极参加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工作。1911年11月25日同拉法格一道自杀身亡。

[17] 《拉法格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265页。——中译者注

[18] 《拉法格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页。——中译者注

[19]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受过律师教育，在1917年革命之前从事宣传工作。他是国家杜马的成员，在那里他加入了劳动派。革命前夕的克伦斯基是杜马反对派的杰出成员。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他加入了1917年2月之后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府，尽管苏维埃决定阻止社会主义者进入李沃夫大公的政府。古契科夫辞职后，克伦斯基担任陆军和海军部长。在二月革命的接下来的进程中，他是取代资产阶级政府的联合各部委的主要人物。十月前夕，克伦斯基任总理、战争部长和总司令。克伦

斯基政治面貌的主要特征混合了革命词句、冒险主义和波拿巴主义。但是，从其政治活动的客观结果来看，克伦斯基是国内外大资产阶级的工具，他本质上实行资产阶级政策。作为战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1917年6月18日，为了讨好英法的大金融资本，他又重新与德国人开战。1917年9月，他希望挽救资产阶级政府的基础，卷入了科尔尼洛夫的冒险行动中。他最终妥协，被十月革命一扫而光。现在他流亡国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2] 格奥尔基·叶夫盖尼耶维奇·李沃夫（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1861年11月30日—1925年3月7日），出身于留里克家族，1905年参加立宪民主党，1914年任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于1917年3月15日任临时政府总理，7月21日辞职。十月革命后被捕，后逃走，流亡巴黎。

[中译者补注 3]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年10月14日—1936年2月14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资本家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曾在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出任十月党党首。1910年至1911年担任杜马议长。一战期间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1917年4月29日被迫辞职。十月革命后，积极支持反革命白军。白军失败后流亡国外。

[20] 原文直译为“长耳朵”。——中译者注

[21] 原文直译为：“这是一个未正中目标的打击！”——中译者注

[22] 原文疑似有语法错误，应为“Last but not least”。——中译者注

[23] 唐恩是孟什维克最杰出的领袖之一。唐恩一直站在孟什维主义的

极右翼立场上。在 1905 年以后的反动时期，他是取消主义的主要代言人，企图彻底清除地下组织。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他持温和的齐美尔瓦尔德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他是孟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支持与资产阶级结盟。十月之后，他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多次因反苏维埃地下活动被捕。目前，马尔托夫去世后，他是孟什维克的主要领袖，柏林出版的《社会主义公报》的编辑之一。——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 年 10 月 19 日—1947 年 1 月 22 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 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 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 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 年回国，1914 年再次被捕，1915 年获释后参军。1917 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 年被捕，1922 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 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 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 年在纽约逝世。

[24] 为了诱导我们支持立宪会议，为了支持自己从绝对命令得出来的论据，考茨基提出了一个源于货币的论证。他写道：“俄国现在亟需外国资本，但是，除非它主张召开国民议会和赞成出版自由，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可能马上得到外国资本的援助的。这并不是说资本家们都是民主主义的思想家。他们毫不犹豫地拿出几百万金来接济沙皇政府，但他们不大相信现在的革命政府有经营业务的能力。”（第 163 页）在这幅涂鸦上有这么几片真理的碎片。当高尔察克政府依靠立宪会议的时候，交易所的确支持他。但当高尔察克驱散立宪会议的时候，交易所对他的支持就更加有力了。从高尔察克的经验中，交易所更加确信，资产阶级的民主机制可以被用于资本主义的目的，然后像破旧的袜子一样被丢弃。完全可能的是，交

第三章 民主

交易所会再次为立宪会议提供一些初步贷款，因为他们坚信，立宪会议只是走向资本主义专政的一个过渡阶段，而过去的经验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打算以这样的价格去交易所购买“商业信心”，我们强烈倾向于红军的武器在现实的交易所中引起的“信心”。——俄文版编者注

第四章 恐怖主义

考茨基小册子的主题是恐怖主义。考茨基宣称，恐怖主义是革命的本质，而他广泛传播这种谬论。“想要革命的人必须与恐怖主义和解”，这并不正确。一般来说，考茨基支持革命，却坚定地反对恐怖主义。然而，矛盾也便由此产生。

考茨基抱怨道：“这次革命已带来了由一些社会主义政府实行的最残忍的恐怖手段。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始作俑者，因而受到了一切不同意布尔什维克观点的人们的最严厉的谴责。其中就有德国多数派社会党人。但是，在这些社会党人采取了作为东方革命特征的由恐怖统治实施同样的手段以前，他们并不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¹似乎由此可以断定恐怖主义与革命的本质具有很深的联系，程度比一些圣贤认为的还要深。但是考茨基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红白双方的恐怖主义在一切最近的革命（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当中的巨大发展，似乎就是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不再是考茨基的理论大梦中“应该成为”的那种革命了。我们先不去纠结“这样的”的革命是否“本就应该”需要恐怖主义，先来看看几场革命的例子，看看它们在活生生的人类历史中是怎样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宗教改革²的历史。宗教改革是中世纪与新历史的分水岭：它越是能牵涉到群众的利益，就越是能够运用内战的方式把宗教的藩篱一扫而空，就越是能无情地让恐怖在双方扎根。

17世纪的英格兰发生了两场革命。第一场革命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变动和战争，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而第二次革命则顺利地促成了新王朝的诞生。英国资产阶级及其历史学家对这两次

革命的态度截然不同：第一次乃是暴徒煽动的结果——“大叛乱”，而第二次革命则被戴上了“光荣革命”的帽子。法国历史学家奥古斯丹·梯叶里³大致阐述了一下这两种革命的不同之处的原因。第一次英国革命——“大叛乱”期间，人民是活跃力量。而第二次革命中群众几乎“默不做声”。所以，在阶级奴役的环境下，很难教育被压迫的群众去遵守良好的礼节。他们要是被惹怒了，就得揭竿而起，手持石块，紧握绳索，高擎火把。剥削阶级的御用历史学家对此无能狂怒。但是，新（资产阶级的）英国历史上的大事，不是“光荣革命”，而是“大叛乱”。

自宗教改革和“大叛乱”之后，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就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其意义远远超过前两者。这场典型的革命存在着相对应的典型的恐怖主义。考茨基愿意原谅雅各宾党人的恐怖主义，认为他们除了动用恐怖手段，别无他法来拯救共和国。但是经此辩解，事后再也没有人能得到帮助和受到阻碍。可18世纪末的考茨基分子们（法国吉伦特派的领袖们⁴）却从雅各宾党人⁵身上看到了罪恶的人格化趋向。某位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对比过雅各宾党人与吉伦特派，虽然他笔调平庸，但我们仍可从中深受启发：“两派都希望出现一个共和国”……但是吉伦特派“渴求的是一个自由、法治和仁慈的共和国。而山岳派渴求（！）的却是一个暴虐的、恐怖的共和国；两派都支持人民拥有最高权力，但是吉伦特派不偏不倚地把人民理解为所有的人，而山岳派却只将劳动阶级看作是人民。所以，在山岳派眼中只有这些人应该拥有领导权。”这几句话虽然运用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术语，但清晰地描绘了高贵的立宪会议支持者与残暴成性的革命专政领导者之间的对立。

雅各宾党人之所以实行残酷专政，是因为革命的法兰西处于危急存亡之时。这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是这样描述那个时代的：“外国军队从四面八方侵入法国领土。在北方是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在阿尔萨斯是普鲁士人，从多菲内直到里昂是皮埃蒙特人，在鲁西荣则是西班牙人。而且，彼时内战四起：诺曼底、旺代、里昂，还有土伦。”除此之外，我们还须加上许多内部的敌人。他们在暗地里支持旧政权，随时准备效忠于仇敌。

我们应该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这般严酷，也是因为面临着与法国大革命相类似的严酷环境。战线遍布四面八方，连绵不断。苏维埃俄国除了要跟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等白匪势力残酷斗争以外，还要面临着如下轮番干涉革命的敌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同时国家还面临着封锁和饥荒，以及阴谋、叛乱、恐怖行动，桥梁和铁路都遭到破坏。

“承担着与无数内外敌人斗争任务的政府既无资金也无足够的军队，几乎是一无所有，除了国家中革命群众所表现出的热情支持和无穷干劲，还有为了国家的安全不惜使用任何必要手段的巨大勇气，尽管它们看上去是那么专断和严厉。”普列汉诺夫也曾拿类似的话来描述雅各宾政府。⁶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 19 世纪下半叶，看看发生在“民主”国家（即北美合众国）的一场革命。尽管问题不在于完全消灭财产私有制，而只是废除黑奴制，但是民主制度却无力以和平方式来解决纷争。当南方各州在 1860 年总统选举中落败后，他们决定不择手段，妄图在奴隶制问题上垂死挣扎，想恢复昔日的辉煌。于是，他们用自由、独立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词汇来掩饰自己的叛乱行径。因此，这些必然与内战中的一切后续一脉相承。

这场斗争刚开始时，设在巴尔的摩的军政府不顾《人身保护法》，逮捕了迈克亨瑞要塞的几个公民，因为他们同情南方的奴隶主。关于这个行动是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成了所谓“高级权力机构”间激烈争论的对象。最高法院判定总统既没有权力阻止《人身保护法》的实行，也不能为军事权力机构授予全权。“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这才是合乎宪法地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位研究美国内战的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说，“但是国家局势处于如此危急的程度，采取果断的措施以防止巴尔的摩居民叛乱的必要性又是如此巨大，所以不仅是政府，美国人民也都支持大部分强力手段。”⁷

北方商人秘密向某些南方叛乱者供货，以满足他们的某些商品需求。自然，北方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对此进行镇压。1861年8月6日，总统批准了国会关于“没收用于暴动目的的财产”的决议。在最具民主因素的形式下，人民赞成了那些极端手段。共和党在北方明显占有多数，而被怀疑是分离主义的人，即那些支持反叛的南方诸州的人，受到了暴力镇压。在一些北方的城镇，甚至是以守秩序著称的新英格兰，人们也经常冲入支持造反奴隶主的那些报社的办公室内，把他们的印刷设备砸个粉碎。人们偶尔也会给某些反动的出版商涂上焦油，糊上鹅毛，把他们拉到公共广场上示众，直到他们发誓忠于联邦时才罢休。对涂满了焦油的农场主的人身攻击与“目的本身”并没多少关系，因此考茨基的绝对律令在美国内战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还不是全部。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政府方面学会了运用各种手段来压制那些与它意见相左的出版物。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的出版自由就受到限制，不比专制的欧洲国家好多少。”同样的命运也落在了言论自由的头上。陆军中校弗莱⁸继续讲道：“以这种方

式，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民否定了其自身的大部分自由。这应当受到注意。”他从中引出教导说：“大多数人民忙于战争事务，为达目的不惧牺牲。他们太投入其中了，不再注意自由的消失，也几乎不会去注意它们的灭绝。” [8]

穷凶极恶的南方奴隶主们雇用了为所欲为的黑帮分子。帕里斯伯爵写道：“无论哪里出现一大群支持奴隶制的人，公共舆论就表现得对少数派十分残暴。谁对联邦旗帜嗤之以鼻……谁就被迫闭嘴。然而这还不够。像所有革命一样，政治冷感者也被迫向新秩序表忠诚……谁不忠于新秩序，谁就得被群众暴力弄得粉身碎骨……在每一个发展中的文明（西南各州）中心都成立起了警戒委员会——它的成员，则是一群在选举斗争中持与众不同的最为极端意见的一帮人……小酒馆是他们经常开会的场所，就在喧闹狂欢中掺和着令人不齿的对公共司法形式拙劣的模仿。少数几个疯子围在一张摆满杜松子酒和威士忌的桌边，就在那审判到场的或缺席的当地市民。那些被告甚至在受审之前就能看到绞索已经准备好了。而缺席受审的人直到挨了一粒藏在森林中的刽子手射来的子弹时才知道对他的判决……”这幅场景使人极易联想起每日每夜发生在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里奇，以及其他英法、美国“民主”英雄的营地里的事情。

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恐怖主义问题是如何在 1871 年巴黎公社中得到体现。无论如何，考茨基在巴黎公社与我们之间进行对立的努力根本上是失败的，而且只是使作者在大多数无足轻重的细节上去玩弄词汇。

人质制度显然应当被看作是内战恐怖主义的“必然产物”。考茨基反对恐怖主义，所以也反对人质制度，但是他却支持巴黎

公社。（注意⁹：巴黎公社出现在50年前。）然而巴黎公社扣押了人质。这样困难就产生了。何种解释艺术才能为此开脱呢？

巴黎公社对人质以及对处死他们的关注程度是与凡尔赛所执行的残暴政策相关联的。根据考茨基深刻的阐释，这是“为了努力保障人们的生命，而不是损害它”。一个奇迹般的发现！这只需进一步得到发展。它可以，而且一定能解释为在内战中我们消灭白军，目的是不使他们更多地杀害工人。结论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消灭人们的生命，而是去保护他们。但是当我们用手中的武器保护人们的生命时，它又导致了人生命的毁灭——不算其他更为古老的圣哲，这种辩证法的深奥难题也只有老黑格尔¹⁰才能破解。

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够维持存在并巩固它的阵地，只是因为它坚决地与凡尔赛进行斗争。凡尔赛在巴黎同样也有着大量内线。为了与梯也尔¹¹的内线作斗争，巴黎公社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前线和后方同时打击凡尔赛的阴谋。在与国民议会的军队进行内战期间，如果巴黎公社的原则超出了巴黎的边界而进入外省，就会发现它在那些和平居民中仍会遇到十分坚定的敌意。所以巴黎公社在抗击保王党的时候，在后方并不允许保王党人有言论自由。

考茨基不顾当今世界形势，完全没有认清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是什么，也没有认清特殊意义上的内战是什么。他不理解每个——几乎是每个巴黎市区中梯也尔的同情者不仅仅是巴黎公社的思想上的“敌人”，而且也是梯也尔的间谍、内线，是时刻准备从后背开枪的凶恶之敌。必须使这些敌人无害化，而这在战争时期就意味着必须消灭他们。

战争期间，革命任务包括摧垮敌人的意志，强迫他们投降并接受胜利者的条件。当然，意志是一个属于心理世界的事实，但

是，与会议、争论或国会截然不同，革命通过运用物质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目标，尽管运用的程度比战争要低。

资产阶级自己发动起义夺取政权，并通过内战来加固它。在和平时期，它又通过压迫体系来维持政权。只要是阶级社会，建立在根深蒂固基础上的矛盾就会进行下去，而压迫者也会持续使用必要的手段来摧垮敌方的意志。

即使在某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在民主国家的外在框架之内成长了起来，这也绝不意味着可以避免内战。关于谁才是国家统治者的问题，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生死问题，并不是由每一方参照宪法有关章节而完成的，而是要诉诸各种形式的暴力斗争。无论考茨基如何深入探究了类人猿的食物问题以及在目前和远古环境下决定人类残忍性的原因，他都不会发现在历史中，除了有目的、坚定有力地使用暴力外，没有其他的手段能够摧垮敌人的阶级意志。

斗争的残暴程度依赖于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状况。被推翻的阶级敌人的反扑越残忍、越危险，就越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恐怖制度对其进行系统性的镇压。

但是考茨基在他与苏维埃的斗争中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一种新的立场，对俄罗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残暴行径，他只是简单地推到一边，置之不理。“关于所有这种残暴，”他说，“在1917年11月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都找不到什么迹象，在最近的布达佩斯更是如此。”¹²

通过这种对问题令人满意的表述，革命恐怖主义被证明不过是布尔什维克嗜血的产物，他们同时还放弃了素食主义类人猿的传统和考茨基主义的道德教诲。

苏维埃在 1917 年 11 月初（新历）首次夺权时，只以轻微的牺牲就达到了目的。俄国资产阶级发现自身已自绝于群众，内心无力，被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影响，克伦斯基体制又是这么士气低落，所以很少能看到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在彼得堡，克伦斯基的政权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被推翻了。在莫斯科虽然有较长时间的抵抗，主要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行动中犹豫不决。在绝大多数外省的城镇，仅仅收到了来自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电报后政权就被移交给了苏维埃。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以后就不会出现“红色恐怖”这个词。但是刚进入 1917 年 11 月，就可以见到资产阶级抵抗。然而，西方帝国主义政府的干预，使俄国反革命对自己有了信心，并使其抵抗力量不断增强。这点在苏维埃革命的整个时期每日每夜大大小小的事件中都逐渐显示出来。

克伦斯基的“大本营”感到得不到士兵群众的支持，所以倾向于不加抵抗地承认苏维埃政权，而此时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了与德国的停战谈判。但是协约国军事代表团的抗议随之而来，并伴以公开的威胁。“大本营”的成员开始害怕了，加之“盟国”军官的煽动，他们开始走上抵抗之路。这导致一场武装冲突，并导致野战参谋杜赫宁¹³将军被一群革命的水兵杀死了。

在彼得堡，协约国的官方代理人，特别是法国军事代表团，与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携手，从苏维埃政变的第二天起，就公开组织反抗，广泛动员、武装、煽动士官生和一般资产阶级青年来反对我们。11 月 10 日士官生的叛乱导致百倍于 11 月 7 日革命的牺牲。与此同时，在协约国的组织下，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¹⁴发动了进军彼得格勒的冒险战役，这自然给斗争带来了最初的残酷要素。尽管如此，克拉斯诺夫将军还是以其人格担保而被释放。雅罗斯拉夫尔的叛乱（1918 年夏）导致更多的牺牲，这次

叛乱是由萨文科夫¹⁵在法国大使馆的指示和财力支援下组织发动的。在英国军舰和飞机的协助下，在英国海军特工的计划下，阿尔汉格尔斯克被占领。高尔察克，美国交易所的走卒，借着法国政府维持的外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建立了统治。卡列金¹⁶和克拉斯诺夫（被我们放了的那个人），顿河反革命的第一批领导人，借助德国公开的军事和财政支持才取得了部分成功。在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在1918年初的时候远远不如德国军国主义。邓尼金的志愿军在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和技术支援下建立起来。如果英国不干预的也不提供物质支持，尤登里奇[14]的军队建立不起来。协约国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在两年中长期露骨讨论：为俄国内战提供资金支援是否是一件有暴利可图的事业。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确实需要厚着脸皮、硬着头皮才能不理睬国际环境，而只在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中寻找俄国内战如此血腥的原因。

俄国无产阶级是第一个踏上社会革命的道路的，而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俄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能被鼓励着不接受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失败，仅仅是因为他们看到各国的大姐头都还掌握着权力，还控制着经济、政治和一定程度的军事力量。

如果我们的11月政变发生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建立起无产阶级统治的几个星期后，或哪怕几个星期后发生，那么我们的革命无疑将是这个充满罪孽的世界上所有可能的革命中最为“和平”、最“不血腥”的革命。但是这种历史进程——不论怎样，一看上去就是最为“自然的”，最有利于俄国工人阶级的——却发现其自身被违反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错误，而是事件的意志使然。事与愿违，俄国工人阶级被证明要第一个担起这个历史使命。在初期的混乱后，正是这种情况，让旧俄国的统治阶级垂死

抵抗，并迫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内有阴谋叛乱，外有外敌入侵的危急时刻采取残酷的国家恐怖措施。现在没有一个人会说这些措施是无用的。但是，或许他们将被要求考虑这些措施是……“不可忍受的”？

工人阶级在战斗中夺取了政权后，其任务和职责就是不可动摇地使这个政权牢固，确保其领导权不受质疑，阻止其敌人颠覆国家，从而使社会主义改革成为可能。否则，就没有理由夺取政权了。

正如革命在“逻辑上”并不要求进行武装起义，它在“逻辑上”也同样不要求实行恐怖主义。好一个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然而革命要求革命阶级以其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实现其目标：必要时通过武装起义，必要时通过恐怖主义。革命阶级用手中的武器夺得了权力，现在和将来都不得不用手中的武器镇压一切把它从手中夺走的企图。凡是有敌方军队对付它的地方，它就会用自己的军队来予以还击。凡是对他不利的武装阴谋、暗杀企图、叛乱，他都会给他的敌人当头一棒，进行严厉的报复。也许是考茨基发明了其他手段？或者他把整个问题简化为与镇压的程度相关的问题，并建议在所有情况下都把人送去监禁而不是叫来行刑队？

镇压的形式或程度的问题当然不是“原则性”问题，而是权宜性的问题。在革命时代，那些被赶下了台的政党，不可能使其自身与那些坚定的统治阶级相妥协，它们将通过与执政政党的疯狂斗争来证明这一点；它不相信执政党的持久性，所以也不被坐牢吓倒。正是这个简单又明确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普遍地在内战诉诸枪决来解决问题。

或者，考茨基想说的可能是：死刑并不合宜，“阶级不可能被吓倒”？这是不对的。当然只有在“最起码”的情况下，倘若反动派用恐怖手段来对付一个处于历史上升阶段的阶级，那么终究是无力的。然而对付一个不愿离开历史舞台的反动阶级，恐怖手段却非常有效。无论对国际还是对国内而言，恐吓都是一件强大的政治手段。战争，如革命，都是以恐惧为基础。一般说来，一场战争的胜利者毁灭的只是被打败的军队中的一小撮，要用恐惧来摧垮其余人员的意志。革命亦然，要杀一儆百。在这种意义上，恐怖无异于武装起义，并且是武装起义的直接延续。只有那些能够从“道义”上谴责革命阶级的国家恐怖的人，才能在原则上（也就是言语上）拒否一切暴力，因而也拒绝任何战争或起义。要做到这一点，只要成为一个虚伪的贵格会成员就够了。

“但是，既然那样，你们的策略跟沙皇专制的策略到底有什么区别？”自由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中的神父们这样质问我们。

你们这些圣人君子啊，难道还不明白吗？那让我们来解释给你们听吧。沙皇的专制恐怖直接指向无产阶级。沙皇的宪兵队残杀那些为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战斗的工人。我们的特别委员会枪毙那些妄图恢复资产阶级制度的地主、资本家和将军。你们捕捉到这种……区别了吗？真的捕捉到了？我们共产主义者觉得这已经足够了。

“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这个问题尤其让著作等身的考茨基心神不宁。关闭报社的做法是否可以接受？

战争期间，所有的政府机构和机关以及公众舆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战争服务。这一点在出版界尤为如此。没有任何一个主动、严肃地参与战争的政府会允许自己领土上的出版物跑去为敌人摇旗呐喊。内战中更是如此。后者的性质决定了每一个战斗阵营在其军队的后方都有相当多的人口站在敌人的一边。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藏在后方的敌方代理人会被枪毙。这并不人道，但没人会把战争当成是人道的学校——内战更是如此。在跟邓尼金白匪打内战的时候，难道要严肃地让站台邓尼金的党派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肆无忌惮地出版书刊吗？以出版“自由”的名义提出这个建议，就相当于以公开原则的名义要求公布军事机密。阿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的一位社员）¹⁷曾写道：“被围困起来的城市不能允许城内有人公开表示希望它陷落，呼吁守卫它的战士叛变，向敌人通报它的部队动向。这是巴黎在公社时期的处境。”这也是苏维埃共和国在其成立后两年间的情况。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考茨基又是如何说的。

“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理由不过是从这样一个天真的假设出发的：即，确实存在着一种绝对真理（！）；只有共产党人才掌握那种真理（！）。它也从另一种假设出发，即：所有的新闻记者根据他们的本性来说都是撒谎者（！）；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理的狂热的拥护者（！）。到处都有那种把他们看到的事情信以为真的撒谎者和盲信者。”等等……¹⁸

因此，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在其最尖锐的阶段，即对各阶级来说生死攸关时，首先仍然是一种书面讨论，目的是确立……真理。多么深刻啊！……当然，我们的“真理”并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因为此刻正在以它的名义流血，所以既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与那些借助各种形式的武器“批评”我们的人进行关于真理的

相对性的文字讨论。同样，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惩罚骗子和鼓励来自四面八方的正确新闻，而是要扼杀资产阶级的阶级谎言，确保无产阶级的阶级真理赢得胜利，而这与两个阵营中都有的狂热者和骗子无关。

考茨基大声疾呼：“苏维埃制度已经废除了揭露野心家、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的最好手段，即出版自由。”（摘自《贪污腐败》一章）¹⁹等等。

出版界是与腐败作斗争的可靠武器！当人们想起两个最具出版“自由”的国家——北美和法国——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腐败最发达的国家时，这种自由主义的处方听起来可怜兮兮的。

考茨基胡诌俄国革命政治后院起火，靠着这种老掉牙的流言蜚语混日子，想象没有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式的公开原则，苏维埃机器就会被“野心家”和“骗子”吞噬。孟什维克一年半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现在连他们也不敢再这样说了。在苏维埃控制和党的选择的帮助下，苏维埃政府在紧张的斗争气氛中，在任何时候比任何政权都能强有力对付那些在革命时刻浮出水面的土匪和冒险家。

我们在打仗。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出版界不是抽象的社会工具，而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武装的、战斗的阵营的工具。我们摧毁反革命的报刊，就相当于摧毁它的坚固阵地和仓库，以及它的通讯和情报系统。我们禁止了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对工人阶级腐败的谴责，但我们正在胜利地摧毁资本主义腐败的根基。

但考茨基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主题——他抱怨说，我们压制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甚至——有时还会——逮捕他们的领导人。难道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不是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运动

中的“意见分歧”？迂腐的书呆子在他习惯的话语之外看不到事实。对他来说，孟什维克和社革党只是社会主义的倾向，而在革命过程中，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积极勾结反革命并公开进攻我们的组织。高尔察克的军队是由社会革命党人（这个名字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太忽悠人了！）组织的，并得到孟什维克的支持。两者都在北方战线上跟我们打了一年半的仗。统治高加索地区的孟什维克，以前是霍亨索伦的盟友，今天是劳合·乔治的盟友，他们与德国和英国军官携手逮捕并枪杀布尔什维克。库班拉达²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织了邓尼金的军队。爱沙尼亚孟什维克参加了当地的政府，又直接参与了尤登尼奇对彼得格勒的最后一次进军。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这些“倾向”。考茨基认为，人们可以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公开打内战，这些人在他们自己为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组织的部队的帮助下，为他们在社会主义中的“倾向”而战，同时又允许这些无辜的“倾向”在我们的后方享有出版自由。如果劝说和投票能够解决我们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争端，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背后没有俄国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话，也就不会有内战了。

当然考茨基愿意“谴责”（也就多费一点笔墨！）封锁、协约国对邓尼金的支持以及白色恐怖。但是他具有的崇高公正性，不偏不倚，觉得这些都是特定的环境造成的，情有可原。你看，白色恐怖并没有违反他们自身的原则，然而布尔什维克在使用“红色恐怖”时竟背弃了“他们自己宣称的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

在实践中，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它与戒律“不可杀生”²¹的区别在哪里，考茨基没有解释。当一个强盗对着一个孩子举起屠刀的时候，人们为了救孩子可以杀死

这个凶手吗？“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是否因此就受到了侵犯？一个人是否可以为了自卫而杀死强盗？是否允许被压迫的奴隶反抗他们的奴隶主造反？以狱卒的生命为代价购买一个人的自由是可以接受的吗？人的生命一般说来都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所以不仅要否定恐怖政策，否定战争，还要否定革命本身？考茨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努力强加给我们的“原则”中包含着反革命意义。在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考茨基又指责我们缔结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²²。按他的意见，我们应当一直打下去。但是这会儿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又在哪里？是否当问题变成“对着说另一种语言的人们时，生命就不再神圣了”，或者考茨基认为在战略战术原则下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根本不能算是屠杀？确实，在我们的时代里，提出比这个还要虚伪、愚蠢的原则来，可真是一件难事。只要人类的劳动力，以及生命本身，仍然可以被买卖、被剥削、被抢掠，“人类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就是一桩可耻的骗局。强调这项原则的人，试图用枷锁永远锁住被压迫的奴隶。

我们曾为反抗克伦斯基带来的死刑惩罚而作过斗争，因为这种处罚是旧军队的军事法庭强加给那些拒绝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士兵身上的。我们从旧的军事法庭手中夺下了这种武器，摧毁了旧军事法庭，并遣散了创造它们的那些旧军队。在消灭红军中以及全国的反革命阴谋家——那些试图通过叛乱、刺杀和混乱来恢复旧政权的反革命阴谋家时，我们是在按照战争的铁律行事，并且想要赢得这场战争。

我们如果要从形式上反驳，那么显然必须站在白色恐怖的立场上。这种恐怖是那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阶级所使用的工具，他们崇尚唯心主义哲学，并坚定地认为个体（也就是他们自

己)就是目的本身。至于我们,根本不关心什么康德式的神职人员和素食主义的贵格会教徒们在“人类生命神圣性”上如何瞎扯。我们没有得到权力时在反对派里是革命者,在得到权力后依然要进行革命。为了使个体生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必须摧毁折磨人的社会秩序。而这个任务只能用铁与血才能达成。

在红白双方的恐怖之间还有另外一种区别,这一点考茨基时至今日也没有看到,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则具有决定性意义。白色恐怖是历史上反动阶级手中的工具。当我们揭露出资产阶级国家对无产阶级进行镇压的无效性时,我们从未否认在某些情况下,统治阶级通过逮捕、枪毙的手段可以在短期内迟延社会革命的发展。但是我们也确信这些手段终究不能终止革命的进程。我们依靠的是这一事实,即:无产阶级是历史中上升的阶级,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强。当前时代的资产阶级是一个日趋没落的阶级,它不仅不能在生产活动中发挥必要的作用,而且因为其帝国主义的占有方式,进而开始毁坏世界经济和人类文明。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的历史韧性还是十分巨大的。它在挣扎,赖着不走。这样一来,它有可能将整个社会拖入深渊。它必须被粉身碎骨。红色恐怖就是用来对付这个注定要毁灭又极不情愿消亡的阶级的工具。如果说白色恐怖只能迟延无产阶级历史发展的进程,那么红色恐怖则加速了资产阶级的灭亡。这种加速——节奏上的胜利——在某些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没有红色恐怖,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世界的资产阶级就会在欧洲革命开始之前就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有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要么瞎了,要么就是故意掩盖。

一个人但凡承认苏维埃制度的革命性历史意义,就必须支持红色恐怖。而考茨基近两年来连篇累牍地攻击共产主义和恐怖主

义，但是，他小册子的末尾也不得不承认俄国苏维埃政府现在是世界革命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这实在是出人意料。他写道：

“不管你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抱有何种看法，一个大国的无产阶级政府已经不但掌握政权，而且还能在可以设想的最困难的条件下维持了近两年，这一事实自然滋长了各国无产阶级中间的权力感。因此，对于世界革命来说，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比他们通过派特派人员和宣传人员做出了大得多的工作（Grosses geleistet）。”²³这句话给人最大的惊喜——它从一个人们不再期待的方面承认了历史真相。布尔什维克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历史事业，他们坚持了两年时间，对抗一个联合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但布尔什维克不仅用思想，还用刀剑坚持了下来。考茨基承认了苏维埃的革命意义，既不自觉认同了红色恐怖手段，又令人痛苦地谴责了他自己的批判构思。

战争的影响

考茨基认为，革命斗争及其血腥的原因之一在战争之中，在于它对道德的残暴影响。这点完全无可争议。这种影响，及其所有的后果，在考茨基还不知道是应该投票支持还是反对战争贷款的时候也是可以提前预见到的。

我们五年前在德语版《战争与国际》一书中写道：“帝国主义强行将社会从不稳定的平衡中撕裂出来，炸开了社会民主党用于阻止无产阶级革命能量进行流动的阀门，并将这种力量引到自己的轨道上。这一可怕的历史实验，击碎了社会主义国际的脊梁骨，同时也把自己置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自身的致命危险之下。工人手中的锤子被夺走，取而代之的是剑。被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束

缚住手脚的工人，突然从自己的环境中挣脱出来，习惯了把集体的目标置于家庭幸福与自身生活之上。”

“由于手中掌握有自己制造的武器，工人被放到了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的位置上。那些平常压迫他、藐视他的人，现在却极力奉迎他。同时，他与大炮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根据拉萨尔[20]的说法，这些大炮构成了宪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跨越了国界，参与了暴力征服，在他的打击下，城市几易其主。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是上一代人从未见过的。”

“先进的工人虽然在理论上知道武力就是权利之母，但其政治思维仍然被可能派以及适应资产阶级合法性的精神浸染着。现在，工人阶级实际上正在学习鄙视并以暴力破坏这种合法性。其心理学中的静态时刻让位于动态。沉重的工具正在将这样的想法钉入他的脑海中：有无法绕过的障碍物，不等于摧毁不了障碍物。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都被领进了这所具有可怕的社会现实主义的战争学校，而这所学校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类型。”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规范——其法律、道德和宗教之上，如今已经崛起的是铁一般必要性之拳。德国总理宣称：‘需求面前无法律！’（1914年8月4日）。君主们在广场上用街头小贩的语言互相指责对方的欺诈行为；政府践踏他们庄严承认过的义务，国家教会对待它的主神就像对待囚犯一样，钉在了国家的大炮上。这些情况应该深刻改变了工人阶级的心理，从根本上解除政治停滞时代带来的合法性催眠，难道这点还不够明显吗？统治阶级很快将不得不相信这一点，并恐惧这一点。上过战争学校的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国家内遇到第一个严重的障碍时，就会觉得有必要诉诸武力的语言。‘需求面前无法律！’他将会用这句话去反驳那些试图用资产阶级合法性的法律来阻止他的人。在

这场战争中，特别是到了战争结束之时，可怕的经济需要将会促使群众藐视许许多多的法律。”（第 56—57 页）

所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除了上面说的，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战争深刻影响了统治阶级的心理：群众愈发苛刻，资产阶级也相应愈发顽固。

在和平时期，资本家曾经通过“和平”抢劫雇工的方式来保证他们的利益。在战争期间，他们通过毁灭无数人的生命来维护这同样的利益。这使他们主人式的自我意识获得了一种新的“拿破仑式的”色彩。战争期间，资本家们已经习惯于为了煤炭、铁路和其他利润而葬送数百万奴隶——同胞和殖民地人。

在战争期间，从大、中、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涌现了几十万军官和职业军人，这些人的性格得到了战斗的磨砺，已经不受外界束缚：合格的士兵准备并能够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来捍卫训练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特权地位，这种残酷近乎于英雄主义。

如果无产阶级有可能像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买通整个匪帮”，那么革命可能会更加人性化。但是，战争期间资本主义强加给劳动者的债务负担太重，深深地破坏了生产的基础，人们无法认真讨论这样的赎金，让资产阶级默默地与政变讲和。群众失血太多，受苦太深，变得太残酷，无法接受一个在经济上超出他们掌握的决定。

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在同一方向上发挥作用的其他情况。战败国的资产阶级因失败而愤愤不平，它倾向于把责任推下层人——推给那些被证明没有能力把“伟大的民族战争”进行到胜利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发现，鲁登道夫向国民议会委员会作的那些解释厚颜无耻，非常具有启发性。鲁登道夫匪帮正在燃烧着欲望，要用本国无产阶级的鲜血来雪自己在国外的

屈辱。至于战胜国的资产阶级，它已经因傲慢而膨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用确保胜利的兽性手段来稳坐江山。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在不进行战争和破坏的情况下在自己的队伍中组织分赃。它能不经斗争就完全放弃它的战利品吗？过去五年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印证了这一点：如果说，即使在以前，期望剥夺有产阶级的——由于“民主”——会不知不觉地、不痛不痒地发生，没有暴动、武装冲突、反革命企图和严厉镇压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的话，那帝国主义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局面，就加倍地、三倍地预先决定了内战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紧张性质。

注释：

[1]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页。——中译者注

[2] 宗教改革是16世纪的一场社会运动，席卷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推动他们反对中世纪各种形式的剥削。根据当时的条件，由于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和支配市民生活各个领域的教会信仰，运动必然采用宗教的形式。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阶级（以教皇为首的神职人员、城市贵族和村庄的封建领主）的经济压迫。与此同时，天主教会的解体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彻底沦为横征暴敛的工具，将宗教变成了一套死气沉沉的形式和仪式。14—15世纪的重大发明和发现（印刷术的发明、火炮的改进、美洲的发现等）拓宽了思想视野，促进了资产阶级批判思想的发展，有力为宗教改革做好了铺垫。1520年，路德（焚毁教宗诏书）和瑞士传教士抗议出售教皇赎罪券（1518年——茨温利），宗教改革运动由此开始。宗教改革运动的外部结果是产生了新的基督教教义和新教会（路德教会和加尔文教会）。社会结果是商业资产阶级摆脱封建制度的桎梏。几十年内敌对阵营之间的血腥冲突，为宗教改革打下深深的烙印。此类事件中最突出的有德意志农民战争、明斯特起义和三十年战争等。——俄文版编者注

[3] 奥古斯丹·梯叶里（1795—1856）是法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

著作中强调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解释历史事件时的重要性。他最杰出的作品有：《诺曼人征服英格兰》（*Conquête de l'Angleterre par les Normands*）《法国历史书信》（*Lett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墨洛温王朝的故事》（*Récits des temps mérovingiens*）等，有俄文译本。——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梯叶里（*Jacques-Nicolas-Augustin Thierry*，1795年5月10日—1856年5月22日），法国历史学家，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并存在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致力研究“第三等级”（法国封建社会中，僧侣和贵族两大统治阶级以外，缴纳赋税的被统治阶级，包括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

[4] 吉伦特派代表法国大革命期间大型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名字来自吉伦特省（加龙省），他们在那里势力特别强大。吉伦特派捍卫本阶级利益，反对限制贸易自由、规定税收和广大劳动群众提出的其他对抗糟糕粮食状况的措施。正是在此基础上，所谓的“第三等级”的两大群体——自由资产阶级和激进民主派之间出现了最初的分歧。这些分歧反映阶级矛盾越来越剧烈，最终导致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吉伦特派在废除了阻碍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贵族特权、获得政治自由后，力图减缓和压制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吉伦特派于1792年3月上台，仅仅坚持到1793年6月。彼时，巴黎武装群众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对所有基本必需品实行“普遍最高限额”。吉伦特派被迫把权力让给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雅各宾派。吉伦特派最杰出的领袖是布里索、韦尼奥、伊斯纳尔、罗兰等人。

吉伦特主义现在已可以用来形容任何参与革命、直到革命还未危及自身利益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以及所有三心二意和摇摆不定的政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1754年1月15日—1793年10月31日），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袖之一。出身于厨师家庭。1788年创办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呼吁立即禁止奴隶贸易，逐渐废除奴隶制。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

发后创办报纸《法兰西爱国者》(Le Patriote français)，后来成为吉伦特派的精神领袖。1791年起是吉伦特派领袖。1791—1793年任国民公会议员，在任期间反对处决路易十六。1793年5月31日被雅各宾派解除一切职务，随即被下令逮捕，并于6月2日被捕，同年10月31日被送上断头台。1911年版《大英百科全书》曾评价：“布里索反应敏捷、热情洋溢，性子急，知识渊博，但同时却优柔寡断，不适合对抗产生于革命事件的猛烈能量。”

[中译者补注2] 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 (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 1753年5月31日—1793年10月31日)，早年担任律师。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参加了吉伦特派的活动，并获得了“吉伦特之鹰”的绰号。1791—1793年任国民公会议员，在任期间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并于1793年1月10—24日担任国民公会主席。1793年6月2日同其他吉伦特派成员一道被捕，10月31日被送上断头台。

[中译者补注3] 马克西曼·伊斯纳尔 (Maximin Isnard, 1758年2月24日—1825年3月12日)，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791—1797年任国民公会议员，在任期间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并于1793年5月16—30日任国民公会主席，同年5月30日辞职，躲过了对吉伦特派的搜捕。热月反动后返回国民公会，大肆捕杀雅各宾派。1802年发表小册子《灵魂的不朽》(De l'immortalité de l'âme)，皈依天主教，后悔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的行为。1813年起支持拿破仑。路易十八复辟后脱离政治活动。

[中译者补注4] 玛农·罗兰 (Manon Roland; 本名: Marie-Jeanne Phlipon, 译名: 玛丽—让娜·弗利蓬, 1754年3月17日—1793年11月8日)，卢梭的学生。1780年嫁给让—马里·罗兰。法国大革命期间成为吉伦特派领导人之一。1793年吉伦特派被搜捕期间拒绝逃走，6月1日被捕，11月8日被送上断头台。

[5] 雅各宾派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的一个政治派别，得名于圣雅各宾修道院的俱乐部。雅各宾派在社会成分和政治纲领上并不是同质化的。它分为三大类：以丹东为首的右翼，代表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的利益；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中派，主要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店主、手工业者等）的利益；左翼，以马拉、后来的埃贝尔和肖梅特为首，代表了手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

罗伯斯庇尔的那一派占据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位置。此派别的社会政治纲领并没有超出小私有者的需要。雅各宾派积极寻求巩固法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他们与法国大资产阶级及其在国民公会中的代表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试图消除极端的经济不平等。

1793年6月2日，雅各宾派在巴黎无产阶级和最贫穷的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执政的国民公会资产阶级派别吉伦特派。以雅各宾派为首的群众之所以不满，主要原因是他们为基本必需品配给（面包价格税）斗争，还要求免除低收入群体的累进税。以雅各宾派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专政一直持续到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倒台之日）。

雅各宾派在短暂的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以累进所得税的形式强行借资产阶级的债，限制继承权。为了城市贫民的利益，每天支付75戈比参加部门会议；为了长期坚持修改制宪和立法议会制订的土地法的农民的利益，国民公会不动用赎买方式就废除了所有封建义务。雅各宾派以同样的精力在军事前线与内外敌人作战，以恐怖手段镇压反革命阴谋和暴动。

历史上的雅各宾主义已成为极端果断的革命行动的象征，而吉伦特主义则体现了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和优柔寡断。列宁同志写道：

“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中译者注：参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8卷第383页。]——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雅克-勒内·埃贝尔（Jacques-René Hébert，1757年11月15日—1794年3月24日），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左翼领袖之一。1790年—1794年出版《迪歇纳神父报》（Le Père Duchesne），为巴黎的工人阶级发声。1792年参加巴黎人民起义，并当选为巴黎公社副检察长。1793年5月被吉伦特派逮捕，获释后参与了逮捕吉伦特派领导人的行

动，随即成为巴黎无套裤汉运动领导人。此后激烈抨击丹东派和罗伯斯庇尔派的政策。1794年3月14日被罗伯斯庇尔下令逮捕，3月24日遇害，直接导致了雅各宾派丧失了无套裤汉的支持。

[中译者补注 2] 皮埃尔—加斯帕尔·肖梅特（Pierre-Gaspard Chaumette, 1763年5月24日—1794年4月13日），1790年起参加法国大革命。1792年巴黎人民起义后当选为巴黎公社检察长，并同埃贝尔合作。1793年激烈抨击吉伦特派，并逐渐成为雅各宾派左翼领袖，期间积极推行非基督教化运动，但反对男女平等。1794年初试图发动起义推翻罗伯斯庇尔，但被巴黎公社拒绝，同年3月14日被捕，4月13日遇害。

[6] 摘自《社会民主党人》，每三月发表一次的文学政治评论，1890年2月，伦敦，第1册，第6—7页，《伟大革命的百年》一文——俄文版编者注

[7] 《美国战争史》，由苏格兰禁卫步兵中校弗莱彻编写，1867年译自英语，圣彼得堡出版，第95页——俄文版编者注

[8] 亨利·查尔斯·弗莱彻（Henry Charles Fletcher, 1833年4月28日—1879年8月31日），英国军官、作家。——中译者注

[9] 原文为德语 NB。——中译者注

[10] 黑格尔（1770—1831），德国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对上世纪40—60年代的西欧和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发展（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巴枯宁等）产生了非凡的影响。18世纪科学思想中盛行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从绝对和孤立的角度思考客观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而黑格尔则提出了一种与之相反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要求在运动和相互联系中研究周围的世界和人类历史。在黑格尔看来，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和永恒的。相反，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不断运动，但这种运动不是进化的，而是辩证的，也就是充满矛盾的。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是一切存在的基础。这种绝对精神按照内在规律的发展，构成了辩证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和人类的发展过程只是复制了永恒自我发展的概念。虽不知这个概念在哪里，但它独立于人

类意识，因为黑格尔将自然本身和人视为精神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恩格斯《反杜林论》）。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彻底批判了整个黑格尔哲学之后，从根本上修正了唯心主义辩证法。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黑格尔辩证法，是在向唯物主义观点过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物质。

“因此，辩证法被简化为研究外在自然和人类思维中的一般运动规律的科学，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内容。正是物质世界不被认为是现成事物的复合体，而是一个复杂的进程。我们在这个进程中看到的似乎不变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精神反映，即概念，经历了不断变化的生成与消亡。”（恩格斯《反杜林论》）。——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上文引用的恩格斯引文，未见诸恩格斯《反杜林论》现行中译本，具体出处尚不明确。

[11] 梯也尔是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梯也尔的政治生涯始于查理十世的反动首相波利尼亚克亲王的领导下，其目的始终是捍卫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七月王朝期间，在 1848 年 6 月法国无产阶级的血腥镇压者卡芬雅克的领导下，他支持针对广大劳动群众的最激进的措施。1870 年第二帝国崩溃后，梯也尔在一段时间后成为反动共和政府的首脑，以最严厉的措施镇压了巴黎无产阶级通过起义建立的革命政权（巴黎公社）。他最著名的历史著作是《法国大革命史》。——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马里·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Marie Joseph Louis Adolphe Thiers, 1797 年 4 月 15 日—1877 年 9 月 3 日），法国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参事院院长、内务大臣、外交大臣和首相。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秩序党领袖之一，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70 年 9 月 4 日第二帝国垮台后，成为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实际领导人之一，1871 年 2 月就任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1871—1873 年任共和国总统。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中译者补注 2] 朱尔·奥古斯特·阿尔芒·马里，波利尼亚克亲王（Jules Auguste Armand Marie, prince de Polignac, 1780 年 5 月 14 日—

1847年3月2日)，法国极端保王派政治家。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随家人流亡国外。1794年流亡俄国，并于1796—1799年期间服役于俄军。1799年起担任查理十世的副官。1803年秘密回国，企图发动叛乱复辟波旁王朝，旋即被捕并被判处两年徒刑，获释后被软禁于巴黎。1814年逃走。路易十八第一次复辟后，被授予陆军元帅军衔，并担任驻慕尼黑公使馆秘书。1815年拿破仑复辟时企图组织王军与之对抗，失败后流亡比利时，不久即回国，旋即被捕，但很快获释。路易十八第二次复辟后，于1815—1830年任上议院议员。1820年被罗马教廷授予亲王头衔。1823—1828年任驻英国大使。1829—1830年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30年七月革命后逃往诺曼底，企图流亡英国，但于8月16日被捕，同年12月21日被判处终身监禁。1836年获大赦，改判流放国外20年，随后几年先后流亡英国和巴伐利亚。1845年回国。1847年病死。

[中译者补注3] 路易-欧仁·卡芬雅克 (Louis-Eugène Cavaignac, 1802年10月15日—1857年10月28日)，1824年参军，1844年晋升为准将。1848年二月革命后被临时政府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并晋升为少将。1848年3月20日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在任上残酷镇压了六月起义。6月28日被制宪议会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行政首脑，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12月在总统选举中败给路易·波拿巴。

[12]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3页。——中译者注

[13]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杜鹤宁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Духонин, 1876年12月1日—1917年11月20日)，1894年入伍。1917年6—9月任西南阵线参谋长，9—11月任俄军总参谋长，11月1—20日任俄军总司令，期间反对十月革命，拒绝和平谈判，并被解除职务。11月20日被一群水兵私刑处死。——中译者注

[14] 克拉斯诺夫将军是克伦斯基于1917年10月调动军事部队对抗彼得格勒起义的负责人。后来他组织顿河地区哥萨克的反革命活动。1918年12月，他被在整个俄国南部发动进攻的红军彻底击败，逃到国外后成为君

主义组织的骨干分子。——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аснов，1869年9月10日—1947年1月16日），1889年入伍。1900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参加了一战。二月革命后曾任第3骑兵军司令，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协同克伦斯基进行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在承诺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后获释，流亡顿河流域，继续参加反布尔什维克活动。1918—1919年任顿河哥萨克阿塔曼。1919年在邓尼金的压力下辞职，参加尤登尼奇白军。1920年起先后流亡德国、法国。二战期间支持纳粹德国。1943—1945年任德国哥萨克部队总司令。1945年德国投降后被英国军队逮捕，后被遣送到苏联。1947年被处决。

[15] 鲍里斯·萨文科夫是社会革命党的著名领袖，沙皇时代社会革命党主要恐怖行为的组织者。大战期间他是社会爱国主义者。1917年2月后成为克伦斯基的副手，被任命为战争部长。作为同谋之一，他参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之后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死敌。1918年夏，他组织并参加了雅罗斯拉夫尔军官叛乱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暴动。在波兰战争期间，他在巴拉霍维奇的指挥下，率领他（萨文科夫）组织的白卫军作战。后来他在法国和波兰军事部门的协助下组织了阴谋和袭击。1924年8月，萨文科夫潜入明斯克市后被捕并受审。鉴于萨文科夫完全承认他的所有活动都是错误的，并有悔过之意，死刑改为10年监禁。——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鲍里斯·维克托洛维奇·萨文科夫（Борис Викторович Савинков，1879年1月19日—1925年5月7日），1879年生于哈尔科夫，1897年考入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1899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1903年参加社会革命党，不久后就成为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负责人。1905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曾组织过多次恐怖行动，消灭了多名沙皇政府高官。1906年被捕，在审判前越狱，并被缺席判处死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了法军。二月革命后回国，1917年7月担任陆军部副部长。同年8月30日退出政府，并被

社会革命党开除出党。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18年流亡法国。1924年8月被国家政治保卫局诱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25年5月7日自杀身亡。

[中译者补注 2] 读者若想进一步了解萨文科夫的相关介绍，可以阅读卡尔·拉狄克的《鲍里斯·萨文科夫》。

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adek/mia-chinese-radek-19250514.htm>

[中译者补注 3] 1918年7月，雅罗斯拉夫尔白卫分子发动叛乱。这次叛乱同当时苏维埃俄国发生的其他反革命叛乱一样，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积极参与下策划的，并且是帝国主义者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俄国中部各城市发动叛乱的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叛乱的目的是同北方的外国干涉者和伏尔加河中游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建立统一战线，然后进攻莫斯科，推翻苏维埃政权。组织这次叛乱的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鲍·维·萨文科夫所领导的“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给这个反革命组织提供了大量经费。叛乱从7月6日开始。萨文科夫从莫斯科派来一批军官具体领导叛乱。叛乱分子夺取了雅罗斯拉夫尔市的中心区，占领了军火库、邮局、电报局、银行等机关，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血腥的屠杀。叛乱分子还企图占领该城的工人居住区，但马上遭到了坚决抵抗。各企业的党组织在同叛乱分子作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武装工人和红军支队同叛乱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苏维埃政府从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调来许多军队和工人武装队伍支援雅罗斯拉夫尔的工人。1918年7月21日，叛乱最终被平定。

[中译者补注 4] 斯坦尼斯瓦夫·布瓦克—巴瓦霍维奇（波兰语：Stanisław Bułak-Bałachowicz；白俄罗斯语：Станіслаў Булак-Балаховіч；俄语：Станислав Булак-Балахович，1883年11月12日—1940年5月10日，按俄语音译则为“斯坦尼斯拉夫·布拉克—巴拉霍维奇”），1883年2月10日生于梅克什泰（立陶宛语：Meikštai，现位于立陶宛边境地区，离白俄罗斯很近）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入伍参战。1918年2月

加入红军，任卢加第1骑兵团司令，在镇压农民叛乱期间挪用公款，东窗事发后投靠白军。1918—1920年任普斯科夫志愿军司令，大肆屠杀红军士兵和农民。1920年尤登尼奇白军解散后，一度逮捕了尤登尼奇，经英法军事使团介入后被迫逃走，后经他人斡旋加入波兰军队，参加了华沙战役。1920年10月组建俄罗斯人民志愿军，企图协助波兰吞并白俄罗斯，大肆迫害犹太人，同年11月战败后逃回波兰。1939年波兰沦陷后，成立游击队与纳粹对抗。1940年5月10日在与德军巡逻队交战时战死。

[16] 卡列金，沙皇将军。1917年8月被哥萨克军界推举为顿河哥萨克首领。1917年8月试图帮助以政变为目标的科尔尼洛夫将军。1917年10月以后成为哥萨克反革命的领袖。看到自己的反革命行动总是被红军消灭，便开枪自杀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ледин，1861年10月24日—1918年2月11日），生于顿河州的一个军官家庭。1879年参加陆军，担任哥萨克少尉。一战期间，曾任第12骑兵团团长、第4军军长、第8集团军司令等职。二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1917年9月1日因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被捕。十月革命后，大肆组织白军，向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猖狂的进攻。1918年1月，他的白军被红军粉碎，他在绝望中自杀。

[17] 阿蒂尔·阿尔努，1871年巴黎公社成员，蒲鲁东主义者。他被凡尔赛政府判处死刑。著名的《巴黎公社史》的作者。——俄文版编者注

阿蒂尔·阿尔努（Arthur Arnould，1833年4月17日—1895年11月26日），法国自由主义记者、作家。第二帝国期间开始担任记者。巴黎公社成立后担任巴黎第四区副区长，在公社内属于少数派。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1880年回国。——中译者注

[18]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考茨基著，第132页。——中译者注

[19]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考茨基著，第141页。——中译者注

[20] 库班拉达是1918年以邓尼金为首的哥萨克政府，是南方反革命势力的据点。反革命势力经常从那里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直到1920

年，红军才设法夺取了库班要塞——克拉斯诺达尔，消灭了哥萨克反革命势力。——俄文版编者注

[21] 这是摩西十诫的其中一条。——中译者注

[22] 《布列斯特和约》一方面是苏俄与帝国主义德国之间缔结的和约，另一方面，从1917年11月初步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谈判中断到1918年3月签订和约的时间里，德国进攻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强加给我们的和约及其屈辱和掠夺性的条件，类似于1807年德国在拿破仑一世的脚下被迫接受的可耻的《蒂尔西特条约》。根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德国要从我们那里得到巨额赔款，还要吞并前波兰王国、整个库尔兰省、利沃尼亚与里加的一部分、整个科夫诺省、五分之一的维尔纳省、三分之二的格罗德诺省、西爱沙尼亚群岛等地。

俄共（布）党内（左右两派的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同志的集团）经过长期的激烈斗争后，1918年3月，第四次苏维埃特别代表大会批准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奴役条约。党内最终采纳了列宁的观点——目前客观上不可能与德国进行革命战争（因旧军队的解体），因此接受《布列斯特和约》赢得喘息机会，趁机建立红军与加强国民经济建设。因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被废止。——俄文版编者注

[23]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4页。——中译者注

第五章 巴黎公社与苏维埃俄国

“第一场完全是由无产阶级进行的、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这一短暂篇章以其敌对者的胜利而告终。这一短暂篇章，从3月18日到5月28日，共持续了72天。”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160页，彼得·拉夫罗维奇·拉夫罗夫，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

公社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不备

1871年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统治第一次的、仍然弱小的历史尝试。尽管巴黎公社的尝试极其有限，其参与者也毫无准备，纲领模糊不清，领导人之间缺乏团结，思想摇摆不定，行动时慌乱迷茫，并且这一切造成了致命的失败。但我们非常珍视公社的记忆。我们重视公社中拉夫罗夫¹说的“无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一个、哪怕是非常苍白的曙光”。考茨基则完全不同。他在自己的书中长篇大论一番，运用粗暴的、带有偏见的方式对比了公社和苏维埃。我们觉得公社有着不幸与罪过，而他却把这些东西看作是公社的主要优点。

考茨基竭力证明1870—1871年间的巴黎公社并未经过“人为”准备，而是从天而降，让革命者猝不及防——与我们党精心准备的十一月革命相对立。然而，考茨基这么一说，正是为了在读者心中种下这样的观念：公社社员只是遭遇了不幸（巴伐利亚庸人福尔马尔²曾经认为公社社员没有睡大觉而去夺取政权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因此他们理应得到宽恕；而布尔什维克则有意地走向不幸（夺取政权），因此他们无论在今世还是来世都不会得到宽恕。这样来谈巴黎公社，做不到逻辑自洽，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样的论调完全不可避免地“独立的”考

茨基之流的立场里冒出来。这些人把头缩在肩上，不肯看到或预见到任何东西。而他们要是向前进了几步，那也不过是因为之前背后挨了一拳。

考茨基写道：“侮辱巴黎，不承认它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剥夺它作为首都的地位，最后是为了更有保证地实行君主制的政变而解除它的武装——这便是国民议会以及它选中的行政首脑梯也尔主要关心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导致巴黎起义的冲突。”

“我们看到这和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差别，因为布尔什维克是靠和平的愿望获得政权的，他们有农民的拥护作为靠山，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外在国民议会里没有君主主义的反对派来反对他们。”

“布尔什维克通过一次布置周密的政变获得了政权，这次政变一下子就使他们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然后他们就立刻开始尽可能不顾一切地积极利用国家机器来剥夺他们的反对者——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反对者。”

“面对公社的起义，正相反，没有谁比革命派自己更感到惊奇的了，而且他们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这种冲突时要不得的。”³

为了更好地理解考茨基在这里说的关于公社社员内容地真正含义，我们将引用以下有趣的证言：

拉夫罗夫写过一本关于公社的非常可资借鉴的书。他在书中写道：“……1871年3月1日，在帝国垮台半年后，也就是在公社爆发的几天前，巴黎国际的领导人仍然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⁴

他还写道：“3月18日之后，无产阶级掌握了巴黎。但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在出乎自己意料的力量面前张皇失措，没有采取最起码的措施。”⁵

公社的参与者、历史学家利萨加莱⁶写道：“一位（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表示道：‘你们的身材不适合你们扮演的角色，你们只关心如何摆脱责任。’这句话道出了很多的事实。但是在行动的时刻，由于缺乏实现的组织和准备，往往导致了角色被交给了‘身材不适合’的人来扮演。”⁷

由此可见（之后这一点将更加清楚），巴黎社会主义者没有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直接斗争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模糊不清并在政治上混乱不堪，而绝不是因为有什么更高的战术考虑。

毫无疑问，考茨基本人对公社传统的忠诚主要表现在他对在德国发生的无产阶级政变的极度震惊——认为这是一场“非常坏的冲突”。然而，我们怀疑后人是否会以此为他记一笔功。至于他搞的历史类比，又是颠三倒四，又是支支吾吾，还不忘了故意歪曲一番。

米留可夫⁸得到了策列铁里⁹和切尔诺夫¹⁰的公开支持，想在彼得堡搞点事情出来。而这与梯也尔曾有过的对巴黎的意图是一样的。从科尔尼洛夫¹¹到波特列索夫¹²，他们之中的所有人每天都在说：彼得堡已经脱离了国家，与国家毫无共同之处，并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推翻和羞辱彼得堡是米留可夫及其帮凶的首要任务。而且这发生在彼得堡是革命的真正中心，且革命尚未在全国其他地方立足的时候。前杜马主席罗将柯¹³公开说要把彼得堡交给德国人，就像放弃里加那样。罗将柯只是逐字逐句地说出了米留可夫的任务，而克伦斯基则通过自己的整个政策来推动这些任务。

米留可夫想要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梯也尔也是如此。此外，在克伦斯基、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的帮助下，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在1917年7月在相当程度上被解除了武装。在8月科尔尼洛夫进攻彼得堡时，无产阶级部分地被重新武装了起来。而他们新掌握的武器，则有力为11月（10月）起义做好了准备。因此，我们的十一月革命与巴黎工人三月起义在很大程度上一致的地方，恰恰是考茨基指出的那些“相反之处”。

但是话又说回来，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首要的一点，就是梯也尔卑鄙的阴谋得逞——他成功绞死了巴黎，并消灭了数以万计的工人。而米留可夫则可耻地崩溃了——彼得堡仍是无产阶级坚不可摧的堡垒，而资产阶级的领袖只能跑去乌克兰，求着德皇的军队接管俄国。在这一区别之中，我们确实有很大的过错，而且也愿意为此承担责任。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这一点不止一次地反映在事件的后续发展之中），公社社员主要依据爱国观点，而我们则始终以国际革命的观点为指导。公社的失败导致了第一国际的实际崩溃。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则导致了第三国际的成立。

但马克思在政变前夕建议公社社员不要起义，而是要建立组织！如果考茨基借此论证马克思没有充分估计到巴黎局势的尖锐性，那还是可以令人理解的。但考茨基试图利用马克思的建议来证明一切起义都应受指摘。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满大人一样，考茨基首先把组织看作是阻挠革命行动的手段。

但是，即使只限于讨论组织问题，我们也不能忘记，十一月革命之前有九个月的克伦斯基政府。在此期间，我们的党不仅在鼓动方面，而且在组织方面，也都不是没有成功的。十一月革命是在我们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全国所有工业中心的工人与士兵

代表苏维埃中赢得压倒性多数，并把苏维埃变成由我们党领导的强大组织后发生的。类似的情况在公社社员身上完全没发生过。最后，我们身后站着英雄的巴黎公社，从这一公社的崩溃中我们为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革命者必须对事件预测和准备。这也是我们的过错。

巴黎公社与恐怖主义

考茨基在比较公社与苏维埃俄国的时候，说了一堆废话，只是为了污蔑并贬低活生生的、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以便支持在距离我们相当遥远的过去进行的一系列专政尝试。

考茨基极其乐意地引用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3月19日关于两名将军被士兵杀害发出的声明：“我们愤慨地宣告，已经使我们名誉受到损害的血腥的耻辱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丑事。我们并没有决定要执行死刑，国民自卫军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这种罪行。”¹⁴

当然，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有什么理由承担与它无关的谋杀责任。但这声明中哀婉的语气非常生动地描绘了这些人在资产阶级舆论面前表现出的政治胆怯。这不难理解。国民自卫军的代表大多是没什么革命背景的人。利萨加莱写道：“没有什么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些小资产阶级，这些店主，都与闭塞的小集团格格不入；而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到那之前也是与政治也都是格格不入的。”¹⁵

拉夫罗夫也写了关于他们的内容：“这个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公告，都可以反映出他们在巨大的历史责任面前显得卑微，浑身打颤，以及他们迫切希望摆脱这种责任——而巴黎的命运却已经落到了这个中央委员会手中。”¹⁶

在对我们发出了有关血腥的夸张羞辱后，考茨基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屁股后面批评了公社的优柔寡断：“巴黎人（也就是公社社员——托洛茨基注）如果对梯也尔紧追不舍，那也许就能推翻政府。从巴黎撤走的军队根本没有力量作任何抵抗……但是梯也尔继续退却。他们让他收拾他的军队，在凡尔赛加以改编，并灌输新的精神，使他们坚强起来。”¹⁷

考茨基没能够意识到的是，同样的人出于同样的原因，在3月19日发表了上述声明并允许梯也尔肆无忌惮地退却并集结部队。倘若公社社员仅靠精神影响手段获得了胜利，那么他们的声明就会获得很大的分量。但这并没有发生。事实上，他们含情脉脉的人道精神只不过从反面印证了他们的革命被动性。这些人仿佛是命中注定，在巴黎获得了权力，却不明白必须果断彻底地使用这一权力，追击梯也尔，趁他还没回过神来就彻底粉碎他，掌握军队，对指挥人员进行必要的清洗并接管各省——这些人当然也不愿意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些要点之间密切相关。如果不逮捕梯也尔在巴黎的代理人并枪毙阴谋家和间谍，就没法追击梯也尔。认为杀死反革命将军是不可接受的“罪行”，就不能形成能量以追击反革命将军领导的军队。

在革命中，最旺盛的能量就是最高的人道。拉夫罗夫公正地说道：“正是那些珍视人的生命和鲜血的人，应该设法筹备快速的、决定性的胜利，然后尽可能迅速并有力地采取行动镇压敌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才能尽可能少流血。”¹⁸

然而，如果不把3月19日的声明看作是无条件的信仰，而是看作未曾预料到的、不流血的胜利后第二天的短暂情绪的表达，那么可能就更正确地评价它。考茨基完全不了解革命的动力

作用，不了解其迅速增长的情绪的内部因果关系。他用毫无生气的公式来思考，通过毫无根据的类比来扭曲事件的全貌。他不明白，心慈手软的踌躇心情一般是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群众特有的。工人们只有在铁一般的必要压力下才会发动进攻，就像他们只有感受到白卫军的威胁迫在眉睫才会走向红色恐怖一样。考茨基描绘的是 1871 年巴黎无产阶级崇高道德的产物，实际上也只是内战初始阶段的一个特征。在我国现象也同样如此。

在 1917 年 11 月的彼得堡，我们几乎没流一滴血就夺取了政权，甚至没有进行逮捕。政变发生后，克伦斯基政府的部长们很快也被释放了。此外，在苏维埃夺取政权后与克伦斯基一起进攻彼得堡、随后在加特契纳被俘虏的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在第二天就因作出了保证而被释放。这就是“宽宏大量”，这完全符合公社在第一阶段时的精神。但这是错误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在南方跟我们打了快一年，消灭了数千名共产党员。不久之前，在他加入了尤登尼奇的行列，再次向彼得堡进攻。彼得堡的士官生发动叛乱，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也在伏尔加河畔的捷克斯洛伐克人¹⁹谋划了叛乱，大肆杀戮共产党人。而列宁和乌里茨基²⁰遇刺等事件发生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才获得了更加残酷的性质。

我们在公社的历史中也看到了这种只会出现在第一阶段相同趋势。

斗争由于自身的逻辑发展，在原则上走上了威慑的道路。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建立对其支持者来说是由红色恐怖的思想决定的。这一委员会被任命，是为了“斩叛徒的脑袋”（《Journal Officiel》官方日报，第 123 号）；是为了“粉碎背叛”（同上，第 124 号）。在这些“耸人听闻”的法令（4 月 3 日）中，有逮

捕梯也尔及其内阁的决定、摧毁梯也尔宅邸的决定、摧毁旺多姆圆柱的决定，特别还有关于俘虏的法令。凡尔赛每枪决一名囚犯或公社的支持者，就会枪决三位人质。拉乌尔·里戈²¹领导的警察局采取了纯粹恐怖主义的行动，尽管不是任何时候都适当。

由于公社领导层陷入了模糊的妥协立场，这些恐吓措施发挥不了有效性。他们试图用卑劣的措辞来调和资产阶级与既成事实，在民主的幻影与专政的现实之间徘徊不安。已故的拉夫罗夫在关于公社的书中，完美地描述了后者。

“巴黎，同时拥有富有的资产阶级和赤贫的无产阶级，是阶级成分混杂的政治社区²²，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要求全面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批评政府的自由等等。巴黎，进行了一场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并立志在各种机构之中完成这场革命的任务，作为被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共同体，要求对新制度的敌人采取革命的也就是专政的措施。”²³

如果巴黎公社没有失败，而是持续斗争，那么毫无疑问，它将被迫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来镇压反革命。不错，在这种情况下，考茨基就不可能将人道的公社社员与非人道的布尔什维克进行对比。但这样的话梯也尔也很有可能没有机会对无产阶级大开杀戒。也许，这样的历史不吃亏。

专制的中央委员会与“民主”的公社

考茨基写道：“三月十九日，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要求向凡尔赛进军。其他一些人想要立刻就地向选民呼吁，还有一些人则希望首先采取革命手段。仿佛这些步骤的每一项都不是同等必要的，”他在这里倒是富有深刻见解，“仿佛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会排斥其他的步骤似的！”²⁴在这之后的几行字中，考茨基就

着这些公社中相互矛盾之处，又在大谈特谈改良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事实上，问题是这样的：如果要进攻凡尔赛，并且要不失时机地进攻凡尔赛，就需要重组国民自卫军，让巴黎无产阶级中最具战斗性的分子担任其领袖，因而也会在革命方面暂时削弱巴黎。但是，在巴黎进行选举，同时还从巴黎的城墙上抹掉工人阶级的色彩，这从革命政党的角度来看是毫无意义之举。当然，从理论上讲，向凡尔赛进军和进行公社选举绝不是相互矛盾的，但实践中它们却是相互排斥的：为了顺利选举，就必须推迟进军；而为了胜利进军，就必须推迟选举。最后，在将无产阶级送上战场从而暂时削弱了巴黎的同时，也要确保首都不会发生反革命阴谋，因为梯也尔会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在公社社员的大后方煽风点火。有必要在首都建立一个更加军事化，也就是更加严格的体制。拉夫罗夫写道：“他们不得不与众多的内部敌人作斗争。这些敌人遍布巴黎，昨天还在证券交易所周围和旺多姆广场上进行暴动，在管理部门和国民自卫军中都有自己的代表，有自己的报刊和集会，几乎明确地与凡尔赛勾结。公社每次失败后，他们就愈发坚决，愈发放肆。”²⁵与此同时，还有必要采取财政和一般经济性质的革命措施，首先要为革命军队提供保障。革命专政的所有这些最必要的措施都很难与广泛的选举运动共存。但考茨基不知道究竟什么叫革命。他以为理论上的调和就是实践上的落实。

中央委员会把公社的选举定在3月22日，但由于对自己没有把握，害怕自己的非法性，并急于在更“合法”的机构的批准下进行行动。他们与完全无力的巴黎市长和代表会议进行了荒谬的、无休止的谈判，只是为了达成协议而准备与他们分权。与此同时，宝贵的时间也在不断流逝。

考茨基试图依靠的、他那古老记忆中的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建议过让公社选举和带工人去打仗同时进行。马克思在 1871 年 4 月 12 日给库格曼²⁶写的信中提到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用考茨基自己的话来说，他“不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观点。非常简单。无论如何，马克思都明白，任务并不是去追赶合法性，而是要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拉夫罗夫说的完全正确：“倘若中央委员会是由真正的革命者组成的，它就应该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到选举和召集公社之前给敌人 10 天时间以调养生息对它来说将会是不可原谅的事情，但当时无产阶级的领导人拒绝了这一责任，不承认他们有权立即领导无产阶级。结果，人民政党过于缺乏准备，竟造就了一个感到自己不得不虚度十天光阴的委员会。”²⁷

中央委员会尽快将权力移交给“合法政府”的愿望与其说是迷信形式民主，不如说是一贯惧怕责任。中央委员会虽然掌握着整个政权的物质机器，但以它是临时机构为借口，避免采取最必要和最紧迫的措施。但公社也并没有从中央委员会手中接过所有政治权力，后者继续相当放肆地干预所有的事务。这就造成了一种特别是在战争形势下极其危险的双重政权状态。

5 月 3 日，中央委员会向公社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要求战争部听任自己安排。正如利萨加莱说的那样，“是应该解散或逮捕中央委员会，还是授权他们管理战争部”的问题再次出现。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民主原则，而在于缺乏明确的行动纲领和作为自发革命组织的准备程度。自发革命组织以中央委员会和“民主”组织——公社为代表，在不完全放弃权力的情况下互相推卸责任。这看上去绝不能说是值得效仿的政治关系。

考茨基安慰自己说：“但是中央委员会从来不想推翻最高权力属于由普选产生的代表这一原则……所以，在这一点上，巴黎公社也同俄罗斯共和国恰恰相反。”²⁸没有统一的执政意志，没有革命的决心，而是存在着双重政权状态，结果就是迅速而可怕的毁灭。但是，没有推翻民主“原则”——这难道不令人欣慰吗？

民主公社与革命专政

列宁同志已经向考茨基指出过，试图把公社描绘成形式民主的表现，就意味着直接在理论上招摇撞骗。根据传统和公社领导政党布朗基派的构想，公社就是革命城市对国家进行专政的一种表现。法国大革命正是如此；如果公社没有在第一阶段倒下，那么1871年革命也会如此。巴黎本身的政权由普选产生这一事实并没有消除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公社的战争行为正是一个城市反对农民法兰西的行为，也就是反对整个国家的行为。为了令伟大的民主人士考茨基满意，公社的革命者必须首先在法国实行全民公投，看看他们是否同意公社与梯也尔匪帮开战。

最后，在巴黎本身，选举是在梯也尔资产阶级从那里逃亡——至少是其最活跃分子逃离以及梯也尔军队撤出那里之后进行的。留在巴黎的资产阶级尽管厚颜无耻，但还是害怕革命队伍，并且选举也正是在这种恐惧的征兆下举行的——这种恐惧也是未来不可避免的红色恐怖的预感。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用这样的事实来安慰自己，即在其专政（不幸的是这一专政非常迟钝且模糊不清）下进行了公社选举，没有侵害到普遍选举的原则，意味着这的确是在用一把梳子的影子来刷一辆马车的影子了。²⁹

考茨基的读者们不了解事实，所以考茨基借此进行了一些空洞的比较。1917年11月的彼得堡，我们还在最“民主”的投票基础上选出了公社（市杜马），并没有为资产阶级参选做出任何限制。在资产阶级政党的抵制下，我们在这次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席位。³⁰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杜马自愿服从彼得堡苏维埃，也就是说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事实置于普选的“原则”之上，并在一段时间后通过自己的决定解散了自己，以利于彼得堡苏维埃的一个分支。因此，彼得堡苏维埃——这一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之父——通过了形式“民主”的祝圣恩典，丝毫不比巴黎公社差。

“在三月二十六日选举时，公社选出了九十个委员。这些委员中间包括十五个政府（梯也尔）支持者，六个反对政府但又谴责（巴黎工人）起义的公民（资产阶级）激进分子。”³¹

考茨基说教道：“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是不会让这种反革命分子出来充当候选人的，更不必说是当选为委员了。公社却出于尊重民主的动机，决不妨碍它的政治反对者的被选举权。”³²我们在之前已经看到过的事实告诉我们，考茨基的这番话在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大错特错的。首先，在俄国革命发展的类似阶段，彼得堡公社进行了民主选举，苏维埃政权没有给资产阶级政党设置任何障碍，而如果有自己的报刊并且公开呼吁打倒苏维埃政权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抵制选举，那也只是因为他们当时仍然寄望于迅速用军事力量战胜我们。其次，巴黎公社不曾存在过包容各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代表——保守派、自由派、赌博派（gambettiste）在其中没有位置。

拉夫罗夫写道：“几乎所有这些人，要么立刻，要么很快也都离开了公社的委员会；他们本可成为巴黎这个资产阶级统治下

的自由城市的代表，但他们在这个共同体的委员会里完全不合宜——这一委员会自愿或被迫、自觉或不自觉、完全或部分地仍然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至少是创造与这场革命相对应的社会形式的微弱尝试。”³³倘若圣彼得堡的资产阶级没有抵制公社式的选举，它的代表就会进入彼得堡杜马。他们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的第一次叛乱（不管有没有考茨基的允许）之后，而如果他们没有像巴黎公社的资产阶级成员在某个时候做的那样提前离开杜马的话，就很可能遭到逮捕。事件的进程会保持不变，只有一些表面上的情节发展会有所不同。

考茨基在过分颂扬公社的民主，同时又指责它对凡尔赛缺乏果断性的时候，并没理解到在“合法”市长与代表含糊的参与下举行的公社选举反映了它与凡尔赛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领导者希望达成协议，而不是进行斗争。群众还没有摆脱他们的幻想。虚伪的革命权威还没有来得及让自己蒙羞。这就是所谓的民主。

韦莫雷尔³⁴主张说：“我们必须以道德力量来支配我们的敌人……我们绝不能碰及自由和个人生命一丝……”为了防止“同室操戈的战争”，韦莫雷尔呼吁他之前曾无情地痛斥过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建立“一个受巴黎全体居民承认并尊重的正当政权”。在国际主义者龙格³⁵指导下出版的《官方日报》中写道：“在（1848年）六月的日子里，将两个社会阶级武装起来相互作战的可悲误解不可能再出现了……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已不复存在……”（3月30日）还写道：“现在所有的纠纷都会消失，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很团结，因为社会仇恨、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来就没有这么少过。”（4月3日）在4月25日的公社会议上，

茹尔德³⁶可以理直气壮地自夸说公社“还从未侵犯过财产权”。他们希望能赢得资产阶级舆论的支持，并找到达成协议的途径。

拉夫罗夫说得不错：“这样的主张丝毫没有解除无产阶级之敌人的武装——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无产阶级胜利的危险——同时还夺走了无产阶级的斗争能量，就像是在不可调和的敌人面前故意蒙蔽无产阶级的双眼。”³⁷但这种令人软化的主张与民主的虚构密不可分。假想的合法性的形式让人以为这个问题会在没有斗争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公社成员阿蒂尔·阿尔努写道：

“就广大居民而言，他们有些许理由相信与政府之间至少存在着秘密协议。”在无力吸引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妥协派一如既往地误导无产阶级。

在不可避免的、已经开始的内战面前，民主代议制只表现出了领导团体的妥协式无助，而这一点在4月16日公社补充选举那毫无意义的程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已经没有时间投票了，”阿蒂尔·阿尔努写道，“局势令人惶惶不可终日，让人片刻不停，也没法让人冷静下来，不能让普遍选举完成其使命……所有忠于公社的人都在工事里，在堡垒中，在最前线的连队中……人民压根儿不重视这些补充选举。这些选举在本质上仅仅是代议制罢了。我们不应该计算选票，而是应该招募士兵；不应该计较自己是否争取了巴黎的民心，而是应该在凡尔赛的进攻中保卫巴黎。”从这些话中，考茨基是能够看出为什么在实践中把阶级战争和阶级间的民主结合起来不是件易事的。

米耶尔³⁸，公社的最佳领袖之一，在自己的出版物中写道：“公社不是立宪会议，而是军事委员会。它必须有一个目标：胜利；必须有一个工具：武力，必须有一个法律：社会救赎的法律。”

利萨加莱指控领袖们：“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公社是街垒，而不是董事会……”

他们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才明白这个道理，但为时已晚。考茨基直至现在也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也千万别指望他某天恍然大悟。

* * *

公社是对形式民主的活生生否定，因为它的发展标志着巴黎工人对农民国家的专政。这一事实高于一切。无论公社内部墨守政治成规的人如何拼命抓住民主合法性的表象，公社的每一个行动即便不足以令其取得胜利，也都足以被说成是非法的。

相当于巴黎市杜马的公社，废除了全国的普遍兵役法。它将其机关报称为《法兰西共和国官方公报》。它虽然很胆怯，但还是碰了国家银行。它宣布了政教分离，并废除了宗教预算。它与外国使馆建立了联系。例子数不胜数。它通过革命专政的权利做到了这一切。但这一权利，当时仍是绿色民主党人的克里蒙梭并不愿意承认。

在与中央委员会进行的会议上，克里蒙梭讲道：“这次叛乱有一个非法的借口……委员会很快就会变得可笑起来，而其法令也会变得可鄙。除此之外，巴黎无权针对法兰西进行叛乱，她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议会的权威。”

公社的任务是解散国民议会。不幸的是，它没能做到这一点。现在考茨基正在为它的罪行寻求减刑。

他指出，公社社员在国民议会中的敌人是君主主义者，而我们在立宪会议中的敌人则是……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简直稀里糊涂！考茨基谈到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忘记了唯一的严肃敌人——立宪民主党人。他们才

是我们俄国的梯也尔政党，也就是以私有制为名的所有者集团，而米留可夫教授则尽力地在模仿这位矮个子伟人。很早，早在十一月政变之前，米留可夫就开始寻找他自己的加利费³⁹——他先后找到了科尔尼洛夫将军、阿列克谢耶夫⁴⁰，然后是卡列金、克拉斯诺夫，而当高尔察克通过解散立宪会议把所有政党逼上绝路之后，立宪民主党，这个基本上信奉君主主义的、唯一严肃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仅没有拒绝支持他，相反还更加同情他，还围着他团团转。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我国没有独立发挥作用，正如考茨基的党在德国革命事件中没有独立发挥作用一样。他们把自己的政策完全建立在与立宪民主党的联盟之上，从而使立宪民主党获得了决定性的地位，而完全不考虑政治力量的关系。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作用，只不过是从小集会与选举上收集并传送被革命唤醒的群众的政治信任。无论选举结果为何，这些政治信任随后被交由反革命的帝国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支配。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多数地位对立宪民主党少数地位那纯粹附庸式的依赖，本身就恶劣嘲弄了“民主”理论。但这还不够。在国家所有过久实行“民主”体制的地区都将不可避免地以反革命的公开政变而结束。乌克兰便是如此，民主的拉达向德国帝国主义出卖了苏维埃政权，结果发现自身被君主主义者斯科罗帕茨基⁴¹给推翻了。库班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的民主拉达处于邓尼金的统治之下。西伯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民主”最重要的实验，立宪会议在形式上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统治，而布尔什维克缺席，实际上是处于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之下，最后导致了沙皇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独裁统治。北方的情况最终也是如此，以社会革命党人柴可夫斯基⁴²政府为面目的立宪派变成了俄

国与英国反革命将领统治的粗糙装饰品。这种情况在所有边疆小国要么发生过了，要么正在发生：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地主、资本家和外国军国主义的统治地位在形式民主的旗帜下得到了巩固。

1871 年的巴黎工人—1917 年的彼得堡无产阶级

考茨基在政治上对比公社和苏维埃俄国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尽显丑态。其中，他对比了 1871 年巴黎工人与 1917—1919 年间俄国无产者两者的特性。考茨基将前者描绘成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热情革命者，而将后者描绘成自我中心主义者、追求私利的人和自发的无政府主义者。

巴黎工人具有太过明确的过去，所以他们不需要以革命做介绍信，或使自己不受今日的考茨基的赞扬。然而，彼得堡的无产者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动机来回避别人把他们与他们的英雄兄长进行比较。彼得堡工人在三年内不断斗争，首先是夺取政权，然后是保卫并巩固政权，在饥寒交迫与持久危险之中展现出了集体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的特殊年代记。考茨基，正如我们在另一方面说到过的那样，拿俄国无产阶级中最黑暗的分子和共产党人的色彩在进行比较。在这一点上，他与资产阶级中的马屁精毫无区别——对他们来说，死去的共产党人总是比活着的共产党人更具吸引力。

彼得堡无产阶级是在巴黎无产阶级 45 年之后才取得了政权。这一时间跨度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优势。老巴黎的手工业小资产阶级特征和新巴黎的部分特征，与彼得堡这个拥有世界上工业最为集中的地区完全不同。后者使我们的鼓动和组织任务变得极为轻松，也使苏维埃制度更容易建立起来。

我国的无产阶级远远没有法国无产阶级那种最丰富的革命传统。但是 1905 年的伟大实验，其失败和遗留的仇债，在这一次革命开始的时候，对我国老一代工人来说记忆犹新。

俄国工人不像法国工人那样，受民主与代议制长期学校的塑造，而这种学校在某一时代里是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俄国工人阶级还没来得及吞服失望的苦涩和怀疑论的精神毒药——而这些直到某一刻之前（希望这一刻是不久之后的将来）都仍然束缚着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意志。

巴黎公社还未来得及面对全面的经济问题，就遭遇了军事上的失败。尽管巴黎工人有着出色的战斗素质，然而公社的军事命运立即被确定为毫无希望——上层的犹豫不决和妥协主义瓦解了下层。

国民自卫军的薪金在账目上按 162000 名士兵和 6500 名军官的应付数额支付，但实际参加战斗的人数——特别是在 4 月 3 日那次不成功的出击之后，在 2 万到 3 万之间浮动。

这个数据丝毫没有败坏巴黎工人的名声，也并没有让别人得以指责他们是懦夫和逃兵提供，尽管逃兵确实也不少。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首先需要有一个集中的、精确的管理机器。这样的东西在公社那里连影子都没有。

正如某位作者说的一样，公社的军事机关就像一个暗室，所有人都其中都免不了撞到其他入。内阁的办公室里挤满了军官和普通的卫兵，他们要求军需品和食物，抱怨没有人换他们的班。他们被打发到指挥部了……

“有些营每次在战壕上会待上二三十天，而在此期间其他的营则一直处于预备队的状态……这种粗心大意很快就扼杀了所有

的纪律。勇敢的人很快就只指望着自己；其他人则逃离自己的岗位。军官也是如此，有些人放弃自己的岗位，是为了去帮助正在遭受炮火打击的友邻部队；有些人则撤回了城内……”⁴³

这样的体制不可能不受到惩罚：公社最后淹没在血泊之中。但在这一点上，考茨基有一个无与伦比的慰藉：

他摇摇头，说道：“指挥战争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拿手好戏。”⁴⁴

这句堪称是邦葛罗斯⁴⁵的箴言的话，与考茨基的另一句名言具有同样的地位，他说，国际在战争时期不是合适的工具，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和平的工具”。

在这两句箴言之中蕴含着现在的考茨基的全部、整个本质，也就是说，他也就比圆圆的零多一丁点罢了。你们看，指挥战争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强项，更何况，国际也不是为了战争时期而建立起来的。考茨基的船是为池塘和平静的港口建造的，而不是为公海和暴风雨般动荡的时代而建造的。如果这艘船破损了，开始漏水，如今正顺利地驶向海底，那么过错也全在这个水和波浪过多和令人难以预料的暴风雨身上，而考茨基才没有打算把他的出色工具用在这种暴风雨身上呢。

国际无产阶级为自己设定了夺取政权的任务。不管“一般来说”内战是不是革命必要的“一般属性”，有一件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进步，至少使他们在俄国、德国以及奥匈帝国的部分地区接受了激烈的内战形式，而这种形式不仅出现在国内战线上，也出现在对外战线上。如果指挥战争不是无产阶级的强项，而且工人国际也只适合于和平时期，那么我们就必须葬送掉革命和社会主义，因为指挥战争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相当拿手，而没有战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允许工人进行统

治。那么剩下要做的，就是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宣布为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产阶级代议制的附庸，这也就意味着公开认可艾伯特、谢德曼、雷诺德尔以及考茨基在口头上似乎仍在反对的政策中的做法。

指挥战争并不是公社的强项。所以，它被打败了，而且这是无情的失败！

当年相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菲奥写道：“人们只有在苏拉⁴⁶、安东尼⁴⁷和奥克塔维乌斯⁴⁸的捕杀那里，才能在文明国家的历史里找到能与此相提并论的屠杀；与之相比，瓦卢瓦王朝末期的宗教战争、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⁴⁹、恐怖时期⁵⁰都只不过是巫见大巫。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17000具联合起来的反叛者的尸体出现在巴黎……杀戮一直持续到6月15日左右。”

“一般说来，指挥战争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拿手好戏。”是这样吗？

不！俄国工人已经表明，他们也有能力掌握“战争的工
具”。相比公社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不是在否定公社——因为要发扬公社传统，根本不应该学会它的无助，而是要继承它的事业。公社很弱。为了完成它的事业，我们变得强大起来。公社被完全打败了。我们反复打击了杀害公社的刽子手，我们为公社报仇，为公社雪耻！

* * *

在领取薪金的168500名国民自卫军成员中，有2—3万走上了战场。这些数字为形式民主在革命时代的作用的结论下了有趣的脚注。巴黎公社的命运不是由其投票确定的，而是在其与梯也尔军队的战斗中决定的。168500名国民自卫军成员代表了大部分的选民。但事实上，在战斗中，公社的命运是由两到三万人决定的一

——他们是最能进行自我牺牲的战斗的少数人。这少数人并不特别——他们只是更加勇敢且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地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志。但这仍然是少数人。其余在关键时刻躲藏起来的人并不敌视公社；相反，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支持着它，但他们缺乏觉悟，态度不坚决。在政治民主的竞技场上，他们过低的觉悟使他们有可能被冒险主义者、无赖、小市民骗子和诚实的蠢货欺骗，而后面这些人自欺。但在公开的阶级战争发生之时，他们或多或少会去支持这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少数。这一点在国民自卫军的组织中得到了体现。倘若公社活得更久，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就会越来越稳固。在公开斗争过程中形成并巩固的组织，作为劳动群众的组织，将成为其专政的组织，也就是武装的无产阶级代表苏维埃。

注释：

[1] 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Пётр Лаврович Лавров，1823—1900），革命民粹主义最杰出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第一国际成员。1876年拉夫罗夫参加了第一个民粹主义团体“土地与自由”；1879年，“土地与自由”分裂为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团体期间，他加入了后者，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一直是民粹派的理论领袖，从1883年到1886年一直担任民意党主要机关报《民意党公报》（Вестник 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的编辑。1874年，他移居北美，寻求在那里建立一个农业殖民地。这次尝试失败后，他在90年代移居英国，在那里参与了自由俄罗斯出版社关于民粹主义倾向《前进》刊物的出版。拉夫罗夫写下了许多杰出著作，其中《历史信札》（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等深刻影响了70、80年代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俄罗斯社会学学派”（русской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школе）奠定了基础。文中提到的拉夫罗夫篇幅最大的著作《巴黎公社》是世界上关于巴黎公社问题的最佳著作之一。

[中译者补注1] 自由俄罗斯印刷厂是俄罗斯人在伦敦开的一家印刷出

出版社，旨在出版未经审查的民主、革命方向的作品。——俄文版编者注

[2] 福尔马尔（生于1850年）是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领袖。自1881年以来，他一直是德国国会议员。理论上，福尔马尔是爱德华·伯恩斯坦式的修正主义者，但在实际活动中支持与资产阶级协商和妥协的政策。早在1891年，福尔马尔就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沙文主义纲要。福尔马尔1891年6月和7月在慕尼黑发表的两次演讲中声称：“如果发生战争，德国将只有一个政党，而我们社会民主党不会是最后一个履行职责的政党。”——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福尔马尔（Georg Heinrich von Vollmar，1850年3月7日—1922年6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和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议会活动家。1877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任地方党报《德累斯顿人民信使报》主编。1878年被当局逮捕入狱，随后被驱逐出境。1879年到苏黎世后，任秘密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因“左”倾主张受到批评，1880年1月辞去主编职务。188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成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重要发言人，此后除1886—1890年外，一直到1918年均为国会议员或邦议会议员。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宣扬搞资产阶级改良和走议会道路。为此，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等著作中批判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1896年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出现后，多方为之辩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后脱离政治活动。

[中译者补注2]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BayernSPD），全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地区协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 Landesverband Bayern），1892年6月26日成立，首任主席为福尔马尔。

[3]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5页，有增补和订正。——中译者注

[4]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64—65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5] 同上，第71页。——作者注

[6] 伊波利特—普罗斯佩—奥利维耶·利萨加莱（Hippolyte-Prosper-Olivier "Lissa" Lissagaray, 1838年11月24日—1901年1月25日），法国革命社会主义者，曾参加过巴黎公社，著有《1871年公社史》（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1871）。——中译者注

[7] 《1871年公社史》，普罗斯佩·利萨加莱著，布鲁塞尔1876年版，第106页。——作者注

[8]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 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大公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中译者注

[9] 策列铁里是孟什维克的杰出领袖。在第二届杜马时期，他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并在伦敦的第五次社民党大会上述职。他和其他人因参与社民党团一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策列铁里采取了温和的国际主义者立场，实际上是考茨基主义者的立场。二月革命后，他迅速变为护国主义者，在孟什维克内领导所谓的革命护国主义者。策列铁里与斯科别列夫一起进入第一届联合政府，寻求利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权力来支持政府并继续帝国主义战争。就连孟什维克左派苏汉诺夫也不在他的《革命札记》中指出：“自从马林斯基宫（部长会议的场所）的恩典最终照在策列铁里的头上以来，可以说，他正式露出了本来的真面目：他成为了临时政府下属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的所有活动、角色、愿望和演讲都是为了使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变成支持临时政府的工具。——一直到立宪会议召开。”策列铁里现在在国外，带着反苏维埃情绪在欧洲各国旅行。——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耶维奇·策列铁里（格鲁吉亚语：ირაკლი (კაკი) გიორგის ძე წერეთელი；俄语：Ир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大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流放到远东，从流放地返回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参加孟什维克派，1904年前往柏林学习法学，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曾入选第二届杜马，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流放远东五年，1913年获释。一战爆发后持和平主义立场，1915年赞成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精神。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曾担任临时政府的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曾被捕，后返回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告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苏维埃俄国解放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1959年于纽约逝世。

[中译者补注 2] 马特维·伊万诺维奇·斯科别列夫（Матвей Иванович Скобелев，1885年11月9日—1938年7月29日），孟什维克派重要人物，生于巴库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1908年至1912年担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返回高加索，并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在1917年3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1917年5月担任临时政府的劳工部长。1917年6月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17年9月辞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与劳工部长的职务。十月革命后在工人合作社工作。1918年底前往巴库，帮助苏维埃政权采购粮食。1920年移居巴黎。1922年回国，并参加俄共（布），此后参加了苏维埃政权的外贸工作。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

[中译者补注 3]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苏汉诺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уханов，1882年11月27日—1940年6月29日），早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参加了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此后流亡瑞士。1913年退出社会革命党。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新生活报》编辑，并加入了孟什维克国际派。十月

革命后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撰写了《革命札记》。1920年退出孟什维克。20年代在苏联政府任职。1930年因“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1940年遇害。后获平反。

[10]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中译者注

[11] 科尔尼洛夫将军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杰出将领之一。1915年，他在奥地利被俘但逃走了，声名大振。1917年7月，科尔尼洛夫被临时政府任命为俄军最高统帅。在这个位子上，他表露了对旧政权的同情，在军队中使用了死刑，并降低了军队选举组织的重要性。在莫斯科国家会议上，科尔尼洛夫反映了旧军官和大资产阶级的情绪。反革命阵营公认他是唯一能够坚定建立国家秩序的人，即消灭二月革命的成果。在所有右翼政党和组织的支持下，科尔尼洛夫试图在1917年8月下旬发动政变，将哥萨克军队调往彼得格勒，但遭到彻底失败。

十月革命后，他逃到顿河地区，成为哥萨克军队的首领。1918年2月的一场战役中，他的部队被红军彻底击败，他本人也在战斗中阵亡。——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

上将。出身于突厥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12]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保守派）1896年生于莫斯科。俄罗斯最早的社会民主党人之一，参与创建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他被流放到维亚特卡省。出狱后移居国外，成为以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人为首的著名报纸《火星报》的编委。在1903年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加入了孟什维克。1907，1908和1909年间他是取消主义的领导人之一。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是最狂热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近年来，他没有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一直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тресов，1869年8月19日—1934年7月11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900年参与创立《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6年起是取消派。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成为孟什维克护国派首领。后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退党，加入了“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短暂被捕，后获释。1925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法国。1934年在巴黎逝世。

[13] 罗将柯是大地主。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十月党领袖之一。二月革命后，任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是克伦斯基时代资产阶级极右翼反革命集团的思想家和组织者。他移居国外后积极领导反苏反革命活动。1924年去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罗将柯（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одзянко，1859年2月21日—1924年1月24日），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877年参加陆军，1885年退役后，回乡从政。1905年参与创立十月党，1906年当选为省自治机构执委会委员。1907年当选为第三届杜马代表，1909年担任杜马副主席，1911年3月担任杜马主席，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17年10月6日。二月革命后曾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后逃到顿河流域，大力支持白军。1920年白军被消灭后流亡塞尔维亚。在贫困中死去。

[14]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1页。——中译者注

[15] 《1871年公社史》，普罗斯佩·利萨加莱著，第70页。——俄文版编者注

[16]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77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17]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1页。——中译者注

[18]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225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19] 伏尔加河畔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作者指的是1918年5月协约国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组织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暴动。根据捷克指挥部和人民委员会之间的协议，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将撤退到法国。然而，捷克部队沿着西伯利亚铁路从奔萨延伸到伊尔库茨克时，发起暴动反抗苏维埃政权，占领奔萨、兹拉图斯特、乌法、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城市。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农村富农起义和所有集结在叛乱地区的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推进到了乌拉尔和伏尔加地区，直至喀山和西伯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搞突袭，而且当时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完全没有组织化的武装红军。但在夏末，红军开始一点一点地平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暴动，夺回喀山并驱逐伏尔加河

地区的入侵者。1919年底，红军取得最后胜利，夺回了所有被占领的城市。——俄文版编者注

[20] 摩·所·乌里茨基生于1873年。他青年时期加入社会民主党。自1897年以来，他常年在监狱和流放途中度过。他在雅库茨克地区待了五年后，于1905年重返党的工作。但在1906年初，他再次被捕，并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乌里茨基在流放中患上肺结核，因此得以出国。他在德国遇上战争，于是搬到了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俄国。乌里茨基多年来一直是孟什维克。1914年的战争使他成为国际主义者。回到俄国后，他加入了区联派，并于1917年7月与后者一起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期间，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光荣地完成了党委委托给他的清算立宪会议的任务。在布列斯特期间，他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彼得格勒劳动公社从列宁格勒撤离后，乌里茨基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契卡主席。他在契卡从事扫除白军阴谋的庞大工作。1918年，乌里茨基被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莫伊塞·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Урицкий，1873年1月2日—1918年8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年后被捕，被流放到雅库茨克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2年8月，他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会议，参与了“八月联盟”。1914年流亡国外。1916年在斯德哥尔摩成为托洛茨基在巴黎编辑的报纸《我们的言论》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上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17年8月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时在《真理报》和其他党派出版物上工作。1917年10月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全俄立宪会议召集委员会委员。1918年2月领导了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在

1918年布列斯特谈判中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3月10日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12月30日被一名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暗杀身亡。

[中译者补注 2] 人民社会党（或“人民社会党”，俄语：Партия народных социалистов）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劳动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劳动人民社会党人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列宁称他们是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市侩机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并且强调指出他们从自己的纲领中勾销了共和国和对全部土地的要求，已同立宪民主党人很少差别。1907年六三政变后，劳动人民社会党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该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

[21] 拉乌尔·里戈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成员。他利用自己警察局长的身份为所欲为，并引起了无数非难和申诉。因此，1871年4月24日，他被免去警察局长职务，并被任命为巴黎公社检察官。但在这个位子上，里戈发现自己也不是个足够闻名的认真且贪婪的政客。他在凡尔赛政府镇压公社时被击毙。——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拉乌尔·阿道夫·乔治·里戈（Raoul Adolphe Georges Rigault, 1846年1月16日—1871年5月24日），法国记者、作家。1870—1871年任巴黎警察局长。巴黎公社成立后担任公社理事会委员，曾下令逮捕巴黎大主教，并逮捕了二百多名宗教人士作为人质。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捕，5月24日英勇就义。

[22] 该词在俄语中也有“公社”的含义，也可解作俄国革命史中经常出现的“村社”一词，特此说明。——中译者注

[23]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143—144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24]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7页。——中译者注

[25]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87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26] 库格曼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参与者之一。马克思的密友。——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路德维希·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1828年8月19日——1902年1月9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1851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1854年起担任医生。1862—1883年期间与马克思长期保持通信。1864年加入第一国际。1869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99年出席社民党汉诺威代表大会。1902年逝世。

[27]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78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28]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7—58页。——中译者注

[29] 语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卡拉马佐夫兄弟》，原小说中为：“我看到一个车夫的影子用一把梳子的影子刷一辆马车的影子。”——中译者注

[30] 值得一提的是，在1871年巴黎的公社选举中，有23万选民参加了选举。在1917年彼得堡的城市选举中，尽管除我们在首都几乎没有影响力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都抵制选举，但仍然有39万选民参加了选举。1871年的巴黎有200万人口，而1917年11月的彼得堡人口却不超过这个数字。我们必须提请注意的是，我们的选举制度是无可比拟地更加民主的。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是在帝国选举法的基础上进行了选举。——作者注

[31]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

58 页。——中译者注

[32] 同上。——中译者注

[33] 《1871 年 3 月 18 日巴黎公社》第 111—112 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 年版。——作者注

[34] 韦莫雷尔是 1871 年巴黎公社的成员。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是蒲鲁东主义。他追随巴黎公社中的少数机会主义分子，力图实行蒲鲁东主义的纲领和策略。韦莫雷尔反对公社的某些领导人企图采取果断的革命行动来反对凡尔赛政府。他谴责暴力斗争和中央集权的组织形式，宣扬广泛的民主和人性。韦莫雷尔著有《1848 年人物》(Les Hommes de 1848) 一书。在书中，他完全反对自己在巴黎公社中的角色，严厉谴责自由主义领导人在 1848 年革命中的机会主义和背叛行为。——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奥古斯特—让—马里·韦莫雷尔 (Auguste-Jean-Marie Vermorel, 1841 年 6 月 21 日—1871 年 6 月 20 日)，法国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成员。1861 年创办报纸《年轻的法国》(La Jeune France)。1868 年发表著作《1848 年人物》。曾因政治观点被法兰西第二帝国政府逮捕入狱。1870 年第三共和国成立后获释。1871 年 3 月参加巴黎公社，并当选为公社委员会委员，反对创立公共安全委员会。同年 5 月 25 日在与第三共和国军队作战中因身负重伤被俘，6 月 20 日病逝。

[35] 夏尔·龙格 (1837—1904)，法国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成员和第一国际成员。1889 年他是《平等》报主编。他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婿。——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夏尔·费利克斯·塞萨尔·龙格 (Charles Félix César Longuet, 1839 年 2 月 14 日—1903 年 8 月 5 日)，出身于君主派家庭。1860 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63 年加入第一国际，随后流亡国外，在英国参加了共济会。1866 年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驻比利时通讯秘书。1870 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回国，参加了国民警卫队。巴黎公社成立后当选为公社委员会委员，反对创立公共安全委员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1872 年当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投票赞成驱逐巴库宁，同年与

马克思的长女珍妮·马克思结婚。1874—1880年任牛津大学国王学院教授。1880年获大赦后回国。1886—1893年任巴黎第11区议会议员。1903年在巴黎逝世。。

[36] 茹尔德是巴黎公社少数派的领导人之一，该派别的主要成员拥护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思想。茹尔德和所有的少数派的拥护者一样，对凡尔赛政府采取了优柔寡断和机会主义的路线，坚决反对公社对敌人暴行采取报复性恐怖措施，并且总是希望使革命服从于日常的正式法律。——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弗朗索瓦·茹尔德（François Jourde / Francis Jourde，1843年7月4日—1893年3月20日），巴黎公社成员。巴黎公社期间曾担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代表。担任财务代表期间曾管理法兰西银行，因过分尊重旧银行而招致部分公社成员不满。1871年5月30日被捕，1871年9月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1874年3月逃出流放地，先后居住在斯特拉斯堡、日内瓦、布鲁塞尔和伦敦等地。1880年返回法国，直到去世前一直担任会计。

[37]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137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38] 米耶尔是巴黎公社的主要人物之一。巴黎公社激进革命派的代表，主张对凡尔赛政府采取果断和直接的措施。他的意识形态仍然是蒲鲁东主义。在公社垮台时被毙。——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让-巴蒂斯特·米耶尔（Jean-Baptiste Millière，1817年12月13日—1871年5月26日），出身于制桶工人家庭，参加了1848年革命。1850年起公开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1859年获大赦后回国。1869年担任《马赛报》（La Marseillaise）编辑。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国民警卫队。1871年2月8日至5月26日任国民议会议员。1871年3月支持巴黎公社，5月26日被凡尔赛军队逮捕，当天在万神殿遇害。

[39] 加利费将军是镇压巴黎公社的著名刽子手。他的名字与1871年

的“流血周”密切相关。“流血周”期间，公社中的抵抗者遭到血腥屠杀。后来他在梯也尔政府任法国战争部长。——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加利费侯爵（Gaston Alexandre Auguste, Marquis de Galliffet, 1830 年 1 月 23 日—1909 年 7 月 8 日），法国将军，1848 年参军，曾参加过俄土战争、奥地利—撒丁战争等。普法战争期间被俘，后率军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1899 年 6 月至 1900 年 5 月曾任国防部长。

[40]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是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最高指挥官的参谋长。1917 年 8 月科尔尼洛夫叛乱后，他曾一度担任最高指挥官。苏维埃时期他是最早组织反革命势力的人之一。在他的领导下，1918 年顿河地区建立了“志愿军”。这支军队后来由邓尼金指挥。——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лексеев, 1857 年 11 月 3 日—1918 年 9 月 25 日），1915 年至 1917 年任俄军总参谋长，二月革命后，于 1917 年 3 月至 5 月任俄军总司令。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运动，1918 年 4 月担任了顿河流域的白军司令，同年 9 月死于心脏病。

[41] 斯科罗帕茨基是一名卫队军官。在德国占领军和君主主义者的支持下，他在 1918 年解散了小资产阶级的乌克兰拉达，成为全乌克兰的盖特曼。然而不久后，德国的 11 月革命使德国军队撤出乌克兰，导致彼得留拉派胜利，斯科罗帕茨基垮台。——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斯科罗帕茨基（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Скоропадский, 1873 年 5 月 3 日—1945 年 4 月 26 日），1886 年入伍。参加了日俄战争。1912 年晋升少将。一战期间曾在东普鲁士作战。1916 年升中将军衔。十月革命后支持乌克兰中央拉达，1918 年与德军合作推翻乌克兰中央拉达，并于同年 4 月 29 日自任全乌克兰“盖特曼”。1918 年 12 月 14 日因被彼得留拉军队击溃而被迫辞职，后流亡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拒绝与纳粹合作。1945 年在德国被盟军空轰炸死。

[中译者补注 2] 盖特曼（乌克兰语：гетьман；捷克语：hejtman；波

兰语&德语：hetman；罗马尼亚语：hatman；立陶宛语：etmonas；俄语：Гетман），是15至18世纪波兰、乌克兰及立陶宛大公国（包括波兰—立陶宛联邦）军队指挥官的头衔，地位仅次于君主，可以意译为“大将军”。有些权势较大的盖特曼甚至兼任王冠大元帅、波兰首相等职务。波西米亚的捷克人于15世纪胡斯战争后，曾使用此头衔。自16世纪后，此头衔亦在波兰哥萨克中广泛使用。今日捷克共和国，“盖特曼”是当选的地方行政长官的称呼。斯科罗帕茨基所称的盖特曼作为君主头衔使用。

[42] 柴可夫斯基，生于1850年。俄国革命运动的旧领袖。70年代，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主义圈子的第一批创始人之一。人民社会党领袖。1917年二月革命后成为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十月后，他领导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白军政府，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柴可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айковский，1850年12月26日—1926年4月30日），出生于维亚特卡的一座庄园，继而在公立学校学习，后赴圣彼得堡学习。1868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1872年获得化学学位。在圣彼得堡学习期间，他加入了一个激进的民粹主义学生团体（后被称为柴可夫斯基小组），因此两度被捕。出狱后不满小组的恐怖主义化，宣布脱离，一度皈依基督教。1880年在英国定居，重新积极参与俄国海外革命组织。1881年，他在伦敦会见了柴可夫斯基小组的前成员克鲁泡特金，他们一起试图组织英国工人。1905年赴美筹集推翻沙俄的资金。1907年，回国被捕，获释后从事合作社事业。一战爆发后积极支持俄国的反德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同时成为重建的温和民粹派政党劳动人民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1917年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他当选为短暂的立宪会议成员。内战爆发后加入白军，积极反对布尔什维克，白军失败后流亡西欧，继续从事反苏活动。1925年流亡英国。1926年死于伦敦。

[43]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100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44]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82 页。——中译者注

[45] 邦葛罗斯是伏尔泰在他的小说《老实人》中虚构的有喜剧色彩的博士。作为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者，邦葛罗斯博士会时不时抛出这样的迂腐且乐观的格言：“在这个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俄文版编者注

[46] 苏拉是公元前 1 世纪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之一。作为罗马最大的阴谋家之一，他通过贿赂和暴力成为军队统帅和执政官。他的统治以一系列禁令为标志（关于革职、征用财产等的法令）。——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公元前 138—前 78 年），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政变夺取政权的人。

[47] 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公元前 83—前 30 年），罗马三巨头之一。凯撒死后，他在罗马夺取了权力，但不得不与三巨头中的屋大维和雷必达分享权力；雷必达死后，他获得了帝国东半部的控制权。他与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关系密切，并且支持她的亲属。所以，他和屋大维发生冲突并决裂；这场冲突在安东尼自杀后以屋大维的胜利而告终。安东尼的统治以无数暴行为闻名。——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此处的克莱奥帕特拉应该指的是克莱奥帕特拉七世，即埃及艳后。而不是指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安东尼的女儿，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即克利奥帕特拉八世。

[中译者补注 2] 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又译作“马克·安东尼”，拉丁语：**Marcus Antonius**，公元前 83—前 30 年），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早期是尤利乌斯·凯撒最重要的军队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之一。前 33 年后三头同盟分裂，马克·安东尼在与屋大维的罗马内战中战败，与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一同自杀身亡。

[48] 格奈乌斯·奥克塔维乌斯（**Gnaeus Octavius**）是公元前 87 年的执政官。苏拉的追随者。被平民派领袖、罗马贵族辛纳驱逐出罗马。罗马

历史上最残忍的暴君之一。——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格奈乌斯·奥克塔维乌斯（Gnaeus Octavius，公元前 137 年—公元前 87 年），罗马帝国开国君主奥古斯都·奥克塔维乌斯（旧译“屋大维”，“奥克塔维乌斯”是严格依据拉丁语读音翻译的）的堂兄。公元前 87 年担任罗马共和国执政官，企图维护苏拉在任期间的政策，并与平民派领袖卢西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辛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发生冲突，最后在与辛纳的交战中战败，被驱逐出罗马。不久经他人劝说返回罗马，旋即被辛纳下令处决。

[49] 圣巴托罗缪之夜是 16 世纪法国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之间因宗教斗争而起的血腥事件，以“流血婚礼”而著名。1572 年 8 月 23 日至 24 日圣巴托罗缪节的夜晚，在贝阿恩的亨利与瓦卢瓦的玛格丽塔婚礼期间，查理九世国王的母亲凯瑟琳·德·美第奇发起了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派的屠杀。胡格诺派反对封建制度，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屠杀胡格诺派，长期阻碍了法国的工业发展。——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贝阿恩的亨利（Henry de Béarn），时任纳瓦拉国王（1572—1610 年在位），即后来加冕法国国王的亨利四世（Henry IV，1553 年 12 月 13 日—1610 年 5 月 14 日），波旁王朝的第一任君主。早年信仰新教，参加了宗教战争。1572 年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后被迫放弃信仰新教。1589—1610 年担任法国国王。1593 年皈依天主教。1598 年签署《南特敕令》，结束宗教战争。1610 年在准备与西班牙开战前夕遇刺身亡。

[中译者补注 2] 瓦卢瓦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de Valois，1553 年 5 月 14 日—1615 年 3 月 27 日），法国和纳瓦拉的王后，同时也是瓦卢瓦公爵，查理九世的妹妹。

[中译者补注 3] 查理九世（Charles IX，1550 年 6 月 27 日—1574 年 5 月 30 日），法国瓦卢瓦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

[中译者补注 4] 凯瑟琳·德·美第奇（法语：Catherine de Médicis；意大利语：Caterina de' Medici，1519 年 4 月 13 日—1589 年 1 月 5 日），出

身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是查理九世和玛格丽特的母亲。

[中译者补注 5] 此事的重要缘起之一就是凯瑟琳意图缓和与胡格诺派的矛盾，于是与胡格诺派领袖亨利四世联姻。在屠杀期间亨利改信天主教，数年后逃离巴黎回到纳瓦拉，并重新改信新教，是假意改信日后悔过的典范。法国新教徒至少在 16 世纪最多只是反对君主专制，而不反对封建制度。

[50] 恐怖时代，作者指的是 1793 年 6 月 2 日至 1794 年 7 月 27 日雅各宾派在国民公会的统治时期。1793 年 6 月 2 日吉伦特派被驱逐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与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之间爆发了内战。为了镇压当时席卷全国的反革命暴动，雅各宾派颁布了多项打击反革命势力的措施。国民公会建立了救国委员会和中央革命法庭。各省也成立了革命法庭，旨在无情铲除反革命。与此同时设立了特派代表机构，特派代表们被派往全国各地，拥有紧急权力。国民公会通过了一系列针对移民、未宣誓的牧师、外国代理人、吉伦特派等的法令。新闻自由被废除。巴黎附近成立了一支由无套裤汉（城乡贫民）组成的特殊“革命军”，以镇压吉伦特派和君主派暴动，监督革命法律的实施，并向首都供应粮食。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宣布为“可疑分子”。1793 年 9 月 17 日的法律将被国民公会免职的可疑官员和所有“通过他们的行为、关系、言论或作品表明自己追随暴政或联邦制，与自由为敌”的公民都划分为“可疑分子”。雅各宾派政权同时采取这些非常措施，在历史上获得了恐怖政权的称号。

——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从 1792 年开始，国民公会向各地革命军派遣特派代表（*représentant en mission*），监督部队作战。特派代表享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并可处决抗命的指挥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阅维克托·雨果的名著《九三年》。

第六章 马克思和……考茨基

考茨基傲慢地否定了马克思在《新莱茵报》¹上发表过的关于恐怖的观点，原因是当时的马克思还很“年轻”，也就是说，他的眼界还没有成功达到那种全面的衰弱的状态，而这种衰弱状态在某些理论家奔七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与1848—1849年间青年马克思（这个时候的马克思正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相对立，考茨基引用了巴黎公社时期成熟马克思的文字——后者在考茨基的笔下，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掉光了灰色狮子般的鬃毛，以一个德高望重的说教者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在民主的神圣性面前毕恭毕敬，嘴里念叨着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在谢德曼、王德威尔德以及他的血亲外孙让·龙格的政治魔力面前肃然起敬。用一句话来说，充满了生活智慧的马克思原来是正派的考茨基主义者。

从不朽名著《（法兰西）内战》——充满着我们这一时代全新紧张生活的著作，考茨基只为自己摘取了只言片语，在这几句话中，正值壮年的社会革命理论家将公社社员的慷慨激昂与凡尔赛资产阶级的血腥残暴进行了对比。这几句话被考茨基变成了陈词滥调。马克思——被描绘成抽象人道主义的布道者、博爱主义的传教士！毋宁说，这应该是在描述佛陀或者列夫·托尔斯泰……国际上有人造谣说男公社社员都是些皮条客，女公社社员都是妓女；而胜利资产阶级也来意淫公社，散布无比恶毒且卑鄙的谣言，认定那些被打败的战士们“犯下兽行”；为了反对这些中伤与诽谤，马克思指出并强调了他们温柔且优美的一面，而这些特征与优柔寡断往往是一体两面——这一点太清楚了，马克思毕竟是马克思。他既不是一个庸俗的腐儒，更不是革命的检察官

——既科学地分析公社，又为革命辩护。他不仅解释并批判，他还会辩护并斗争。但是，马克思在指出失败公社温柔之处的同时，也对公社为了不失败而应该采取的措施不抱疑问。

《（法兰西）内战》的作者指责中央委员会，也就是当时的国民自卫军代表苏维埃，过于草率地把自己的地位让给了选出来的公社。考茨基“不理解”这种指责的缘由。这一诚挚的不理解，局部反映了考茨基在革命的一般问题方面上大脑迟钝。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首要地位应该由一个纯粹战斗性的机构、一个反对凡尔赛叛乱与军事行动的中央来占据，而不是工人民主的自我管理组织。后者只应当在晚些时候出现。

马克思指责公社没有立即进攻凡尔赛匪帮，而是采取貌似“更人道”的防御形式，这种形式容易让人高呼道德法则和生命的神圣性，但却永远不会带领人们在内战中胜利。马克思的首要愿望也是让革命胜利。他在任何地方都没说过民主在原则上高于阶级斗争。正好相反，马克思——不是《莱茵报》的那个年轻编辑，而是《资本论》的成熟作者，我们真正的马克思，有着还没被考茨基之徒的理发师修理过的茂盛狮子鬃毛，以高浓度的蔑视讲述了“代议制的人造气氛”，而在这种气氛中，连梯也尔这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矮子也变成了巨人！考茨基的那本学究式的小册子，又贫瘠又干燥，通篇充斥着诽谤，而《（法兰西）内战》宛若甘霖。

与考茨基进行的诽谤相反，马克思与那种将民主看作是历史最后的、无条件的、至高无上的词语的观点毫无关系。资产阶级社会虽然产生了现代民主制，但其发展也绝不像战前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幻想家让·饶勒斯²和现在腐儒中最博学的卡尔·考茨基梦想的那样是一种渐进民主化的过程。在拿破仑三世

的帝国中，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³。因此，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政权的最终形式不是民主，而是波拿巴主义。经院哲学家们可能会说：马克思错了，因为波拿巴主义在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被“民主共和国”取代了。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犯错，反而说到点子上了。第三共和国就是一个民主制完全腐烂的时代。与第二帝国相比，波拿巴主义在庞加莱—克里蒙梭的交易所共和国中得到了更完整的表达。不错，第三共和国没有头顶王冠的皇帝；但在其上空，沙皇阴魂重重。

在对公社的评价中，马克思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那些被民主话术褪去光芒的文字。他写道：“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⁴首先，马克思指出的不是公社那种有条件民主的形式，而是它的阶级本质。正如我们所知，公社摧毁了正规军、警察，并下令没收教会的财产。它是通过巴黎革命专政的权利来达成这一点的，并没有得到全国范围内民主的许可，而这种民主在当时梯也尔的国民议会中得到了更加“合法”的表达。但革命并不是由投票来决定的。马克思说，“……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仍然是武装的巴黎。”⁵这与形式民主制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马克思说过：“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⁶因此，马克思认为，革命巴黎的任务并不是从自己的胜利中诉诸立宪会议⁷摇摆不定的意志，而是要用一个集中的公社组织来覆盖整个法国，这种公社组织并不依赖于外部的民主原则，而是植根于生产者的真正自治。

考茨基将苏维埃宪法当成是选举的多层次性的过错，而这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规定是矛盾的。马克思用下面这句话描述了法国工人形成的结构，他说：“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务；这些地区的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⁸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丝毫没有为选举的多层次性感到难为情，因为问题关乎无产阶级本身的国家组织。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下，选举的多层次性掩盖了政党间和阶级间的分界线。然而，在“生产者自治”，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之中，选举的多层次性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自治技术上的问题，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它可以表现出它在工会组织领域中含有的相同优势。

民主庸人对苏维埃宪法中表达的城市与乡村革命作用的差异中反映出来的工人与农民在代表权方面的不平等感到震怒。马克思写道：“公社体制是把农村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导之下，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⁹任务并不是在纸面上把农民提高到与工人等同的地位，而是要在精神上把农民提高到与工人相同的水平。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国家的所有问题都放在活生生力量的革命动态之中考虑，而不是放在代议制集市般的帷幕的阴影之上。

为了达到其精神衰退的最终极限，考茨基否认了工人苏维埃的国家合法性，理由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边界线。考茨基在社会分界线未定型这里看到了苏维埃专政横行霸道的根源。马克思对此说的正好相反：“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

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¹⁰公社的秘密在于，其实质乃是工人政权。马克思明明讲清了这一点，但这对考茨基来说仍是天书。

民主伪君子义愤填膺地讨论苏维埃政权的镇压，讨论报纸的关闭，讨论逮捕与枪决。马克思是这样回答“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和“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对公社进行的镇压的指责的：“凡尔赛方面从外部对巴黎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且还想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此种情况下，公社若是装作像在太平盛世一样，遵守自由主义那一套表面上温文尔雅的行为规范，岂不是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如果公社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是同一类政府的话，那么凡尔赛方面就没有理由查禁公社的报纸，而巴黎方面也就同样没有理由查禁秩序党的报纸了。”¹¹也就是说，考茨基以神圣的民主基础的名义要求的那些东西，早已被马克思打上了“背叛使命”的印记。

对于那些过去归咎于公社就像现在归咎于苏维埃政权那样的破坏，马克思将其称作“正在诞生的新社会与正在崩溃的旧社会之间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中不可避免和较为次要的伴生现象”¹²。破坏与残酷在任何战争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马屁精才会在“被奴役者反对奴役者的战争、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马克思语）认为它们是罪行。与此同时，我们的严酷指控者考茨基在他的整本书中，却对我们处于持续的革命防御状态、正在对世界奴役者发动一场激烈的战争——“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这一事实不予置评。

考茨基不止一次地为苏维埃政权在内战中使用了劫持人质的严酷手段而自我打脸。他又一次荒谬地比较残酷的苏维埃政权和

人道的公社，依旧牵强附会。马克思对此的回应明确而清晰：

“梯也尔从冲突一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杀公社方面被俘人员的人道做法，公社就不得不为保护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这些人质中已经接连有人因凡尔赛方面不断枪杀俘虏而丧命。在麦克马洪¹³的御用军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他们怎么还能再保住性命呢？”¹⁴我们与马克思一道想问一下，在内战的条件下，当反革命占领了同一国家的大部分领土，在所有可行的地方大肆抓捕并枪杀了手无寸铁的工人、他们的妻子和母亲时，还能怎样行动呢？除了把受资产阶级宠爱或信任的人当作人质，从而在整个资产阶级上空悬着连环互保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之外，还能怎样行动呢？从日复一日的内战史中不难看出，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所有残酷行为都是革命自卫的强制措施。我们不在此详述。但是，为了至少给评估斗争条件提供一个部分的标准，让我们回顾这样一点：当白卫军和他们的英法盟友一起，残杀每一个被他们俘虏的共产主义者时，红军却毫无例外地对所有的囚犯——包括最高级的军官都留了情。

马克思这样写道：“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总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他们那一套无知的陈词滥调和顽固的宗派主义谬论，口气俨如发布永无谬误的神谕一般。”¹⁵

即使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有时会以第二国际落后理论家的面貌出现，这也丝毫不剥夺这一胡言乱语的等级继续胡言乱语的权利。

注释：

[1]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是著名的革命机关报，于 1848 年 6 月 1 日至 1849 年 5 月 19 日在科隆出版。报纸的主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考虑到当时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仅仅是初步打击了专制主义，认为革命者接下来的任务是支持资产阶级的进步团体并齐心协力赢得政变的最大胜利。《新莱茵报》准备好了这项任务。然而，反动愈演愈烈，侵蚀了 1848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成就，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呼吁民众发动武装起义并建立公社委员会。1849 年，该报因其极具革命性而被停刊。——俄文版编者注

[2] 让·饶勒斯(1859—1914) 是法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和杰出的演说家。饶勒斯在加入社会主义运动之前经历了漫长的演进。饶勒斯一开始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一员，1885 年他们把他选进了众议院。1892 年他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并从工人中进入众议院。自 1902 年以来，他一直是法国社会党的成员，并且是其议会派系的领导人。饶勒斯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经常走机会主义路线。他支持米勒兰，尤为表现了机会主义倾向。米勒兰违背社会主义传统，冒着风险于 1899 年加入瓦尔德克—卢梭资产阶级政府。饶勒斯相信资产阶级社会逐渐民主化，赞同主要的改良主义思想。1904 年，饶勒斯成为法国社会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

(L'Humanité) 的编辑，直到去世。饶勒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同反动势力和军国主义斗争，为法国乃至国际工人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饶勒斯热切地寻求用民兵取代常备军并缩短兵役期限。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饶勒斯希望通过和平手段来阻止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与资本主义政府谈判，利用宣传和公众舆论压力。世界大战前夕，他被一名政府特工残酷杀害，后者害怕饶勒斯煽动反战情绪。饶勒斯在法国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奥古斯特·马里·约瑟夫·让·利昂·饶勒斯 (Auguste Marie Joseph Jean Léon Jaurès, 1859 年 9 月 3 日—1914 年 7 月 31 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93 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02 年参加了由

可能派和阿勒芒派合并而成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05年法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 SFIO）后，饶勒斯和盖德一起领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饶勒斯在一战爆发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试图组织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进行总罢工，以此阻止战争爆发，最后于1914年7月31日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郎（Raoul Villain, 1885—1936）暗杀。

[中译者补注 2] 德雷福斯事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上台后，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

[中译者补注 3] 皮埃尔·马里·勒内·恩斯特·瓦尔德克—卢梭（Pierre Marie René Ernest Waldeck-Rousseau, 1846年12月2日——1904年8月10日），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政治家。出身于律师家庭。1881—1882年任内政部长。1883—1885年第一次担任内政和宗教部长。1884年参与起草《瓦尔德克—卢梭法》，推动工会合法化。1885年暂时脱离政治活动。1886—1894年期间从事律师工作。1894年在补选中当选为参议员。1895年参加总统大选，但在第一轮选举中败选。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后，于1899—1902年任总理兼内政和宗教部长，在任期间下令重审德雷福斯案件，支持通过《结社法》，同时又积极镇压罢工，1900年出兵中国，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1901年镇压了阿尔及利亚人起义。1902年因病辞职。1904年去世。

[3]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53页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中译者注

[4] 同上，第 154 页。——中译者注

[5] 同上，第 143 页。——中译者注

[6] 同上，第 155 页。——中译者注

[7] 原文如此。——中译者注

[8]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第 155 页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中译者注

[9] 同上，第 157 页。——中译者注

[10] 同上，第 158 页。——中译者注

[11] 同上，第 164 页。——中译者注

[12] 同上，第 177 页。——中译者注

[13] 玛利·埃德姆·帕特里斯·莫里斯·德·麦克马洪，马坚塔公爵

(Marie Edme Patrice Maurice de Mac-Mahon, Duc de Magenta, 1808 年 7 月 13 日—1893 年 10 月 16 日)，法国军事家。1827 年入伍。1855 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9 年参加意大利第二次独立战争。1864—1870 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70 年参加普法战争，在色当战役中重伤被俘。1871 年获释后任法军总司令，并于同年 5 月率军镇压了巴黎公社。1873—1878 年任总统。1878 年被迫辞职，旋即退休。——中译者注

[14]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第 178 页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中译者注

[15] 同上，第 159 页。——中译者注

第七章 工人阶级及其苏维埃政治

俄国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并未被强行委托给西欧的老牌无产阶级及其强大的政治、工会组织和其沉重的代议制和工联主义传统，而是被委托给一个落后国家的年轻无产阶级。历史一如既往地选择了阻力最小的路线。革命时代从最不设防的大门中冲了出来。这给俄国无产阶级带来了非同寻常的、非一般人力所及的困难，并大大减轻了西欧无产阶级尚未到来的革命工作的负担，为它做好了准备，加快了它的速度。

考茨基非但没有以一种革命时代即将在全世界到来的角度来看俄国革命，反倒还在议论俄国无产阶级是否过早地夺取了政权。

他解释说：“群众中间的高标准的普及教育和高标准的‘道德’，乃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种道德不仅在有关团结一致、同情和自我牺牲的强烈社会本能和感情中表现指出来”，他还说，“我们曾经看到巴黎公社的无产者中间有力地显现出这种道德。而在那些主要构成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中则根本缺少这种道德。”¹

为了达到考茨基的目的，光是在他的读者跟前把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政党来诋毁是不够的。他知道布尔什维主义与俄国无产阶级已经融为一体，所以就试图诋毁作为整体的俄国无产阶级，把它说成是一个黑暗的、没有思想的、贪婪的群体，认为它凭当时的本能和训诫来行事。在整本小册子当中，考茨基多次回到俄国工人的智力和道德水平的问题上，每次都只是为了强调和凸显他们无知、愚蠢和野蛮的特征。为了增强反差，考茨基举出了公

社时期一家军工企业的工人代表强制要求一名工人在夜间值班以便能够在夜里递送要修理的武器的例子。“这个决定的原文如下：‘在目前情况下，绝对有必要尽量节约公社的每一分钱，所以不给夜间的值班人员报酬。’”于是考茨基就作出结论：“的确，这些工人并没有把他们的‘独裁’时间当作要求增加工资的凑巧时机。”²俄罗斯工人阶级就是另一码事了。它不够自觉性，思想上不够坚定、自制，没有准备好自我牺牲，等等。考茨基嘲讽说，它就像闵希豪森³没有能力用头发把自己从沼泽中拉出来那样，没有能力为自己选择合适的领导人。这种把俄国无产阶级和爱瞎扯的闵希豪森进行对比的手法，鲜明地体现了考茨基讨论俄国工人阶级时的语气。

他引用了我们个别的一些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谴责了工人环境里的一些消极现象——并试图主张说消极被动、黑暗与利己主义在1917—1920年间（即最伟大的这革命年代里）耗尽了无产阶级的生命。

考茨基好像不曾听说、不曾猜过也不曾假设内战期间俄国无产阶级不止一次地奉献自己的劳动；他们甚至还进行过“无偿的”值班——这样的无偿值班并非一个人在一个晚上的举措，而是数以万计的工人在无数个令人不安的漫漫长夜中的行动。在尤登尼奇进攻彼得堡的那数周里，光是苏维埃的一份电报就足以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城市里所有的工厂和街区中保持清醒、坚守岗位。这不是彼得堡公社刚成立那会儿，而是经过两年斗争以后，饥寒交迫的阴影笼罩在他们身上的那段时间。

我们的党每年都会动员两三次，把一大部分自己的成员派到前线上。在绵延不断的长达八千俄里的前线上，他们身先士卒，慷慨赴死。而当在饥寒交迫、把自己的工人精华都献给了前线的

莫斯科宣布了入党周的时候，仅在这一周内，无产阶级群众中就有 1.5 万新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是在什么时候？当苏维埃政权濒于灭亡的危机到达顶点的时候，当奥廖尔被占领，邓尼金逼近图拉和莫斯科，尤登尼奇威胁到彼得堡的时候，正是在这一最艰苦的时期里，莫斯科无产阶级仅花了一周的时间就向我们的党输送了 15000 名人员，而这 15000 人随时等待奔赴前线的新动员命令。可以肯定地说，除了 1917 年 11 月起义的那一周以外，莫斯科无产阶级从没有像在这些危急存亡的艰难时刻那样，在革命高潮中如此团结一致，为自我牺牲做好万分准备。

当我们的党提出义务星期六和义务星期天的口号时，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主义以志愿劳动的形式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先是几十、几百，然后是几千，现在则是几万、几十万的工人，每周都在为国家的经济复兴捐献劳动若干小时。而这一点，则是由半饥饿的、穿着破旧靴子和脏衣服的人完成的——这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鞋子，也没有肥皂。事实上，这就是考茨基为其订好了自我否定方针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如果我们在这里立即会想起，无产阶级中所有自私的、小市民的、粗鲁且贪婪的分子——所有这些逃避前线、逃避义务星期六、捣乱并煽动工人在饥饿的那几周里进行罢工的人，都在苏维埃选举中投票给了孟什维克，也就是投票给了俄罗斯的考茨基之流的话，那么这些事实及其之间的联系就会显得更加清楚。

考茨基援引了我们的话，在这段话里，我们甚至到十一月革命以前，就清楚地意识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缺少教育的事实，但因为认定政权将不可避免的过渡到工人阶级手中，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寄希望于斗争本身、其经验，并在其他国家无产阶级不断增强的支援之下，应对困难，并确保俄国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对这

一点，考茨基问道：“但托洛茨基是否想爬上火车头并开动火车，相信他会在中途学习和安排一切呢？……在你想开动一辆机车以前，你必须取得某种为驾驶机车所必须的技能。同样的，如果无产阶级想要担任这项任务，它也应当取得那些在组织和生产工作方面必不可少的技能。”⁴

这种教训人的比较如果是让任何的农村牧师来做，那倒是值得尊敬的。但这还是很蠢。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考茨基在没有学会稳稳地坐在马鞍上并在各种步态下驾驭马的四条腿之前，敢骑马吗？我们有理由认为，考茨基不敢进行这种危险的、纯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担心，考茨基如果不冒着风险上马，那就很难掌握骑马的本领。因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偏见恰恰就是：只有坐在马上，才能学会骑马。

5

要说驾驶机车的话，乍一看虽然没那么明显，但也不失为一个事实。没有人是坐在办公室里学会操作机车的。必须爬上机车，站在驾驶室里，握住必要的调节装置，并转动它。不错，有了老司机的教导，在机车里可以训练行驶；在有经验的骑手带领下，马匹也可以在赛场上动起来进行训练。但在国家管理领域，这样的人为条件是无法被创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也不会为无产阶级建立国家管理学院，也不会为他们提供国家杠杆，来进行一时的实验。而工人和农民既没有赛马场又没有骑手的协助，照样学会骑马。

对此，我们还必须补充另一个观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无产阶级没有选择上马还是不上马；没有选择马上夺取政权，还是放弃掉它。在某些条件下，工人阶级会被迫在整个历史时代的政治自我真空的威胁下掌握权力。一旦掌权，就不能任意

只接受其中的一些后果，而拒绝其他的一些后果。如果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为了夺回国家政权而故意作恶把搅乱生产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得不走向公有化的道路，而不管目前公有化是否有利。而在接管了生产以后，无产阶级被迫在钢铁般的必要性压力之下，通过经验本身来学习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艰苦工作。骑手一旦上了马，就被迫驾驭马匹，否则自己的头骨就会被压碎了。

* * *

为了让自己的虔诚拥趸“正确认识”俄国无产阶级的道德水平，考茨基在他的书中第 116 页（俄文版）引用了下面的这份委托书——好像是摩尔齐洛夫卡工人代表苏维埃颁发的：“苏维埃兹责成格雷戈里·萨列叶夫同志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命令，征发资产阶级和金融家阶级的已婚和未婚妇女六十名，并送往兵营，供驻扎在布良斯克县摩尔齐洛夫卡城的炮兵师之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六日。”⁶（《布尔什维克都在做些什么》第十页，由纳特·文希—马列叶夫博士出版，洛桑，1919）

我丝毫不怀疑这份文件的伪造性质以及整个报告的虚假性，但还是委托他人对此进行了全面调查，以了解哪些事实或事件可能构成这一捏造的基础。彻底的调查展示出了如下事实：

第一，布良斯克县绝对没有一个叫做摩尔齐洛夫卡市镇。临近的县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城镇。最接近的村庄名称叫作穆拉维耶夫卡，在布良斯克县。但那里不曾有过炮兵师，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与上述“文件”有关联的事情。

第二，调查人员也调查过炮兵部队的路线。没有一处发现像考茨基从他的鼓舞着那里引用的所谓事实的间接暗示。

最后，调查人员把目光放向了所有可能出现这类传言的地点。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也难怪，伪造的内容本身与指导苏维埃的先进工人与农民在性情与舆论方面有着过深的矛盾，甚至在最落后的地区亦是如此。

因此，该文件只可能被确认为低级伪造。只有那些出版花边小报的老奸巨猾的恶毒报社才会传播这种垃圾。

在刚才提到的调查仍在进行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同志交给我一份 1919 年 11 月 9 日的瑞典报纸《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其中转载了委托书的传真件：

任状

特此授权卡拉塞耶夫同志在叶卡捷琳城找一个 16—36 岁的少女进行公有化。

伊瓦舍夫总司令

这份文件比考茨基引用的那份更加愚蠢，更加厚颜无耻。据了解，苏维埃政权只曾很短暂地掌握叶卡捷琳诺达尔⁷——库班的中心。很明显，这份文件的作者不太清楚革命的年表，因此从中删除了日期，这样的话，就不会无意中出现“伊瓦舍夫总司令”在邓尼金的士兵统治叶卡捷琳诺达尔的时期下令对那里的妇女实行公有化的情况。这样的一份文件会勾引住呆头呆脑的瑞典资产阶级，是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但对俄国读者来说，这一切就很清楚了：这份文件不仅仅是伪造的，而且是由一个拿着词典的外国人伪造出来的。两位公有化女性的人的名字“格雷戈里·萨列叶夫”和“卡拉塞耶夫同志”听上去一点也不像是俄罗斯的人名，这倒是让人很好奇。“ЕеВ”极少作为俄罗斯人的名字结尾，只会出现在某些特定的组合。但是，这位揭发布尔什维克的人——考茨基提到的那本英文小册子的作者，其姓氏为文

希—马列叶夫。很明显，这位坐在洛桑的英籍保加利亚警察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形象脑补了“公有化女性的人”。

考茨基真是啥时候都不缺乏独树一帜的启发者和战友！

苏维埃、工会和党

在考茨基看来，苏维埃作为工人阶级的一种组织形式，“同比俄国先进的国家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相比较，并不是无产阶级组织的任何较高的形式，而不过是聊备一格的权宜之计。”⁸就让我们假设俄国的情况如此。但如果这样，为什么苏维埃在德国出现了？在艾伯特的共和国里，它们难道不应该完全不存在吗？然而，我们知道，考茨基最亲密的同志希法亭⁹曾提议将苏维埃纳入宪法。考茨基沉默了。

公开的革命斗争比代议制有多“原始”，对苏维埃是一个“原始”组织的评价就有多正确。但代议制的人造的复杂性使得它只能包含来自上层的、数量微不足道的人。而只有在群众能够被活生生地把握住的地方，革命才是可能的。11月革命让群众站了起来，而这是革命前的社会民主党做梦都想不到的。无论德国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德国范围有多广，革命的范围也一下子就比这些组织要广泛得无可比拟。革命群众在最简单的、最普及的代表组织——苏维埃中找到了自己的直接代表。我们可以承认，代表苏维埃在纲领的明确性和组织的正规性方面，不如政党和工会。但它在吸引参与群众有组织的斗争的人的数量上远远超过政党和工会，而这种数量上的优势使得苏维埃具有无可争辩的革命优势。苏维埃包含了所有企业、所有专业、所有文化发展水平、所有政治意识水平的工人，因而客观上也使自身不得不表达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

《共产党宣言》认为共产党人的任务恰恰在于表达工人阶级的共同历史利益。

按照《宣言》的内容，“共产党人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¹⁰运动本身以全方位的阶级组织苏维埃的面貌，把自己变成一个“整体”。从这里就很清楚，为什么共产党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苏维埃的领导党。

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苏维埃作为党的“替代物”的评价（考茨基）是错误的，为什么尝试用苏维埃作杠杆来补充和调节资产阶级民主机制（希法亭）是愚不可及的。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在作为权力斗争的机关，或作为工人阶级的权力机器时，是有意义的。

考茨基没能理解苏维埃的革命作用，把其最重要的优点看作是它们的根本缺陷。他写道：“资产阶级与工人¹¹的界线永远无法划分得很准确。在这种努力中，总会发生一些专断的行为，实际上使得苏维埃的观念特别容易变成纯粹独裁和专断统治的基础，而很少有助于建立并建成一个有系统的、鲜明的国家制度。”¹²

考茨基认为，阶级专政不可能为自己建立符合其性质的机构，这是因为阶级之间没有无可挑剔的分界线。但这点在普遍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中又是如何呢？恰恰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总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多种过渡阶段中看到反对阶级斗争的“原则”本身的主要论据。对考茨基来说，一旦无产阶级克服了中间阶级的无形性和不稳定性，把其一部分拉到自己身后，把另

一部分赶到了资产阶级的营帐里，并在苏维埃的国家体制中实际组织了自己的专政，原则性的疑惑就产生了。正是因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统治不可或缺的机器，所以它的框架是有弹性、灵活的。因此，不仅阶级和阶层关系的社会变化，它的政治变化也都能在苏维埃机器上找到无延迟的表达。苏维埃从最大型的工厂和车间开始，然后吸引作坊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加入自己的组织，再进入农村，组织农民反对地主，然后组织中下层农民反对富农。工人国家为自己挑出了许多职员，而这些职员主要来自资产阶级圈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被苏维埃体制培养了纪律性，所以在苏维埃系统也找到了自己的代表。随着无产阶级夺得的社会地位的扩大或缩小，苏维埃制度也会时而扩张，时而缩小，在其内部动态、潮起潮落、错误和成就中保持作为社会革命的国家机器。随着社会革命的最终胜利，苏维埃制度将会扩展到全人类，从而失去国家的特征，并溶解成生产和消费的强有力的合作制。

如果说党和工会是准备革命的组织，那么苏维埃就是革命本身的工具。苏维埃在胜利后，就会变成权力机关。党和工会的作用虽没有减弱，却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

总的领导被掌握在党的手里。它不直接进行管理，因为它的机器不适合这么做。但它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有表决权。此外，我们的实践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在所有的一般纠纷、部门冲突和部门内部的个人冲突中，党的中央委员会都拥有最后的话语权。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确保在最困难以及最混乱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必要的行动上的团结一致。只有在党的权威不容争议、党的纪律纯洁无暇的情况下，这样的制度才是可能的。对革命来说幸运的是，我们的党在这两点上都达到了相

同的水平。在那些过去未曾有过得到具有伟大战斗精神的强大革命组织的其他国家，到无产阶级进行政变的时候，是否会同样产生有权威性的共产主义政党，就很难预测了。但很明显的是，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这个问题。

共产主义政党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特殊作用是相当清晰的。这是一个关于阶级专政的问题。阶级内部有不同的分层，不一样的情绪，不同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专政的前提则是意志的统一、方向的统一和行动上的统一。还能有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专政呢？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前提就在于，在无产阶级本身之中，有一个处于政治领导地位的政党，而这个政党具有明确、有效的纲领和不容置疑的内部纪律。

党外联盟政策在本质上是与革命专政体制相悖的——我们在这里指的不是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因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是指共产党人和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结成联盟，而这些组织代表了劳动群众中不同程度的落后与偏见。

革命很快就会侵蚀一切不稳定的东西，磨坏一切人造物；在革命事件的压力之下，披着联盟皮的矛盾很快就会被暴露出来。这样的情形我们在匈牙利便可目睹。在那里，共产党人和经过重新粉饰的机会主义者之间联合起来，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这一联盟很快就瓦解了。共产党人很快就为其同路人的革命无力与政治背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很显然，如果匈牙利的共产党人晚一些上台，提前给左翼机会主义者一个彻底妥协的机会的话，这样会对这些共产党人更加有利。而这点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则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与机会主义者的联盟只是暂时掩盖住了匈牙利共产党人的相对弱点，同时也阻止了他们通过牺牲机会主义者来加强自身，并最终让自己走向了灾难。

俄国革命的例子充分描绘了同样的思想。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只持续了几个月，就以流血的破裂而告终了。不错，要为联盟买单的，不是我们共产党人，而是我们不忠诚的同路人。显然，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联盟中是最强的一方，因此试图在历史关口上利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并没有冒太大的风险，在战术上也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尽管如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一页清楚地表明，交易、妥协与互相让步的体制——也就是联盟体制，在一个形势变化极快、需要高度统一观点以便统一行动的时代下，是不可能长久的。

我们不止一次地被人指责用党的专政来替代苏维埃的专政。与此同时，我们完全有权利说，苏维埃的专政只有通过党的专政才有可能实现：党因为具有明确的理论意识，以及自身强大的革命组织，所以能确保苏维埃能够从劳动者的非正式议会转变为劳动者进行统治的机器。这种用党的权力来“替代”工人阶级权力的做法并不偶然，其本质上也不算替代。共产主义者表达的是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在历史将这些利益完全地安排好的时候，共产主义者成为公认的、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是完全自然的。

于是有些智者就要问我们了：“但是你们如何保证党表达了历史发展的利益？在将其他党派摧毁或赶入地下之后，你们已经消除了他们与你们的政治竞争，于是也剥夺了你们自我检查路线的机会。”

发表这种观点，是因为用纯粹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认识革命进程。在所有矛盾公开化，政治斗争迅速转变为内战的时候，除了发行孟什维克的报纸以外，有足够的物质标准来检验自己的路线。诺斯克在粉碎共产党人，但后者却在增长。我们镇压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他们则已经落荒而逃。这项标准已经能

充分检验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任务都不是测算一组方向的路线，而是确保我们的方向——革命专政的方向的胜利，并在向这一方向行进的过程中，在其内部摩擦之中，找到自我检查的充分标准。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工会运动的长期“独立”与联盟政策一样，都是不可能的。工会变成了无产阶级执政的最重要的经济机关。因而他们也就受共产党的领导了。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不仅要解决工会运动中的原则问题，还要解决其中内部的严重组织冲突。

考茨基分子谴责苏维埃政权是工人阶级中“一小撮人”的专政。他们说：“假设出现了专政，那它至少也应该是整个阶级的。”要理解他们在这块的想象并不容易。无产阶级专政，就其本质而言，意味着革命先锋队的直接统治，而这革命先锋队则依靠有份量的群众，并在必要时迫使其落后部分向最先进的部分看齐。这点同样也适用于工会。一旦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它们就有了强制的性质。它们必须掌握所有的产业工人。党的队伍中则仍然只包含那些最自觉、最具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只有在大型选拔之下，它才会扩大自身的队伍。因此，共产主义少数人在工会中的领导作用，与共产党在苏维埃中的统治地位相对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表达。

工会直接体现了社会生产。它们不仅表达产业工人的利益，也表达产业本身的利益。在第一个时期，工联主义的倾向不止一次地在工会中抬头，促使工会向苏维埃国家讨价还价，向它施加条件，并要求它为其提供保证。越往后，工会就越是会意识到自己是苏维埃国家的生产机关，并对苏维埃国家的命运负责——不是通过反对它，而是通过将自己与其视为一体。工会成为劳动纪

律的领路人。他们要求工人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工作，因为工人国家还没有能力改变这些条件。工会成为了革命镇压的领路人，来针对工人阶级中无纪律、放纵任性的寄生虫。工会，从某种程度上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会运动密不可分的工联主义政策，正在全线向着革命共产主义政策过渡。

农民政策

考茨基谴责说：“它们本来希望在农村中利用给最贫苦的农民以政治权利的办法来使有产农民丧失活动能力。现在他们却已经给与这些有产农民以某种程度的选举代表的权力。”¹³

考茨基列举了我国农民政策的外部“矛盾”，却没有质疑其总的方向，也没有质疑国家政治和经济状况中固有的内部矛盾。

在进入苏维埃制度的俄国农民里，存在着三个层次：贫农，主要靠出卖劳动力并购买食品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中农，用农场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以有限的数量出售剩余产品；上层，即富农，“库拉克”，他们系统性地购买劳动力，并广泛地出售农产品。不需说，这些分组在全国范围内即没有特别的定义表征，也都没有同质化。然而，总的来说，贫农是城市无产阶级天然的、不容争辩的盟友，富农同样是不容争辩、不可调和的敌人，而最广泛的中农，则表现出最大的犹豫不决。

倘若国家未曾如此衰竭，无产阶级能够向农民群众提供必要数量的商品和文化产品，那么农民中的大多数劳动者接受新体制的过程就会更加无痛。然而，国家的经济失调，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土地或者粮食政策，而是由于在此之前产生的因素——它使城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失去了向农村提供纺织和金属产品、殖民地商品等等的可能性。同时，工业无法拒绝从农村收集哪怕是最低

数量的粮食。无产阶级要求农民拿粮食作为预付费，要求以仅仅以它打算创造的价值来进行合理的借款。这些未来价值的符号就是已经贬值到极点了的信用证章。但农民群众不太擅长历史的抽象概念。农民由于清算了地主剥削，与苏维埃政权联系到了一起，并在其中看到了防止沙皇专制复辟的保证。但同时，他们却往往反对粮食的收集，认为只要自己不能够收到棉布、钉子和灯油，那就是做了亏本买卖。

苏维埃政权自然首先要把粮食税加到农村里的上层人士身上。但在农村里社会条件尚未成型的情况下，更加习惯于让中农跟着自己走的、具有影响力的富农处心积虑逃避粮食税，把它转移到更加广大的农民群众身上，同时使他們与苏维埃政权敌对。有必要促使底层贫农怀疑和敌视上层富农。贫农委员会就起到了这一作用。他们在底层形成，是一群旧时代里被压迫、被排挤到角落里、被剥夺了权利的分子。当然，在他们中间也有一定数量的半寄生分子。这一点成为了民粹“社会主义者”蛊惑人心的主要动机，这些人的演讲在富农的内心里回荡起了赞赏的回声。但把权力交给农村里的富农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意义。为了领导农村半无产者，党从城市里派出了先进工人，到农村完成了宝贵的工作。贫农委员会成为了反对富农的打击性机关。因此，他们借助国家权力，不仅迫使农民的中间阶层在苏维埃政权和地主政权之间做出了选择，同时也在无产阶级与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的专政、富农的恶势力之间做出了选择。在一系列教训（其中有些非常残酷）中，中农发现自己被迫承认这样的事实，即赶走了地主和县警察局长的苏维埃政权同样也让农民背负起了新的义务，并要求他们做出牺牲。对数千万中农的政治教育并不像学校课堂教育那样轻松顺利，也没有立即产生无可争

辩的结果。中农发动过叛乱，与富农结盟，并无一例外地拥护白卫军—地主的领导；在苏维埃政权的地方代理人，特别是贫农委员会那里，也产生过滥用职权的行为。但主要的政治目标实现了。强大的富农即使没有被完全消灭，也已经被深深地震撼到了，被砍去了自我意识。中农虽然在政治上仍然模糊，就像它在经济上模糊一样，但已经习惯于在先进工人身上看到自身的代表了，就像之前他们在流氓富农身上看到的那样。一旦这一基本结果达成，作为临时机构、打入农村群众的尖锐楔子的贫农委员会，就必须让位于苏维埃，而在这个苏维埃里，贫农和中农都选派了自己的代表。

贫农委员会存续了大概六个月——1918年6月到12月。在它们的建立与废除之中，考茨基只看到了苏维埃政策的“摇摆不定”。与此同时，却丝毫不见他自己的实际指导。况且从何而来呢？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是未曾有过先例的，苏维埃政权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在书中也找不到处方。考茨基所谓政策上的矛盾，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在松散的、未分化的农民人群中进行的积极的灵活应变。帆船必须在风中灵活机动，但没有人会觉得为了达到目的地而进行的机动之间会存在着什么矛盾。

在农业公社和苏维埃农场的问题上，人们也可以数出许多“矛盾点”，这些矛盾与个别错误一起，表达了革命的不同阶段。苏维埃国家在乌克兰应该为自己保留多少土地？应该给农民多少土地？应该为农业公社设立个什么方向？应该给予它们什么形式的支持，以免它们成为寄生虫的苗圃？应该用什么方法来保证对它们的控制？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创造的全新任务，它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未曾提前解决过，而且在解决它们的过程中，原则、纲领性的路线还没能找到自身的实际应

用以及自身的经验检验，只能经历不可避免的、暂时性的左右偏差。

但是，就连俄国无产阶级在农民中找到了支持这一件事，考茨基也要倒打一耙：“这给苏维埃体制带来了经济上的反动因素，而巴黎公社却幸免于难（！），因为它的专政并不以农民苏维埃为基础。”

说得就好像我们确实可以通过武断地抛弃“经济上的反动因素”来继承封建—资产阶级制度一样！但这还不够。农民用“反动因素”毒害了苏维埃政权，使我们失去了它的支持。它现在“憎恨”布尔什维克。考茨基是从克里蒙梭的广播和孟什维克的发言稿中得知这一切的。

广大农民确实因缺乏必要的工业产品而遭受了损失。但同样正确的是，在所有其他体制下（在过去三年里，俄罗斯不同地区存在过许多的体制），农民肩膀上的负担无可比拟地重得多。无论是君主政府，还是民主政府，都没办法增加商品的库存。而它们也都需要来自农民的粮食和马匹。为了执行自己的政策，资产阶级政府，包括孟什维克考茨基之流的政府，利用了纯粹的官僚机器，比起工农组成的苏维埃机构是直接无视农民经济上的需要。因此，尽管中农摇摆不定，产生过不满甚至进行过叛乱，但归根结底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现在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有多么困难，也都要比在其他体制下遇到的困难小得多。公社在农民的支持下“幸免于难”，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公社并没有因为梯也尔农民军队的消灭而幸免于难！我们的军队有五分之四来源于农民，他们满腔热血为苏维埃共和国而战斗，战果丰硕。仅凭这一个事实，就反驳了考茨基和那些启发了他的人，最恰当地评价了苏维埃的农民政策。

苏维埃政权与专家

考茨基说：“布尔什维克起初认为没有‘知识分子’、没有专家也能照样生活下去。”¹⁴但后来，他们确信知识分子是重要的，就从残酷的镇压转到了用一切手段，比如用高工资来招募知识分子。考茨基嘲笑道：“所以，托洛茨基的意思是说，把这些知识分子变成公务员和社会化的领导人员‘必要的因而是正确’的方法，是首先无情地把他们踩在脚底下。”¹⁵正是如此。在所有市侩庸人的同意之下，无产阶级专政恰恰包括“蹂躏”以前的统治阶级，迫使他们承认和服从新制度。受资产阶级培养的专业知识分子，以为自己是全知全能的，长期以来不会相信、不愿相信也不能相信工人阶级真的有能力管理国家，不会相信、不愿相信也不能相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非偶然性，不会相信、不愿相信也不能相信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因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其容易包揽工人国家的义务，甚至在开始为工人国家服务的时候也是如此，并认为在无产阶级的体制下接受威尔逊、克里蒙梭或米尔巴赫¹⁶的钱进行反苏鼓动，或将军事机密及技术手段交给白卫军和外来帝国主义者是再自然不过和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以实际行动向这些人强烈表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不是为了让他们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开这种玩笑的。

在对知识分子的严厉惩罚中，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看到了“争取知识阶级不是通过提高人们的觉悟，而只是通过即从前面又从后面拳打脚踢的办法”¹⁷产生的后果。也就是说，考茨基是严肃地认为，在所有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仍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时候，而这些资产阶级又不惜一切代价威逼利诱俄国知识分子，使之成为殖民奴役俄国的工具时，仅靠说服就可以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主义建设。

考茨基没有分析斗争的进程，而是在和知识分子有关的方面给出了学究式的处方。如果说我们的党认为没有知识分子也照样活得下去，没有意识到知识分子对我们面前的经济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性，那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当工人阶级如火如荼地为夺取并巩固政权而进行斗争的时候，当大多数知识分子充当资产阶级突击队，与我们公开作战，或者破坏我们的机构的时候，苏维埃政权毫不留情地与专家作斗争，正是因为知道了他们的巨大组织意义——他们不是在试图建立独立的“民主”政治，而是在执行主要阶级的任务。只有通过严酷斗争击溃知识分子的抵抗，吸收专家进行工作的机会才会出现。我们也立即就走上了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并不容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过的工人与厂长、抄写员与经理、士兵与军官之间的关系，留下了对专家在阶级上最深刻的不信任作为遗产，而这种不信任在内战的第一个时期则变得更加尖锐——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惜以寒冷和饥饿来摧毁工人的革命。要克服这些情绪，从疯狂的残酷转为和平的合作并不容易。工人群众必须逐渐地习惯把工程师、农学家、军官看作是现在有用处的职员、工人和农民政权必需的专家，而不是过去的压迫者。我们已经说过，考茨基把用无产阶级取代专家的原则倾向强加给苏维埃政权，是错误的。但这种倾向在无产阶级的广大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点不容争辩。这个年轻的阶级已向自己证明，它可以克服自己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已经撕碎了围绕着有产者政权的神秘面纱，已经确信上帝是不会烧制陶锅的——这个革命阶级在自己不太成熟的分子的面貌下，自然倾向于在初期高估自己的能力，认为不借助资产阶级教育过的专家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由于这种倾向具有成型的性质，我们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与它进行斗争的。

我们在 1918 年 3 月 28 日的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讲过：“现在，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以后，要进行反对破坏的斗争，就必须把昔日的破坏者变成今日的仆人、执行者，变成服务于新体制的技术管理人员。如果我们克服不了这点，如果我们不吸收我们所需的一切力量并让它们为苏维埃服务，那么我们与昨日与破坏的斗争、军事革命的斗争，就彻底化为无用功。”

“在这些技术人员、工程师、医生、教师、旧军官身上，就像在毫无生命的机器上那样，投入了我们众所周知的国民资本，而如果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有责任开发、利用这些资本。”

“民主化根本不是要取消熟练力量的意义，不是要取消具有专业知识的个人的意义，也不会要用各地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来替代掉他们——这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学前知识。”

“这些选举出来的委员会由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代表组成，但他们缺乏必要的技术知识，不能够取代一个上过专门学校、知道如何做某项特殊工作的技术员。我们在各个领域中都看到了的集体制的涌现，这些完全是年轻的、革命的、昨天还在被压迫着的阶级的自然反应，他们拒绝昨天的地主和指挥官的长官独裁制，并把选出来的代表放在各个地方。我要说，这是一种完全自然的、来源上完全健全的革命反应。但这并不是无产阶级经济国家建设的最后一步。”

“下一步应该是集体领导的自我规制，这是对工人阶级来说健全的、有益的自我规制。这一工人阶级知道工人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在哪里具有决定权，而在哪里又必须安排具备专业知识的技

术员与专家——我们需要让这些技术员与专家担负重任，并必须对他们实行警惕性的政治监管。但是，我们必须尽可能让专家自由活动、自由创造，因为任何有能力、天赋的专家在自己的领域里都不可能在一群外行人的压服下进行工作。政治上的、集体的、苏维埃的控制无处不在，但对于起执行作用的职务来说，必须任命专业技术人员，把他们安排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并且使他们担负起这个责任。”

“那些害怕这点的人，便是不自觉地在内心里强烈怀疑苏维埃体制的人。如果有人认为吸收昨日的破坏分子担任技术领导的专业职务会动摇苏维埃体制的基础，那么他就没有意识到，苏维埃要是被绊倒，不是因为某个工程师或旧将官（在政治、革命和军事方面，苏维埃体制都是不可战胜的），而可能是因为应付不了创造性的组织任务。”

“它需要从旧机构那里提取出一切富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其全部用于新的工作上。”

“同志们，我们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将无法应付我们的主要任务，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抛弃过去积累的一切而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之中找到所有必要的专家人士。”

“从本质上讲，这就相当于是说，我们现在要把所有那些迄今为止用于剥削工人的机器全部扔掉。这种做法就太没脑子了。对我们来说，吸收那些受过教育的专家就和接收并登记所有的生产和运输工具以及整个国家的所有财富一样重要。我们必须尽快登记我们拥有的所有专业技术人员，使他们接受劳动义务，同时给予他们广泛的活动空间，并将他们置于政治监管之下。”

最尖锐的专家问题，从一开始就出现在军事部门内。在这里，在钢铁般必要性的压力下，它首先得到了解决。

在工业和运输的管理领域，必要的组织形式迄今为止远未完全实现。我们必须从以下事实中寻找原因：在头两年里，为了军事防御，我们被迫牺牲工业和运输的利益。内战的极度动荡反过来又阻碍我们与专家建立合适的关系。有资质的工业和运输技术人员、医生、教师和教授要么随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军队撤退而离开，要么被这些军队掳走。只有现在，在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知识分子才会大量地与苏维埃政权和解，或向它俯首称臣。经济任务被提上首要的日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学的生产组织。专家将会拥有一个巨大的工作空间，被赋予了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必要的独立性。全国的工业领导权都集中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手中。

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政策

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权，是因为他们在俄罗斯的一切政党中是最努力要求和平的一个政党，这是一种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的和平，甚至是局部的和平。他们没有凭空为了由此可能产生的总的局势担忧，也不管这是否会帮助的意志黠武君主国取得胜利和获得世界霸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自行担任德意志军国主义者的雇佣兵，像印度或爱尔兰起义者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一样。”¹⁹

关于我们胜利的原因，考茨基只知道一个：我们支持和平的口号。他没有解释，当苏维埃政权再次动员帝国主义军队的相当一部分士兵，在两年里成功地击退自己的政治敌人时，它又在坚持着什么。

和平口号无疑在我们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正是因为该口号是针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最鲜明地支持和平口号的不是疲惫不堪的士兵，而是先进工人，对他们来说，这口号并不意味着休息，而是意味着与剥削者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正是这些喊着和平口号的工人们，后来在苏维埃的前线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声称我们要求和平而不关心它对国际局势的影响，是立宪民主党人一孟什维克式诽谤迟来的翻版。把我们将印度和爱尔兰的亲德民族主义者相提并论，是在为“德帝国主义实际上就像利用印度人和爱尔兰人那样在试图利用我们”的说法寻找基础。但是，法国的沙文主义者也在竭力利用李卜克内西²⁰和卢森堡²¹（甚至还有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整个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允许自己被利用？我们的行为是否给欧洲工人哪怕是一丁点将我们与德帝国主义看作一体的理由？只要回顾一下布列斯特谈判的过程，会谈的破裂和1918年2月德国的攻势，就足以充分暴露考茨基这种指责的厚颜无耻之处。事实上，我们与德帝国主义的媾和在事实上未曾存在过一天。在乌克兰和高加索前线，我们以我们虚弱到极点的力量进行着不公开的战争。我们太弱了，无法在整个战线上维持俄德战争，我们暂时维持着虚假的和平，利用德国主力部队被调到西线的情况。如果说德帝国主义在1917—1918年仍然足够强大，以便在我们做了为打破这一绞索而进行的一切努力之后把《布列斯特和约》强加给我们，那么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可耻行为。考茨基仍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14年8月4日就已经预先决定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出现。考茨基不仅当时没有向德帝国主义宣战——就像他后来要求苏维埃政权去做的那样，而

苏维埃政权到 1918 年在军事上仍是无力的——之后还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而且他那段时间让许多人在几个月时间里不得不搞清楚他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战争。而这个在决定性时刻放弃了社会主义基本立场的政治懦夫，竟敢指责我们在某个时刻被迫退却（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而是在物质上）；而我们为什么要退却？因为我们被深受考茨基之流腐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出卖了，也就是说，被理论伪装过的政治消沉给出卖了。

我们不关心国际形势？！事实上，我们对国际形势有着更加深刻的标准，而这一标准没有欺骗我们。早在二月革命以前，作为战斗力的俄国军队就已经不存在了。它注定会走向崩溃。如果没有发生二月革命，沙皇专制就会与德国君主制达成交易。但二月革命挫败了这一交易，这正因为它是一场革命，彻底破坏了基于君主制原则的军队。不论它发生在一月还是三月，军队都会变成一盘散沙。克伦斯基的军事政策就是鸵鸟政策。他对军队的瓦解视而不见，侃侃而谈，用话语威胁德帝国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一个出路：站在和平根基上，把它当作是革命军事无能状态下的必然结论，并把这个口号变成对欧洲所有人民产生革命影响的工具；也就是说，我们不和克伦斯基一起被动地等待可能埋葬革命的最终军事灾难，而是要掌握住和平的口号，引导欧洲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奥地利、德国的工人——来支持这一口号。我们从这一观点出发跟同盟国谈判了，并本着同样的精神起草了递交给协约国政府的备忘录。我们尽可能地拖延谈判，以便使欧洲的工人群众能够理解苏维埃政权及其政策的含义。1918 年在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的一月罢工表明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这次罢工是德国革命的第一个重要先声。德帝国

主义意识到，正是我们给他们带来了这一致命危险。这在鲁登道夫的书中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不错，他们已经不再冒险对我们进行公开的十字军东征了。但是，在他们能够秘密地与我们作战的地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能够欺骗德国工人的情况下，他们就这么做了——在乌克兰、顿河还有高加索地区。在俄国中央地区，在莫斯科，米尔巴赫伯爵从到来的第一天起就与针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阴谋密切相关，就如同越飞同志²²在柏林与革命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那样。德国革命的极左派，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政党，一直与我们携手并进。德国革命立即采取了苏维埃的形式。尽管有《布列斯特和约》，德国工人阶级也从未怀疑我们是与李卜克内西而不是与鲁登道夫站在一起。1919年11月，鲁登道夫于国会委员会作证的证词提到：“最高统帅部要求建立一个机构，其任务是揭示德国革命倾向与俄国之间的关系。越飞到了柏林，俄国在许多城市也设立了领事机构。这对陆军和海军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考茨基却以可悲的勇气写道：“如果说这个军事独裁政府没有获胜，结果发生了德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当然是并不对此负责的。”²³

倘若我们甚至在1917—1918年有机会通过克制革命来为旧的沙皇军队提供支持而不是加速它的毁灭的话，那么我们就只是在帮助协约国，用我们的同流合污来掩盖住它对德国、奥地利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强盗性摧残。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政策，在决定性的时刻就会发现自己在协约国面前完全是赤手空拳的，甚至比现在的德国还要去武装化。同时，由于十一月革命和《布列斯特条约》，我们现在是唯一手握步枪对抗协约国的国家。我们不仅没有通过我们的国际政策帮助霍亨索伦统治世界，正相反，我们通过十一月革命，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为了他的

垮台而做准备。同时，我们在自己身后确保了战争的间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创造了拥有无数人的强大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所有协约国的链下恶犬都没办法对付它。

我们的国际形势最关键的时刻是 1918 年的秋天，德国军队解体之后。在我们面前已经不是两个或多或少互相制衡的强大阵营，而是处于世界力量顶峰的得胜了的协约国以及已经被击垮的德国，其容克渣滓认为，为了从克里蒙梭的厨房里得到一块骨头而紧紧抓住俄国无产阶级的咽喉是令人幸福而光荣的。我们向协约国提出过和平提议，并再次准备签署最苛刻的条款，因为我们是被迫这么做的。但是克里蒙梭——其人的小资产阶级愚昧仍然在其帝国主义掠夺中保持着所有力量——拒绝给容克骨头，并且同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用苏维埃俄国领导人的头皮来装饰荣军院。克里蒙梭用这一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不小的帮助。我们捍卫了自己，并坚持下来了。

在苏维埃政权的头几个月里，欧洲资本主义政府暴露出自己仍有相当大的稳定性的时候，我们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恰恰是考茨基困惑不解而现在偶然领会到的：坚持下去！我们都很清楚地意识到，苏维埃政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事件。而这种意识决定了我们的让步和一时的退缩——不是原则上的，而是我们在对自身力量的冷静评估中得出来的实际的结论。我们退却，就像一支军队向敌人割让城池乃至要塞，以便撤退并集中精力。这不仅仅是为了防卫，也是为了进攻。我们退却，就像是一群如今已经筋疲力尽的罢工者，但这些罢工者咬紧牙关，为新的斗争做准备。倘若我们不是对苏维埃专政的世界意义抱有坚不可摧的信念，就不会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做出那最沉重的牺牲。倘若我们的信仰被证明为与事物的实

际进程相反，《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就会作为一个注定失败的政权进行的无用投降而被载入史册。不仅是库尔曼²⁴，所有国家的考茨基也都以这种方式评价了局势。但我们评估当时的弱点和未来的实力时都是正确的。艾伯特共和国，拥有普选权、代议权、议会舞弊和出版“自由”，谋杀工人领袖，只不过是奴役与卑劣的历史链条上的又一个环节。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是一个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意义的事实。有必要把它坚持下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垃圾场、尚未结束的帝国主义战争、霍亨索伦匪帮自以为是的厚颜无耻、世界资产阶级在革命基本问题上的愚蠢、美国和欧洲的矛盾、协约国内部关系的混乱——有必要驾驶未完工的苏维埃大船越过汹涌的波涛，穿越在礁石之间，并在这个过程中将其完工，并为它装上装甲。

考茨基决定重复指责我们在1918年初没有手无寸铁地对付强大的敌人。倘若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就会被打败。²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就会失败。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将受到沉重的打击。协约国会在俄国革命的尸体上与霍亨索伦媾和，世界资本主义反动派还能苟活若干年。考茨基说我们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没有考虑它对德国革命命运的影响时，他是在进行可耻的诽谤。我们从各方面讨论过这个问题，而我们的唯一标准就是世界革命的利益。我们的结论是，这种利益要求世界上唯一的苏维埃政权继续存在。而我们是对的。但考茨基即使没有迫不及待，也是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我们倒台，他把自己的整个国际政策都建立在这种预想中的倒台之上。

鲍威尔内阁²⁶公布的1918年11月19日联合政府的会议记录指出：“首先，继续讨论德国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态度。哈泽²⁷建议采取拖延的政策。考茨基与哈泽一道：有必要推迟决定，苏

维埃政府不会坚持太久，它将不可避免地在几周内垮台”……因此，在苏维埃政权的处境确实及其艰难——德军国主义的失败似乎为协约国创造了“在几周内”解决掉我们的充分机会——的时候，考茨基不仅没有急着来援助我们，甚至也没有金盆洗手，而是积极参与出卖革命俄国。为了使谢德曼更容易地扮演资产阶级的门卫而不是其“纲领”中写着的“资产阶级掘墓人”的角色，考茨基本人也急于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掘墓人。但苏维埃政权还活着。它将比自己所有的掘墓人还要长寿。

注释：

[1]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3页。——中译者注

[2]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9页。——中译者注

[3] 闵希豪森男爵是臭名昭著的小说《闵希豪森男爵历险记》的作者。由于闵希豪森男爵在描述他传奇般冒险经历中自吹自擂，他的名字成为了所有吹牛者和骗子的代名词。——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闵希豪森男爵（Baron Munchausen）是由德意志作家鲁道夫·埃里希·拉斯佩（Rudolf Erich Raspe, 1736—1796）创造的一个虚构人物，其原形是希罗尼姆斯·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闵希豪森（Hieronymus Karl Friedrich von Münchhausen, 1720—1797）男爵。这个人物的特点是嗜好对自己的冒险经历进行可笑而又夸大的吹嘘。

[4]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0页。——中译者注

[5] 对于这一点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注解，就是当今世界也没几个国家可以在不学习实际操作的情况下颁发某种交通工具的驾驶执照……——Uni

[6]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

129 页，有改动。——中译者注

[7] 现克拉斯诺达尔市。——中译者注

[8]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53—54 页。——中译者注

[9] 希法亭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1909 年出版著名著作《金融资本》。列宁认为：“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中译者注：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序言。]战争期间，希法亭是温和的反对派，与德国独立的社会民主党考茨基一起领导德国独立社民党。1920 年 10 月，在哈雷党代会的分裂中，希法亭处于右翼少数派，该派别拒绝与共产党合并。自 1922 年他的政党与谢德曼派合并后，希法亭极大右倾化，现在他已经光荣地成为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1923 年底，先前反对社民党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希法亭，成为了施特雷泽曼联合政府的财政部长。施特雷泽曼政府旨在将资产阶级从迫在眉睫的革命中拯救出来。自次年夏天，希法亭开始编辑新的杂志《社会》(Gesellschaft)。这本杂志直观展现了希法亭的变节和从理论上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拒绝。——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古斯塔夫·恩斯特·施特雷泽曼 (Gustav Ernst Stresemann, 1878 年 5 月 10 日—1929 年 10 月 3 日)，1903 年参加民族自由党，1917 年任该党主席兼国会党团主席。一战期间积极支持战争，1918 年 12 月主持成立德意志人民党，1923 年 8 月 13 日—1929 年 10 月 3 日任外交部长，1923 年 8 月 13 日—1923 年 11 月 30 日任总理。

[中译者补注 2] 希法亭的社会主义“前科”和他犹太人的身份使他不得不在希特勒上台后逃亡。然而 1941 年他仍没有逃出盖世太保的魔掌。这位写出时人称为“《资本论》第四卷”的《金融资本》的经济学家，后来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忠犬，最终还是被纳粹的铁拳压扁在巴黎的地牢里。

[10] 《共产党宣言》第 2 小节——中译者注

[11] 中译本为“中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中译者注

[12]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28 页。——中译者注

[13]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62 页。——中译者注

[14]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43 页。——中译者注

[15]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44 页。——中译者注

[16] 米尔巴赫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会后的德国驻俄罗斯使团团团长。1918 年，他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尼古拉·安德烈耶夫和雅科夫·布柳姆金杀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明白签订充满了奴役俄国的条件的布列斯特和约是历史中的迫不得已，而试图通过杀死米尔巴赫来破坏它。——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尼古拉·А·安德烈耶夫（Николай А. Андреев，1890—1919），出生于敖德萨，1918 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7 月 6 日暗杀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随后逃往乌克兰。1919 年因斑疹伤寒去世。

[中译者补注 2] 雅科夫·格里格列维奇·布柳姆金（Яко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люмкин，1900 年 3 月 12 日—1929 年 12 月 12 日），二月革命后加入了社会革命党。1918 年 5 月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加入契卡。1918 年 7 月 6 日参与刺杀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事后逃往乌克兰，并试图刺杀德国驻乌克兰占领军司令艾希霍恩元帅，但未果。1918 年 12 月—1919 年 3 月任左派社会革命党基辅地下党委书记。1919 年 3 月被俘。1919 年 4 月向基辅契卡自首，被判处死刑，后被赦免，随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 年起任第 79 旅指挥官，后出任托洛茨基的秘书。1920—1921 年任第 79 旅参谋长。1923 年秋天进入苏联外交部。1924—1926 年任格别乌驻高加索地区代表，参与了在格鲁吉亚镇压孟什维克叛乱的行动。1926 年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西藏和印度代表，1926—1927 年担任冯玉祥的军事顾问。1927 年被召回莫斯科。1928—1929 年任苏联驻君士坦丁堡代表，

期间与托洛茨基秘密建立联系。1929 年被捕，11 月 3 日被判处死刑，12 月 12 日遇害。

[中译者补注 3] 威廉·马里亚·特奥多尔·恩斯特—理查德·格拉夫·冯·米尔巴赫伯爵 (Wilhelm Maria Theodor Ernst, Richard Graf von Mirbach-Harff, 1871 年 7 月 2 日—1918 年 7 月 6 日), 德国外交官, 1918 年 4 月任德国驻苏俄大使, 参与了德国与苏俄在布列斯特的谈判。1918 年 7 月 6 日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暗杀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的信号。——俄文版编者注

[17]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45 页。——中译者注

[18] 《劳动、纪律、秩序将拯救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Труд, дисциплина, порядок спасут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Советск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莫斯科, 1918 年。考茨基知道这一本小册子, 因为他引用了它好几次。然而, 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忽视掉上面引用的阐明苏维埃政权对知识分子态度的部分。——作者注

[19]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43 页。——中译者注

[20] 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因其在战争期间的英雄行为而名垂青史。他一贯忠于国际主义，在国会的一次会议上投票反对战争贷款，这与社会民主党议会派系的相对决议背道而驰。李卜克内西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决裂，组织革命的斯巴达克斯同盟 (Spartakusbund)，让广大工人群众开展斗争反对社会民主政策，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示威游行，大力鼓动无产阶级公开反对资产阶级容克政府。战争动员开始后，李卜克内西仍没有停止在士兵中的反战宣传。结果，他被捕并被判处两年半的苦役，但仍设法与德国工人阶级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保持联系。十一月革命使李卜克内西获释，并使他领导在德国组织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工人群众运动。李卜克内西热情地将这个政权称为“第一个双手老茧的政府”。1919 年 1 月，以谢

德曼、诺斯克为首的反革命势力重创斯巴达克斯运动，斯巴达克斯同盟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谢德曼的流氓残忍杀害。——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威廉·马丁·菲利普·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李卜克内西（Wilhelm Martin Philipp Christian Ludwig Liebknecht，1826年3月29日——1900年8月7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他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

[21] 罗莎·卢森堡（1870—1919），波兰和德国著名的社会民主运动的活动家，多次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大会。著有许多杰出著作，比如《波兰工业的发展》《资本积累论》。罗莎·卢森堡始终站在国际社会主义的左翼。伯恩斯坦主义和米勒兰主义把卢森堡看作意识形态方面的死敌。自1907年以来，她完全为德国工人运动工作。她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激进派别上，领导左翼激进团体，与党内新生的机会主义错误倾向不懈斗争。她第一个赞赏俄国1905年革命（“总罢工”）的教训，试图将其灌输到德国工人的意识中，并在许多问题上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即使在战争前夕，也就是1913年，她因发表反对军国主义的言论而被判入狱一年。她在战争期间是热心的国际主义者，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志同道合，和他一同创建了“斯巴达克斯同盟”。1916年，她被捕入狱。然而，她在监狱中并没有停止鼓动和宣传工作。她秘密发送小册子、传单和反战号召。在狱中，她以“尤尼乌斯”为笔名撰写了著名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在这本小册子里，她在理论上预测了第二国际的彻底解体和第三共产国际的建立。1918年11月革命后，她与李卜克内西一起成为工人阶级共产主义团体的领袖，为夺取政权和向苏维埃制度的过渡做准备。1919年1月，谢德曼政府的军队重创斯巴达克斯同盟，卢森堡被德国军官杀害。——俄文版编者注

[22]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是一位老社会民主党人，前孟什维克。1917年，他加入了俄共（布）。他积极参加了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参与并完成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1918年任苏联第一任驻德大使。

1920年与波兰进行和平谈判，签订《里加条约》。他一直从事外交工作。
——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1883年10月1日—1927年11月16日），出身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在1908年至1912年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与托洛茨基合编《真理报》。1912年回国后被捕，被监禁10个月，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在八月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德国进行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长。1921—1925年间活跃于外交界，曾多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国。1925年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当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越飞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而自杀。

[23]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2页。——中译者注

[24] 库尔曼，德帝国主义政府外交部长，领导了德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里夏德·冯·库尔曼（Richard von Kühlmann，1873年5月3日—1948年2月16日），1906年任德国驻荷兰公使。1916—1917年任驻土大使，1917—1918年任外交大臣。任上参与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和《布加勒斯特和约》的谈判。一战后退休。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变”而被捕。二战后获释。

[25] 维也纳《工人报》将俄国共产党人与奥地利人进行了对立，把后者说成是理智的。该报写道：“难道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有清晰的想法和认识的托洛茨基，因为迫不得已的《布列斯特和约》会起到巩固德帝国主义的作用而没签署它吗？《布列斯特和约》与《凡尔赛和约》一样残酷和无耻。但这是否意味着托洛茨基必须敢于继续与德国的战争？俄国革命的命运岂不是早就结束了吗？托洛茨基向无法阻止的必要性低头，并在预期

了德国革命的情况下签署了可耻的条约。”预见《布列斯特和约》所有后果的功劳属于列宁。但这当然不会改变维也纳考茨基式报纸的论点内容。——俄文版编者注

[26] 鲍威尔政府在德国谢德曼政府于 1919 年 6 月 21 日辞职后成立，一直持续到 1920 年 2 月 27 日。它包括社民党的多数派和中间派。[中译者注：谢德曼实际于 3 月 26 日辞职。]——俄文版编者注

[27] 哈泽是前独立党的领导人之一。战前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任主席（首任主席是倍倍尔）。在战争期间他成为社会民主党温和反对派的领袖。革命后，他是六个所谓的人民代表之一。哈泽后因遭到蓄意谋杀，伤重不治而去世。——俄文版编者注

第八章 劳动组织的问题

苏维埃政权与工业

如果说在苏维埃革命的第一个时期，资产阶级世界的主要指摘针对的是我们的残酷与嗜血，那么到后来，当这种经常使用的论据变得迟钝并失去力量的时候，我们认为主要应该对国家的经济混乱负责。为了与自己目前的使命相协调，考茨基有条不紊地使用冒牌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翻译资产阶级对苏维埃破坏俄国工业生活的一切指责：布尔什维克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进行了公有化；对尚未成熟的东西进行了公有化；最后还有俄国工人阶级根本还没有准备好管理工业等等。

通过重复并组合这类指摘，考茨基以蠢货般的顽强精神掩盖住了我们经济混乱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的屠杀、内战和封锁。

苏维埃俄国在成立初期的那几个月里就发现自己被剥夺了煤炭、石油、金属和棉花。首先是奥德帝国主义，然后是协约国帝国主义，在俄国白卫军的协助之下，从苏维埃俄国切走了顿涅茨克的煤炭和冶金矿区，高加索的油田地区，拥有棉花的突厥斯坦，拥有最丰富的金属资源的乌拉尔，以及拥有面包和肉类的西伯利亚。顿涅茨克矿区通常为我国工业提供了 94% 的煤炭燃料和 74% 的黑色金属。乌拉尔地区则提供其余 26% 的金属和 6% 的煤炭。在内战期间，我们失去了这两个区域。我们失去了五亿普特从国外运过来的煤炭，也失去了石油——每一块油田都落到了我们的敌人手中。只有在我们真的掌握铜块的时候，一个人才能讨论“不合时宜的”、“野蛮的”等等的公有化对工业的影响，而这一工业已经被剥夺了燃料和原材料。无论企业属于资本家的托拉斯还是工人国家，无论工厂是否进行了公有化，在没有煤和油

的情况下，它的烟囱里都还是不会冒烟。关于这一点哪怕看下奥地利，或者德国本身，都能弄清楚。按照考茨基的最好的方法来经营的一家织布厂——假设考茨基的方法除了自己的墨水瓶以外，什么都可以管理，没有棉花便生产不出棉布。我们也同时被剥夺了来自突厥斯坦和美国的丝供应。除此之外，如前所述，我们没有燃料。

当然，封锁和内战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变的结果。但无论如何都不能由此认定，英、美、法之所以要来封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土匪行径之所以会造成巨大破坏，都是因为苏维埃经济方法不合适。

革命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其狼吞虎咽的后勤需求，给我们年轻的工业带来的负担，比它带给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负担要沉重得多。我们的运输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铁路的运转量大大增加，其磨损也相应大大增加，而其维护却被严格控制在最低限度。燃料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清算时刻更加迫近。我们几乎同时丧失了顿涅茨克、外国的煤炭和高加索的石油，所以被迫在运输领域中改用柴火。而现有的柴火库存根本就不是为此而生的，我们不得不使用备用的原木来烧热机车，而这对已经磨损的蒸汽机车的机械来说是极具破坏性的。因此，我们看到，运输崩溃的主要原因都发生在1917年之前。但那些与十一月革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原因，也属于革命的政治后果，但它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约束社会主义经济方法。

当然，政治动荡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运输和燃料方面。如果说世界工业在近几十年来日益转变为一个单一的有机体的话，那么国家工业就更是如此了。同时，战争与革命在各个方向上都机械地肢解并切散了俄国工业。早在沙皇专制时期，波兰、

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彼得堡的工业就开始遭到破坏。克伦斯基时期，这一破坏还在继续，并蔓延到了越来越多的地区。无休止的疏散意味着，在工业被破坏的同时交通也被破坏了。在内战期间，由于前线的频繁移动，疏散工作变得更加火急火燎，因此其破坏性也就更大了。每一方都暂时清空了一个又一个工业中心，采取一切措施使敌人无法使用最重要的工业企业：所有有价值的机器，或至少其最精密的部件，连同技术人员和最好的工人一起被带走了。工业被疏散之后，就会被遣回原地，而这往往彻底破坏了被运输的财产和铁路。一些关键的工业地区——特别是乌克兰和乌拉尔——数次易手。

此外，在技术设备前所未有地遭到破坏的时候，曾经在我国工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外国机器流入完全停止了。

但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双重打击下，遭受可怕损失的不仅仅是无生命的生产要素——建筑物、机器、铁轨、燃料和原料，它的主要因素，其活生生的创造力量——无产阶级，遭受的损失即使不比那些生产要素更大，那也不比它们小了。它进行了十一月政变，建立并保卫了苏维埃政权的机构，而且还和白卫军展开了持续的斗争。熟练工人一般来讲同时也是最先进的工人。内战使数万名最优秀的工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从事生产性工作，而其中有数千名再也回不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受的是最重的牺牲，而工业遭受的牺牲也是最重的。

苏维埃国家在其存在的两年半里，在应付战争方面集中了全部注意力，把最好的力量和主要的资源都送去前线了。

阶级斗争在总体上打击了工业。在考茨基之前，所有鼓吹社会和谐哲学家早就已经指责过这点了。在简单的经济罢工中，工人们消费，但不生产。阶级斗争对经济更深刻的打击是以其最

激烈的形势——武装斗争造成的。但很显然，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内战归咎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法头上。

上述原因足以用来解释苏维埃俄国的严峻经济形势了。没有燃料，没有金属，没有棉花，交通被破坏，技术设备被毁。活生生的劳动力分散在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地奔赴前线，其中相当多都永远倒下了——还有必要在布尔什维克的经济乌托邦主义中寻找额外的理由来解释我们工业的衰退吗？相反，单独拿出上述的每一条理由，都足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在这样的条件下，工厂车间活动怎么可能存在？

同时，这种活动主要以军事工业的形式存在，而军事工业现在靠其余的工业过活。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像重建军队一样在废墟中重建它。在这种空前困难条件下恢复了的军事工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红军不再衣不蔽体，有了鞋，有了步枪、机枪、大炮、子弹、炮弹、飞机和一切它需要的东西。

当和平的曙光开始显现的时候，也就是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失败之后，我们全心全意地开始着手经济组织问题了。而在这一领域里进行艰苦工作的3—4个月里，人们发现并确信，苏维埃政权由于其与群众的紧密联系，其国家机器的灵活性和自身的革命主动性，它拥有其他国家不曾拥有的重建经济的资源和方法。

诚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劳动组织领域面临着全新的问题与困难。社会主义理论不能、也不可能直接回答这些现有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经验来找到解决方案，并且在经验中校正它。考茨基之流比苏维埃政权正在解决的巨大的经济任务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他们以孟什维主义的面目，脚步混乱，用资产阶级偏

见和知识分子——官僚主义的怀疑态度来反对我们经济建设的实际措施。

为了让读者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劳动组织问题的实质，我们将在下面引用本书作者在第三届全俄工会大会上的报告¹，为了更全面地阐明这一问题，演讲稿中还补充了作者在全俄国民经济会议大会²以及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³上作的报告的重要摘录。

关于劳动组织的报告

同志们！内战即将结束。西线局势仍不明朗，波兰资产阶级有可能会向自己的命运发起挑战……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追求这种情况，战争也不再需要我们投入的那种吞没一切的力量了。过去我们在四条战线上就投入过这种力量。战争的可怕压力正在减弱。经济需求和任务越来越提上日程。历史把我们引向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在新的社会基础上组织劳动。组织劳动本质上是在组织新社会：每一个历史上的社会的基础就是其劳动的组织。如果说过去的每一个社会都是在为少数人的利益而组织劳动，并且这一少数人组织自己的国家强制力来对付压倒性多数的劳动者组织，那么可以说我们在这世界上则是第一次尝试为了多数劳动者本身的利益来组织劳动。然而，这并不排斥一切形式的强制因素，包括最温和与最强硬的强制。义务、国家强制力的因素不仅还没有离开历史舞台，相反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继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会躲避劳动。勤奋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经济压力和社会培养中形成的。可以说，人是一种相当懒惰的动物。人类之所以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懒惰的本质。倘若人类不试图经济地消耗自己的力量，不尽可能用少量的

能量来获得多的产品，技术和社会文化就不会发展了。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人类的懒惰是一种进步的力量。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⁴老头子，甚至把未来的人描绘成“一群幸福而天才的懒汉”。然而，我们绝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党和工会必须在自己的鼓动中把这种品质作为一种道德责任来宣扬。不，不！我们这里有懒惰，而且比我们需要的还多。社会组织任务正是将“懒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培养其纪律性，用人类自己想出来的手段和措施来鞭策自己。

劳动义务

经济的关键是劳动力，无论是熟练的、经过基本培训的、半培训的、生手的还是干杂活的。制定出正确登记、动员、分配和投入生产的方法，意味着实际解决经济建设问题。这是整个时代的任务，一项巨大的任务。而下述事实加剧了这一困难：劳动必须在空前的衰落与骇人听闻的贫困条件下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重建。

我们的机器设备越是破旧，铁路设施越是受到破坏，我们在近期内就越难以从境外获得大量机器，活生生的劳动力问题就越是重要。劳动力似乎很多。但是，怎么才能接触到他们？如何才能吸收他们参与工作？何时能够在生产上组织他们？我们连清理铁轨上的雪堆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鉴于目前纸币形同废纸，而且几乎完全没有来自制造业的产品，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大量使用劳动力从事开采木材、泥炭和页岩油的工作，就无法满足哪怕是对燃料的部分需求。内战严重破坏了铁路线、桥梁和车站建筑。需要几万甚至几十万工人，来进行这一切工作。为了进行大规模的伐木、泥

炭采伐和其他的工作，就需要有工人宿舍，哪怕是临时的营房。同样，这也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建筑工作。需要有大量的工人来组织河运，等等……

资本主义工业大量依靠劳动力，这些辅助劳动力以农民工作为形式。被土地缺乏钳制住的农村，总是把一定的剩余劳动力抛向市场。国家通过要求纳税来迫使它这么做。市场向农民提供货物。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村里的土地增加了，农业机械供不应求，土地需要干活的，而现在的工业几乎不能给村子带来任何东西，市场对劳动力也不再具有吸引作用。

同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劳动力。不仅工人，还有农民，都必须贡献苏维埃国家自己的力量，以确保劳动者的俄国以及劳动者本身不被压垮。若要吸引必要劳动力来完成经济任务，唯一途径就是引入劳动义务。

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劳动义务的原则本身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不劳者，不得食。”由于每个人都必须吃饭，所以每个人也都有义务工作。我国宪法⁵和《劳动法典》⁶中提到了劳动义务。但到目前为止，它仍然只是一个原则。只有在偶尔的、局部的、零星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到它。只不过到了现在，我们面临着国家经济恢复问题，劳动义务的问题才具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上，解决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都是把整个国家的居民都视为必需劳动力的储藏库——一个几乎取之不竭的来源，并以严格的制度对其进行登记、动员和使用。

如何在劳动义务的基础上实际地开始吸收劳动力呢？

到目前为止，只有军事部门有登记、动员、组织和转移大批群众的经验。这些技术方法和技能主要是从过往继承下来的。在经济领域没有这种继承，因为在那里起作用的是私有制法律原

则，企业是从市场上雇佣劳动力的。自然，至少在刚开始的一段时期，我们会发现自己被迫需要大规模吸收军事部门的机器，以进行劳动动员。

我们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实现劳动义务：我们已经在众多的省、县、乡设立了劳动义务委员会。它们主要依靠军事部门的中央和地方机构提供支持。我们的经济中央——全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会为它们所需的劳动力制定要求。劳动义务总委员会则会接受这些要求，对其进行协调，将它与地方的劳动力源头结合起来，向自己的地方机构指派相应的勤务，并通过它们动员劳动力。在州、省和县内，地方机构独立展开这些工作，以满足地方的经济需求。

整个组织还处于其早期阶段。它仍然不完善。但路线无疑是正确的。

如果说组织新社会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组织新劳动的话，那么组织劳动同样也意味着实施全国的劳动义务。这项任务绝不仅限于实施组织和行政措施。它涉及到经济与日常生活的根本基础。它将面对的是强大的心理习惯和偏见。实施劳动义务，一方面意味着巨大的教育工作，另一方面意味着在实际方法中深思熟虑。

应该尽可能节省运用劳动力。劳动动员必须考虑到每个地区的经济生活条件，以及当地居民的主要职业需求——农业上的需求。应该尽可能依靠当地居民过去的副业及零工。应该尽可能短距离调遣被动员的劳动力，即调遣到距离最近的劳动前线场所中去。调动的工人数量应与经济任务的规模相称。应及时向被动员的人员提供必要的劳动工具和粮食。应让经验丰富、头脑清晰的指导员领导他们。应该当场让被动员者相信，自己的劳动力得到

了谨慎、节俭的运用，而不是被浪费。应该尽可能用劳动课程来代替直接的动员，比如说，某乡有责任限期交付一定数量的木柴，或者把某个量的铁送到某个车站，等等。必须特别认真地研究这一领域里不断积累的经验，给经济机构以大的灵活性，更多关注地方的利益和生活特点。简而言之，就是要明确、改进并完善动员劳动力的接收、方法和机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永远地认识到，劳动义务原则已彻底地、不可逆转地取代了自由雇佣的原则，就像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那样。

劳动的军事化

如果不一定程度使用劳动军事化的方法，那么劳动义务的实施就无法想象了。这个词直接让我们面对最大的迷信，听到反对派哀嚎。

要理解工人国家中劳动军事化的含义和方法，就必须理解军队本身是如何推进军事化的——军队，正如我们都记得的那样，在自己的初创期里并不具备必要的“军事”性质。在这两年里，我们为红军动员的士兵数量比我们工会的会员数量要少一些。但工会成员都是工人，而在军队里，工人约占15%，其余都是农民群众。然而，我们确信红军的真正建设者和“军事化专家”是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推举出来的先进工人。在前线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刚动员起来的农民群众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坚定性时，我们一方面求助于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一方面求助于全俄工会委员会主席团。来自这两者的先进工人被派往前线，并在那里按照自己的形象与榜样建立红军——教育、锻炼并军事化农民群众。

现在必须清楚地回忆起这一事实，因为它一下子弄清了工农国家条件下的“军事化”概念。劳动军事化的口号被反复宣扬，

并在西方和沙皇专制的资产阶级国家经济部门中得到了落实。但我们的军事化无论是在目标还是方法上都与这些实验不同，就像为解放而觉悟并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与为剥削而觉悟并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有所不同一样。

在这一问题上出现的大多数偏见、错误、抗议和哀嚎都来源于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军事化与资产阶级军事化的历史形式半自觉半恶毒的混淆。孟什维克——俄国的考茨基之徒在他们提交给本次工会大会的原则性决议中表达的立场完全基于这种概念上的替换。

孟什维克不仅反对劳动军事化，也反对劳动义务。他们认为这些方法是“胁迫性”的，因而予以否定。他们宣传，说劳动义务等于劳动生产率低下，而军事化意味着漫无目的地掠夺劳动力。

“强制劳动总是生产率低下的”，这是孟什维克决议中的原话。这句话让我们直面问题的本质。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工厂中宣布战时状态并不是一个是否合理的问题，也不是授权军事革命法庭惩罚那些盗窃对我们来说如此珍贵的材料和仪器或怠工的腐败工人是否可取的问题。不，孟什维克提出的问题比这些要深刻得多。他们声称强制劳动在任何时候都低下，从而试图把我们从目前过渡时代的所有经济建设之中连根拔起。如果没有革命专政，没有经济组织的强制形式，无法从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跨入社会主义经济。

孟什维克决议的第一段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时期。这意味着什么呢？而且首先，他们是从哪里得出的这个结论？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国的考茨基之徒也承认这点了？他们指责我国（这构成了我们之间分歧

的基础)是个社会主义乌托邦;他们声称(这构成了他们政治学说的本质)在我们的时代不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共产主义者只是在破坏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在领导国家前进,而是在让它退步。这是基本的分歧,是最深的、不可调和的分歧,其他的任何分歧都是由此而产生的。现在,孟什维克在其决议中最开头的条款中,顺便告诉了我们,我们正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无需证明的事情。而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承认,看起来非常像意识形态上的彻底投降。但这种投降由于整个决议显示的那样没有给孟什维克施加任何革命义务而变得更加轻率,转瞬即逝。他们完全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承认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的边缘之后,孟什维克更加猛烈的抨击这些方法——在当前的严酷而艰巨的条件之下,如果没了这些方法,就无法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他们跟我们说,强制劳动总是生产率低下的。我们要问:这里所说的强制劳动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他们针锋相对支持的是哪种劳动?很明显,答案是自由劳动。在这里提到的自由劳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是进步资产阶级思想家在与农民的不自由劳动——农奴制——和车间工匠定量的、受严格规定的劳动作斗争时提出的概念。自由劳动,意味着它可以在市场上被“自由地”购买,自由被归结为一种基于自由雇佣奴隶制的法律虚构。我们在历史上不曾见到过其他类型的自由劳动。让参加这次大会的那么几个孟什维克代表向我们解释一下,自由、非强制性的劳动如果不是意味着劳动力市场,那是意味着什么?

历史熟知奴隶劳动、农奴劳动以及中世纪行会中受严格规定的劳动。现在雇佣劳动统治着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花边小报都将其与苏维埃的“奴隶制”相对立,认为雇佣劳动是最高的自由。

我们也相反，将规范化的社会劳动与资本主义奴役相对立，前者的基础是全体人民都必须履行、因而对国家的每个工人都具有强制性的经济计划。没有这些，就无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物质的、有形的强制因素或多或少，取决于许多条件：国家的贫富程度、旧时代的遗产、文化水平、交通与行政机器的状况，等等。但义务，还有强制性，是遏制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公有化以及在统一计划基础上重建经济的必要条件。

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最终意味着市场。资本家能否以便宜的价格购买劳动力，是衡量劳动自由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不仅不适用于未来，也不适用于过去。

如果认为农奴制时期棍棒底下出劳力，每一个庄稼人背后都站着一位手执长鞭的监工，那是非常荒谬的。中世纪的经济形势产生于一定的生产条件，并创造了一定的生活形式。庄稼人逐渐习惯了这些形式，并在一定时期里认为这些形式是公正的，至少接受了它不可被改变的想法。当他在物质条件变化的影响下变得充满敌意时，国家就会以其物质力量来对付他，从而表现出其组织劳动的强制性质。

劳动的军事化基于这样的国家形式：如果没有这些形式，社会主义经济永远取代不了资本主义经济。我们为什么提到军事化？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但却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比喻。除了军队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社会组织认为自己有权利使公民服从自己，使自己的意志从四面八方笼罩住他们，就像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认为自己有权做而且正在做的那样。只有军队（正是因为它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民族、政府和统治阶级的生死问题）才有权要求每个人——各种各样的人完全服从自己的任务、目标和法令。

而且，军事组织的目标越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越能得到实现。

目前，劳动战线正在解决苏维埃俄国的生死问题。我们的经济组织，以及与其同在的专业—生产组织，有权要求其成员拥有迄今为止只有军队才会要求的全部忘我精神、纪律和执行力。

另一方面，劳资关系并非仅仅建立在“自由”合同的基础上，还包含了国家调节和物质强迫的强大要素。

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给劳动自由的虚构带来了某种非常片面的真实性，但我们通过摧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最终消除了这种被辛迪加和托拉斯最小化了的竞争。孟什维克口头上承认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意味着从基于买卖竞赛、市场价格和工资变动的自发性劳动力分配方式过渡到由县、省和全国的经济机构对工人进行的有计划的分配。这种计划分配的前提在于被分配者要服从国家的经济计划。这就是劳动义务的实质，它不可避免地进入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纲领之中，成为其基本要素。

如果说计划经济在没有劳动义务的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可以说，不取消劳动自由的虚构，不以义务原则来取代它的话，也是不可想象的——后者是以强制的现实性作为补充的。

自由劳动比强制劳动更具生产率的说法，完全适用于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的时代。但是，要想把这一真理延续下去，并将其应用在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的话，就首先得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来说，首先得做一个考茨基主义者。如果强制劳动真的像孟什维克决议提到的那样无条件拉低生产率的话，那么我们的一切建设就注定要失败。因为除了威严地支配全国的经济力量和手段以外，除了按照全国计划集中分配劳动力以外，我们没办法过渡到社会

主义。工人国家认为自己有权把每个工人送到需要他进行工作的地方。没有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者会否认工人国家有权严惩拒绝执行劳动勤务的工人。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孟什维克所谓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是纯乳白色的——没有粮食垄断，没有市场的消灭，没有革命专政，也没有劳动的军事化。

没有劳动义务，没有命令和要求执行的权力的话，工会将会变成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因为，对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来说，不需要工会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这是整个社会与国家组织的任务），而需要它们为了生产而组织工人阶级，对某些类别以及个别的工人进行教育、纪律培养、分配、分组，并限期把他们安排到指定的岗位——简而言之，通过与国家携手合作，有力地将工人纳入统一经济计划的框架。在这种情况下捍卫劳动“自由”，就意味着在一个交通、粮食和设备被严重破坏的饥饿国家内坚持一个贫困且无助、没有对更好条件的寻求、从工厂到工厂杂乱无章地转移的状态。把资产阶级的劳动自由与无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结合起来的荒谬企图，除了完全解体工人阶级并让经济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以外，还能产生什么结果呢？

同志们，由此可见，在我指出的基本意义上的劳动军事化不是个别政治家的发明，也不是我国军事部门的发明，而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中用于组织劳动力和并培养劳动力纪律的一种无法避免的方法。这种方法意味着强制分配劳动力，让劳动力在一段时间内依附于某一部门或企业，并借助全国经济计划来管理劳动力。如果，所有这些形式的强制，如孟什维克决议写道的那样，总是无条件拉低劳动生产率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毫无希望了。因为社会主义无法建立在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基础之上。每个社会组织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劳动组织。如果我们新的劳

动组织拉低生产率，无论我们如何装点它，制定什么措施来拯救它，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都是必死无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说，孟什维克对军事化的反对论据是在把我们引向劳动义务与它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的影响这些根本问题。强制劳动真的总是缺乏生产率的吗？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最可悲、最庸俗的自由主义偏见。整个问题在于，这些强制是由谁推行，适用于谁，为什么进行——哪个国家，哪个阶级，什么条件，什么方法？农奴的组织方式在一定条件下是一种进步，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就是劳动力在市场上可以被自由买卖的时代，生产率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自由劳动与整个资本主义一起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自爆了。全世界的经济陷入了血腥的无政府状态、骇人听闻的震荡、积贫积弱和人民群众死亡的时期。在这些条件下一——当自由劳动的成果被破坏的速度十倍于它被创造的速度时，自由劳动的生产率还值得一提吗？帝国主义战争及其后续的情况表明，社会不可能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继续存在。或者，也许有人掌握了如何将自由劳动从帝国主义的白热化中解脱出来的秘密，也就是将社会发展倒退五十或一百年？倘若事实证明，取代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因而也是强制性的劳动组织导致了经济的倒退，这就意味着我们整个文明的崩溃，意味着人类倒退到野蛮时代。

所幸，不仅对苏维埃俄国，而且对全人类来说，强制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会拉低劳动生产率哲学，只不过是姗姗来迟的自由主义陈词滥调。劳动生产率指的是社会条件下的最为复杂的组合的生产量，且根本不由劳动的法律形式衡量或预先决定。

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组织并教育集体中的人类为实现更高的生产率进行劳动的历史。正如我之前斗胆而说的那样，人是懒惰的。也就是说，他会本能地努力去以最少的精力去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品。没有这种努力，就不会有经济的发展。人类的劳动生产率是检验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准的，每一种社会关系的新形式都必须经得起这一试金石之的考验。

“自由”劳动，即自由雇佣的劳动，其生产率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因为长期应用了劳动组织和劳动教育的方法，才逐渐达到了高生产率。这种教育包含了各种方法与技术，而这些方法与技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先是用棍棒把庄稼人赶到了大街上，事先抢了他的土地。当庄稼人不想在工厂里工作时，资产阶级就会用烧红的铁烫他们的额头，把他们吊起来，关进监狱，最后，再让被赶出农村的流浪汉习惯于工厂中的机器。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劳动在物质条件和法律环境上与苦役劳动差别仍然不大。

在不同的时代中，资产阶级以不同的比例混合了意识形态作用的压迫方法与烧红的铁——首先就是牧师的宣传。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就改革了由封建制度维护的旧的天主教，并以宗教改革的面貌将新宗教为自己运用。宗教改革结合了自由灵魂、自由贸易与自由劳动。它为自己找到了新的牧师，这些牧师成了资产阶级的精神管家和忠诚的考勤员。资产阶级将学校、出版社、市政厅和议会改编为工人阶级思想的加工厂。各种形式的工资——日结、计件、集体协议，都只是资产阶级随时可用的对无产阶级进行劳动驯养的手段。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劳动奖励和对功利主义的煽动。最终，甚至连工会，这一工人阶级本身的组织，资产阶级也能够掌握并广泛利用于使劳动者严守秩序了，在

英国尤其如此。它驯化了工人领袖，并通过他们向工人灌输和平有机劳动的必要性，给他们灌输严格遵守自身义务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的态度。所有这类工作的最终产物则是泰勒制⁷，它结合了生产过程中的科学组织要素与剥削制度最集中的手段。

由此可见，自由雇佣劳动的生产率并不是历史赋予的，不是现成的盘中餐。相反，它的产生，是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长期持续的压迫、教育、组织和奖励政策。它一步步地学会了从工人身上榨取越来越多的劳动产品。而它手中的有力工具之一，就是宣布自由雇佣是唯一自由、正常、健全、生产率高并有救赎作用的劳动形式。

历史上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本身就能保证自己具有生产率的劳动的法律形式。劳动的法律外壳符合时代的态度与观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技术力量增长，离不开劳动教育，并且需要劳动者逐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资料与新的社会关系形势。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意味着在新的基础上组织劳动者，使他们适应这些基础，并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不变目标对他们进行劳动的再教育。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的领导之下，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次自我教育。谁不明白这一点，谁就连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常识都不明白。

我们如何再教育劳动者？我们对劳动者再教育的方式，比资产阶级的那些宣传要广泛得无可比拟，而且开诚布公，不掺杂谎言。资产阶级不得不自欺欺人，把自己施加的劳动说成是自由的，而实际上它不仅是社会强加的劳动，还是奴隶般的劳动。因为这是大多数人为少数人利益的劳动。而我们，则是为了劳动者自身的利益来组织劳动。因此，我们也不可能有动机去隐瞒或掩饰劳动组织的社会强制性质。我们不需要教士式、自由主义的或

考茨基式的童话故事。我们开诚布公地对群众说，他们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无条件的纪律，以及每个工人最精确的执行力，才能拯救、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使其进入繁荣的状态。

我们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不仅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进行宣传。劳动义务具有强制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对工人阶级使用武力。倘若劳动义务遭到大多数劳动者的反抗，那它就会被破坏，苏维埃制度也会随之被破坏。在劳动者反对下进行的劳动军事化是军警暴虐制度⁸。按工人自己的意志进行的劳动军事化是一种社会主义专政。劳动义务和军事化并不像“自由劳动”那样强奸劳动者的意志，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义务星期六的形式出现的志愿劳动的兴盛最能说明这一点。这种现象以前从未在任何地方出现过。工人用他们自愿的、无私的劳动——每周一次，或者甚至更频繁，生动地表明他们不仅准备好承担“强制”劳动，而且还希望给国家贡献一些剩余的劳动。义务星期六不仅仅出色地表现了共产主义团结，也最可靠地保证义务劳动会取得成功。需要借助宣传来阐明、扩大和深化这些真正共产主义的倾向。

资产阶级主要精神武器是宗教；我们的主要精神武器，则是公开启蒙群众，让他们了解真实的状况，传播自然历史和技术知识，让群众开始参与全国经济计划，在此基础上运用苏维埃政权拥有的所有劳动力。

在过去的时代里，我们鼓动的内容主要来自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是一个谜，而我们则向群众揭开这个谜底。现在，苏维埃体制的机制向群众解答了社会之谜，吸引劳动者来参与管理的所有领域。政治经济学走得越远，就越有历史意义。研究自然和使自然服从人类的方法的科学被提上了首要日程。

工会必须最广泛地开展组织科学技术启蒙工作，以便使每个工人都能在自己的产业部门中接受理论知识，而后者将使他在改善了劳动并使劳动更具生产率的状态下继续劳动。公共出版物与国家的经济任务同等重要，这意味着它们不仅应该像现在这样鼓动劳动者提升自我，而还应该讨论并权衡具体的经济任务和计划，讨论解决它们的方式和道路，最重要的是检查并评价取得的成果。报纸要逐日跟踪最重要的工厂和其他企业的产出，记录成败，夸奖一些人，谴责另一些人……

俄国资本主义迟钝、缺乏独立性，所以具有寄生性。因此，同欧洲资本主义相比，俄国资本主义远未能培训和提升劳动群众的技术，他们的生产纪律化程度也较低。这个任务现在就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身上了。一位优秀的工程师、机械工人、钳工在苏维埃共和国必须拥有和过去杰出的鼓动者、革命战士以及最近一段时间里最能干、最勇敢的指挥官和政委拥有的同等的名声和荣誉。大大小小的技术头领必须在公众的关注中占据中心地位。必须让那些不够了解自己的工作的坏工人因此而感到羞愧。

我们这里还存在着工资，并且它还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工资就越需要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必需品，也因此将失去作为工资的特性。但现在我们还没富裕到这种地步。目前主要任务是增加产品的生产数量，其它所有的任务都要服从于这一任务。在这个困难时期，工资首先不会保证单个工人个人生存，而会评估单个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给工人共和国带来了什么。

因此，必须使现金和实物的工资尽可能地与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一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件和协议工资制度，还有泰

勒制的应用等等，都是在通过榨取高额利润来加大力度剥削工人。而在公有制生产中，计件工资、奖金等措施的目的是增加社会产品的总量，从而相应增加总体福利。那些对总体利益贡献最大的工人有权比懒惰、马虎、散漫的工人获取更大份额的社会产品。

最后，工人国家既要奖励一些人，又不能不惩罚另外一些人，也就是惩罚那些公然扰乱劳动团结、破坏共同工作、严重损害国家的社会主义复兴的人。为实现经济目标而进行的镇压是社会主义专政的必要工具。

所有这些措施与其他的一些措施一道，必须确保提高生产中的进取意识。如果没有进取意识，我们甚至永远无法超过中等水平。进取意识建立在为生存而斗争的生活本能之上，在资产阶级秩序下具有竞争的性质。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进取意识不会消失。但随着生活必需品日益富足，进取意识将呈现出越来越无私、纯粹思想的性质。它将表现最大程度地服务于自己的村庄、县、城市或整个社会，并得到相应的回报——名声、感激和好感，或者，到最后，就仅是在意识到自己做好了工作后的内心满足感。但是，在一个艰难的过渡期里，在物质极度匮乏、社会团结感不够强烈的条件下，进取意识某种程度必然关乎个人需求自给自足的愿望。

同志们，这就是工人国家为提高生产力掌握的全部手段。如我们所见，现成的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书本不能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答案。我们也仅仅是和你们一起，刚刚开始用劳动者的血汗来写这本书。我们要说，工人们，你们已经走上了定额劳动的道路。只有在这条路上，你们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除了你们

没有人能在新的社会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就会灭亡；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会让人类向前迈出一大步。

劳动军

我们是用实践经验，而不是用现成的理论来处理在劳动任务中运用军队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对我们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在苏维埃俄国的一些边疆地区，情况是这样的：大量的军队长期不上战场。铁路运输系统混乱不堪，很难把这些军队重新运送到其他正在活跃的战线上，在冬季尤为如此。例如，位于乌拉尔省的第三军情况便是如此。这支军队的指挥人员明白，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办法复员军队，于是便自行提出了将其投入劳动的议题。他们把一份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精心设计的劳动军计划草案送到了中央。

这是一项并没那么容易的新任务。红军战士可以劳动吗？他们的劳动会有足够的成效吗？他们能为自己收回本钱吗？甚至我们有些同志也对此有疑问。毋庸置疑，孟什维克又在唱反对意见高调了。还是那个阿布拉莫维奇⁹，在国民经济会议大会上，大概是1月或2月初，也就是整个事业还处于草案阶段的时候，就预言我们必然失败，胡诌整个事业毫无意义，是军警专横下的乌托邦云云。我们并不这么看待这项事业。当然，困难是很大的，但原则上仍相当于苏维埃建设中的普遍困难。

我们来仔细看看第三军的构成是怎么样的。这支部队没几个军事单位，只有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总共15个团——以及特殊单位。其余的军事单位此前已经被转移到其他的部队和前线。但是，这支军的控制机构仍然完好无缺。我们认为，如果春天还没被击溃的话，它很可能不得不沿着伏尔加河转移到与

邓尼金战斗的高加索前线上。在第三军的指挥部、各机构、军事单位和医院等地，总共有约 12 万红军战士，其中主要是农民。在这个巨大人群之中，大约有 1.6 万名共产党员和同情者组织的成员，其中包括数量相当多的乌拉尔工人。因此，就其成分和结构而言，第三军是一群农民，在先进工人的领导下的一个军事组织中受到了约束。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军事专家在工作，他们执行着重要的军事职能，并受到共产党员全面的政治控制。如果从这个总体角度来看，第三军可以算是整个苏维埃俄国的一面镜子。无论我们是否把红军、苏维埃政权在县、省和各共和国的组织（包括经济机关）看作一个整体，我们都会发现，到处都有相同的组织简图：数百万农民被在苏维埃建设的所有领域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有组织的工人吸引到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形式中去。资产阶级教育出来的专家被吸引到需要专业知识的岗位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赋予了他们一定的自主权，但仍控制着他们的工作。对我们来说，除了在先进工人领导下动员以农民为主的劳动力以外，劳动义务没有其他的实施方法。因此，在劳动中运用军队，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原则上的阻碍。换句话说，孟什维克反对劳动军原则，实质上是反对一切“强制”劳动，因而也是在反对劳动义务和经济建设中的整个苏维埃方法。我们不难克服这些反对意见。

当然，军事机构本身并不具备管理劳动过程的能力。但我们并不打算推翻这一事实。领导权必需留在相应的经济机构手中；军队以有组织的紧凑单位的形式提供必要的劳动力，适合从事最简单的同质化工作：清扫道路积雪、砍柴、建造、组织畜力交通等等。

我们现在已经能熟练地在劳动中运用军队，可以给出比推测与猜测更进一步的预估。我们从这一经验中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孟什维克急匆匆地下结论。还是那个阿布拉莫维奇，在矿业工人大会上说我们已经破产了，劳动军是一个寄生虫组织，其中10个工作人员中就有100个仆人。这是真的吗？不。这种人站在一边，不了解事实，只捡拾杂碎，到处说我们已经破产或即将破产，轻浮、恶毒地批评我们。在现实中，劳动军不但没有破产，相反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不断进化，变得越来越稳固。那些预言家胡诌整个计划会失败，没人会去工作，红军战士不会走进劳动战线而跑回家。恰恰是这些预言家破产了。

有人发表这些反对意见，是出于小市民的怀疑主义不信任群众和勇敢的组织性举措。但是，当我们开始为军事任务进行大规模动员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听到建立在同样基础的反对意见了吗？我们当时也很害怕开小差，这似乎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是不可避免的。逃兵当然存在。但根据经验，我们多虑了——逃兵不会大规模存在，也不会摧毁军队。精神与组织连结，还有共产主义志愿和国家强制一道结合起来，确保了数百万人规模的动员，确保了数量众多的部队，确保了最艰难战斗任务的执行。军队最终获胜了。在劳动任务方面，我们也预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我们并没有错。红军战士在从战斗状态过渡到劳动状态期间，根本没有像怀疑论者声称的那样脱逃。在精心策划的鼓动下，过渡期间本身有巨大的精神高潮。不错，有一部分士兵试图当逃兵，但每逢一个巨大的军事单位从一个前线转移到另一个前线，或从后方转移到前线，或一般地被动摇，或潜在的逃兵变成了主动的逃兵的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此时，政治部、出版社、反

逃兵机构等部门立即贯彻了自己的权利，现在，劳动军中逃兵的比例并不高于战斗的军队。

军队由于其内部建制，不一定只能投入一小部分人员。我已提过，第三军保留着一个完整的指挥机构，只具备少量的军事单位。只要我们还出于军事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保持军队的指挥部和其他指挥部门的完整性的话，军队中的工人比重就确实会非常低。在总数为 11 万的红军战士中，有 21% 处于行政经济岗位上；约 16% 的人在大量的设施及仓库中进行着日结工资的工作（警卫或其他工作）；约 13% 人要么是伤寒患者，要么正在从事医疗卫生工作；高达 25% 的人因各种原因（出差、休假和擅自外出）缺席。因此，可用于工作的闲暇人员不超过 23%，这是第三军中在那段时期里可以参与劳动的人员数量最大值。事实上，在一开始，只有约 14% 的人在劳动；其主要来自于仍在军队中的那两个步兵师和骑兵师。

但是，我们一旦打败了邓尼金，并且不用在春天把第三军派到伏尔加河下游去援助高加索的前线部队，就立即着手解散了繁冗的军队机关，并使军队机构更加适应劳动任务。这项工作虽然尚未完成，但已经成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结果。目前（1920 年 3 月），第三军投入劳动的人力约占其总人力的 38%。至于附近乌拉尔军区军事单位中，已经有 49% 投入了劳动。我们如果将此与许多工厂中工人的出勤率相比，那么就得到一个不算太坏的结果——最近，在一些工厂中，由于合法或非法的理由，缺勤率达到了 50%，甚至更高（到 1920 年 6 月，这个比例已经急剧下跌了）。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这样一个事实：工厂工人和车间工人往往由家里的成年成员照顾，而红军战士则自己照顾自己。

我们在乌拉尔地区借助军事机构动员了一批 19 岁的青年从事伐木工作。以此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其总数的 75%，也就是 3 万多人都参加了工作。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它表明，我们通过军事机构进行动员和组建，可以改变纯粹劳动单位的结构，以确保大大增加直接参与物质生产过程的人的比重。

最后，我们现在也可以根据经验来判断军事劳动的生产率了。刚开始的时候，尽管士气很高，但主要劳动领域中的劳动生产率确实很低，以至于阅读第一批劳动公报会令人相当沮丧。例如，为了准备一立方俄丈的木柴，在一开始需要 13 到 15 个工作日，正常来讲需要 3 个工作日，而现在连 3 个工作日的的时间都很少用得上。应该补充的是，这一事业中的“艺术家”们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做到每人每天收获 1 立方俄丈的木柴。这一事业还发生了什么呢？军事单位远离伐木场。在许多情况下，工人必须步行 6—8 俄里上下班，而这消耗了工作日中相当一部分时间。工作现场斧头和锯子供不应求。许多来自草原的红军战士不了解森林，从未砍过、切过或锯过树。省和县的林业委员会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如何利用这些军事单位，把他们送到需要的地方，并为他们提供合适的装备。所以也难怪会有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但是，一旦纠正了组织工作中的明显缺陷，就会得到更有利的结果。这样说吧，根据最新的数字，在相同的那第一支劳动军中，每准备立方俄丈的木柴需要花费四个半工作日，这与目前的标准相差不大。然而，最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劳动的优化，劳动生产率正在系统性地提高。

莫斯科工程团短暂但丰富的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取得的成就。领导这一试验的军事工程总局首先制定了每三个工作日一立方俄丈木柴的定额。这一数字很快就被超过了。到一月份的时

候，生产每立方俄丈木柴需要约 2.3 个工作日；二月份的时候只需要 2.1 个工作日；而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就只需要 1.5 个工作日了——这样的生产率相当高。莫斯科工程团之所以取得成果，是因为发挥了精神的影响作用，精确核算每个个体的工作，唤醒劳动者的功名心，向产出高于平均值的工人颁发奖金。按工会的说法，这些做法适应了所有人的个体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灵活费率。这种近乎实验室式的实验清楚地展现了我们未来需要遵循的道路。

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劳动军在行动了：第一军、彼得堡军、乌克兰军、高加索军、南扎沃尔日斯克军和预备军。正如我们所知，后备军的协助大大提高了喀山—叶卡捷琳堡铁路的运力。而凡是合理地尝试在劳动中利用军事单位地方，都能证明这种方法无疑是一种极其重要而正确的方法。

关于军事组织必然无条件具有寄生性质的偏见被打破了。苏维埃军队自身反映了苏维埃社会制度的趋势。我们不应该用上一个时代的固定术语——“军国主义”、“军事组织”、“非生产性的强制劳动”之类的词语来思考，而应该不带成见、睁大眼睛去观察新时代的现象。我们还应该记住，星期六是为人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所有形式的组织，包括军队，都只是工人阶级政权的工具。工人阶级为达成一定的目的，既有权利也有能力调整、改变或者重组这些工具。

统一经济计划

只有制定一套覆盖全国和所有生产部门的统一经济计划，才能在此基础上像实行劳动军事化那样推广劳动义务，并让后者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项计划不仅要考虑到若干年的情况，还要考

考虑最近的整个时代的情况。根据国家经济复兴的必然阶段，这项计划自然而然地分成若干不同的时期或顺序。我们将不得不从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任务开始。

我们首先要确保工人阶级能够生活，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生活，并以这种方式拯救工业中心和城市。这是起点。我们如果不想让农村消解城市，农业消解工业，不想让整个国家变成农村的话，就必须至少最低限度地维持我们的交通，为城市提供粮食，为工业提供燃料和原材料，为牲畜提供饲料。不这么做，我们就停滞不前。因此，计划的最紧迫部分，就是改善运输状况，至少要防止其进一步恶化，并采购必需的粮食、原材料和燃料的储备。未来的整个时期将会充满集中且紧张的劳动力，来解决这些主要任务，而这将为未来的一切创造前提条件。这就是我们为劳动军设定的特殊任务。第一个时期和下个时期是以月为单位，还是以年为单位，现在还无法预测；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国际形势、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耐力程度。

第二个时期的任务就是为交通、原材料还有粮食提取方面制造机器。在此，蒸汽机车是一切的核心。

目前，蒸汽机车的维修都是以手工的方式进行的，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机车的维修必须转移到备用零件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既然工人国家同时掌握整个铁路网与所有工厂，我们就可以而且必须为全国的蒸汽机车和车厢设立统一的类型，使其零部件标准化，让所有必要的工厂参与备件的大规模生产，不断简化维修工作，这样到最后就可以直接用新零件替换磨损的零件，从而确保利用备件来大规模地组装新的蒸汽机车。我们既然已经解决了燃料和原材料的源头问题，现在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建造蒸汽机车。

第三个时期的任务是建造用于生产大众消费品的机器。

最后，在第四个时期，在前三个时期成果的基础上，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个人消费品的生产。

这个计划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能够总体指导我们经济机关中的实际工作，而且还能指导我们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我们的经济任务。如果我们不把握住工人阶级中一切城市的、觉醒的、充满崇高精神的分子，我们的劳动动员就不会有结果，也不会扎根。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向群众介绍我们的情况和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必须公开告诉他们：就算劳动者拼尽了全力，我们的经济计划也不可能短时间带来自由自在的富裕生活。因为我们近期要集中精力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准备条件。我们只有确保能够最低限度地恢复运输和生产资料，才能转向消费品的生产。因此，经济计划只有推进到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第四阶段时，才会为劳动者带来直接的、有形的劳动果实——也就是个人消费品。只有到了那个时候，生活的负担才会真正减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群众将继续承担劳动与贫困的负担，他们必须全面了解这一经济计划不可避免的内在逻辑，以便能够担负起这一经济计划。

我们不应过于绝对地理解上述四个经济时期的交替。我们现在当然不打算完全停止纺织工业的运作，哪怕仅仅为了军事原因都不能这么做。然而，为了使注意力和力量不至于在来自各地需求和要求的压力下变得支离破碎，有必要以经济计划为基本标准，区分主要的、基础的需求与要求和次要的、补充的需求与要求。不用说，我们的目标绝不是与世隔绝的“国家”共产主义：封锁的解除与欧洲革命，都必然让我们的经济计划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缩短其各发展阶段，使其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何时会发生。而我们必须以一种特殊方式行事，以便于

在欧洲和世界革命最不利，也就是最缓慢的发展状态下都能坚持下来并发展壮大。我们假如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实际的贸易关系，还是会坚持上述经济计划的指导。我们会拿出部分原材料来换取蒸汽机车或其他必要的机器，但不会换取衣服、鞋子或殖民地商品——位于我们列表首位的不是消费品，而是交通和生产工具。

如果我们为自己假设经济会从现在的完全崩溃状态逐步恢复到崩溃前的状态，也就是说，假设我们会沿着阶梯往上爬，而且只有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才会达到帝国主义战争前夕的水平的话，那我们就是短视的怀疑者、小市民式的舍本逐末者。这种假设不仅不能宽慰我们，而且必然是错误的。经济破坏，既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价值损失，也摧毁了经济中许多平淡无奇、陈腐和毫无意义的东西，从而促进按照世界经济现在可以得到的技术数据来进行新的建设。

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并不像逐个台阶地爬楼梯那样发展，而是跳过一系列台阶，在原始的大草原上就建立起了美国式的工厂，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就更可以采用同样的加速方式了。我们一旦克服了万恶的贫困，积累了少量的原材料和粮食储备，改善了交通状况，就能跨越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利用我们不受私有财产束缚的状况，使所有的企业和经济要素都服从于一个统一的国家计划。

因此，打个比方说，我们无疑可以推动所有的主要工业行业及个人消费领域走向电气化，而不必再次经历“蒸汽时代”。我们的电气化计划是根据总体经济计划的基本阶段分成的一系列连续阶段而制定的。

一场新的战争可能会阻碍我们实现经济意图；我们的精力和毅力可以而且必须加快经济复兴的进程。但是，无论事件如何进一步发展，很明显，我们的所有工作——劳动动员、劳动军事化、义务星期六和其他形式的共产主义劳动志愿服务——都必须基于统一的经济计划。而在近期内，我们需要集中全部精力完成第一批基本任务，也就是解决粮食、燃料、原材料和运输问题。不分散注意力，不分割力量，不浪费精力。这是实现救赎的唯一途径。

集体领导制与一人专责制

孟什维克正试图在另一个在他们看来有利的问题上下注，以便再次接近工人阶级。这就是工业企业管理形式的问题，也就是集体领导制与一人专责制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把工厂交给单个管理人员而不是集体，是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犯罪。太妙了，不久前，孟什维克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是对历史的嘲弄，是对工人阶级犯罪，现在却最热心地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反对一人专责制。

我们的党代会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罪责，因为主张在工业领域——首先是在最底层，在工厂和车间里——实行一人管理的办法。然而，如果认为这一决定不利于工人阶级的自主，那就大错特错了。劳动者的自主不是由领导岗位上的工人数量——三个或者一个——决定的，而是由更深层次的因素和现象决定的：劳动者在工会积极参与下建立经济机构，通过代表数千万劳动者的苏维埃大会创建苏维埃机关；被管理者参与或监督管理者——这就体现了工人阶级自主。如果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通过党、苏维埃和工会的代表大会得出结论，认为让一个人负责一个

工厂比让集体负责更好的话，那这就是工人阶级自主得出的决定。从行政手法的角度来看，它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它绝不是强加给无产阶级的，而是由无产阶级的斟酌与意志决定的。因此，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和工厂工人的集体领导问题混为一谈，是草率的错误。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破坏生产资料私有制，意味着劳动者的集体意志领导整个苏维埃运行机制，但绝不表现在个别经济企业的管理形式上。

必须在此驳斥另一种经常出现的针对一人专责制的指责。反对派说：“这是苏维埃军国主义分子在试图把自己的经验从军事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一人专责制原则在军队中可能很棒，但却不适合经济。”这样的表述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错误的。我们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在军队中引入一人专责制；即使是现在，我们也还没有在军队中完全落实一人专责制。我们为经济企业中一人管理辩护，也并不只是基于军事经验。事实上，我们不仅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来理解革命任务和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创造性责任，并运用这种理解方式来着手这一议题。有必要继承过去积累的技术知识与技能，有必要吸收专家并广泛地运用他们，以便不让技术向后倒退，而是向前发展——我们不仅从革命开始后，而且早在十月到来前，就已经理解和认识到这几点了。我相信，如果内战没有夺走我们经济肌体中一切结实、有创造力、独立的事物的话，那么经济管理领域就更能迅速和顺利地推广一人专责制。

有些同志首先把经济管理机构看作是一所学校。当然，这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管理机构的任务就是管理。如果有人愿意并且能够学习管理方式，他可以去学校学习专门的指导课程；可以去当助手，到处观察并积累经验。而那些被任命到工厂的管理

处的人员，不是上学，而是上岗，负责行政—经济工作。但是，即使从“学校”这个有限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也会说：在一人专责制之下，这个学校将好上十倍，因为你们如果用三个不成熟的工人来代替一个优秀工人，把他们组成的小组放在责任管理岗位上的话，就是在剥夺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足的机会。每个人都会向其他的两个人寻求决定，并在失败的时候指责其他的两个人。

这并不是原则性的问题，而这一点，在一人专责制的反对者上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他们不要求在作坊、车间和矿山中实行集体领导制。他们甚至愤愤不平地说只有疯子才会要求三五个人管理一个车间：必须且只能有一个车间主任。为什么？如果集体管理是“学校”，那么为什么我们不需要一所最初级的学校呢？我们为什么不在作坊里实行集体管理制呢？但如果说集体管理制对作坊来说不是神圣约言的话，那为什么它对工厂是必需的呢？

阿布拉莫维奇就此说，我们由于缺少专家（他跟着考茨基重复说这是布尔什维克的过错），所以将会用工人集体来取代他们。这是扯淡。任何不了解一个行业的人组成的集体都不可能取代了解这一行业的个人。律师组成的集体不能取代一个扳道工。病人组成的集体不能取代一个医生。这样的想法都是错的。集体并不会给无知的人以知识，而只能掩盖住无知者的无知。如果要在责任行政岗位上安排一个人，那么不仅别人，还有他自己，都要清楚地明白这个人到底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但是，如果一个由无知、缺少历练的工作人员组成的集体占据着一个需要专业知识的纯粹实践岗位，那就糟糕透了。集体成员会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相互扯皮，而他们的无助会给动摇所有的工作，造成混乱。工人阶级对提高自身管理能力，也就是学习，深感兴趣。但

这在工业领域中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工厂管理处定期向全厂汇报，讨论当年或当月的经济计划，而工厂经理或特别委员会将登记所有对工业组织事业表现出认真兴趣的人，并对其教授适当的课程，而课程本身将与工厂本身的实际工作紧密相关；在此之后，他首先会被安排到需要稍微负点责任的岗位上，然后被安排到更大的岗位上去。我们会将通过这一途径延及到数千人，然后是数万人。关心三人领导或是五人领导的人不是工人群众，而是苏维埃工人官僚机构中那更落后、更弱小、更不自立的部分人。一个先进的、自觉的、坚定的管理者自然会想把整个工厂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向自己和他人表明自己能够管理。但软弱的管理者把握不住自己的脚步，只想黏着别人；因为他的软弱会被他人的陪伴掩盖起来。在这种集体领导制中，有一个非常深的危险，那就是个人责任开始消亡。一个工人如果有能力但没经验，就需要一个管理者；在管理者的臂膀下，他将学习，而明天我们就能把他任命为一个小工厂的负责人。这就是他要前进的路。而在一个随意组织起来的领导集体中，每个人优缺点都是不明晰的，责任感也会不可避免地消亡。

我们的决议当然指的是用系统的方法达到一人专责制，而不是一挥而就。这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和组合。在一个工人可以独立管理的地方，我们就会让他来当工厂的管理人员，并给他配备专家作为助手。在一个专家优秀的地方，我们可以让他来当厂长，给他配两三个工人作为助手。最后，如果某个地方的领导集体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工作能力，我们就会保留它。这是唯一严肃对待事业的方法，也是唯一能够正确组织生产的方法。

在我看来，有必要还要考虑到社会教育的性质。我们的工人阶级领导层太薄弱了。这些人谙熟地下工作，长期从事革命斗

争，出过国，在监狱和流亡途中读过很多书，有政治经验，视野开阔，是工人阶级中最宝贵的部分。然后是年轻的一代，他们自1917年以来就自觉地参与了我们的革命。这是工人阶级中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在任何地方——苏维埃建设、工会、党务工作和内战前线，这些无产阶级的精华都发挥着领导的作用。在这两年半时间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工作就包括将工人的精华从一个前线转移到另一个前线的机动工作。从农民群体中出来的更深层的工人，虽然是情绪是革命的，但还很缺乏主动性。我们俄罗斯庄稼人患着群居心态、丧失个性的病，这也是我国反动的民粹主义颂扬的心态，也是列夫·托尔斯泰以普拉顿·卡拉塔耶夫¹⁰的形象赞扬的心态——农民与村社融为一体，服从土地。很明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不是普拉顿·卡拉塔耶夫，而是有思想、有进取心、有责任感的工人。必须培养工人的这种个人主动性。资产阶级中的个人原则是自私的个人主义和竞争。工人阶级中的个人原则和团结的、兄弟般的合作都不冲突。社会主义的团结不能建立在非人格化和群居心态的基础之上。在此间，集体领导的背后往往藏着这种非人格化的现象。

工人阶级充满力量、才能和天赋。它们需要被曝光，在进取中被发现。行政技术领域的一人专责制原则正有利于此。这就是为什么它高于集体领导原则并更加富有成效。

报告的结语

同志们，孟什维克发言人，特别是阿布拉莫维奇的论点首先反映了他与生活及其任务完全脱节。一位观察者站在河岸边，必须游过这条河，而这位观察者却忙于研究水的性质和水流的力量。要游过去——这就是任务！我们的考茨基之流踌躇而不知所

措。他说：“我们不否认游过去的必要性。可是，我们作为现实主义者，看到了危险，而危险不只一个，而有好几个：水流很急，岩石很多，人们很累等等。但如果有人跟你们说我们否认游过去的必要性时，你们要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如何都并非如此。即便是在 23 年前，我们也没有否认游过去的必要性……”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首先，孟什维克说，我们不反对也从未反对过国防的必要性，因此我们也不否定军队。其次，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劳动义务。让我问问你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某些小宗教派别以外，哪里还有人会否认“一般意义上”国防的必要性呢？然而，这件事情也并没有因为你们的抽象承认而向前迈进一步。当涉及到真正的斗争并建立一支真正的军队来对付工人阶级的真正敌人之时，你们当时又做了什么？在没有否定一般意义上的国防的情况下进行了抵制和破坏。你们大声讲，并且在报纸上写道：“打倒内战！”而此时，白卫军把我们团团围住，把刀架在了我们的脖子上。现在，你们又马后炮地肯定了我们已经胜利了的国防，把批评的目光转向了新的任务，并教训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不否定劳动义务，但是……不要法律强制。”然而，这句话有一个荒唐无比的内部矛盾。“义务”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强制的因素。一个人被迫、有义务做某事，如果他不做，就会受到惩罚。在这里，我们将谈到强制的种类。阿布拉莫维奇说：“经济压力，好；法律强制，不好。”金属工会工人的代表戈尔茨曼¹¹出色地证明了这一建制的空洞性。在资本主义下，也就是在“自由”劳动的体制下，经济压力就已经与法律强制密不可分，现在更是如此！

我在自己的报告中试图阐述清楚：只有同时运用各种方法——经济利益刺激、法律强制、内部协调的经济组织的影响、镇压力量，以及最重要的思想影响、鼓动、宣传，最后再是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才能使劳动者习惯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新劳动形式，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多管齐下，才能极大提高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水平。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利益已经不可避免地倚靠国家物质力量的法律强制相结合的话，那么在苏维埃国家，也就是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中，经济强制与法律强制就根本无法分离了。国家掌握我们所有最重要的企业。当我们对车工伊万诺夫说“你现在必须去索尔莫夫斯基工厂工作，如果你拒绝，你将得不到口粮”的时候，这算是经济压力还是法律强制？他不能去别的工厂，因为所有的工厂都在国家手里，而国家不允许换单位。由此可见，经济压力在此与国家镇压的力量结合到一起了。阿布拉莫维奇显然希望我们调节劳动力分配，只利用涨工资、发奖金之类的手段来吸引合适的工人到最重要的企业。很明显，这里就是他的全部观点。但如果问题是这样被提出来的，任何严肃的工会运动工作者都会意识到这是纯粹的乌托邦。我们不能指望劳动力在市场上自由流动。如果要这么做，国家手里需要拥有充足的粮食、住宅以及交通资源以供机动——而我们现在尚未创造这类资源。如果不按照经济机构的命令来大规模、有计划地重新部署劳动力，我们将一事无成。在此，我们面临着进行强制的时刻以其所有的经济必要性。我给你们读过一封从叶卡捷琳堡发来的关于第一劳动军工作进展的电报，它说有 4000 多名熟练工人来到了乌拉尔劳动义务委员会麾下。他们从何而来？主要来自原来的第三军。他们没有被送回家，而是被送到了指定的地点。他

们被从军队移交到了劳动义务委员会的手上，后者将对他们分门别类，并把他们送往工厂。自由主义者会说，这是在“强奸”个人自由。然而，绝大多数工人都心甘情愿地走上了劳动战线，就像他们以前走向战争前线上一样，他们是出于一种更高的利益需要才这么做的。有一部分人是违背自己的意志去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强制送达指定地点。

很清楚，国家当然必须通过奖金制度提升最优秀工人的生活条件。但这并没有将国家与工会拒之门外——没有它们，苏维埃国家将无法建设工业。相反，它们还被赋予了用于工人身上的新权利。工人将不会简单地与苏维埃国家讨价还价——不，他对国家有义务，全方位地服从于它，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国家。

阿布拉莫维奇说：“倘若你们告诉我们说，一切的事情只是和工会纪律有关，那就没什么好争论的了。但是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军事化？”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和工会有关，但这里指的是新的、有生产力的工会下的新纪律。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苏维埃国家——这是我国的考茨基之流不能理解的事情。当孟什维克鲁布佐夫¹²说，我的报告中的工会所剩无几时，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他理解的工会，也就是工联主义的工会确实所剩无几，但在苏维埃条件下，工人阶级的专业生产组织承担着最重大的任务。什么任务？当然，不是以劳动者的利益为名与国家进行斗争的任务，而是与国家携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这样的工会是一个根本上的新组织，它不仅不同于工联，而且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之下的革命工会，正如无产阶级的统治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统治阶级工人阶级的生产性工会与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性工会任务不同，方法不同，纪律不同。在我们这里，所有工人都有义务加入工会。孟什维克反对这么做。这很好

理解，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根本由来。考茨基之徒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也反对它产生的所有东西。经济强制和政治强制都只是工人阶级专政在两个密切相关的领域里的不同表现形式。的确，阿布拉莫维奇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不会有强制，强制原则与社会主义相悖，在社会主义中起作用的是责任感、劳动习惯和劳动吸引力，等等。这点毋庸置疑。但只不过这个毋庸置疑的真理需要补充。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下，强制机器本身——国家将不复存在，而将完全消解在生产性和消费性公社之中。然而，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需要精力最高程度国家组织的紧张状态。而你们与我们一道，正在经历着这一时期。就像一盏油灯在熄灭之前闪烁明亮的火焰那样，国家采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也就是最为无情的国家，而这种国家在消失之前势必会全方位地包裹住公民的生活。阿布拉莫维奇以及他代表着的整个孟什维主义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国家专政的历史阶段，并被它绊倒了。

在过去，除了军队以外，没有其他组织像处于最艰难的过渡时期的工人阶级国家组织那样，将如此严厉的强制力笼罩在人们身上。这正是我们谈到劳动军事化的原因。孟什维克的命运就是落后于事件，落后于人，承认革命纲领中那些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的部分。今天的孟什维主义并不质疑镇压白卫军和红军逃兵的合法性（尽管有所保留），在遭受了自己与“民主”的悲惨经历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它好像事后才明白，在面对反革命团体的时候，不可能再去说“社会主义没必要动用红色恐怖的手段”之类的话。但在经济领域，孟什维克还在试图打发我们的儿孙——尤其是孙子。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沉重遗产和未结束内战的环境之下，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发展经济。

孟什维主义就像所有的考茨基主义一样，沉迷于民主的陈词滥调和对社会主义的抽象议论之中。人们一再发现，对它来说，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并不存在。因此，它的批判、揭示、计划和处方都是毫无生机的。问题并不在于二三十年后会如何（那时当然会好得多），而是今天如何走出崩溃，如何分配劳动力，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我们如何处理我们从乌拉尔的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四千名技术工人。难道要放他们去四面八方，然后说“同志们，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不，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要把他们送到军用火车上，发往工厂和车间。

阿布拉莫维奇感叹道：“你们的社会主义与埃及的奴隶制有什么不同？这与法老建造金字塔的方式别无二致，就是迫使群众劳动。”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可真是无与伦比的比喻呀！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个小事被遗漏了，那就是政权的阶级性！阿布拉莫维奇认为埃及的体制和我们的没有区别。他忘了埃及有法老，有奴隶主，也有奴隶。埃及农民并不是通过自己的苏维埃决定建造金字塔的（当时有一个基于种姓等级的社会制度），劳动者被敌对阶级强迫工作。在我们这里，强制是由工农政权以劳动群众的利益为名进行的。这就是阿布拉莫维奇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们在社会主义学校里学到的就是，所有的社会发展都建立在阶级及其斗争的基础之上，整个生活的进程都是由政权的阶级性质和推行政策的目的决定的。这就是阿布拉莫维奇不明白的事情。他可能通读了《旧约》，但对他来说，离社会主义还隔着七本经书。

阿布拉莫维奇不考虑国家阶级性质，坚持自由主义的肤浅类比，也许可以（过去孟什维克也不止一次这样做）把红军和白军混为一谈。两者都是以农民群众为主进行了动员。两者都进行过

强制行为。两者都有一些来自沙皇专制学校的军官。两者还用同样的步枪，同样的弹药——区别在哪里呢？先生们，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都由一个基本属性决定：谁在掌权，是工人阶级还是贵族，是法老还是庄稼人，是白卫军还是彼得堡无产阶级？这些是有区别的，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农民是由工人动员起来的；对高尔察克来说，则是由白军军官动员起来的。我们的军队集结起来，日渐强大，而白匪溃不成军。苏维埃和法老的政权是有区别的——彼得堡无产者通过射杀彼得堡钟楼上的法老¹³来开始自己的革命，这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某位孟什维克发言人试图把我描绘成一般的军国主义的辩护人。根据他的描述，说我在为德军国主义辩护也一点也不为过。你们看，“我一直在证明，德国的士官——是自然界的一个奇迹，他做的一切都是无法模仿的……”我到底说了什么呢？我讲的，只是那种最完整、最精炼、最尖锐地表达了社会发展的所有特征的军国主义；判断我说的军国主义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从政治或者社会主义的方面来看，哪个阶级掌权下的军国主义；第二，从组织方面来看，我说的是一种具有严格分配义务、精确相互关系、无条件的责任以及严厉的执行力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军队是残酷压迫并镇压劳动者的机器；社会主义军队是解放并保卫劳动者的工具。但局部无条件地服从其整体是所有军队的共同特征。严格的内部制度与军事组织是不可分开的事物。在战争中，任何的马虎、粗心，甚至是小小的不精确，往往都会带来最严重的伤亡。因此，军事组织努力将明确性、正式性、关系的精确性和责任感提高到最高水平。这种“军事”素质在任何领域都是宝贵的。在这一点上我曾经也说过，每个阶级都重视自己

那些在许多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成员来为自己服务。对德意志君主和艾伯特共和国来说，一个从军营里出来的德国富农，作为一个军士长都比没有经受过军事训练的同样的富农要更有价值。德国铁路机构之所以有很高的水平，是因为招聘军士长和军官担任交通部门的行政职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有必要向军国主义学习。我国最著名的专业工人之一齐佩洛维奇¹⁴同志在这里向我们作证说，一个经过了军事训练的专业工人，比方说他如果担任过一年团政委的职务，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很差地完成专业工作。他回到工会后，从头到脚都还是以前的那个无产者，因为他曾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战；但他回来以后会变的更加坚强、成熟、独立和果断，因为在重大负责岗位上任过职。他曾必须领导数千红军战士，而这些红军战士的觉悟程度不等，其中大多数是农民。他与他们同甘共苦，共同进退。即便遇到过指挥人员背叛、富农叛乱、惊慌失措的情况，他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约束缺乏意识的群众，引导他们，用自己的榜样来激励他们，惩罚叛徒和自私自利者。这是伟大而宝贵的经验，而他离开团政委的岗位并回到工会后，也不会变成一个糟糕的组织者。

在集体领导问题上，阿布拉莫维奇的论点就像他在其他任何问题上的论点一样毫无生气——就如同一个站在河边的局外人一样。

阿布拉莫维奇向我们解释说，一个好的领导集体要好于一个坏的领导人，而一个好的领导集体里应该包括一个优秀的专家。说得很精彩，但为什么孟什维克不给我们创造出数百个这样的集体呢？我认为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应该可以为他们找到足够的用武之地。但是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工作者，必须用我们已经拥有的所有材料来进行建设。我们的专家，其中三分之一是认真

的，有知识的；三分之一是半认真的，半有知识的；最后三分之一则是毫无用处的。而在工人阶级中，存在着许多有天赋、有奉献精神而且精力充沛的人。不幸的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拥有必要的知识和经验。其他人有性格和能力，但没有经验或知识。而另外一些人这些全都没有。必须从这些材料中创造出工厂和其他地方的管理处，而且此处也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清的。首先，需要选拔出所有在经验中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管理企业的工人，我们就给他机会自己立足——这些人会自己希望实行一人专责制，因为工厂管理不是给落后的人准备的学校。一个坚定的、对行业有所了解的工人会想要进行管理。如果他做了决定下了命令，那他的决定和命令就必须得到执行。如果他将来被赶走，那是另一回事，但只要他还在做主——苏维埃、无产阶级主人，他就会完全、整个地管理企业。如果他被放进了一个由更弱的人负责的管理集体之中，就不会产生什么好结果。这样的工人管理人员需要有一两个专家助手，这取决于企业本身。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人行政人员，但是有一个认真而多识的专家，那么我们会让他来做企业的领导，再给他两三个优秀工人作为助手，这样的话，专家的每个决定都会被他的助手们知道，但助手们无权推翻专家的决定。他们将逐步与专家合作，学习东西。而过了六个月或一年后，他们就可以独立上岗了。

阿布拉莫维奇用我的话举了那个理发师指挥部队的例子。这是没错的！然而，阿布拉莫维奇不知道的是，如果我们的同志——共产党员开始指挥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一个军，那也是因为他们曾经是专家指挥官手下的一个政委。专家承担责任，并知道如果犯了错误，就得担负起全部的责任，而不能说自己只是一个“顾问”或“领导集体成员”。现在在我们的军队中，大多数指

挥岗位——尤其是低层岗位，也就是政治上最重要的那些岗位，都是由工人和先进农民担当的。而我们是怎么开始的？我们把军官放到指挥岗位上，把工人放在政委岗位上，然后工人们就学到东西，而且学得很好，学会了如何打败敌人。

同志们，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时期，也许是最困难的时期。民族和阶级生活中的困难时期对应着严格的措施。路走得越远，就越轻松，每个公民都会越来越感到自由，无产阶级国家的强制力就越来越让人难以察觉。如果那个时候孟什维克的报纸还存在的话，那么我们也许还会允许孟什维克办自己的报纸。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专政的时代，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如此。而孟什维克则继续破坏这种专政。当我们在内战前线同敌人浴血奋战、保卫革命时，孟什维克的报纸写道：“打倒内战！”我们不可能允许出现这种现象。专政就是专政，战争就是战争。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高度集中力量进行国家经济复兴的时刻，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孟什维克仍然忠实于他们的反革命天职：他们发出的声音仍然是怀疑和崩溃，松动和破坏，不信任和瓦解。

当阿布拉莫维奇，在这个有一千零五名代表了俄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参与的、孟什维克不到5%、共产党人占90%的大会上，告诫我们“有一小撮人取代了人民，不要被这种方法迷惑了”，难道不荒谬绝伦、可笑至极吗？孟什维克代表说：“一切通过人民，劳动群众之上不要监护人！一切通过劳动群众，通过劳动群众的自主！”他们还说：“阶级不能被这些论点说服！”看看这个大厅吧：这就是阶级！工人阶级就在我们面前，和我们在一起，正是你们这群微不足道的孟什维克试图用小市民的论调来说服他们！你们想成为这个阶级的监护人。而同时，他们又有极高的自主能力，这种

自主能力说明他们现在已经抛弃了你们，正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行！

注释：

[1] 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 1920 年 4 月 6 日至 13 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听取了下列报告：（1）关于政治形势概况——列宁同志的报告；（2）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托姆斯基同志的报告；（3）关于劳动人民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施密特同志；（4）关于工会运动的任务——托姆斯基同志的报告；（5）关于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活动——李可夫同志的报告；（6）经济发展的任务——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7）组织问题——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报告；（8）国际形势报告——拉狄克同志等……

大会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问题，这是因为清除了国内的白卫军。与波兰的战争威胁仍然悬而未决。最大的争论是由劳动军事化问题及其相关的工会任务引起的。以阿布拉莫维奇、唐恩、马尔托夫、鲁布佐夫等人为首 33 人孟什维克反对派，出席了本次代表大会，强烈反对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托洛茨基同志在工会大会上捍卫的各种措施。

根据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听取了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后决定：

批准俄共第九次全俄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建设的提纲，并指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用这些提纲作为能够使苏俄走出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的唯一指导方针，有力推动其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从而最终巩固工人阶级对资本的胜利。

此外，为了驱散国际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围绕俄国劳动军事化问题的恶意鼓动，大会特别呼吁向世界无产阶级说明在经济建设领域采取的措施。

致所有国家的工人。

工人同志们！

最近几周，电报、广播、出版物，这些强大的资本主义欺骗工具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你们通报了苏维埃俄国的劳动军事化。帝国主义的走狗试图从这一事实中获得双重利益：诽谤社会主义俄国，并为自己对劳动人民的

暴力辩护。

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超过三百万产业工人的一千多名代表认为，我们有责任像兄弟般地警告你们资产阶级舆论对于苏俄组织劳工的方法的赞扬和抹黑。

帝国主义的屠杀、非人道的封锁以及丘吉尔和克里蒙梭雇佣军的不断进攻，蹂躏了我们的经济。我们现在需要尽最大的力量，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带领国家走出最严重的灾难和贫困。这项任务要求苏维埃俄国的每一个劳动者都表现出极大的力量和最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正如有阶级意识的红军战士随时准备为劳动人民的事业在前线献出生命一样，每一个正直的男女工人现在都必须准备为拯救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而竭尽全力。除了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密集生产劳动之外，我们没有也不能有任何其他任务、思想和忧虑。严格的劳动纪律、不可动摇的团结和经济计划的实现——我们称之为劳动军事化。在我们之上，没有帝王将相，没有资产阶级的议员和部长，没有地主、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没有资产阶级的将军、法官及其刽子手。剥削者及其掠夺性的国家并没有自上而下地规定我们推进劳动军事化。我们工人自愿承担对革命和后代的责任所要求的严酷的劳动义务。我们辛勤工作的成果不会养肥寄生虫，而会改善群众生活。我们，俄国劳动人民，为自己立法。在决定了劳动军事化之后，我们通过自己的无产阶级组织，用自己的双手实行它。

各国工人！在斗争和劳动的巨大压力中，我们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问候。我们满怀信心地等待那个很快就会到来的时刻。那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将推翻他们的压迫者，铲除古老的暴力、欺凌、酷刑的遗产，并把我们的世界变成自由人类的繁荣财富。——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

（Томский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

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中译者补注 2] 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施密特

（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мидт，1886年12月29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7年至1911年流亡德国，1911年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担任彼得格勒市委书记，1917年11月至1918年10月任副劳动人民委员，1918年至1928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28年至1930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1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18年至1919年、1925年至1930年两次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6年至1930年两次担任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中译者补注 3]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

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中译者补注 4] 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

(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 1878年3月28日——1952年8月12日)，原姓德里佐(Дридзо)，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贫穷的犹太教师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铁路工人中间开展组织工作。1903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被捕，被流放到喀山。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在1905年10月因袭击喀山警察局而被捕，三周后获释，12月又在圣彼得堡被捕，逃亡哈尔科夫后再次被捕。1906年7月至1908年5月被关押在狱中，随后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但在押送途中逃脱，从此流亡国外。1917年6月回国，并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理事会书记。1918年1月11日被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党。1919年12月重新加入俄共(布)。1921—1937年间担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改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苏德战争期间担任苏联新闻局副局长。1945—1948年担任苏联新闻局局长。1949年1月26日因卷入“犹太阴谋”而被捕，1952年7月18日被判处死刑，8月12日被处死。1955年11月22日平反。

[中译者补注 5]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 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至1923年。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

[2]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从内战向和平经济发展

过渡的气氛中召开的。由内战引起的各种问题直到 1920 年一直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生活重点。随着红军的胜利，恢复因内战而疲惫不堪的国民经济成了第一要务。大会有 500 多人参加，有 249 人有投票权，其中 50% 以上是共产党员。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估（李可夫同志的报告）、劳动组织和普遍劳动义务（托洛茨基和托姆斯基同志的报告）、管理经济生活，以及关于制定工业管理指令（米柳京同志的报告）。大会在其决议中完整表达了旧经济政策的思想。——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米柳京

（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Милютин，1884 年 11 月 5 日——1937 年 10 月 30 日），1903 年加入孟什维克。1910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 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萨拉托夫苏维埃主席。1917 年 7 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1917—1918 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 年 11 月 8 日—11 月 19 日任农业人民委员。1917 年 11 月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关“左翼联合政府”的立场，辞去农业人民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但 11 月 29 日即承认错误，撤回申请。1917 年 11 月—1918 年 3 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部长。1918—1921 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1920—1922 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8 年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7 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副主席。1928—1934 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7 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 年平反。

[3] 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于 1920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4 日举行。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有 716 人，其中有投票权者 554 人，代表 611978 名党员。代表大会的顺序如下：（1）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同志的报告；（2）经济发展的当前任务——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3）工会运动；（4）组织问题；（5）共产国际的任务；（6）合作；（7）向民兵制度的过渡等等。

辩论的中心是经济建设问题，特别是关于劳动“军事化”、“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及与经济任务相关的专业工作形式的问题。——俄文版编者注

[4]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 1843—1904）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他最重要的著作有《唯物史观论丛》和《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参见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作品第七卷，由达·梁赞诺夫编辑）和《批判者的批判》。——俄文版编者注

[5] 宪法第2章第5节第18条写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承认劳动是全体公民的义务，并宣告：‘不劳动者不得食。’”——俄文版编者注

[6] 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参加劳动义务的程序，1922年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法典》第3章写道：

“（11）在特殊情况下（抗击自然灾害，缺乏人力来完成最重要的国家任务），除第12—14条规定的公民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体公民都可以按照人民委员会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授权的机构的特别决议所规定的劳务程序参与劳动。

（12）下列人员不应实行劳动招聘：（a）18岁以下的；（b）45岁以上的男性和40岁以上的女性。

（13）下列人员免征劳务：（a）因疾病或受伤而暂时丧失工作能力、处于康复期的人；（b）生育前8周的孕妇和生育后8周的女性；（c）处于哺乳期的女性；（d）因劳动和战争而残疾的人；（e）有8岁以下子女的女性，且子女无人照料。

（14）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劳动人民委员会根据健康状况、家庭状况、工作性质和生活条件，为某些类型的劳务规定了额外的例外和优待条件。”——俄文版编者注

[7] 泰勒制是生产过程中基于精确科学数据的一种劳动组织体系。该

制度由美国工程师泰勒开发和制定，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在资本主义下，泰勒制是从工人那里吸取剩余价值的一种额外手段，因为结合了生产过程的科学组织的要素（在这种制度下）与“血汗工厂”最集中的方法。

——俄文版编者注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年3月20日—1915年3月21日），美国机械工程师，“泰勒制”科学管理方式的发明者。

[8] 军警暴虐制度（Аракчеевщина）是战争部长阿拉克切耶夫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引入的军事屯垦（Военные поселения）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驻扎在俄国各地的军队结合了兵役与国家经济服务。军队强行管制农业，让农民非常凄惨，因为剥夺了他们的自主管理时间的权力。军事屯垦制度能让军警政权扩大对周围人口的政治和行政影响，经常引起农民暴动和大规模逃亡。当然，根据沙皇政权的一贯苛政，这些人都会受到惩罚。——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阿拉克切耶夫（Алекс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Аракчеев，1769年9月23日—1834年4月21日），俄国政治家和军事领导人，亚历山大一世的宠臣。

[9] 阿布拉莫维奇是俄罗斯孟什维主义和崩得的领导人之一。目前，他在柏林与唐恩一起出版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社会主义公报》，日复一日地进行反苏维埃宣传。——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1880年7月21日—1963年4月11日），原姓莱因（Рейн），出身于拉脱维亚陶格夫匹尔斯（Daugavpils）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时期即参加革命运动，1901年参加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1年流亡国外。1914年一战爆发后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反对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离开俄国，定居柏林，主办孟什维克流亡者的报纸，参与创立第二半国际，第二国际与第

二半国际合流后，曾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他在纽约协助主办意地绪语的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

[中译者补注 2] 崩得 (Бунд)，全称“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意第绪语：פּוילן און רוסלאַנד אַלגעמיינער אַרבעטערסבונד אין ליטע；俄语：Всеобщий еврейский рабочий союз в Литве, Польше и России)，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

[10] 卡拉塔耶夫是一位农民，坚信能控制人类生活的更高力量，并对它产生共鸣。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中描写过这个人物。——俄文版编者注

[11] 戈尔茨曼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前工团主义者，自1917年起成为俄共成员。著名的电气化事务主管。（译者注：指他曾担任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电气化管理领导。他最著名的职位是第一任民用航空总局领导。）——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阿布拉姆·季诺维耶维奇·戈尔茨曼（Абрам Зиновьевич Гольцман，1894 年 12 月 24 日—1933 年 9 月 5 日），出身于装卸工人家庭。1910 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1 年被捕并被判处 1 年苦役。1913 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纳里姆。1916 年越狱。1917 年再次被捕，二月革命后获释。1917 年 4 月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1920 年任全俄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2—1925 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要电工局局长。1925—1933 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1933 年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3 年因飞机失事殉职。

[12] 鲁布佐夫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成员，老工会运动家。1920 年，他积极参加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领导人数不多的孟什维克反对派，反对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劳动军事化、普遍劳动义务等决定。——俄文版编者注

[13] 1917 年 2 月底，内务部长普罗托波夫用这个词称呼被派往屋顶和钟楼的沙皇警察。——作者注

[14] 齐佩洛维奇是老社会民主党人，敖德萨第一个社会民主圈子的组织者。工会运动者。著有《俄罗斯的辛迪加与托拉斯》。1919 年加入俄共。——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格奥尔基·弗拉基米洛维奇·齐佩洛维奇（Григо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Циперович，1871—1932），苏联经济学家。1888 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4 年在敖德萨因领导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而被捕，1895 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5 年革命期间在哈尔科夫参加革命活动。1907 年移居彼得堡，继续参加工人运动。1911 年再次被捕，五个月后获释并流亡国外。一战期间是孟什维克国际派。二月革命后回国，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经济部门工作，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编辑，不久即被开除出编辑部，随即进入《新生活报》工作。十月革命后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18 年任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书记。1919 年加入俄共（布）。1920 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1929 年任列宁格勒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委员、列宁格勒

第八章 劳动组织的问题

执行委员会委员、列宁格勒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29—1932年任列宁格勒工业学院院长兼共产主义学院技术与技术政策研究所所长。1932年逝世。

第九章 卡尔·考茨基，他的学派与著作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鲍威尔、伦纳、希法亭、马克思·阿德勒¹、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过去常常与考茨基学派对立，认为后者用隐蔽的机会主义来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事实证明，这是彻底的历史误解，欺骗了一些人很长时间，但最终真相大白：考茨基是奥地利式冒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和最有成就的代表。马克思的实际学说是行动、进攻、发展革命力量、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法则，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却变成了被动和逃避、庸俗历史和保守的学派。也就是说，它缩小了自己的任务范围，只负责解释和证明，而非指导行动和推翻，沦为当下议会和机会主义需要的仆人，用狡猾的诡辩取代辩证法。最后，他们尽管还说着革命的漂亮话，但还是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最可靠的支柱，支撑着它上面的祭坛和王座——如果后者坍塌落入深渊，那也不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过错。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厌恶和恐惧革命行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解释昨天得到的深邃思想，也有勇气预言明天。但它较少思考今天——这是大行动的先决条件。对它来说，今天总是被琐碎的机会主义忧虑带来的压力迷惑，然后这点就被解释为过去和未来之间不可改变的联系。

在发现主动性被妨碍，革命行动被阻挠的原因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是不遗余力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学术性的、虚荣的有关被动与投降的理论。当然，正是在奥地利，这个被徒劳的民族矛盾困扰着的巴比伦，体现了生存与发展之不可能的国家，诞生和巩固了丧失行动能力的伪马克思主义，绝非偶然。

最出风头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某种“个性”。他们经常在各种问题上意见相左。他们内部甚至有政治分歧。但总的来说，他们同根生。

卡尔·伦纳是这类人中最出风头、最花哨、最自恋的代表。他文学模仿方面的天赋——或者换个词，风格造假，是出类拔萃的。他周日的“五一”文章运用了最革命风格的文字。由于文字和它们的组合在一定范围内有着自己的生命，伦纳的文章点燃了许多工人心目的革命火焰，而作者自己显然从来都不知道。

从奥匈帝国文化的混杂性上看，伦纳同他的兄弟们相比，更加追求外表、等级和头衔。从本质上讲，他始终只是一个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词句的帝国皇室官员罢了。

伦纳曾写过有关卡尔·马克思的革命悲怆文章，后来一转成为一个歌剧式的总理，阐述自己对北欧君主的尊敬与爱戴之情——这是历史上最为合理的悖论之一的代表了。

奥托·鲍威尔比伦纳更具学者风范，更单调，更严肃，更无聊。不能说他没有阅读书籍、收集事实并得出结论的能力——这是就他人进行的实际政策给他留下来的那些任务而言。鲍威尔没有政治意志。他的主要技艺在于笼统地切割最尖锐的实际问题。他的思想（政治思想总是与意志并存的）缺乏勇气。他的作品始终只是大学研讨会中天才学生学术作品的汇编。他的身上深刻地体现了奥地利机会主义者最可耻的行为和德奥社会民主党面对有产者政权时最卑微的奴性。他有时会恭敬地反对形式，但总是同意实质。当他在反革命斗争中引用了一堆反对革命行动的论据和事实，才能说他表现出了一种政治气质和能量。他最辉煌的那个时期（1907年后）还太年轻，当不了议员，而是担任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秘书，为党团提供材料、数据、思想的代用品，指示并写

笔记，似乎以伟大行动的鼓舞者自居。实际上，他只是代议制机会主义者的替代品和造假者。

马克斯·阿德勒代表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相当复杂的一类人。他是一个抒情诗人，一个哲学家，一个神秘主义者——一个消极哲学的抒情诗人，就像伦纳的政论家和律师、希法亭的经济学家、鲍威尔的社会学家那样。马克斯·阿德勒心满意足地接纳了维也纳小市民式社会主义和哈布斯堡国家的框架，但还是被塞进了一个立体的世界。他代表的那种人混合了浅薄的宣传、政治的耻辱、徒劳的哲学努力，以及廉价的、纸上谈兵式的理想主义，散发着淫荡的、令人厌恶的气息。

鲁道夫·希法亭和其他人一样就是个平庸之辈，他几乎是作为一个造反者进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但却是一个具有奥地利“气质”的造反者，也就是说，随时准备不战而屈人之兵。希法亭把培养了他的奥地利政治的外在流动性和小题大做误认为是革命的主动性；在长达十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温和地劝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但他很快就丢掉了奥地利——维也纳人的那种大惊小怪，很快就服从了柏林的机械节奏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动的精神生活。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到了一个纯粹的理论领域，在那里确实没说过一句举足轻重的话——没有一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领域说过一句举足轻重的话，但他还是在那里写了一本算是比较严肃的书。他背着这本书，就像一个挑夫挑着重担一样，进入了革命时代。但是，即使是最有学问的书也不能替代意志、主动性、革命天赋、政治决心，没有这些，行动都是不可想象的……希法亭接受过医学训练，很容易有警惕性；尽管他受过理论训练，但在政治领域确实最原始的经验

主义者。对它来说，今天的主要任务是不跳出过去遗留给他的困境，为保守主义和小市民的浮躁找到科学的、经济的辩护。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代表的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最缺乏平衡的一类人。他继承了父亲的政治气质。在与奥地利条件下存在的不安定因素进行的浅薄的、令人疲惫的斗争中，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让他的讽刺性怀疑主义破坏了其世界观里完全革命性的基础。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气质使他多次与父亲建立的学派对立。在很多时候，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似乎革命性地拒斥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过去是，现在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完成。他的爆炸性的革命性标志着奥地利机会主义对急剧崩溃的绝望——它不时担心自己的消失。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骨子里就是怀疑论者：他不相信群众，不相信群众的行动能力。当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军队取得大胜，走到波茨坦广场号召被压迫的群众公开战斗的时候，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却走进一家资产阶级餐馆，在那里杀死了奥地利的首相。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用他唯一的一颗子弹试图结束自己的怀疑主义，但没有成功。在这种歇斯底里的努力之后，他愈发迷茫。

黑黄色的社会爱国主义匪帮（奥斯特里茨²、莱特纳³等人）向恐怖分子阿德勒洒下了他们懦弱而悲情的所有泪水。但是当尖锐的时刻过去，浪子带着烈士的光环从苦役监狱回到自己的父辈家中时，他以这种形式证明了他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双重、三重价值。恐怖分子的金色光环被党内经验丰富的造假者蚀刻成了光亮剔透、蛊惑人心的纪念币。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群众面前成为了奥斯特里茨案和伦纳案的宣誓担保人。所幸，奥地利工人越来越觉得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感伤和抒情、伦纳的高调粗

俗、马克斯·阿德勒的高调无能和奥托·鲍威尔那分析性的自以为是是一回事。

在革命时代的伟大任务面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理论家彻底暴露了思想的懦弱性。希法亭在把苏维埃制度纳入艾伯特—诺斯克宪法的不朽尝试中，不仅表达了他自己的精神，而且还表达了整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精神。随着革命时代的到来，该学派试图成为考茨基的左翼，就像革命前它在考茨基的右翼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斯·阿德勒关于苏维埃制度的观点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维也纳的折衷主义哲学家承认了苏维埃的价值，甚至有勇气收养它们。他明确宣称它们是社会革命的机器。当然，马克斯·阿德勒是支持社会革命的。但他可不支持暴力的、街垒的、恐怖的、血腥的革命，而是理智的、经济的、平衡的、合法的、合乎哲学的革命。

苏维埃并不符合宪法中的三权分立“原则”。但是，马克斯·阿德勒并没有被这个事实吓倒。（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有不少白痴认为这是苏维埃制度的巨大缺陷！）相反，作为工会律师和社会革命的法律顾问，马克斯·阿德勒甚至觉得权力的合并是一种优势，认为苏维埃能直接表达无产阶级的意志。马克斯·阿德勒赞成无产阶级直接表达自己的意志，但不认可他们通过苏维埃直接夺取权力。他提出了一个更可靠的方法。在每个城市、地区和街道，工人苏维埃必须“控制”警察和其他官员，将“无产阶级的意志”强加给他们。然而，在塞茨、伦纳和考茨基的共和国中，苏维埃的“国家法律”地位将是什么？对此，我们的哲学家回答道：“工人苏维埃最终将尽可能掌握较多的国家法律权力，

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活动中确保了这种权力。”（《工人报》，第179号，1919年7月1日）

无产阶级苏维埃应该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机构，就像以前根据改良主义的理论，所有无产阶级组织都应该成长为社会主义一样，然而，由于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未曾预料到的四年闹剧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在没有社会革命的情况下无法有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另一方面，苏维埃有计划地进行社会革命的前景——不通过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的方案出现了。

为了确保苏维埃不会在地区和街道的任务中陷入困境，勇敢的法律顾问建议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及其走卒依然掌握政治权力。但在地区和街道，苏维埃控制着法警和警察。为了安慰工人阶级，同时集中其思想和意志，马克斯·阿德勒在星期天宣读关于苏维埃的国家—法律地位的论文，就像过去他宣读关于工会的国家—法律地位的论文一样。

马克斯·阿德勒承诺：“这种方式可以调整工人苏维埃的国家—法律地位。国家公共生活的整个路线会保证它们的分量和重要性，而且，在没有苏维埃专政的情况下，苏维埃制度将获得一种影响力，在苏维埃共和国中也不可能有这种影响力；同时，要取得这种影响力，不必掀起政治风暴，不必破坏经济。”（同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方面，马克斯·阿德勒仍然坚守奥地利的传统：在不与检察官先生争吵的情况下进行革命。

这个学派的开山鼻祖和最高权威是考茨基。他在一丝不苟地维护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监护人的声誉的同时，特别是在德累斯顿单方会谈和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不时地反对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最妥协的活动。像已故的维克多·阿德勒一样，鲍

威尔、伦纳和希法亭——所有人都认为考茨基太过迂腐，太过笨拙，但却把他当成是无为主义教会的德高望重、还能发挥余热的教父和导师。

考茨基在自己的学派达到革命高潮时，即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开始忧心忡忡。当时他认识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并试图让德国工人阶级来学习俄国大罢工的经验中得出的理论结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崩溃立即阻止了考茨基向激进主义发展。在德国，他越是直接面临群众行动的论题，就越是拐弯抹角。他停滞不前，步步后退，丧失信心，越来越像一个迂腐的学究。帝国主义战争扼杀了所有的不确定性，直截了当提出了所有问题，暴露了考茨基的彻底政治破产。他立即在投票支持战争拨款这一最简单的问题上无可奈何地纠缠了起来。此后他的所有著作都代表了同一主题的变体：“我和我的困惑。”俄国革命最终杀死了考茨基。他一步步倒退，最终敌视无产阶级 11 月的胜利。他不可避免地投靠了反革命的阵营。他已经彻底失去了历史天赋。他写出的小册子越多，就越沦为资产阶级市场的低俗文学作品。

我们拆开的考茨基的书，发现它在外表上具有所谓客观科学著作的所有属性。考茨基以他特有的全部彻底性来调查红色恐怖问题。他首先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背景条件，以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促成残暴和人性发展的生理和社会原因。在一本专门讨论布尔什维主义的书中，共有 154 页涉及到这个问题。考茨基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我们最遥远的类人祖先以什么为食，并推测在主要吃植物性食物的同时，这个类人祖先也吞食昆虫，也许还吃一些鸟类（见第 85 页）。简而言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一

个值得尊敬的、明显是素食主义者的祖先会产生像布尔什维克这样嗜血的后代。这就是考茨基提出问题的坚实的科学基础！

但是，这类作品的经院学术外衣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恶毒的政治小册子。这是有史以来最具欺骗性和无良的书之一。乍一看，考茨基从哈瓦斯、路透和沃尔夫⁴的丰富餐桌上听到了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最卑鄙的消息，从而在他的学者头罩下露出了奸商的耳朵，这难道不令人咂舌吗？但这些未加修改的细节，只不过点缀了一下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领导党的生硬学术谎言的帷幕。

考茨基用最黑暗的语气描绘了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残酷，说资产阶级“没有表现出抵抗的倾向”。

考茨基丑化了我们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无情，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不同色调”。

考茨基把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描绘成一塌糊涂的局面。

考茨基把苏维埃工人以及普遍意义上的俄罗斯工人阶级都描绘成一群自负的人、闲人和懒人。

他闭口不谈俄国资产阶级背叛民族的空前卑劣的行为。它出于“教学”目的将里加⁵交给德国人；它也准备割让彼得堡；它呼吁捷克斯洛伐克、德国、罗马尼亚、英国、日本、法国、阿拉伯和黑人等外国军队反对俄国工人和农民。它用协约国的钱从事阴谋和暗杀活动；它利用封锁，不仅让我们的孩子快饿死了，而且还系统地、不知疲倦地坚持在全世界传播闻所未闻的谎言和诽谤。

他闭口不谈 11 月政变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政府对我党施加的卑鄙虐待和暴力。关于根据有利于霍亨索伦德国的间谍条款对党的几千名有责任感的工人进行刑事起诉，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与了资产阶级所有阴谋，关于他们与沙皇将军和

海军将领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合作，关于社会革命党人受协约国委托进行的恐怖行为，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用外国使馆的钱在我军组织的起义（这些起义在反对帝国主义君主帮的斗争中流产了），他只字不提。

考茨基还对以下事实只字不提：我们不仅多次宣布，而且在实践中证明我们准备为国家争取和平，哪怕是以让步和牺牲为代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被迫在各条战线上艰苦奋战，以保卫我们国家的生存，避免它成为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考茨基对以下事实只字不提：在这场英勇的斗争中，我们正在捍卫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俄国无产阶级必须花费自己的主要精力、最好和最宝贵的力量，暂时放下经济和文化建设。

考茨基的整本小册子甚至没有提到，先是德军国主义在谢德曼的协助和考茨基的纵容下，然后是协约国的军国主义在雷诺德尔的协助和龙格的纵容下，两者都用铁一般的封锁线包围了我们。他们占领了我们所有的港口，切断了我们与整个世界的联系，通过雇佣兵白匪军占领了富饶的土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切断了我们与巴库石油、顿涅茨克煤炭、顿河和西伯利亚粮食还有突厥斯坦棉花的联系。

考茨基对以下事实只字不提：在这些空前困难的条件下，俄国工人阶级不停地与敌人英勇斗争——近三年来，在 8000 俄里的战线上进行了战斗。俄国工人阶级成功地用剑代替了锤子，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为了这支军队，它动员了自己已经筋疲力尽的工业。而且，尽管国家已被破坏，世界上的刽子手注定要封锁苏维埃俄国，要挑起内战，但在这三年来，俄国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力量和手段，为数百万军队提供了衣服、食物、武器和运输工具，而这支军队已经学会了取胜。

考茨基在他关于俄国共产主义的书中对所有这些情况都保持沉默。而他的沉默是一个基本的、大写的、极其重要的谎言——不错，都是消极的，但比国际资产阶级新闻界所有骗子主动说的谎言综合起来还要罪恶，还要可恨。

在诽谤共产党的政策时，考茨基没有任何地方说他实际上想要什么或提出什么。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的舞台上并不是一枝独秀。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会不停看到，一些人在掌权，一些人在当反对派——社会革命党人（不少于五个流派）、孟什维克（不少于三个流派）、普列汉诺夫派、最高纲领派⁶、无政府主义者……所有“社会主义的色调”（用考茨基的语言）都果断地试验了自己的力量，展示了他们想要和能够做到的东西。这些“色调”五花八门，以至于很难让人在相邻的色调之间插上一把刀子。这些“色调”的来源并非偶然：可以说，它们代表了革命前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在最伟大的革命时代下的各种变体。考茨基面前的政治按钮看上去已经非常充足，可以指出赋予俄国革命正确性的马克思主义色调的那个按钮。但考茨基却沉默不语。他拒绝了让他听着头疼的布尔什维克曲子，却并没有寻找另一种曲子。原因很简单：这位苍老的演奏者根本就拒绝演奏革命的乐器。

注释：

[1] 马克斯·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最杰出的理论家，误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问题》（*Marxistische Probleme*）中，他指责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并用伊曼纽尔·康德的唯心主义知识理论“纠正”马克思。马克斯·阿德勒鲜明反映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堕落程度，并且拒绝革命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问题上，马克斯·阿

德勒是考茨基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在他的小册子《浪漫主义原则》

（Prinzip oder Romantik）中，他说：“社会民主主义的整个国际主义如果不以和平理念作为内政外交的中心，那么必然而且仍是乌托邦。”阿德勒闭口不谈促进阶级斗争和内战的必要性。——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1873 年 1 月 15 日—1937 年 6 月 28 日），奥地利律师、哲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中译者注

[2] 奥斯特里茨是奥地利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狂热支持社会沙文主义。——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弗里德里希·奥斯特利茨（Friedrich Austerlitz，1862 年 4 月 25 日—1931 年 7 月 5 日），奥地利记者。1887 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95—1931 年任《工人报》主编。1919—1931 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19—1929 年任宪法法院终身法官。1931 年在维也纳病逝。

[3] 莱特纳与奥斯特里茨两人的政治特点相同。——俄文版编者注

[4] 哈瓦斯社、路透社和沃尔夫社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通讯社，垄断了从世界各地收集的信息的传播。它们作为欧洲资产阶级的机构，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肆意歪曲俄国革命，编造了最荒谬的谣言：关于俄国共产党内部矛盾，关于人民起义反对苏维埃政权，以及关于红军崩溃之类的废话。它们很大程度促成了欧洲民主团体对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态度。——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哈瓦斯社，是世界上第一家新闻通讯社，今日法新社的前身。

[5] 德国人占领里加。1917 年夏天，某些俄国将领默许德国占领里加。这些将军希望德国突破彼得格勒，以此阻止革命进一步发展。——俄文版编者注

[6] 最高纲领派是 1904 年在社会革命党内部形成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恐怖集团，1906 年 10 月在芬兰奥布市召开成立大会，组成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最高纲领派无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

阶段，坚持立即实行社会革命党的最高纲领，即在实行土地社会化的同时实行工厂社会化。最高纲领派认为劳动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同时声明，在革命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而斗争的主要手段是个人恐怖。1907年，在恐怖行动接连失败和大批人员遭到逮捕以后，最高纲领派的组织开始瓦解。

1917年10月，最高纲领派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最高纲领派参加了苏维埃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久即告分裂，一些人走上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另一些人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于1920年4月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的决议。——中译者注

代后记

这本书付梓之际，恰逢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第一次大会后的几个月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官方的、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的立场在各地都受到了打击。共产主义的思想正在逐渐深入人心。官方的、教条式的考茨基主义名誉扫地。考茨基本人，目前在他创建的“独立”党的内部，略有权威，充当着一个相当可笑的人物。

然而，国际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意识形态斗争还只是刚刚升温。如果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教条式的考茨基主义目前苟延残喘，中派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正忙着与之决裂，那么考茨基主义作为一种小市民的态度，作为一种消极的传统，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懦弱，仍然在全世界各个工人组织的高层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那些倾向于第三国际，甚至已经正式加入了第三国际的政党也一点也不例外。

德国的独立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无产阶级专政，却在自己的队伍中容忍考茨基一伙人。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在理论上妥协并诋毁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活生生的表现形式就是苏维埃政权。在内战条件下，只要“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领导圈子虔信无产阶级专政，并借此无形抗议诺斯克、艾伯特、谢德曼等人公开的、可耻的背叛，而且反对将其视作（归根结底不能是）是选举和议会蛊惑的工具，这种共存就是可以想象的。

无形的考茨基主义的生命力在法国龙格派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让·龙格自己说服了自己，并长期试图说服其他人——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只有克里蒙梭的审查制度和我们的法国朋友洛里奥²、莫纳特³、罗斯默⁴等人的诽谤阻碍了我们的武装友谊。

但是，只要熟悉龙格的任何议会演讲，就足以看出，现在他与我们之间的鸿沟也许比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阶段时还要深。现在国际无产阶级面临的革命任务比五六年前更为严肃、直接、宏大、鲜明，而龙格派尽管在形式上回到了议会反对派的行列，但这些永远消极的议会代表在政治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反动。

意大利党虽然加入了第三国际，但绝没有摆脱考茨基主义。至于他们相当多的领导人只是依职权和在下层的强迫下穿上了国际主义的外衣。在 1914—1915 年，意大利社会党比其他欧洲政党更容易坚持反战，这既是因为意大利比其他国家晚了九个月参战，也特别是因为意大利的国际形势在它那里甚至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集团（广义的乔利蒂派⁵），这个集团直到最后一刻还反对意大利参与大战。这些情况使意大利社会党不用面临最深的内部危机，就拒绝了政府的战争拨款，并在总体上与主战派划清界线。然而，这样就推迟了党的内部净化过程。作为第三国际的成员，意大利社会党至今仍在其内部容忍屠拉蒂⁶及其支持者。这个非常广泛的集团——不幸的是，我们发现很难精确地界定它在意大利议会派别、新闻界、党和专业组织中的数量意义——代表了一种不那么迂腐、不那么教条、拥有更多的宣扬和抒情的机会主义，但这仍然是最糟糕的机会主义，一种具有罗马特色的考茨基主义。

由于有关国家的革命时机尚未成熟，所以要对考茨基之流、龙格之流和屠拉蒂之流抱持着的和解态度，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人规定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进行革命。但第三国际要求其支持者不是在语言上而是在行动上承认以下内容：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革命时代，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走向最大的动荡和公开的阶级战争，无产阶级革

命代表的任务是为这场不可避免的、即将发生的战争准备必要的思想武装和组织支持。那些国际主义者认为目前有可能与考茨基、龙格和屠拉蒂合作，与他们并肩站在群众面前，是在实践中放弃了从思想和组织上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起义，这点无论它是提前一个月还是推迟一年发生都是如此。为了确保无产阶级群众的公开起义不至于在迟来的寻找道路和领导权的过程中四分五裂，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甚至现在就必须学会接受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的全部范围，以及同各种考茨基主义和妥协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一个真正的革命派，即共产主义者，必须对抗所有优柔寡断且半信半疑的教条主义者、鼓吹者和消极的团体，巩固自己公开的、半公开的和严格的阴谋家的立场——首先是思想上的，然后是组织上的。何时与公开的和变相的考茨基派正式分裂，或将他们从工人党的队伍中驱逐出去的时刻，当然要视情况而定。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整个政策必须以这个方向为导向。

……所以，我认为这本书仍然没有过时——这对我来说非常遗憾，即使对作为作者的我来说不是如此，对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我来说也是这样。

1920年6月17日

注释：

[1] 1920年7月21日至8月6日，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7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会议除外）。39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大会。169名代表有决定权，49名代表有审议权。代表大会会有152名共产党员，其余代表被归类为“同情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整个欧洲的工人运动达到顶峰。所以，退出第二国际的（德国独立党、英国独立党、法国社会党等）社会民主党中派（考茨基派）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

大会，并提出加入第三国际。大会议程如下：（1）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前后共产党的作用和组成；（2）工会和工厂委员会；（3）议会制问题；（4）民族和殖民地问题；（5）土地问题；（6）与“中派”的新派别有关的立场及其加入国际的条件；（7）共产国际章程；（8）组织问题；（9）共产主义青年运动；（10）选举。

本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问题。辩论围绕执行委员会制定的 21 个条件展开。

这些情况导致中派政党分裂；他们中最具革命性的部分终于加入了共产国际，而机会主义分子则溜进了黄色的第二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无论是在其代表性还是在辩论的性质上，都证明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发展。——俄文版编者注

[2] 费尔南·洛里奥（Fernand Loriot，1870 年 10 月 10 日—1932 年 10 月 12 日），生于奥恩省瑟通镇（Ceton），1901 年参加法国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PSF），1905 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SFIO）。1906 年参与创建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CGT）旗下的教师联合会，1912 年担任教师联合会全国司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20 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执委会委员。1928 年参加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2 年因白血病逝世。——中译者注

[3] 莫纳特是目前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1922 年底加入共产党）。他战前革命工团主义分子，在战争期间召集了工人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反对派核心，反对社会主义和职业阵营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战后，莫纳特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但脱离了共产党。1922 年冬天弗洛萨尔集团离开后，他不再游离于党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 1] 皮埃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1881 年 1 月 15 日—1960 年 6 月 27 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法国总工会创始人之一，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当过印刷工人，1904 年与阿尔丰斯·梅雷姆（Alphonse Merrheim）共同创办《工人生活》（La Vie Ouvrière）杂志。起

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逐步转向社会主义。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十月革命接受共产主义，1919年4月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建立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 syndicalistes révolutionnaires）。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关系密切。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与苏瓦林和罗斯默被一起开除出党。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杂志。

[中译者补注 2] 吕多维克—奥斯卡尔·弗洛萨尔（Ludovic-Oscar Frossard，1889年3月5日—1946年2月11日），1913年因公开反对军国主义而被开除教职。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在党内是中派。1918—1920年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于1921—1923年担任总书记。1922—1923年任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年1月1日因拒绝退出共济会以及拒绝接受共产国际关于要求他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合作的要求而辞职，随即退党，另行组建统一共产党

（Parti communiste unitaire）。1924年同另一个小团体合并为共产主义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communiste）。后返回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8—1942年当选国民议会下议院议员。1932—1935年任朗香（Ronchamp）市长。1935年退党。1935—1936年任劳工部长。1936年参加共和社会主义者联盟（Union socialiste républicaine）。1938年1月18日—3月10日任国务部长，同年3月至4月任新闻部长，4月10日至8月23日任公共工程部长。1940年3月21日—6月27日再次担任公共工程部长，同年6月兼任运输部长。1940年7月投票赞成贝当出任国家元首。法国沦陷后拒绝进入维希政权工作，但仍留在国内从事新闻工作。二战结束后，在法庭上被判无罪。1946年去世。。

[4] 罗斯默与莫纳特走了相同的政治活动道路。前者不同于后者，在1919—1920年就打破了工团主义的偏见，并在1920年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随后几年，罗斯默在法国共产党内积极捍卫共产国际的路线，是法共左派领导人之一。——俄文版编者注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

月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 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

[5] 乔利蒂派追随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老领袖乔利蒂。在1914年战争期间，乔利蒂坚持认为意大利不应参战。乔利蒂曾多次担任总理。现在他反对墨索里尼。——俄文版编者注

乔万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1842年10月27日—1928年7月17日），意大利政治家。早年加入“历史性左派”（Historical Left）。1881—1928年任意大利王国议会议员。1890年任财政部长。1892—1893年、1901—1903年、1903—1905年、1911—1914年、1920—1921年任内政部长。1892—1893年、1903—1905年、1906—1909年、1911—1914年、1920—1921年五次担任意大利王国首相。——中译者注

[6] 屠拉蒂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最初几年，屠拉蒂是社会党左派。在随后的政治活动中，他是意大利改良派的领袖。早在战争期间，他就反对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反战路线。近年来，屠拉蒂领导公开的社会叛徒。塞拉蒂派脱党后，他成为意大利社会党的领袖，实际上此时的社会党已经勾结法西斯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 菲利波·屠拉蒂（Filippo Turati，1857年11月26日—1932年3月29日），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创始人之一，改良主义者，一战期间采取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立场。——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2] 贾钦托·梅诺蒂·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1874年11月25日—1926年5月10日），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党报《前进!》（Avanti!）编辑，一战期间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十月革命后率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入选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社会党分裂后，留在社会党内，1924年再次率社会党左翼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并入选意共中央。——中译者注

